

凤凰周刊文丛

CPC Anti-corruption Lesson

大浪淘沙

中共治腐啓示録

凤凰周刊 编

《鳳凰周刊》授權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凤凰周刊文丛

CPC Anti-corruption Lesson

大浪淘沙

中共治腐啓示録

凤凰周刊 编

《鳳凰周刊》授權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目录

编者按：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纸牌屋”

一、“雷雨齐鸣”中共治腐

中共反腐“雷雨齐鸣”，令风气更新

王岐山脸谱

王岐山政协反腐报告直击

中纪委2013反腐实录

中共治官宽严两难

中共反腐大数据——十八大后高官整饬启示录

高官贪腐犯罪现状及规律——以十八大后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为样本

二、落马高官内幕解密

1.解密薄熙来

薄、谷、李家族联姻探秘

薄熙来、谷开来与王立军的纠葛

薄熙来重庆“遗产”再调查

谷开来海外关系网起底

2.徐才厚往事

从长兴岛到哈军工——徐才厚往事

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

3.周永康的石油帝国

开篇语：朋党周永康

草莽周永康

周氏石油圈

周永康四川布局

“少主”周滨的财富帝国

周永康认罪

苏联式干部任用制度亟需改革

——专访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十年政法“大管家”：法治且行且困顿

4.起底谷俊山

谷俊山贪腐内幕

起底谷式军产腐败

5.蒋洁敏“商仕”末路

三、“老虎”的各色沉浮

郭正钢沉浮录——“最年轻少将”和他的商贾妻子

副处级亿元贪官是如何炼成的？——马超群覆灭

记
景春华："小节"不严的省委秘书长落马
争议周文斌案
高劲松：平庸政道亦落马
漯河政协常委王华涉黑案内情
徐钢的双面人生
唐山前市长陈学军的黑金江湖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落马幕后
四、风起云涌的各地官场
晋吏再洗牌
山西公安系统地震背后
河北反腐：廊坊初现官场地震
内蒙古官场反腐升级
新疆"打虎拍蝇"提速
五、海外"猎狐"艰难破局
开篇语：程慕阳沉浮录
程慕阳河北往事：权力庇护下掘金
程慕阳流亡记：地产富豪的末路
程慕阳案再起波折

解密国际通缉令里的中国贪官：数量超过50，十八大后大增
贪官外逃“封锁”指南
外逃贪官为何钟爱加拿大？
大陆海外追赃难题
大陆反腐赃款赃物处置谜题
欧洲引渡艰难破局
追缉外逃贪官倒逼权力结构改革
“猎狐行动”提速中外警务合作
国际反洗钱组织：中共海外反腐“外援”？
中澳联手追捕贪官内幕
澳方热情降温？中澳联合追逃面临考验
中共反腐或终结海外“逃亡天堂”——逃澳贪官十人录
高严外逃“罗生门”——百人名单之外的著名逃澳贪官
五、反腐风暴冲击业界
解密大陆航运业贪腐“黑洞”
大陆电商反腐风暴升级
吏治风暴冲击景德镇瓷业生态

内地肃贪波及澳门博彩业

澳门赌业：站在中共反腐漩涡的边上

版权信息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5©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5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00110177-0141-150905

最后修订：2015年 09月05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编者按：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纸牌屋”

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雷雨齐鸣，重拳频出，一系列腐败案件被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有力地震慑了敢越雷池者。

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苏荣、令计划等5位副国级高官落马，查处如此高级别的干部表明中共反腐决心坚定，让百姓增强了对反腐工作的信心，顺民意，大快人心。

不过，要清醒的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中国把反腐败作为必须打赢的、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较量。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法必依，打虎拍蝇，法律适用于所有人。

一些国家认为中国腐败是权力斗争，为逃出去的腐败分子提供庇护。对此，习近平总书记9月访美时直接回应，中国反腐“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的这句话，从深层次阐述了党员干部增强自身免疫力，对于强健党的肌体，增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性，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高度，阐明了为官清正与政府清廉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诠释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新理念、新思路，意义深远，发人深思。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诚哉斯言！振聋发聩！一个党的干部，腐化堕落首先总是从自身的蜕变开始的。或恋权，或贪钱，或好色，或嗜酒，或使气，忘乎所以欲壑难填，就会以权谋私，不能自己，违纪犯法，最终弄得身败名裂。每一位党员干部能否做到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中共反腐势必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近两年，《凤凰周刊》对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案及海外追逃的独家报道在业内影响颇巨。现特将这些报道梳理分类，集纳成册，以飨读者。

一、“雷雨齐鸣”中共治腐

中共反腐“雷雨齐鸣”，令风气更新

文 / 薄智跃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反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体现。由于习近平曾担任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因而报告本身可能更多地反映着习近平的看法。这说明在准备十八大的过程中，习近平已经对腐败问题有了很清晰的认识，要下决心整治腐败。在此之后两年内，中共掀起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就不难理解。

从与反腐有关的人事配备上，就能看出习近平新的想法。王岐山作为著名的“救火队员”，以及对处理危机问题能力极强的中共官员，习近平将其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既显现了政治决心，同时也有了一个相对得心应手的干将，反腐稳扎稳打。

在十八大后的第一年，外界更多的是只听见口号，“只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觉得只是说说而已。而从2013年开始，在相关证据掌握足够之后，反腐大案一个接一个地曝出。

习近平在机构调整方面也有值得一提的变化，尽管一些举措也并不是完全的新举措，在十八大之前也已经在做。一是在中共十六大以前，地方的纪委书记一般都是本地提拔，到了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期，纪委书记跨省交流逐渐增多。

习近平将王岐山任命为中纪委书记之后，中纪委的权力变得更加集中，各省纪委书记不仅是跨省交流，而更多是从中央空降。同时，中央巡视组的权力也比以前更大：2013年的两轮巡视、2014年的两轮巡视，巡视组直接向中纪委汇报。

在此之前，巡视组尽管由中央委派，但在相当程度上还需要跟地方的领导汇报交流，因而一些案件可能会受地方施压。但这次巡视组直接向中纪委汇报。为了加强中纪委的直接领导，对一些地方在巡视结束后又派中纪委副书记进一步复查。

2013年与2014年的巡视组工作也有不同。总的趋势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巡视组依靠地方的配合越来越少。2013年的巡视组工作中可能与地方的配合还与十八大之前的巡视工作更类似。由于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地方的配合对于迅速了解地方情况是很有帮助，能很快进入状态，

但问题是可能会受到地方领导的影响。

苏荣案就是一个例子。以前巡视组就已有人反映过他的问题，但由于当时他身为江西省委书记，巡视组的运作方式又是中央和地方衔接较多的模式。如今，中纪委开始在这一模式上有了变化，且苏荣已不再是江西省委书记，再派巡视组进入江西，这样就顺利地将其过去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在中国，反腐有其天然的合法性，每一代领导人都在强调反腐，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表现出广度与深度的空前性。

现在受到查处的，有一些是党员干部中做事的官员，因为一旦要做事，就会牵扯到各种利益。所以，现在流行一种更安全的做法是，能少说就少说，能少做就少做。

“不作为”现在成为新问题。在全国反腐的情势下，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出贪官，会被认为有问题。由于反腐的力度加大，党员风气为之一新，过去一些炫富、铺张等行为受到遏制；但另外一个相应的变化是，在反腐压力下官员变得消极怠工。怎样找到一个既能够保持干部队伍清廉，又能保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的方法，是摆在中共和习近平面前的一大挑战。

除了反腐，习近平两年来另一要务是治党，最主要的内容是一年多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又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由于“八项规定”抓得紧，规定明确，容易查处，对各地党政部门产生很大影响。通过群众路线以及反腐运动，通过“八项规定”、巡视组的工作等，习近平的公众形象逐渐建立起来。

十八大之后，省级官员变动也呈现出特点。由于反腐力度的加大，省一级同时由于各种原因调动的官员目前已经达到65人。在这65人中，从中央空降的比较多，省际之间交流的也比较多。且这种交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以前更多的是副书记交流，而现在更多的是副省长。以前交流的频率较低，一般都是专职副书记进行交流，数量上也有限，现在更多的是副省长交流到另一地区进入省委常委，且被交流的官员更加年轻。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精英政治问题专家）

王岐山脸谱

记者 / 吴如加　林子敬

王岐山准备用五年时间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为党风的根本好转打下基础。过往一年，王为带头遵守中央规定而推掉了各种人情往来，为避免与老友生疏，王岐山夫妇宁愿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
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他曾对友人称，因为年龄原因，或将只担任一届中纪委书记。本届任期五年，他将以“倒计时”的心态，逐步往前推进，力争为彻底扭转风气、遏制腐败打好基础。

因过往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舆论普遍将王视作解决问题的高手。此次中共决定安排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解决最棘手亦最迫切的腐败问题。履新中纪委后，王岐山在一次座谈会中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接下来，在他执掌中纪委的这一年之内，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

纪检是王此前工作经历中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

黄江南非常确定：“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

多次提到美剧《纸牌屋》

坐镇中纪委之后半个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反腐工作的建议。在会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了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了。他希望在场专家们免去这样的客套话。

诚如黄江南所言，王岐山告诉专家们：“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要求内部开会时多谈问题，不讲大道理，要求做报告的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工作实、作风正”。曾参加过这样会议的人称，发言人被王岐山问倒十分常见。

该知情人士表示，王岐山非常低调，在媒体的上镜率不高，一般上镜时也都是谈反腐败的问题。为此王岐山多少给民众留下“不苟言笑”的

印象，但王本人私下幽默风趣，才思敏捷，会和下属开玩笑。只是这样的幽默和玩笑涉及腐败议题都会收止。

王岐山针对现在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王认为纪检干部知识结构要全面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查案情况。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

此外，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凤凰周刊》2013年总第470期曾详细介绍此书）、《大清相国》等书。

《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近期王岐山还曾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美国政治剧《纸牌屋》。《纸牌屋》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描述众议院和华盛顿的权力角逐。消息称，王岐山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党鞭”（Whip）一词源于英国，指议会内的表其政党的领袖人物，负责督导同党议员，并维持议会党团纪律，多为党内权威人士。政党的“党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王岐山重视网络建设，认为中纪委作为权威机关，必须注重通过网络拓宽和民众联系的渠道。过去监察部网站排名比较靠后，王来后表示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否则不可能把中央反腐倡廉的决策以及成果宣传出去，也难以反映群众对反腐的要求和建议。

据透露，过去中纪委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也做过在线访谈，但是最高只派出过正局级副主任。现在副书记、常委等人都在中纪委监察网站做过在线访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在开会时告诉工作人员：“你们统统都要到纪委监察部网站去做在线访谈，宣传党的反腐败主张。”

据知情人士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纪委平均每天会收到800来件信访，王岐山要求件件有着落。接访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中纪委没有增加一个编制。王岐山要求局级、处级干部以及各科室的主任都必须要接访。过去没有接访任务的某科室被分配了三个人的指标，需要轮流接访，日程表已经排到了下个季度。

在接访问题上，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把上访民众当亲人，

把接访当作纪委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给老百姓办好事”，接访时不能来回踢皮球。有工作人员总结了一套“接访礼仪”：“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的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大哥’，比你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王岐山准备用5年时间为党风、纪检工作打下基础，5年内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此亦是本届中纪委的中心工作和基调。即使在周末，中纪委工作人员也可能需要向王传送资料。王本人则时常强调，中纪委繁杂的反腐工作方针皆是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安排。

在家中做饭招待老友

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为中共整顿党风以及反腐的总执行机构，反“四风”亦成为中纪委下半年重要的部署。

王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今年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带头遵守中央的规定，在一些事情、细节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2013年5月底，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会员卡。一位王岐山的老友告诉《凤凰周刊》，前些年有个国企老总曾送过一张高尔夫球场荣誉卡给王岐山，王从未用过。王想起此事后，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来退回去。该国企的老总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企业股权都已卖光，没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坚持，无论如何，必须处理掉。

王岐山的工作风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不急于求成。对此，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解读为：“小作风问题都不让犯，更何况大腐败？”

11月21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这是中纪委继治理公款买月饼、寄贺卡之后，对公款消费进行治理，持续反“四风”的又一次规范，被中纪委内部

称之为“一个节一个节”推进至此。

此时距离春节尚有两个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提前两个月下达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业企业开始为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等礼品准备原材料甚至下单，避免浪费。这表明此类规范绝非作秀之举。通知强调“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旁边特别用括号注明：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称得上用心细致。

2013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纪委人员形容今年中纪委的行动如铆钉般层层“钉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结束，这份5年时间表预计或即将于近期公布，或将有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出台。

公社里的读书人

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上书中南海农村改革，到莫干山会议，之后广东挽救金融，北京抗击“非典”，最新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同样令王收获颇多好评。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1969年元月，21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后，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对这段艰苦的生活仍记忆深刻：“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辘辘饥肠无从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劳作也清寂单调，读书是当时不多的休闲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记得王以石板为桌看理化数学，其中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

据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这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顺”来的。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王岐山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王留了下来。

读书的爱好一直伴随着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公开称讨厌听别人讲套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

不如多看几本书。”他尤其偏爱历史和西方经济学。

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王岐山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

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王岐山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

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也好，姚依林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陈云说要反对改革。"

王岐山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

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

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

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

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

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

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

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实习生林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岐山政协反腐报告直击

记者／蓝艺　特约撰稿员／杜杨

8月25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七次会议开幕，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让外界意外的是，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竟然也坐在了主席台上。

多位与会者事后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政协常委们会前曾得到通知，此次会议将讨论反腐问题。但很多常委都没有想到，王岐山会亲赴会议并做报告。随后，王岐山以他一贯的“王氏作风”，抛开了会议已经准备好的、“很长”、“没味道”的书面报告，脱稿开讲。

与会者向《凤凰周刊》记者复述了王岐山报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个要点。



八项规定：小题目，大文章

王岐山首先对自己的到来做了背景介绍。他说：

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协工作时，提了个建议——政协会议应该有一个谈反腐倡廉的议政话题——得到总书记支持；俞正声主席就邀请我到政协来做这个报告，他说，既然是你提议的，就由您老人家来

讲。没辙！就这么着，来了。

一番开场白后，王岐山开始切入正题。

既然是政治协商，要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政协的监督反腐倡廉工作就应该是一个重要课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谋篇开张，应该说基本都做到位了。我今天不讲太多，先从八项规定这个话题切入。我说的话的作用和功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话引子”（编者注：北京方言，与“药引子”、“面引子”一个系列，意为抛砖引玉），然后请大家讨论，发表真知灼见。八项规定虽是一个小题目，却是一篇大文章。十八大的基本精神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百年”、“中国梦”和“民族复兴”，但是这一切从哪里落脚呢？中央认为，从自身抓起开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中央让我管这事，我琢磨了半天，从哪里管呢？

说到这儿，王岐山讲了一个小插曲。2013年3月22日，王岐山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据当时新华社发出的新闻提到，王岐山“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上，王岐山向全体政协常委生动描述了当时见面场景：

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8300万是一个相当于中等偏大国家的人口规模。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

说到这里，王岐山话锋一转：我的观点就是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这就是我的信条。

王岐山在时隔一年半以后，用中共近一年多来的反腐成就回应了基辛格的调侃。

接着，王岐山谈了为什么反腐要从八项规定入手：

反腐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立竿见影。八项规定是很具体的，一点都不抽象，而且政治局常委就带头遵守。中央过去不知有过多少规定，但都是不了了之；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工作，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抓得住、抓得牢，而现实是非常严峻的。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在各地引发的反应令我很吃惊。各地的政研室闻风而动，我们共产党的机关是不缺政研室的。政研室把电脑里的文件调出来，七改八改就出台一堆规定，根本没有“抠”住八项规定的具体条文及实质。

因此，各地反映说，这些规定太快、太宽、太严。我问他们：你们做得到吗？坚持得了吗？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还是一阵风、刮过去就算完了，没有认识到这是关乎人心向背、是作风根本转变的宝贵机会。2013年两会期间，我们开始抓这个事儿，仅仅是牛刀小试，还要更快更严地落实。大家都要认识到，这是关乎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坚持做到八项规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我们要“扭住”这个事情。

八项规定要做成本届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上交的“名片”

王岐山还谈了在抓八项规定、党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故事。他说：

做具体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想了一些办法。去年“五一”长假到来之前，我们让中纪委约谈各部委，我找了两个单位亲自约谈，财政部和国资委。这两个部委领导来了之后，拿了一大堆文件，说财政部系统怎么样怎么样，国资委系统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甭跟我谈系统，你们就谈谈你们办公大楼里这点事儿，我就要看你们自己是怎么落实八项规定的。

还有一个关于月饼和贺年卡的故事，王岐山说：

在今年八月份到来之前，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月饼问题，得到总书记很好的呼应。月饼是个小事儿，但困扰我们大家很久的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当市长的时候就发现，月饼已经和交通有联系了，从东城送西城，西城送北城，转圈儿送。而且，送来送去，发现篮子里变得无奇不有。月饼篮子里有手机、有钱、有金银首饰。我还专门去天津走访了月饼厂，他们反映，月饼越做越贵，鎏金的、包金的，里面放这放那的，越来越不像话。以后新年到来之前，我们要开抓贺卡。贺年卡也是越做越不像话，常委的压力很大，每个人得写三百多张。我在常委会说了这个事之后，下午就通过了这个决议，大家都很支持。

继而，王岐山在讲话中透露了中央高层关于反腐的一些深层和缜密思考。他介绍说：

习总书记在提出八项规定之后，开始提出公私要分明。有很多事情很具体，比方说要出差，走哪就在哪儿吃。总书记说，我们要不要交钱？交多少钱？你八项规定这么细致，就是要求公私要分明。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也越来越细，2013年常委开始联系省一级，到2014年常委开

始联系县，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业绩），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五年。

八项规定是我们输不起的战斗

对下一步反腐如何标本兼治，王岐山的态度很坚决，并表现出对目前实际工作的胸中丘壑：

反腐败要讲“不敢”、“不能”、“不想”；今天我讲八项规定也要从这个角度，要使党员干部“不敢”、“不能”、“不想”贪腐。反腐中的“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我们要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八项规定的成功与否，已经变成一场输不起的战斗。

这时，会场上对中央反腐的高度认识和决心给予了热烈掌声。

王岐山在谈到八项规定查处问题时，又诙谐了一把。他说：

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就像戒烟戒酒一样，能一下就不抽、不喝啦？所以不要那么急着说“不想”，我觉得我们现在把“不敢”和“不能”做到就行了。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经初见成效。这次我到政协来，就想给大家出个题目，让大家帮我一起研究一下怎么能做到“不能”？从“不敢”阶段向“不能”阶段迈进。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会场上笑声一片。可见，作风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必须联系到自己、严格律己才能真正改变。

谈到反腐中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王岐山说：

为什么能做到“不敢”呢？我觉得监督作用发挥了很重要的效果。过去，我们都是自上而下来监督，现在颠倒了，由于有微博、微信、媒体的监督，现在是从下而上，不一样了，现在网上的反应非常的迅速，非常普及，而且（对公款大吃大喝）一直能拍到屋里。听说有的媒体是给了稿费、给好处费的，你能帮我拍到哪个官吃饭、哪个单位的发票，给你多少多少钱，所以把服务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所以他们真拍

啊！加大了惩处的力度。（对腐败问题）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到目前为止，中纪委已经曝光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1600起，涉及人员67600多人，非常有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发挥监督的功能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作风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弄不好就成了一堵墙，把人民和党分隔开了，把党组织和群众分隔开了。

王岐山还谈到了制度创新反腐，他说：

近平同志在中纪委会议上专门讲了“二十五个不能”，这是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党风直接影响到政风，也直接影响到民风和社风。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都跟党风有重要关系。当然，党风建设要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现在有一些制度创新的问题，我问财政部了，到现在为止，出差的规定还没有改，是几十年以前定的，这怎么行啊？现在有同志提出来了，我儿子结婚我也不能摆酒席了，这车怎么坐？我也在问我自己，我跟同志们讲，我们现在也不能自己开车，我也不能有私人车，我去办私事怎么办？要不要交钱？有人问，反腐治标、治本，有无时间表？我就说一句话：反腐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又是满场的掌声。

王岐山与政协委员互动：党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有起点无终点

据与会者透露，王岐山政协报告用时总计约七十分钟，其后，会场气氛进入另一个高潮。依照会议说明，“话引子”结束，30分钟现场提问回答互动开始了。

政协礼堂中的常委会会议厅，每个座位上都设有发言的麦克风，但很多政协委员从来没有使用过。政协常委与会议报告人这种提问互动议政的场景，也极为罕见。在本届政协几次常委会上，大家还没有用过麦克风。因此，当大家学会使用麦克风底座按钮提问模式后，会场上出现了很多踊跃抢麦提问的手臂。

坐在第六排的葛剑雄常委抢到第一个提问，紧接着，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广东侨联副主席李葳等，都成功抢得提问权。一共八个问题，包括：目前反腐败、“打老虎”形势是怎样的？中央反腐有无治标和治本的时间表？推进反腐过程中，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怎样划界？等等，问题不可谓不尖锐。但与会者认为，王岐山的回答不回避问题实质，开诚布公，充满政治智慧。

王岐山逐一回答到：

——93年以来，我们说反腐倡廉问题非常严峻，现在我们在严峻后面加了一个词，叫“严峻并复杂”。我们叫有腐必反，有贪必查，对贪污和腐败零容忍。说句老实话，贪污的问题古往今来，哪国没有？哪个朝代没有？前段时间见一位丹麦的外国朋友，丹麦人说他们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贪污，我说没有可能啊，有规则就有潜规则。当然我们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增量问题，我们要求增量的问题更要严查。什么叫增量？就是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继续贪污腐败的人，要严查，要从重严惩；再一个，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的，必须处理，从重严惩；第三个，重要岗位上将要提拔的干部，决不能让他们“带病”上岗，不行就得处理。

——怎样摆正党纪和国法的关系，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们一起来研究。刑法和党纪有重合、有矛盾的地方，在法律上就要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党纪要严于国法。

——大家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有人说）反腐以后，基层干部不作为了，（也有人说）不干活了。我问你们，不作为和乱作为，哪个对我们党的影响更大？哪个的现实影响危害性更大？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整治的是乱作为，不作为要不要整治？要整治，但是首先要把乱作为整治了。在整治乱作为的问题上要有紧迫性。我们才开始两年，不作为的问题大家不要太急，还要靠制度解决，还要靠思想教育，但是乱作为就不行！

……

政协常委们以热烈掌声回应了王岐山的每次精彩回答。

王岐山的会议讲话一向生动、深刻、且不乏幽默，这在党政干部中是有口碑的。本来很严肃的反腐话题，政协常委们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还时常发出会心的笑声，现场掌声不断。报告把当前反腐和作风问题讲的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既斩钉截铁地表明了中共中央长期反腐的决心，又让大家知道中央完全掌握目前反腐中出现的新问题。

有位与会的政协常委给记者念出了在会议现场有感而发的对联：妙语连珠，字字千金，满堂彩；情真意切，掷地有声，动精英。

一位政协常委说，王岐山同志性格坚毅，但在工作中却是从善如流的。如在此前一次会议上，他就曾向王岐山同志建议，在全国、全党大面积铺开反腐的同时，还要从“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角度来考虑“监管监管者”问题。他感觉到王岐山对他的建议听的很认真，其后，大家也看到了

中纪委内部建立自我监督机构、查处内部违纪人员的新闻。

十八大以来，中共执政新风不胜枚举，反腐倡廉、深化改革，件件大事迅速铺开，齐头并进，让人目不暇接。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也开始有一些变化，如各地方政协主席均已不再担任省（区、市）委常委职务等。同时，地方纪委相当一部分职权已经与省、市剥离。这都被认为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的表现。

今年8月下旬，全国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史无前例地讨论了一个“局部项目”——传媒改革，引起舆论界高度关注。坊间还在消化此件大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前往全国政协做报告，谈反腐倡廉，一下又成舆论热点。大事、新事接连发生，也许可算作中国政经体系最新词汇“新常态”的浅显解释吧。

有理由相信，王岐山在政协的报告，标志着目前中国反腐已进入“新常态”。

政协主席俞正声在8月27日的闭幕会上，也做了生动报告。据与会者回忆，俞正声的发言很真诚、很简洁，同样受到了委员们的好评。他主要谈了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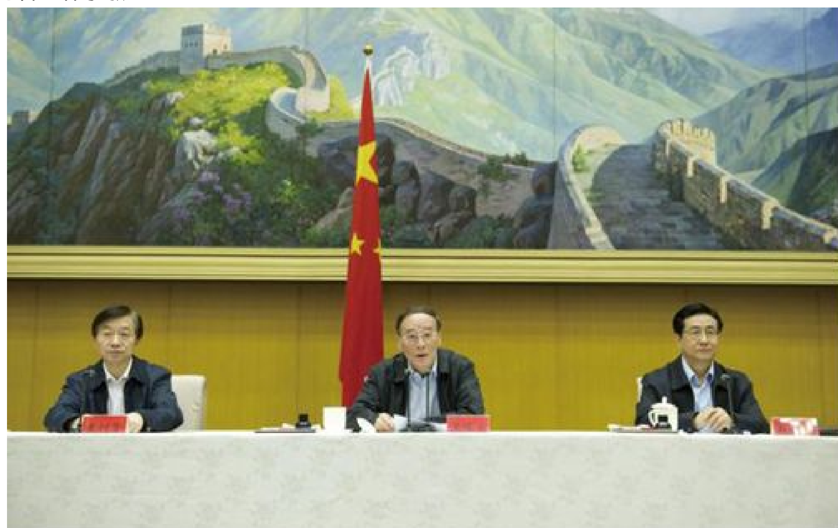
第一，我们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坚决拥护。有人说，现在这种“每周一星”的情况何时是头呀？说明我们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的贪污腐败的形势也是前所未有的——如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案件。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了！不然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丑陋的现实，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这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现在有人说，反腐以后，有的基层干部不干活了，也有怕得罪人不干活了，怕被别人检举。领导要参与到活动中来，身先士卒，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政协委员要严于律己，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政协委员，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民营企业家不要和官员勾勾搭搭，应该正大光明做生意。我主张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官。

中纪委2013反腐实录

记者 / 林子敬



2013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因贪腐落马，至此中共十八大以来，11名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因涉嫌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包括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蒋洁敏、季建业和廖少华。

作为本届中共中央反腐行动的执行机构，中纪委在廉政宣传、作风建设以及打击腐败层面的高压反腐姿态，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从苏联模式到异体监督

中纪委副书记张军11月5日在中纪委监察部官网的在线访谈中表示，今年1至9月，各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7万件，同比增长10.1%；处分10.7万人，增长13.1%。各省纪委也“晒出”反腐成绩单，比如广东查处地厅级干部29人、县处级干部242人。中纪委监察部官网高频更新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信息，从地方官到“封疆大吏”，被纪委调查的官员涉及医疗、建筑、教育、交通等各个领域。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3条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在反腐败问题上，大方针和路线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纪委贯彻并落实党风和反腐事宜。在中共中央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今年中纪委反腐不再柔性强调“预防为主”，而是更为严厉地突出“主动出击”和“严惩查办”，一位纪委官员称，过去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为一些小案子影响不大，不屑于去查，现在查案则

是“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反腐的同时，中纪委也重视铲除腐败滋生的文化根源，如“改进四风”。一年间，中央纪委下发纪律通知，包括清退会员卡、禁止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以及10月份严禁公款购买贺年卡等物品。有消息称，中纪委正在组织安排起草反腐败、反浪费的若干问题规定，将作出详细、具体和严格的要求。

王岐山主政中纪委后，中央巡视组亦成为今年的“热门词汇”。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2013年的4月份、9月份，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次听取巡视工作情况汇报。张军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王岐山先后6次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2次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会上发表讲话，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部署。

王岐山强调，巡视组的重点放在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权力寻租腐败以及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纪律作风腐败。中纪委副书记张军在线访谈时亦表示，目前中纪委正在研究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今年6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和《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巡视组加强对各个省市、各级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在调查时“下沉一级”，对一把手任职过的单位进行巡视。

此外，王岐山在巡视组内部引入竞争机制，组建组长库，实行“三个不固定”：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巡视组组长不再固定于“一座山头”，而是“一次一授权”，也避免巡视组组长在固定范围内权力过大而导致腐败。

王岐山在鼓励巡视工作人员时坦言，巡视工作是苦活、累活和难活。巡视人员在各地还会受到官员的威胁，有些民众也质疑巡视组工作的成效。

10月23日，王岐山在部署第二轮10个巡视组的工作时强调“未发现问题是失职，不客观汇报是渎职，必将追究责任”。张军称要求非常高。记者亦获悉，今年中纪委的许多工作人员公差较往日更为频繁。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加强巡视组是反腐关键，因中共30年来纪律检查体制都沿用了苏联模式，所有的监督都是同体监督，没有异体监督。实践证明同体监督是一种低效、无效成本很高的监

督，而巡视机构就是30多年来监督支点迁移的一个异体监督的成功示范。“王岐山虽然没从事过纪检监察工作，但看到了巡视制度的异体监督功效，因此就加大了巡视的力度以及巡视制度的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体制改革平衡纪委双重领导

一位地方纪委官员告诉记者，“现在反腐败锁定证据越来越难，因为腐败分子作案的手段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期权化的趋势，给办案带来很大的压力，官员的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追回的难度巨大，基本上不可能追到。”

中纪委虽反腐决心高涨，但是地方官场的情况却更为复杂。海南省某县处长陈哲（化名）向《凤凰周刊》透露，其所在县的纪委本来从上级获批了包括副处在内等3个领导职务，但是党委直到现在还没有为其安排人。他认为，地方党委不希望给纪委太大的权限，影响领导权益可能是原因之一。

一位县级纪委官员亦感慨办案难度。县市地区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裙带风严重，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随便查处一个干部都可能遇到巨大阻力。相较之下，省级纪委回旋余地更广，中纪委则更超脱。因此目前中纪委在制度改革上的着眼点或许是如何唤醒基层纪委的监督职能。

对此，一些专家认为，反腐改革的方向是实现纪委体系的“垂直单列管理体制”。目前纪委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行政上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业务上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种管理体制被认为导致地方纪委无法有效对同级党委行使监督权。

11月13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中纪委常委会决定研究制定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单列管理没有被提及。根据公布的《决定》，纪委将通过完善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规定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一位纪委官员表示，纪委是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党章》没有作出重大修改之前，不可能脱离同级党委的领导。此外，纪委如果实行垂直管理，也会因为纪委权力过大而面临“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任何失去监督的权力都可能导致腐败，纪检权、监督权也不例外。”他认为纪委系统的单一垂直管理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实现。

在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下，某个层级的党委会有上一级纪委的巡视组负责监督。对此，一位中纪委人士称，即便在理论上没有监管漏洞，但是最好的做法还是加强该级党委身边同级纪委的监督权力更有效。“靠上级监督，太远了。巡视组也不是常来常往。目前比较可行的改革是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在用人等重大事项方面的监督权。”

目前纪委体系改革的目标是纪委的派驻单位。海南省一名纪委官员称，海南省各厅局都有纪检组，属省纪委领导。但目前他们的人事、工资关系都在驻在部门，不在省纪委，这样他们开展监督就不超脱，必须看驻在部门领导的眼色行事，今后应该将这支队伍收归上级纪委统管。

目前各省市已有相关的试点在进行，比如湖南省市一级有常德，县一级有醴陵市。虽然还在试点阶段，但是都有中纪委的授意。在试点问题上，据说对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等都在调研和论证，届时将改变反腐的被动局面。

“双规”全程录像

“当前中纪委的工作思路在发生变化。过去中纪委对腐败官员是一查到底，将该官员所有的罪证都查清楚后再交给检察院。现在只要有足以定性的贪腐证据，那么最后该官员到底贪腐了多少资金则交给司法机构调查。”一位接近最高检察院的人士向《凤凰周刊》的记者透露。

中纪委的直接反腐对象只限于省部级官员以上，有消息称，只要掌控某干部贪腐50万的证据就能定性，而地方纪委掌管的定性标准是5万元。纪委在调查过程中对可能会出现的连带关系人也不亲自调查了，同样交由司法机构处理。

某纪委人士分析，过去在反腐问题上，中纪委负责到底。司法资源能被中纪委任意调遣，过去中纪委可以在任何地方抽人办案，比如过去中纪委特别喜欢调用衡水的检察官，觉得他们好用。但是现在纪委和司法机构的职能相对更独立。

另有纪委工作人员也表示，现在纪检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只要发现了足够移送司法机关的证据，最好马上移送司法部门。如此，既能更加超脱，以便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查办新的案件，另一方面也能尽快让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以避免非议。这是当前纪委注重效率优化的思路转变。

中共的反腐模式是以纪委为核心的模式，党内作出处分决定后才会将案件交给司法机关。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称，这意味着中纪

委的权力极大，特别是对党员的“双规”权力。“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是纪委实现党内自净的重要调查手段，但是纪委“双规”的权力在法学界一直有所非议，因为期间可能会出现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林喆表示，中纪委使用“双规”权力时确有章法可寻，因纪委内部条例规定，在“双规”期间被审问官员要进行日常身体检查记录，还需全程录像，以防刑讯逼供：“我自己走访地方时也参观过用于‘双规’的场所，其实很人性化，环境并不恶劣。”一名地方纪委官员向记者证实这些章法绝大多数都落实了。

县级纪委就拥有“双规”的权力，但审批权被上收，以防止地方纪委滥用调查权，但若案件线索具体、证据确凿肯定会被批准。

而另一名地方纪委官员透露，过去纪委“双规”进行询问时可能会有上级领导授意，如果贪腐官员交代的事情涉及到某某领导时必须要制止话头，即便说出来也不会被记录。全程录像后这种事情就难做了，因为笔录删节不会有破绽，但是影像删节会有明显的痕迹。

即便如此，仍然有纪委人员无视章法。8月17日，浙江省衢州市法庭举行了一场罕见的审判：6名纪委工作人员因为在“双规”期间有使用刑讯逼供的嫌疑而站在被告席上。9月30日判决公布，6名涉案纪委人员分别获刑4年到14年不等。此案或能反映中纪委要求严格依纪依法办案、安全文明办案的意图。

此外，在反腐思路的效率优化外，中纪委积极的纪律建设意在还原其根本职责，包括新班子上任后强调的“八项规定”、走群众路线以及党内民主生活会等，其实都是重新贯彻过去共产党一些好的“风纪规定”。

全方位争夺民意

9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中纪委开始积极面向社会发声，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是由王岐山提议创建。原本中纪委监察部也有多个网站，比如监察部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举报网站、纠风之窗，还有工程建设领域治理工作网站等等，“但这些网站比较分散，力量不集中，资源浪费，王岐山提出要打造新的网站，把五网合一网。”

并且，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实行的是合署办公体制，即三个单位、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整合原有的两家网站亦是高效和节省资源的选择。

有消息人士称，中纪委将主动出击，借由门户网站全方位、立体式地对自身进行宣传。还会在门户网站上刊载被处分的官员新闻，加强社会整体反腐的舆论环境，到年底之前已计划了多场网络在线访谈。

此外，随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方纪委推出官方微博，有传言称，中纪委近期内也会进驻微博甚至微信平台。纪委系统已经开始主动依托新的媒介平台发挥反腐的功能。

随着中纪委的门户网站一并落成的还有全国统一的举报平台。事实上，中央纪委的网络举报受理平台早就建立并且受理了大量的举报投诉。此前民众通过各大商业门户网站上的“网络举报专区”都可以直接向中纪委举报。全国的网络举报平台是由中央纪委的信访室和国家监察部的举报中心维护。

按照工作流程，纪检机关在网上接到群众举报后首先会甄别举报的内容，信访举报部门会根据信件的内容进行分类，分析举报内容是否具备“可查性”。不乏有举报信上列举的问题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或者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味道。这种现象在地方党委政府换届前发生尤其频繁。

而对内容比较具体的实名举报，以及线索非常具体和证据比较扎实的匿名举报，纪委一般都会及时初步核查，或移交案件检察部门调查处理。对于暂时不具备可查性，但是又有一定的信息量的举报，会作观察处理；对于不涉及本级管辖范围的举报信件，会及时批转下级机关处理；对完全不具备可查性的，会存档不作处理。

中纪委的网络举报独立于其他各省市县的举报网站，并非将全国各地的反腐网站进行统合。民众向中央纪委举报时并不会直接转给地方的纪委负责人，而是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反映问题的类别性质等情况，将举报内容转给中央纪委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或相关地方的纪委处理。即便是不同层级的纪委之间也有严格的保密纪律。

因此会出现一个选择问题：应该向哪个层面的纪委举报？这里存在着效率和保密性某种程度的矛盾。通常举报遭遇泄露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举报者为了达到“广种薄收”的效果，在寄出举报信时往往像天女散花，一发出就是几十封，这不可能保密；二是信件在批转办理过程中，被无意泄露，或者被人口头有意泄露。

有地方纪委官员总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民众如若举报当地官员，直接投书于地方纪委更为可靠，因为减少了一个批转的环节。但某基层纪委的官员则认为，向高一级的纪委举报亦有好处：转批下来后地

方的查处人员会比较重视。

中纪委网站开通后，短期内由于影响较大，可能激发群众的网络举报热情，使网络举报件数量在短期内有所上升。但从长远来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腐败问题一直存在，网络只是提供了一条更加便捷、更加可靠的渠道。

卡严嘴巴

“最近我们地方一位前官员被‘双规’，在吃饭时被告知后，我转头问旁边纪委的领导是否有此事，他回答不清楚。旁边一位非纪委的人表示肯定后，该纪委的领导说了一句：‘这可是你说的啊！’。”一位地方纪委官员称，今年纪委的嘴巴关得更严实了，过去官员被“双规”后很容易从当事纪委官员口中得知案情，但现在直到纪委公布处分结果才能知道查了什么事情。

一年中，中纪委的工作思路转变切实反映在地方纪委。今年中纪委在机构设置方面做了微调，政策向办案一线倾斜，中央纪委的案件检察室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0个，某省纪委的案件检察室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5个。

一些省级纪委强调为基层纪委提供独立完善的工作条件，包括配备独立的办公室、电话、传真和档案密码柜等“十有”标准。有些条件虽然不起眼但是十分重要，比如此前用的是其他科室的传真机，那么群众举报时该科室的人会先看到，从而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

这一年基层纪委特别强调对“三重一大”的监控，分别是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以及重大资金使用。规范了权力运行流程图，必须按照流程来办事，该干到哪个层面就干到哪个层面。

2013年中纪委还开始进行“廉政风险防控”。廉政风险防控主要是分析每个官员的职权，然后指出该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可能会出现的腐败风险。比如说要列出该官员的熟人，特别是亲戚。每项风险等级都会按照“高中低”标准进行评估。

基层纪委工作人员紧缺，有些纪委监察科室只有纪委人员1人，监察人员3人。基层纪委不同于中纪委以及省纪委，基本上所有的举报都得去核实。一位基层纪委官员笑言：“我们都说能不干纪委就不要干。”

地方纪委一般事件的初步核实时限为两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一个月。党纪案件的立案调查时限为三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一个月。地方

纪委有时候会接到密件或者接到上级纪委的电话，说有几个人会到办事处去，需要接待一下，但可能仅限接电话的人知晓。

纪律建设被反复强调，潜规则和惯例大幅度下降。一些地方纪委甚至取消了过节费和物质补贴，许多纪委工作人员下班都要打卡，一名基层官员称，“过去有些工作人员以下村为由不来办公室，但是无法核实其是否下村，现在在村委也设置了打卡机，下村的工作人员得在村里打卡。”

在纪律作风教育环节中还会带官员去监狱看服刑的前官员或者看教育影片，如《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

纪委找官员谈话以及诫勉的频率也有所升高。有些被举报但调查时没有找到充分证据的官员，也会被谈话诫勉：“群众反映你的作风有问题，要注意。”

中共治官宽严两难

记者 / 张弛

“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不好办了”。因为公司最近要组织召开一个高级别的论坛会议，小王此次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国家部委的一些官员出席会议。不过，往年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他们都不愿意去外地出差，接待标准不如以前，礼品也不敢收。即使到了当地，想吃个饭联络下感情都找不到人。”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7月17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现在一些干部对招商引资顾虑较多，不愿同客商过多打交道，担心企业出了问题自己受牵连。强卫说，有人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人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感叹什么“为官不易”“官不聊生”，进而“为官不为”，当“好好先生”，这都是十分错误的。

7月24日，《湖北日报》刊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讲话。李鸿忠表示，要坚决破除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清廉为官与事业有为相矛盾等所谓“影响论”和“矛盾论”，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现在出差要赔钱

“不是不想去，是真赔不起。前几天我陪司长去武汉出了趟差，两天赔了400块。”刘晓阳（化名）是某国家部委一个综合处室的负责人，因为司局级和处级差旅费报销标准不一样，他自费补足了二等座与一等座车票的差价，往返一共400块。而他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过7000块钱。

这是他几乎全部的收入。部委机关里没有季度奖、年终奖和加班费，过节费基本也销声匿迹，只在每年年终时多发一个月工资。刘晓阳所在的部门，属于国家部委的非业务部门，没有什么实权，清水衙门一座。上有老下有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日子过得很紧巴。

他不反对中央的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吏，但这些措施让他感觉过于严苛：“两个人一起出差，两个车厢？司长是说要陪我坐二等座，我能答应吗？”让他觉得不近人情的，还有交通费、伙食和住宿补助。像他这样的处级干部，一天的住宿补助是每天80元，这点钱住快捷酒店的标准间都不够。交通费补助90元，只补助离京、返京两天。餐饮补助每天50元。

如果一次要去几个不同的地方，中间的交通票据必须齐备。有一

次，刘晓阳从上海到苏州，因为接待单位也要去苏州办事，就顺便送了他一段。谁知回去报账的时候出了麻烦，因为没有这段行程的交通票据，会计没法做账，就让他写情况说明，还要对方签字证明，折腾了好几天。“太麻烦了。如果每次出差都这样，那我宁愿不去。”

其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补贴一直都不高。据刘晓阳回忆，刚参加工作时，他每天的补助只有18元，几年后才涨到30元，不过，那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当时出差，都是地方单位接待，住宿、餐饮包括回程机票都不用考虑，因此根本感觉不到。而财政部今年1月份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已经将每天的30元补助提高到了80元。

但问题是，现在地方单位的管理也收紧了。以前这些“部领导”根本不用考虑的芝麻小事，现在变成了头等大事。“还没去呢，对方就打来电话，以万分为难的口气商量，解决住宿真的有困难”，刘晓阳说。

饭局也少了很多。像他这样在普通行政岗位上的处级干部，虽然没有什么决策权，但在一个领域浸淫已久，朋友还是有一些的，平时饭局不缺。不过，现在要想出去吃饭，只能自费。“前几天，我和另外一个处长约着出去吃饭，想了一圈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我们俩就自己去了。”

大陆餐饮业的惨淡，也侧面证实了这个说法。经历了去年餐饮业增速十年来的最低谷，高端餐饮公司纷纷谋变。继A股民营餐饮湘鄂情转战互联网，百年老字号全聚德在网上卖起了烤鸭，而高端川菜馆俏江南在推出团购业务后，又在重庆卖起了盒饭。

还有车改，“部委还好办，基层怎么办？”刘晓阳说，县长和乡长是在基层工作的，每月700元车补，他们怎么到村里调研？只能不去或者尽量少去。“这么多年为什么改不下去？就是因为实际情况复杂。如果觉得中央一‘打雷’，地方就‘下雨’，那就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警惕逆淘汰

普通民众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一个在网络流传的段子极尽调侃：“最近，陆续发现各地领导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有的会亲自打伞了，有的会亲自开车门了，有的会亲自拎包了，有的会亲自拿水杯了，有的居然会亲自写讲话稿了，值得可喜的是竟然会拉老婆手了……其实人民群众对领导的期望也不是很高，只要生活能基本自理就可以了”。

喜闻乐见的段子，最能说明一种现象的普遍性。而人民论坛7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问卷，其结论也能够予以支撑。这个针对官员群体的调

查显示，中共强力反腐与从严治吏，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不适应，心态也有些不稳定。这种摇摆，按照程度由轻到重，又表现为“郁闷”、“顾虑”和“害怕”。如今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儿”，最郁闷“工资收入低”，最大的顾虑是“得罪人”。

对于官员们的这些困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显得不能理解。一些民众认为，这些官员选择的参照对象有问题。“像国家部委，一些普通岗位的公务员，工作能力和承受的竞争压力有限，非要和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比薪酬，这有可比性吗？”还有民众直言不讳，觉得公务员不过是在自怨自艾，“以前才是不正常，现在刚刚正常就不习惯了？待遇低可以辞职啊，真刀实枪到社会上练练，看到底是不是精英。”

但事实上，一些公务员跳槽下海，只不过是体制内资源在市场变现的一种方式。那些能够成功跳槽到比较赚钱的岗位的，往往是在部委已经获得一定级别，并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识积累和人脉的。而那些在普通行政岗位积累工作经验的公务员，一旦离开所在单位就会“人走茶凉”，在市场上的价值基本为零。加上岗位职责限制，工作内容单一，缺乏历练，很多人已经丧失在市场搏杀的能力。“离开现在的单位，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一位基层公务员说。

按照中组部干部管理规定，硕士研究生毕业7年为提拔副处最低年限，副处2年为提拔正处最低年限，也就是说硕士毕业后理论上至少9年才能提正处，按硕士毕业25岁算，提到正处至少34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两个级别各延迟1年就算非常非常快了，即硕士毕业11年，36岁。也就是说，即便在部委机关，大多数70年代末生人还处在正科、副处的位置上，更别说一些基层单位了。

与此同时，中共对于一些所谓实权岗位的限制也愈发严苛。2013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一位在部委工作的年轻人很苦恼，他等了10年，房子还没有分到。每到分房子排队，就会发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很多人，排在他前面。排名顺序靠打分，其中工龄最重要，因此分到房子的很多都是复转军人。因为复转军人工龄从初高中毕业参军算起，而他是读完博士才上班，这样就差了高中、大学、硕士、博士12年工龄。后来，他实在等不及了，就在通州买了一套房，和在公司打工的年轻人一样，每天挤公交，每月付房贷。

一位中直机关的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现在公务员的福利几乎消失殆尽，除了大城市还在乎的户口，分房也成了“千年等一回”，机关很多年轻人现在一样要供房贷，如果养老再并轨，估计会形成新一轮辞官潮。

但就记者接触的机关一些年轻人，目前真正准备付诸行动的几乎没有，年纪大、有一定职级的就更少。毕竟机关对于年轻人的吸引，不仅仅是待遇，还有整个社会对于公务员群体的观感。中国官本位观念浓重，在大多数人看来，公务员算是一种“成功”的人生，更何况是在中直机关或者国务院机构工作，这令他们获得金钱之外的另一种成功感。他们的不平衡在于，“在机关耗了十几年，还没有享受到领导的待遇，忽然之间这些待遇可能马上就要不存在了”。

反而是一些新近进入的年轻人，想离开的人所占比重较大。上海一家部属单位的纪委书记说，他们单位每年新入职的有180多人，有一次他召集其中18人开会，问是否有人因为待遇低想离开，结果当场举手的就有4个人。他感到有点意外，“没想到比例这么大”。他认为，就目前的收入情况，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的生活几难维系。“普通民众对于官员群体存在误解，不能将贪官污吏等同于普通公务员”。

地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东部与西部地区就不一样，在西部一些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省份，受观念与就业环境影响，即使待遇低，机关与事业单位仍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

谈到近来热议的公务员加薪，这位书记认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的理由是，如果平均加薪1000元，整个社会都不会答应，而即便是加1000元，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担心长此以往，会“优汰劣胜”，“等到真的有人想离开，一定也是有本事、有门路，也就是素质较高的公务员会先离开，留下的一定是庸才，这会是一种逆淘汰。”

“吐槽”背后的深层原因

而据一位来自长沙的基层政府官员反映，“消极怠工”是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吏之前就有的现象。因为基层公务员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一直没有解决好，在目前锦标赛式的选拔机制下，基层公务员升迁极其困难，导致大多数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部委机关的对未来有个盼头，基层能够杀出重围的绝对是凤毛麟角”。

国家公务员局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已达708.9万人，超过90%属于科员及科员以下职务，有60%是在县级以下

政府机关。

他认为，官员群体“吐槽”反映出的诉求，主要集中于工资收入、事业平台、职业声望、晋升通道、制度环境和考核监督，这些均属于人力资源激励的核心要素。这些问题原本就存在，只不过在目前强力反腐、从严治吏过程中，又重新浮出水面，其中有着各自所对应的更深层次原因。

据2008年试行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而晋升科员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也就是说，全国科级干部90万人，想成为只有4万个的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几率小于4.4%。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仕途基本就终止了。

在西部省份省直机关任职的李严达（化名）注意到，现实中身边的很多人，许多干部早年勤奋敬业，但人到中年开始懈怠，甚至骄奢淫逸；而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像焦裕禄、沈浩等一些因公殉职的基层干部，典型性虽强，但其榜样和示范作用有限。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职业只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手段。难道对‘人民公仆’的诠释，必须要用生命来完成吗？”他对此感到困惑。

此前曾有分析称，从习近平上任之初即提出“八项规定”，并在2014年视察河南再提“官员楷模”焦裕禄可以看出，十八大后中共在“收拾官场”的两板斧——反腐和整风中，整风实际就是要“重塑官德”，也是中共对于未来官员基本的要求。

这一点，不仅从中纪委频繁使用“通奸”这个表明“党纪严于国法”的词汇中可窥见一斑，7月20日，中组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官员与“西方道德”划清界限，并使用了“应声虫”一词。有学者认为，这里中组部对于官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实际上都是“党建官德”的一部分。

应赋予基层官员解决问题的权力

黄明（化名）是在中直机关工作的一名年轻人，他曾短暂到基层部门挂职，负责信访工作。在目前环境下，他觉得，这些教育激励和惩罚措施，对解决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的作用有限。他认为，部分基层干部确实存在问题，但将问题仅仅归咎于此，过于简单武断。

“从年龄结构、文化素质和教育背景来看，基层干部和中央机关的

干部之间，尤其是新入职的干部之间，虽有差距但并不显著。‘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很有可能不是桔本身的问题，而是存在水土、气候、环境等深层次原因”。

根据他的观察，基层干部之所以饱受诟病，“上下不讨好，两头都受气”，与其所处环境、位置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有关。一是付出和所得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工作繁琐、辛苦，内容单调、枯燥，常常要面对群众的抵触情绪和过激行为。与此同时，他们的职位普遍不高，发展机会有限，工资待遇较低，工作缺乏“奔头”，这都极大影响其士气及工作积极性。

二是责任和权力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工作在第一线，直接担负着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责任，但其拥有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解决问题的资源匮乏。比如，对生活无着的群众应当给予救助，但没钱怎么办？久而久之，难免变得冷漠和麻木。

三是工作负荷与个人精力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工作质量越高，服务态度越好，找他办事的群众就会越多，工作负荷也越重。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终归有限，如果长期超负荷工作，只能是要么降低工作质量，减轻工作压力；要么导致积劳成疾甚至英年早逝。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

他说，在群众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包括一些机关的领导干部也常常认为，上头制定的政策多数是好的，只是基层执行政策的和尚把经给念歪了，这不公平。

他呼吁，应该给予基层干部更多理解、关爱和支持。除了在工资待遇方面适当给予倾斜，还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赋予基层干部一些解决问题的权力。此外，组织部门要真正将群众评价作为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对群众满意、表现优秀的干部要优先提拔，避免沈浩“干得好，提不了”的现象重演；对群众不满意、表现较差的干部要加以惩戒，并与工资待遇、职务职级、荣誉奖励等指标适度挂钩。

中共反腐大数据——十八大后高官整饬启示录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强劲，至今势头仍在持续。

根据新华社日前公布的信息，仅进入2015年以来，截至8月25日，中纪委网站已经通报了472名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平均每周通报14人。被通报的官员中，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共38人。

诸多腐败官员落马，体现了中央“反腐到底”，以及整饬和严管党员、干部队伍的决心。抓贪官不是目的，“治标”是为了“治本”，核心是建立廉政体系，最终实现吏治清廉。

在建立廉政体系过程中，已经落马的诸多官员，以及对他们的查办过程，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细节。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海量数据规律，反思其中教训，能为预防腐败提供积极经验。

今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贵州考察，就大数据问题专门作了讲话。此后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建立贪官数据库。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亦发文，要求建立与官员贪腐有关的数据库。包括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案件的数据库，以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插手案件的数据库等。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运用，或已成为助推中央反腐的最新利器，亦时常被大陆媒体称为“反腐大数据”。

尽管与作为IT专业术语的大数据（Big　Date）在数据量上有很大差异，但建立庞大数据库并进行分析，确实是反腐的新思路。从中共近年来对党内规章制度的完善、对党员干部的各项新要求，以及在反腐实操上的多项新手段、提法来看，中共高层显然已经在研究过往落马官员的“大数据”，并对存在的问题积极应对。

中共十八大以来到2015年7月底，共有116位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凤凰周刊》特以他们作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试图勾勒出大陆部分高官失职、越线乃至贪腐犯罪的细节与规律。细细观之，中共干部培养、选拔、任命、监督等各个环节，可能存在值得反思之处，在此均有隐约体现。对于中共完善对干部的择优、管理，也具有参考价值。



高官贪腐犯罪现状及规律——以十八大后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为样本

特约撰稿 / 李国霖 张悦 雷续

今年夏天，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宣判无期徒刑，一度有舆论认为反腐高潮将过去。但随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以及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取代徐才厚成为最大“军老虎”，这些重磅新闻让公众切实体会到了中央反腐力度之强、决心之坚定，这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贪腐犹如毒瘤，虽不即刻致命，终会慢性致死。“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如若轻视纵容，千里之堤必会溃于蚁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此多次强调，反腐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将是大陆长期内一项艰巨的任务。

自十八大以来截至2015年7月底，大陆总计有116名省部级（部队为军级）及以上官员因为涉及贪腐等问题被查，其中不少已经被移交司法，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凤凰周刊》分析这116只“老虎”相关数据，不仅是我们了解人性软弱本质的教科书，也是探究反腐倡廉建设的活素材。中共严管干部，不惜刮骨疗伤，经验、教训十分深刻 。认真总结、分析，弥足珍贵。

贪官的分布：爆破式，集中式

十八大后这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绝大多数都出自普通家庭，大多数为草根阶级，如郭正钢（郭伯雄之子）这样的官二代为极少数。

统计数据显示，这些落马高官中，年龄最大的是73岁的郭伯雄，年龄最小的是47岁的冀文林，平均年龄58岁。

从年龄分布上看，落马高官年龄密集段为58-60岁。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特殊岁月，耽误了十年的青春，大部分人都是在文革之后才真正得以进入仕途，其中不少人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的，应该说是同龄人中的精英。这些人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上历经风雨，跋涉几十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曾经的精英分子，却蜕变为如今最不堪的一群，其悲剧结局不能不令人反思。

从性别比例来看，仅有2名女性高官，白云（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和高小燕（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在落马高官中所占比例为1.72%，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的女性比例4.88%。换言之，在此次落马高官呈现出的样本中，男性官员的腐败概率要高于女性官员。但是否表明男性官员在官场中面临更多的钱、权、色的诱惑，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任职单位和地区来看，十八大之后的落马高官中，落马或退休时任职地方官员的所占比例最高，占46.55%，接近总数的一半，军队高官次之，占32.76%，任职中央机关的官员明显低于前两者，占15.52%，而任职央企的官员最少，仅为5.17%。

这些落马官员中，除去38只“军老虎”和任职于中央机关和央企的24人，54名“地方老虎”共涉及27个省级行政区。山西省毫无悬念地成为此次“打虎”行动的风暴眼，落马高官有7人之多。江西有4人，云南、四川、江苏、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各3人。上述8个省份的落马高官共29人，占总人数的53.7%。此外，海南、安徽等19个省份分别有1至2名高官落马，共计25人。以上分布情况可见，落马高官分布较为广泛，但局

部集中，且贪腐现象容易呈现爆破式、集中式增长。

此外，根据已经公布的相关案件信息梳理后可以发现，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高发领域。

事实上，矿产资源领域向来敏感，因其与经济发展一脉相承，而常处于多事之秋。以原山西省省委常委聂春玉为例，其主政山西吕梁的8年间，与煤老板相勾结，形成了以黑金为媒、越滚越紧密的官商利益输送网。

土地出让、拆迁也沦为权力寻租的温床。据报道，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常借由“民心工程”的名义大拆大建。这般的“大兴土木”确实为其腐败创造了便利条件。此外，工程建设领域的贪腐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原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在职期间，利用其担任中共六盘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黔东南州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六盘水市盘县红果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丰球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获取政府扶持基金、取得银行贷款、争取建设开发用 承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催要工程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陈春章、何智慧等11人给予的财物。

高学历泛滥

自古以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业与仕途即相辅相成。中共干部选拔时，对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重视。

《凤凰周刊》从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样本分析发现，高官总体呈现出高学历态势。这表明，高学历曾被当作仕途生涯的敲门砖，亦曾为官场生涯锦上添花。

统计数据显示，116人中，42%的官员是硕士、博士研究生，16%的官员从中央党校或地方省委党校毕业，仅有2%的官员属于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

不过，落马官员的高学历中，在职研究生占相当比重，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高校对在职研究生的招收和开放力度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高官进修的需求有关。不少官员在官场风生水起的同时，也不忘去高校里读学位、刷学历、混文凭。

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热门专业分别是工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落马高官所学专业集中在经济、管理及理工等方面，主要是由于：一是本身中国高校在职研究生在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方向开放较

多；二是工作需要，为弥补第一专业的不足，高官多需要在相关领域，尤其是在经济、管理等领域进一步深造，提升专业知识储备。

事实上，落马高官中，很多人的高学历是令人存疑的。不少人学历畸高，博士头衔占相当比重，但其学历的含金量不足，可信度下降，甚至可能存在学术不端、学历欺诈等。譬如，曾任南京市市长的季建业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据悉，2011年1月9日下午于中国人民大学某会议室，法学博士后研究生季建业的出站报告顺利通过评审。但该法学院众多师生此前却很少有人见过季建业到校完成学业和研究工作，不少人对季建业这样一边忙于政务，一边又要投入大量时间完成学业的“奇迹”表示了疑问。

大陆曾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大学在招生、培养、学位授予方面并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其背后存在“权学交易”、“学术欺诈”等问题。

“秘书帮”占比不小

早在2003年，随着“河北第一秘”李真案的披露，秘书身份对于官员升迁的如虎添翼之功效已初见端倪。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秘书李真，于2003年10月9日因受贿、贪污被判死刑。在此之前，李真是河北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短短5年间，即由一般职工升到厅级干部，33岁便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河北第一秘”李真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秘书”这一身份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让官员赢在起跑线上，并且有着随时随地“超越”同伴的潜质。

《凤凰周刊》统计的数据显示，116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当中，秘书出身占8.62%的比重。这些秘书出身的落马官员不少曾出现过“火箭晋升”，典型代表是曾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冀文林，年仅47岁就当选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的个人履历显示，冀文林从1998年8月起任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助理调研员以及部长秘书，而2005年9月便升迁至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以及正局级秘书。短短八年的时间，冀文林从部长秘书、正处级秘书、副厅级秘书、副局级秘书升至正局级秘书。

统计资料显示，落马高官平均从工作到担任省部级官员所花费的时间是31.7年，而冀文林仅用24年就成为了省部级官员。冀文林的“火箭晋升”与其秘书经历有脱不了的干系。

此外，也有不少为同一高官担任过秘书的官员均东窗事发，最为典型的便是周永康的“秘书六人帮”。先后担任过周永康秘书的李华林、沈定成、冀文林以及郭永祥、余刚相继落马，“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一俗语在这帮人身上体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原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1989年

起跟随周永康任职，直至2002年；原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曾担任周永康在中石油时的秘书，以及周永康长子周滨在美国时的“保姆”；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1998年起任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的秘书长达十年；此外，原中油国际书记沈定成、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均曾任周永康秘书。

有鉴于秘书提拔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近年来也逐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规范，2013年中央办公厅曾专门召开过“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会议”，要求加强对秘书工作人员的管理。2015年初，中央军委发布了《军队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对领导干部秘书选拔配备和教育管理监督等作出明确规范，对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任职回避作出具体规定，对后备干部遴选条件、数量结构、选拔培养和动态管理等加以调整完善。堵住了干部使用和秘书使用的漏洞。

被“朋友圈”围猎的贪官

统计资料分析，中国贪腐高官的核心利益圈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局部呈现塌方式状态。而且，落马高官常因“钱”、“色”乃至“雅好”而形成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的局面。秘书圈、校友圈及亲属圈的交叉重叠，政法、石油系统及商界富豪的混杂交织，使得“大老虎”的朋友圈成为腐败圈的主阵地。

在除去“军老虎”外的落马高官中，至少有47人的朋友圈中相继出现高官朋友落马，比例高达60%。譬如，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西山会”是由山西籍在京高官组成的庞大权力—金钱帝国，据称成员包括令计划、令政策、刘铁男、杜善学、申维辰、金道铭、陈川平等相继落马的高官。据大陆媒体报道，成立于2007年前后的神秘组织“西山会”，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山西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刘铁男、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一众高官都是其成员，刘志军的合伙人、山西商人丁书苗是饭局的一名埋单者，令计划则在其中扮演特殊角色。

除此之外，“官商勾结”现象体现得也很明显，譬如原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涉嫌与煤老板进行利益输送，李春城、季建业均与多名商人形成利益圈，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落马伴随着两名房地产开发商被刑拘。据澎湃新闻报道，陈铁新落马与其在辽宁朝阳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插手土地交易不无关系。2014年年初，中央巡视组进驻辽宁期间，朝阳市已有数名房地产商远走国外，两名房地产开发商已被刑拘。

陈铁新在朝阳市的交际圈子里，房地产开发商是重要的一环。在陈

铁新主政朝阳的五年里，石凤华成为房地产界的“宠儿”，刘帅则因傍上陈铁新而成功转型房地产开发商。陈铁新喜好女人，并热衷于结交大老板。石凤华投其所好，借花献佛，成功低价拿地。据悉，石凤华专门在朝阳的北大街上开了一家北海道日本料理店，并把三楼房间特意装修成KTV，房内还置有一张大床，陈铁新正是这家料理店的常客。而朝阳市黄河路与凌凤街交汇处西南侧的一块面积为300亩的土地被石凤华低价抢到手，据知情人士称，这块地是以每亩130万的价格卖给石凤华的，而当时同地段地块的起拍价格为每亩150万元左右。另一房地产开发商刘帅同样在陈铁新主政期间，获其青睐，在陈铁新的帮助下，拿下了万商国际城市广场这块地。

2015年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提醒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县委书记，“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实际上，贪官身边的“朋友圈”也就是其被“围猎”的猎场。看似位高权重，帮了很多人的大忙，让很多人发大财，自己最终却难免身败名裂，亦是干部队伍的损失。

贪腐全家总动员

3月1日，中央党校2015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也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要在管住自己的同时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在别人的‘围猎’中掉进圈套。”就目前的数据分析可见，除了被“朋友圈”“围猎”，亲人也是官员陷入贪腐的重要一环。

目前，大部分落马高官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部分案件已审结完毕。在已经由官方公布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案件信息中，本人受贿的比例为64.58%，其余主要是由家人、亲属及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还有一部分由于目前正处于司法机关处理阶段，中纪委未给出明确受贿主体信息而无法统计。

普遍来说，落马高官的贪腐大部分与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关联，“父子兵”、“夫妻帮”、“全家总动员”屡见不鲜。其中到底是贪官利用家人、发动家人贪腐，还是家人怂恿、利用官员贪腐，难以统计。但最终成为阶下囚的结果并无二致。

“一人当官全家贪腐”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于201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铁男，其子刘德成在23到25岁的时候，名下已有千万元；郭伯雄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其子郭正钢升迁之速非常惊人。

再如，周永康之子周滨、苏荣妻子“于姐”、令计划之兄令政策、徐才厚之女徐思宁，都在官场任职或不同程度地参与贪腐、滥用职权等。据大陆媒体报道，苏荣的第二任妻子于丽芳，在江西政商界有“于姐”之称，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被指多次染指江西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还有不少江西省内的高级领导以贿赂“于姐”的方式，变相贿赂苏荣，以此获得苏荣的信任和提拔机会。

据悉，曾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新余市委书记的李安泽为讨好“于姐”，不惜赠送价值不菲的傅抱石名画，还违规将300多亩土地廉价出让给“于姐”介绍来的商人朋友，致国有资产流失近10亿元。于丽芳，曾供职于中国民生银行，退休后又被民生银行聘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而实际上做的是“只领工资不上班”。苏荣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搞家族式腐败，于丽芳涉猎甚广、贪得无厌，苏荣案已然成为家族腐败的典型。

在十八大之后所有被提起公诉的19位落马高官之中，几乎所有的高官都涉及受贿罪。受贿犯罪往往是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许多官员往往通过自己的亲属、特定关系人收取贿赂，这种犯罪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收集证据也更加困难。

目前所有已经被判处受贿罪的落马官员都是经济贿赂，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土地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政府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政府优惠政策的获取等等。其中涉及土地开发领域腐败的占到了60%，房地产开发成为贪腐犯罪最为多发的领域。如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法院审理查明的7项犯罪事实中，有6项涉及项目开发，获得土地使用权，拆迁、建设等与土地开发相关的犯罪。

“雅腐”与滥情：堕落程度各不同

兴趣爱好，人人有之。身居高位、掌握权势和资源的官员，在放松要求，突破法纪界限之后，所好何物，“雅趣”何在，时常在陆媒报道中被提及，亦赚足了公众眼球。这批落马高官中，就有不少因“雅好”沦为“雅腐”落马的官员。譬如秦玉海以及倪发科。

中纪委网站开设的“忏悔与剖析”专栏曾专门刊登了关于落马高官秦玉海的“忏悔录”。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走上腐败犯罪之路，与其痴迷摄影、追名逐利不无关系。在秦玉海追求摄影成就的路途上，曹某是坚定的支持者，为秦玉海提供全程服务。据调查，2012年至2014年，曹某为秦玉海出版《真水》作品画册，拍摄以秦玉

海摄影活动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山》，先后4次出资为秦玉海举办摄影作品展，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圈内的人脉关系，将其作品展览开办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花费580多万元。作为回报，2007年至2014年6月，应曹某请求，秦玉海向河南云台山公司打招呼，使曹某公司顺利承揽了云台山公司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铁广告业务；其间，秦玉海还帮该公司协调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仅此一项，曹某公司就获得广告费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十余年间，秦玉海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元。但是，用他的话讲，“自己却从没有花过一分钱”。

同为“雅好”所害的还有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经查，倪发科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据了解，倪发科向来喜欢玉石，为投其所好，矿业老板吉立昌多次专程带着玉石专家坐飞机去新疆，买回玉石供倪发科挑选。而倪发科也放下副省长的“架子”，和吉立昌一起跑环评、项目审批手续，为吉立昌实际控制的公司挪用国家下达的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其以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

除去“雅好”，贪腐高官的滥情，也常常是其走上不归路的致命原因。对于贪腐高官多有情妇、作风不良这类问题，公众也早已见怪不怪。

从婚姻状况看，由于公开资料有限，在可以查到婚姻状况的10名落马高官中，再婚率高达40%。如果将样本缩小至副国级及以上的5名高官，即苏荣、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则再婚率趋近50%。

中纪委是如何通报官员作风问题的呢？据澎湃新闻报道，从2014年6月5日，中纪委将“与他人通奸”写进通报中以来，这个字眼在此后通报的45人（编者注：这些人并不都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先后出现了25次，占总数的55.56%。这个比例应该说相当高，但同时也打破了社会上流传的“凡是贪官都有情人”的错误论调，应该说这个比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领导干部容易陷入权色交易、形成特定关系利益输送的真实情况。

根据本次对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统计分析，中纪委公开提到生活作风问题的高官有27名。在用词上，“与他人通奸”出现多达15次；“道德败坏”出现7次；“腐化堕落”出现2次；“多次出入私人会所”“多次参加高消费娱乐场所”“多次接受公款宴请”“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则各出现1次。另外，对周永康的通报称：“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

由此可见，在通报落马官员的男女关系问题时，中纪委有一套自己的特殊话语体系。曾有大陆媒体报道称，“腐化堕落”一般说的是有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则是指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但未获更多信息源证实。譬如，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等，就被使用了“道德败坏”。而“道德败坏”之上还有升级版，就是“严重道德败坏”。“严重道德败坏”是指因男女关系还造成了不良影响。

贪官是如何被发现的：巡视制度是利器

公开信息显示落马原因的高官共有35名，揭发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为中央巡视组发现，二为实名举报。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可谓战果累累，在上述的35名“老虎”中，32名由中央巡视组揪出。

中央巡视组工作最早从2003年就开始开展。王岐山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巡视组的明晰定位，严明执法，强调“盯住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重点人”即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点事”就是部门、企事业单位在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本运作、工程项目等方面反映突出的具体事项；“重点问题”是指行政审批权、执法权、人事权以及国有企业“三重一大”等方面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

如此犀利而坚决的反腐，必然遭遇诸多阻力，如恐吓、威胁、通风报信等多种妨碍都曾真切地发生过。中纪委原常委祁培文曾表示，中纪委在案件调查中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在一个省里巡视，有人给我写信说，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儿，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反腐的艰难可见一斑。

2015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发挥巡视监督作用 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巡视工作自此将更加有制度保障。

除了中央巡视以外，实名举报这一揭发方式拿下数名“老虎”，包括宋林、刘铁男和衣俊卿。体现了中共对各方面信息的高度重视。宋林与刘铁男均是被记者在微博中实名举报，衣俊卿则是唯一一个被其情妇举报的省部级高官，因此格外吸引眼球。2012年底，一篇名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12万字长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使衣俊卿

与常艳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曝光于公众视野下。2013年1月17日，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成为2013年的“情妇反腐第一案”。

中共“打虎”加速度

《凤凰周刊》统计显示，从中纪委公布高官被调查，到宣布“双开”的时间平均是5个月，最短时间是1个月（童名谦），最长时间是18个月（李春城），大部分主要集中在2至5个月之间。

此外，官员被中纪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后，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提起公诉的平均时间是8个月，最短时间是4个月，最长时间是12个月。而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6条及第157条的规定，案情重大复杂的重刑案件，侦查羁押期限最长为7个月，高官涉案被侦查的平均时间已超过这个时长。因此，需再延长羁押期限，可以依据刑诉法第155条规定，“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从中纪委宣布调查到被移送司法机关，2010年每人的平均时长为194天，2011年为225天，2012年为209天，2013年为165天，2014年为176天，2015年为142天。明显可见，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加快了纪律审查的节奏，其中童名谦（原湖南政协副主席）用时仅15天，阳宝华（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用时仅50天，李达球（原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用时60天，王敏（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61天，王素毅（原内蒙古自治区常委、统战部长）、景春华（原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66天等。

资料显示，目前已有13名省部级官员被通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该表述首次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是在2015年2月13日，中纪委接连宣布了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双开”的消息。在对三人的通报中，均出现了“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表述。

显然，加大对十八大以后腐败官员的查处将是今后的重中之重。

“带病提拔”乱象多

在已经做出判决的高官腐败案件中，司法机关认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时间，有9人是在晋升为厅局级干部后即开始出现受贿的，分别是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陈安众、李

春城。这说明腐败问题其实并不是成为“老虎”之后才出现的。

这个事实一方面提醒有关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厅局级干部乃至更下级官员的监管力度，将腐败犯罪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

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显示了官员“带病提拔”的普遍性。“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组织未能发现或查实、仍得以提拔任职的情况。

116只“老虎”中，不少官员在担任厅局级干部乃至更早时就存在劣迹，却还能一帆风顺地继续升职，最终成为省部级干部，可见“带病提拔”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容小觑。譬如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1992年10月至2013年上半年，其利用担任中共江苏省苏州市吴县县委副书记兼太湖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昆山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1999年底至2012年下半年，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2万余元。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竟然从未被追究，季建业本人也一路官运亨通，令人咋舌。

“带病提拔”究其原因，首先，与党政工作中观念上的偏差有着密切的关联。德才兼备历来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但某些地方和部门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下，发展才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干“大事业”，干部有德无德无关紧要，从而对干部的“德”重视不够、考察不到位。其次，不容忽视的是，制度不完善与“带病提拔”也存在紧密的联系。2002年7月9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02年《条例》），但仅对干部的考察内容做了粗略的规定，“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这一标准较为模糊，在操作上也比较困难，这也就导致了干部考察的形式内容多于实质内容，难以全面考察干部情况。因此，2014年1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14年《条例》），增加了大量有关考察内容的篇幅，突出考察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强调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防止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改变“唯GDP政绩观”。

此外，作风考察和廉政建设考察也被单独列为考察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提出了“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这一新举措。2014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对抽查核实报告工作的原则、项目、对象、范围、方法、结果处理和纪律要求等问题予以明确。这为更好地监督官员，防止“带病提拔”问题的

出现提供了新路径。

归根结底，缺乏对干部的有效监督，是“带病提拔”现象的根源所在。本次调查所涉及的所有非军队省部级官员都曾有过“一把手”经历，均担任过某一单位或部门的正职领导干部。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把手”通常在本部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从而使得这些“一把手”能够边腐边升。

上级的监督部门往往存在只重视经济发展指标，对下级“一把手”存在的廉政、作风问题不重视，也使得成为“一把手”的贪腐分子心存侥幸。同级的监察部门虽然在制度上有监督“一把手”的权力，对其情况也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但是碍于“一把手”位高权重，多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的状况，往往形同虚设。

同时，由于民主机制的建设仍不够健全，普通群众难以了解“一把手”官员的情况，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正是由于多重监督机制均有问题，才使得“一把手”官员能够轻松享用“绝对的权力”，最终导致腐败的发生。

改进干部选拔制度：选青、选优再思考

从落马高官显示的诸多规律来看，如何选拔合格干部，是保障吏治清廉的前提与关键。

回顾大陆的干部选拔路线，改革开放之前曾长期强调“又红又专”这一标准。干部选拔侧重点在于“红”，要求干部、政治家要 “懂些业务”，而对于经济家、技术家，如果“不注意思想和政治，就会迷失方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与此同时，干部选拔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专”这一标准，受到了本应有的重视。随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四化”要求：“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并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又提出了“三化”，即“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

2002年《条例》，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扩大民主、强化监督方面都作了规定，显示了中共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02年《条例》对官员升迁条件做出相关限制。譬如关于年限的限制，《条例》第七条规定了“提任县（处）级以

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而《条例》第八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

一般而言，官员的升迁速度较为恒定。不过，《条例》中同时规定：“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意味着可以突破既有的规定进行提拔，不再有年限以及提拔级数的限制。虽然破格提拔体现了升迁机制的灵活性，并非简单的“论资排辈”决定升迁，但由于未对破格提拔的条件以及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一条例本身的操作空间弹性很大。此轮落马官员的晋升历程中，不乏破格提拔、快速晋升的影子。譬如，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周永康，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曾任华润电力总经理的王帅延，曾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川平等人，不止一次一职级的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与此同时，选青、选优之标准在实践中，多易剑走偏锋。近年来，年龄、学历等方面已经沦为官员造假的重灾区。选青，极易导致唯年龄论。由于过度强调年轻，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标准，会得不偿失。随着干部任用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愈加明显，受“官本位”思想影响，一些年龄不符要求的官员，试图通过年龄造假来争取谋取私利的机会。而选优，在实践中也常被异化成为学历的附属品。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制度存在的漏洞，2014年《条例》对升迁的条件专门做了调整与补充。首先，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的基本资格中增加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资格要求”这一条件，并将具备法治精神纳入干部选拔标准之中。其次，将破格提拔的对象由“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调整为“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从而消解“选青”这一标准带来的弊端，体现“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用好各年龄段的干部。再次，详细规定了破格提拔的条件，要求从严掌握，不得突破条例所规定的选拔任用基本条件以及基本资格中符合法律和党龄的要求；任职试用期未满或者提拔任职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不得在任职年限上连续破格；不得越两级提拔。这些规定，均为防止不正当的破格提拔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反腐是一项长期任务

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巨额贪腐案件一起接一起，落马“老虎”一只大过一只，与此同时，公众的担忧也开始弥漫。对此，党中央提出反腐肃贪“无上限”以及“持久战”说法，给公众吃了定心丸。

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倡廉的理论建设和行动指导有了全新的特点规律。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明确了反腐的方向、力度及路线，也为反腐肃贪斗争的开展与持久奠定了理论基础。

“打铁还要自身硬”；反腐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以此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以及“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等提法，都是在近年来的反腐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如今，反腐已经成为社会主旋律，诸多高频词、新提法让群众耳目一新。诸如“高压反腐”、“围猎贪官”、“政治生态”等。据大陆媒体报道，习近平是在2014年6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政治生态”一词的，同日，徐才厚等四只“老虎”被开除党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避免形成“黑白颠倒”的混乱局面，必须要营造纯全正直的“政治生态”。这种全新的提法，既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也蕴含着家国天下的政治担忧。

2015年6月12日，周永康案宣判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并强调，“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有法律制度强力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管好党、治好国，不负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三名作者为本刊实习研究员）

二、落马高官内幕解密

1.解密薄熙来

薄、谷、李家族联姻探秘

记者／钟坚

革命年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婚姻，一般是在封闭的红色圈子内选择根红苗正的志同道合者为侣，这是从经历中共各种内部肃反运动和斗争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成了这些日后成为红色后代者潜意识的选择标准。

8月26日，济南中院，已出庭数日的薄熙来神色黯然，面容显得极度疲惫。在被告席上，薄熙来面对公众做了这场被称为世纪庭审的最后答辩：“已知在劫难逃，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

高频次的镁光灯下，这位中共政治明星往昔荣光消弭。薄熙来是中共建政以来，继陈希同、陈良宇后的第三位出庭受审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因贪腐落马的第四位直辖市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父亲为中共元老薄一波，薄妻谷开来之父谷景生是开国将军，上世纪30年代即为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父亲为北京前市委书记李雪峰，中共北方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薄一波、谷景生、李雪峰三位中共开国元勋中，仅谷景生职级稍低，但亦战功卓著，离休前夕仍主持新疆全面工作，薄、李两人均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薄一波、谷景生、李雪峰晚年获家人和组织悉心照料，三人皆为世纪老人，在本世纪前后均以近百岁高龄一一离世。

而他们的后人则因为政治因缘结亲，薄一波的二子薄熙来、谷景生的五女谷开来及薄前妻、李雪峰的三女李丹宇等三个红色家族后代间，错综复杂枝枝蔓蔓的关系，亦因此次涉薄的贪腐、滥用职权和受贿指控案件，被渐次起底，浮现在众人面前。

战火中结下的情谊

8月22日，薄熙来案首次庭审，薄、谷、李三家后人代表悉数出庭。薄氏家族中，除了传闻与薄熙来素来关系较好的薄家“五妹”薄小莹外，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弟弟薄熙宁出席；薄妻谷开来的大姐谷望江代表谷家列席旁听；李家的代表则是薄家三代、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之子李望知。

34岁的李望知与其父薄熙来外形颇似：眉目秀气，前庭饱满，身材硕长。李望知是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短暂爱情成果。这是李望知首次以薄熙来长子身份在公众场合出现，也是他6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李望知曾对外媒称，上一次与父亲见面还是2007年1月21日，在祖父薄一波的葬礼上。

事隔6年，薄、谷、李三家又重新坐到一起。唯有此时，这个红色家族二代、三代间多年的恩怨被暂时搁置，虽然共同诉求一致，但坐在庭上的三家人恐怕各怀心思。

而6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薄一波、谷景生和李雪峰，祖籍同为山西，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同心同德，携手并肩。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共北方局委派薄一波回山西与阎锡山合作组建

新军。阎锡山惜薄英名，在薄一波抵达太原翌日，即同意他接办和改组山西牺盟总会领导机构。薄一波在牺盟会27名新委员中暗自安排了21名秘密共产党员。次年，薄一波按阎锡山要求组建山西新军，以抗击日军。当年8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决死队随后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兵旅和3个政工旅，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

决死队后来成为中共的新生力量，薄一波下属谷景生曾任决死队第一纵队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等项工作。多年后，薄一波评价昔日的“老战友和老部下”谷景生所做工作，是“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薄一波的山西新军后来为中共输送了5万新军，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阎锡山与中共反目后，薄一波即转入中共所辖的太行山区从事抗战活动。薄在担任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等职务期间，谷景生亦一直紧随薄的领导，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下属太行区五分区、七分区的政委兼地委书记。

谷景生的直接上司是太行区区委书记李雪峰。李雪峰作为中共早期地方组织领导，曾任职太行区区委书记多年，太行山妇孺皆知其名。太行区为邓小平部129师休养生息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之后李雪峰随邓的部队南下，转战郑州、昆明等地，直至进京。

薄一波是山西定襄县人，其部属谷景生是山西临猗人，而李雪峰是山西永济人。三人早年并无交集，但在戎马倥偬的太行山革命时期，三人成为上下属间的战友关系，战场上的生死考验，让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薄一波后来弃武转文，渐入中共领导核心。而李雪峰一直矢志地方建设，凭政绩步上青云。谷景生走的是从军报国的仕途，也曾屡有转任地方的机会，但旋即又因各种原因被召回军界，官至少将。

作为“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谷景生早在1937年就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文革”时期，谷景生被打倒，遭监禁关押12年。70年代末获平反后仅一周，即被点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奔赴中越战争前线。此前与谷开来等子女分离已有12年。

在越战中，谷景生为越军的流弹所伤，越战结束后回到广州。而他搬进宿舍的第八天，就接到中央调其去新疆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命令。事后得知，是邓小平指名让这位老部属到新疆主持工作。谷景生到任后，实际上是新疆党政军一把手。

战争中的红二代

中共建政前夕，太行军区抽调各分区的基干团组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现隶属中央军委直管的空降15军前身），需调一个既懂军事又懂地方工作的纵队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区的八个地委书记中，李雪峰代表太行区党委推荐了谷景生，谷时任太行区党委第七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

谷景生之后又接替黄镇任第二野战军15军政委，与秦基伟搭档。谷既任军职，又兼地方工作：先后任郑州市和昆明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谷景生的同乡兼密友薄一波此时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昔日上级李雪峰则奉邓小平之名，抽调太行根据地数百干部和8万民工，挺进中原，先后任中共中原局副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中共这些上层精英们在南征北战中娶妻生子，许多儿女的童年在硝烟中度过。薄一波在战争年代育有三女四子：与前妻育有长女薄熙莹，与第二任妻子胡明生有老二薄熙永、老三薄洁莹、老四薄熙来、老五薄小莹、老六薄熙成和老七薄熙宁。

李雪峰则育有子女五人，三女二子。分别是老大李晓林、老二李丹琳、老三李小雪、老四李丹宇和老五李小峰。李晓林曾撰文回忆："三个大的都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我出生在左权县，妹妹二林（李丹琳）、弟弟小雪（李小雪）在涉县。"李家本还有一女，在太行山区日寇扫荡期间不幸夭折。

中共战史记载，1945年，林彪、罗荣桓部经过河南滑县以西的平汉铁路时被敌人发觉，战斗打响，驮着林豆豆和李丹琳（李雪峰之女）的驮篓掀翻在花生地里，部队通过封锁线很远后才发觉两个孩子丢了。叶群吓得眼睛发直，林彪则脸色铁青，急令警卫员们回去寻找。一位董姓警卫员最后在花生地里找到了两个孩子，二人在驮篓里酣睡方醒，丝毫没有受到惊吓。

李雪峰的长女李晓林、次女李丹林和长子李小雪很小就被寄养在农村奶妈家，直到李雪峰工作稳定才接回父母身边。乳名为"小矛"的李家三女李丹宇和二子李小峰生在战事平息后的50年代，自小跟随李雪峰左右。

中共游击时期的领导人择偶，大多选择队伍内的同志或控制区内的妇女干部。如薄一波的第二任妻子胡明1937年是中共广东省委秘书，李雪峰之妻翟英是太行区下属某县的副书记，谷景生之妻范承秀是太行山区著名才女与妇救会干部。范承秀为谷景生育有五个女儿，依次是：谷

望江、谷政协、谷丹、谷望宁和谷开来。

在革命年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婚姻家庭，一般是在封闭的红色圈子内选择根红苗正、志同道合者为侣。这是从经历中共各种内部肃反运动和斗争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成了这些日后红色后代婚姻家庭潜意识的选择标准。

老布尔什维克间的联姻

建政初期，中共需要大量卓有功勋的革命干部填满和充实上至中央下至省市县的政务班子，文官序列的薄一波、李雪峰得到了较快擢升。

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薄一波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雪峰则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等职。

谷景生此时仍身着军装，辗转国内各个战场。在赴朝鲜战场前，谷景生从昆明飞往重庆找到点名其赴朝参战的邓小平，表达希望留在地方工作的想法。邓小平沉吟片刻对谷说，“你还得去，担任志愿军15军政委兼党委书记，秦基伟任军长，朝鲜战争结束后，去不去地方工作那时再考虑。”谷景生服从命令，他率领的15军后来成为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中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亦为中共军队输送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典型。

自朝鲜战场班师回国后，谷景生被任命为防空军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不久，谷景生被其老上级薄一波调任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当政委，协助钱学森院长主抓导弹部队、原子能工业的筹建工作。

在太行游击时期便相熟的薄一波、谷景生和李雪峰三家人颠簸数年后，得以在北京重逢。

1956年，薄一波二子、7岁儿子薄熙来入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彼时的老师关敏卿对薄熙来印象很好，称其“两眼正气，说话彬彬有礼。”

薄熙来的小学同学在一篇博文中透露，在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挑选为外国元首献花的儿童，条件是：是乖孩子，长得还要漂亮可爱，个头要高，“我和薄熙来都被选中了”。

薄熙来在北京上小学第三年，小他9岁的谷家幺女谷开来出生了。此时正值“文革”初期，其母范承秀被打成右派，谷景生亦因妻子受累，被调离五院，到总政任群工部部长，控制使用，从此便被打入“不被重

用”行列。谷开来没有赶上父母春风得意的时候，恰恰相反，却最“生不逢时”。

1967年元旦，偕家眷在广州的薄一波被红卫兵带回北京囚禁，谷景生不久后亦入狱，范承秀则被关入牛棚，五个女儿基本处于放羊状态。谷景生曾写给女儿们一封“文革”家书，让他们坚决拥护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主导的伟大运动，“没有资格参加，也罢。”他叮嘱女儿们不要因为造反派们三天两头来家里抄家就“对党有想法”。这位忠诚的中共政工干部希望长女谷望江从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还让三女谷丹想法上小学，在家勤练柳书，保护好小宁（谷望宁)和小丽（谷开来）。

谷开来很早就辍学在一家纺织厂当女工，也曾在猪肉坊卖过猪肉。自小没有享受到父母呵护的谷开来被迫学会自我保护，为人自立要强，专横且聪慧。重庆时期，谷开来喜欢王立军等人称其为“五哥”，即与此段人生经历有关。

70年代初期，谷开来的三姐谷丹与李雪峰儿子李小雪结婚。尽管两年后李雪峰也被打倒，但此时他仍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高位，比起被以“叛徒”和“右派”家属名义关押的薄一波及谷景生来说，境遇好得多。

同意儿子与失势的老战友女儿结好，体现了李雪峰这对战友的情谊。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也在1976年9月与薄一波的二子薄熙来结婚，不过，这最终是一场悲剧。

家庭的分裂

一位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中共的高级干部子女一般都会和级别相同的高干子弟结婚，青春年少的薄熙来也遵守了这条准则。当时的薄熙来不仅身为“黑五类”，还背负一段牢狱经历。

薄熙来涉贪腐被诉后，有人提起他年轻时这桩旧案，称他入狱原因是偷拿新华书店的辞书出去卖钱。另一种描述版本是，当时薄氏兄弟3人与元老林枫之子林炎志同为“黑帮子弟”，经常玩在一起，成了铁哥们儿。他们把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家的吉普车偷出来玩，并开上路，不料撞死一头小牛。那时牛是生产队的头等财富，四人立即被抓。审讯时被定性为“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江青亲自下令，“将薄一波家的黑崽子抓起来”，结果四人同时被判入狱。

1972年，经周恩来的指示，在高级干部子女管教班强制劳动结束的

薄熙来被安排到北京一家五金修理厂的电工班当工人。据称，高干家庭出身的薄熙来颇结人缘，很多工友为其介绍女朋友。薄熙来还是把眼光投到了圈内：李雪峰家的四女“小矛”（李丹宇的小名）。

薄熙来和李丹宇自幼相识，李丹宇还是薄熙来小学时期的玩伴。二人的父亲是同乡兼战友，进京后，李雪峰还一度接替薄一波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虽然李雪峰在“文革”中也被开除党籍，革职查办；但李丹宇彼时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地位较之薄熙来的“黑五类”的工人身份，仍是高高在上的。

薄熙来在给李丹宇的情书中写道：“如果把你的大脑比做一个剧院，现在也许已经座无虚席了，早被冠心病、动脉硬化、胆固醇、心电图之类的医学名词占满了”，“我这个迟到者自然没有座位。但只要有耐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想双方都会找到座位的。”这封长达11页的手写情书迄今被李丹宇保存得完好无损。

李丹宇称，与薄熙来“最初几年，拥有纯真爱情”。薄熙来追求李丹宇时颇花心思，他用微薄的薪金买了一个画有小朋友的小铁盒、一个女孩子喜欢的帽娃娃和抱着球若有所思的小熊猫，作为礼物送给李丹宇。

李丹宇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即便他30年都没来看过我，我还是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只记得那些美好的光阴。人不能生活在仇恨里。”两鬓斑白的李丹宇回忆说，薄曾经是一个朴实、上进的青年，“他那时经常阅读马列选集”。夫妻的裂痕可能产生在薄熙来进入北大之后，李丹宇揣测那时薄熙来就与谷开来好上了。

薄熙来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是在1978年薄一波平反复出后。同年，20岁的谷开来进入北大时，也恢复了高干子女的身份。年轻美貌的谷开来很快成为高干子女圈中的名人。

李丹宇的嫂子是谷家三女谷丹，谷丹则是谷开来的姐姐。薄熙来选择与他妻兄的小姨子结婚，令薄、谷、李三家大跌眼镜。薄一波出狱的那年，薄家的四个儿子都已结婚，他没有时间干涉儿子们的婚姻，但传闻因薄熙来与李丹宇离婚难断，薄一波出面调停，薄、李两家从此有了隙缝。

红二代们的选择

随着薄案的开审，薄、谷、李三代红门恩怨又演绎出了新故事，佐证了人性的种种叵测和凶险。《纽约时报》记者去年援引薄熙来前妻李丹宇提供的资料披露，在薄熙来失势前几个月，薄熙来曾要求他第一任

妻子的哥哥李小雪到重庆与他会面。薄要求对方走进院子后关掉手机。薄熙来说，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人一直在试图毒害谷开来，他怀疑投毒的幕后主使是他和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李小雪断然否定了，称此纯属无稽之谈，薄熙来似乎放了心。薄案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后，薄熙来也承认，“谷开来当时是千方百计在我面前，让我感受到薄瓜瓜行，薄望知不行。”

李丹宇称，虽然自己和谷开来长期不和，但儿子李望知却从未有过杀害谷开来的图谋。李丹宇怀疑指责她儿子意图谋杀的是谷开来，而那些所谓的法医证据则有可能是王立军炮制的。

王立军在叛逃前，亦向薄熙来证实，谷开来曾策划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薄熙来的长子李望知并不受薄家待见，4岁时即由母亲李丹宇带离中南海的薄家，与外公李雪峰一家生活，并改姓李，以示与薄家决绝。

海外媒体报道称，李望知海外留学毕业后，李丹宇让其去找父亲薄熙来，薄怜长子辛苦，介绍他去自己曾执政的辽宁发展。

李望知化名李小白，现担任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据该俱乐部的网站介绍，李望知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96级)，研究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院结业。而李望知同父异母的弟弟薄瓜瓜现亦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就读。

美国彭博社称，李望知自2003年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课程后，一直从事投资活动，曾在香港为花旗集团工作。2008年更在本港注册老牛雪龙控股，投资大连雪龙黑牛公司。李望知的轨迹与多数大陆红色后代相似，选择从政或经商已是红色后代的普遍现象。

现在，薄熙来的权力大厦轰然倒塌。薄、谷家族的后人的生活私隐和商海经营亦被民众层层发掘。谷景生的几个女儿中谷望江、谷望宁分别是深交所上市的东港股份公司的大股东，谷望江早年在香港开设喜多来集团，拥有20多家合资和独资公司。据公开资料，喜多来又是在深圳上市的东港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东港股份市值20多亿元人民币。二女谷政协亦是中国特大型国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纪委书记。李望知的几个叔伯薄熙永、薄熙成、薄熙宁亦分别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六合兴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1986年，担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在湖南省的一次老干部座谈会

上讲到，“在座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多子多孙，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是一件大事情，自己要尽到责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子女交给党，交给社会去教育。”

而今回顾这段话，薄、谷两家可能均会各自沉吟。身陷囹圄的薄熙来与谷开来已成为中共新近反腐倡廉的活教材。而薄前妻李丹宇则仍期冀薄熙来能获善终：“他年纪已大了，我希望他安度晚年。”

薄熙来、谷开来与王立军的纠葛

记者 / 郑在

薄熙来8月24日对检察官称，他的生活已经是一个悲剧，谷开来也是如此。他希望不要再进行这种调查，不要把他家庭中的最后一丝温暖也压榨出来。

在经历了一场夫妻反目、旧故交恶的漫长庭审之后，原本清晰的剧情随着薄熙来案庭审的推进几度急转。这出大戏要画上句号似乎并不容易，它总是会被各种突出其来的意外增添问号与惊叹号。海内外的观察家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毫无疑问的是，戏中的主角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徐明、尼尔.海伍德、张晓军等配角，让各位看客完整地欣赏了一出围绕权力与财富、理智与情感、违法与犯罪展开的连环大戏。

辽宁 聚光灯下的金童玉女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薄熙来与谷开来以“金童玉女”的形象成为不少中国杂志的封面人物，更被誉为天作之合。

彼时，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正蒸蒸日上。她的丈夫薄熙来在政治上也是一片光明。薄熙来任职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大连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北其他城市。即使是薄的坚定反对者，也承认大连的城市建设的确取得了成绩，但这些“成绩”并没有提高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2001年2月，薄熙来当选为辽宁省省长。2004年初，薄熙来被调离辽宁省，出任中国商务部部长。

同样在这一年年初，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一次会议中痛斥形式主义和浮夸风，还提出要避免“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的现象。这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对薄熙来主政时期未点名的公开批评。闻世震认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和振兴是一个历史过程，辽宁必须卧薪尝胆、持之以恒，绝对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

但是薄熙来的“成绩”足以吸引那些想要接近权力的财富打拼者。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期间，海伍德曾向其致信愿意帮助他吸引外资。当时，海伍德与他的朋友共同经营的咨询公司，以帮助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为主要业务。海伍德得到了薄熙来的回应。

另一个幸运儿便是做鱼虾出口和土石方项目的生意人徐明。1993年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市长时推出一项计划，希望通过一系列大规模基础设

施开发工程将大连建成集运输、时尚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中心。《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他这么做是急于给中共高层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在此期间，一位美籍台湾商人将徐明引荐给了薄熙来夫妇。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徐明的公司转型成一个涉及塑胶、金融和地产等业务的大型企业，这主要得益于与薄熙来打造大连计划有关的当地政府政策及工程合同。

徐明还收购了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大连足球队。大连实德的一位高管曾对媒体披露，徐明其实不喜欢足球，投资足球是为了博领导欢心——薄熙来对球队感兴趣，他要用球队来提升大连的形象："大连足球实际上是大连城市精神的体现。"

伦敦 家庭生活埋下隐患

就在薄熙来的仕途如日中天时，谷开来带着儿子薄瓜瓜远赴英伦。根据薄瓜瓜此前对媒体的讲述，出国留学是由年幼的他自己作出的决定。而薄熙来却在庭审时道出当年的隐情："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尽管薄熙来的出轨与谷开来的出走长期没有公开，二人仍以夫妻情深的形象示人，但两人的感情裂痕不仅改变了夫妻关系，也让薄熙来稳定的权力中心被打破，谷开来日渐独立地成为另一个中心人物。

海伍德生前声称，薄瓜瓜在他的帮助下得以进入久负盛名的哈罗公学。不过，薄家的一位朋友却称，海伍德是在听说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之后才认识谷开来的。不过两个版本对此后情况的描述基本相符，即谷开来离开英国之后，海伍德成为薄瓜瓜的临时监护人，并周末负责接送薄瓜瓜往返学校。

在谷开来居住在伯恩茅斯期间，除了海伍德与之关系密切，徐明曾在2000年前往英国拜会她。此前他就曾陪谷开来和薄瓜瓜去英国物色学校，并且支付了行程中的全部费用。

谷开来曾和徐明一起登上公寓附近被称为"伯恩茅斯之眼"的热气球，并合影留念。谷开来希望将热气球引入大连，徐明随后花费几十万美元买下一只热气球。不久之后，由实德公司在大连新建的、也是临海最漂亮的星海广场上拉起一个巨大的足球形热气球，成为大连足球城和实德队生动的广告。大连实德的官方网站上也出现一张薄熙来与徐明在热气球上的合影。

尽管热气球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但徐明的事业显然没有受此影响。

2004年，薄熙来赴北京担任商务部部长之后，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成为商务部发牌允许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几家民营企业之一。2005年《福布斯》杂志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34岁的徐明名列第八，是两名最年轻的富豪之一。此后他成了国际商务会议上的常客。

13年后，当年的热气球项目被公诉人认定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徐明的请托，为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谋利"的证据之一。但薄熙来却认为他和徐明的所有业务都是"公事公办"。

对于"徐明是薄家'钱袋子'"的说法，薄熙来也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尽管外界一直认为徐明与他关系密切，但他却辩驳说徐明不是自己的朋友："他与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当然他与开来是朋友，我回家有时候碰到他们这是常有的事情，但并不能意味着我把他当我的朋友。"

其实，正如熟悉大陆官场的人所指出，哪怕薄不用给徐明打什么招呼批什么文件，只要徐明能够保持在薄家的顺畅地出入，就足以换取巨大的利益。"要说薄真的和徐明交换了什么，那就是徐明用20年的利益输送，换取了对大连乃至辽宁上上下下官员的威慑能力。"

重庆 合作与分裂

2007年10月，薄熙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接替汪洋出任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

2008年6月，曾经因打黑闻名全国的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与薄熙来共同开展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重庆打黑运动。这场运动被法律界人士批评为"文革式黑打"，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却颇受重庆百姓赞誉。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

此时的王立军不仅是薄熙来所倚重的手下，也颇得谷开来赏识。王立军与谷开来是通过徐明介绍结识的。徐明于2006年结识王立军后与其关系密切，并于2009年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为其亲属在京购置两套房产。

2007年1月，谷开来曾在公公薄一波的葬礼上昏倒。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在其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神经系统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伤。谷开来认为有人投毒，徐明找到全国知名的锦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来调查此事。王立军不负期望，很快就解决了疑案。他的结论是，薄熙来的私人司机和一个家内工作人员对下毒负有责任。

根据谷开来的供述，自那以后，她和王立军关系就很好："王立军担任了我医疗组的组长，工作之外对我也很尽心，我对他相当依赖，瓜瓜在美国的安保也是他负责。"

资料显示，2010年1月12日，身着红风衣、黑裙、黑色长靴的谷开来携其母范承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局，王立军作陪。当天，谷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的办公室里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谷亲手为王制作桌上装饰品。当年8月20日，谷开来到重庆街头探望执勤的王立军并送水慰问的照片，至今在网络中广泛流传。

然而，好景不长，在谷开来看来，她和王的关系在2011年六七月份出现了罅隙。谷称，自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没能如愿。"还有一次，王立军在3号楼（薄家住地）告诉我，他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晚上薄回来我跟薄说了。薄很生气。"据新华社报道，当年8月12日，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谎称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车祸，谷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不过，此时与海伍德的关系破裂更让谷开来头疼。海伍德与谷开来及薄瓜瓜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2011年7月11日，海伍德致信薄瓜瓜，要求薄家为一个失败的房产投资项目支付约1300万英镑，否则对薄瓜瓜不利。双方多次交涉未果。海伍德会"像当年毁掉圆明园一样毁掉薄瓜瓜"。

"虽然王立军说他已经安排好人在美国保护瓜瓜了，但是接到瓜瓜的视频后，我就特别不放心，所以才导致了后来11.15案件的发生。"

王立军与谷开来商议后，将到达重庆的海伍德以涉嫌毒品犯罪为由实施监控。11月13日，谷开来与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合力将海伍德投毒杀害。

王立军在庭审时表示，为了不得罪谷开来，他回避了尼尔.伍德案。谷的供述却称，王在此案中推波助澜。谷开来称，投毒前夜（2011年11月12日），王立军曾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谷称，13日投毒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材料显示，谷当场还写了一封信，称海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她远距离保护。张晓军回忆称，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随后，谷与张二人共同实施了对海

伍德的投毒行为。

11月14日中午，王立军前往谷开来的住所，谷向其讲述投毒杀害海伍德的具体经过，王立军当时私下秘密对谈话录音，但向谷开来保证善后，并让其忘记此事。之后，重庆市警方作出海伍德酒后猝死的结论。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薄熙来控诉了谷开来包括杀死海伍德在内的四大罪状，但他换来的却是薄熙来的一记狠狠的耳光。数天后，在未征求公安部允许的情况下，王立军被从公安局局长的位置上撤下，将其副市长分工由公安司法调整为科教文卫。王立军手下参与了调查薄熙来家属的助手及调查员反而开始受到调查。王因此感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最终于2012年2月6日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震惊海内外。

内地编剧周力军曾在1996年受公安部委托创作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1997年春他采访王立军时，王曾在抚顺的澡堂子里对他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周对当年的王立军评价很高，但现在他不明白的是，王立军“既然心里清楚，又为什么让别人可劲儿嚼呢？”

北京 大难临头各自飞

如果说当年谷开来的出走为薄熙来埋下了诸多隐患，那么王立军的出走无疑给薄熙来带来致命一击，直接导致了薄熙来的倒台。

2012年3月15日，“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常委及委员职务。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薄熙来立案调查。新华社同时发布消息称谷开来和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半年后，谷开来、王立军先后接受审判。2012年8月20日，谷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数罪并罚，共获刑15年。而薄熙来案却直到2013年8月22日才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几场庭审审理下来，夫妻反目、旧故交恶的场景不断出现，令观者唏嘘不已。

谷开来在庭审提到王立军时，她遗憾自己“用人不察”，“这个人实在太卑鄙了”。而王立军则认为谷开来拖了自己后腿，“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谷，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当薄熙来看到谷开来提供录像证词、王立军出庭作证时，薄熙来称王立军“品质低劣”，是一个卑鄙的撒谎者，称自己的妻子“变了，她疯了，经常说

假话。”

据谷案庭审记录，“谷开来在2006年服用大量含重金属的虫草胶囊之后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她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也称，她这几年的精神极不正常，性情怪异，经常晕厥，“一年都不出家门10次”。

尽管薄熙来案开庭之前曾有不少人预言薄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剧情变化之突然和强烈仍然令无数通过微博“转播”关注庭审进展的网民瞠目结舌。

庭审从预定的两天延长到五天。薄熙来不仅对检方的所有控告都矢口否认，更在庭审的最后一天抛出惊人的内幕：“王立军为什么要逃跑，他自述的那几个理由根本都不成立，其真正理由就是因为王立军他自己已经交待了，他暗恋着谷开来，情感纠结，不能自拔，也向谷开来做了表白，这个他与谷开来写信时写出来了，而且自己打自己八个耳光，谷开来说你有点不正常，他说我过去不正常现在正常了，没想到这时我突然出现，我把东西收走了，他知道我的性格，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情感，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谷开来和他是如胶似漆，谷开来对他是言听计从……他们俩的一种极特殊的关系，我烦透了”。

对薄熙来的辩驳，公诉人表示，有“确实充分并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证明薄熙来的行为构成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又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微博上“转播”庭审进展，获得了审判透明的赞赏。但也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一条庭审直播微博在发布后又被删除，并且比第一次发布时少了一部分内容。被禁止传播的内容是公诉人在指责薄熙来推卸责任时说出的一段内情：“在同意出具王立军虚假诊断证明的问题上，薄熙来一再强调是基于上级的指示，但是在案证据证实，薄熙来同意出具虚假诊断证明在前，其所说的上级六条指示在后，而且，上级指示中没有出具虚假证明的要求”。

本港媒体《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笔录还删除了薄熙来对谷开来表示同情的一些言论。薄熙来8月24日对检察官称，他的生活已经是一个悲剧，谷开来也是如此。他希望不要再进行这种调查，不要把他家庭中的最后一丝温暖也压榨出来。

薄熙来重庆“遗产”再调查

特约撰稿员 / 龙军

薄熙来主政重庆的四年多时间里，“唱红打黑”、“五个重庆”等政治动作接二连三，其力推的“重庆模式”也名噪一时。如今，随着薄案公开受审，其政治生涯走入末路，但薄熙来留给重庆的诸多“遗产”和问题尚需逐步厘清和纠正。

8月26日，经过5天的庭审，薄熙来案一审结束，济南市中院宣布将择日宣判。

从2007年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到2012年3月黯然去职，薄熙来主政重庆的四年多时间里，“唱红打黑”、“五个重庆”等政治动作接二连三，其力推的“重庆模式”也名噪一时。

如今，随着薄案公开受审，其政治生涯走入末路，但薄熙来留给重庆的诸多遗产和问题尚需逐步厘清和纠正。

重庆媒体“非常时期”

济南对薄熙来持续5天的审判高潮迭起，在海内外媒体均掀起报道风潮。但在重庆，本地媒体除了有限地转载新华社的通稿之外，几乎看不到自采的新闻。

8月22日，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重庆媒体就高度重视，但并无“自选动作”。一个夜里10点还要赶到办公室值班的媒体总编告诉记者，非常时期，非常时期……

回顾一年半以前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任何与薄熙来有关的新闻，都是这个城市所有媒体头等重要的大事。作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的《重庆日报》，则组建专门团队，负责薄熙来日常工作的报道，无一例外的是，每篇报道刊发之前，都必须送薄熙来本人审看修改。

如今，重庆媒体的集体噤声，既与公审期间中央媒体对薄熙来的高调批评对比鲜明，也让底层民众对薄熙来本人的认知，仍停留在形象过度包装与媒体严格受控的薄主政时期。

济南公审期间，在重庆街头随机采访，仍能感受到底层一些民众对薄熙来似乎不无好感。这种好感既有基于对薄熙来政绩的人云亦云，也有对他人生和仕途彻底失败的些许同情。

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判断的理由，如果一定要从他们的言语里提炼

出一点理由，那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做了一些事”，“城市有变化”。至于这些变化背后的代价，无人知道，似乎也无人关心。对底层民众来说，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被无辜劳教的网民、开除公职的民警、被黑打的企业，似乎都与他们无干。

即使是种植银杏树这样遭遇普遍非议的事情，一些重庆的百姓也觉得不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他们能理解。理由是不种银杏，这些钱也到不了他们的手里，甚至可能被官员直接贪污。

尽管有一些好感，但被访问到的普通市民对薄熙来的命运也并不关心。很多人在表达了自己的复杂感受之后，并不知道薄熙来庭审已经历时数日。这个曾经在重庆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的坠落，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但对于因在网络上批评薄熙来，并因此被劳教的警察蒋某来说，审判薄熙来让他略感安慰。数年前，作为南岸区一个警察，他因为发布了两条不足100字的天涯跟帖，被开除公职，并直接送劳教，最后不得不依靠开小卖部养家糊口。

王立军、薄熙来倒台之后，蒋重新回归警察队伍，但身体彻底毁了。薄熙来走上被告席的那一天，他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并发症送医急救，仍在电话里诅咒薄熙来、王立军，表达自己的愤怒。

但在此次庭审中，除了贪污、受贿和针对王立军本人的滥用职权，劳教无辜网民以及违反程序黑打，都没有列入庭审的范围。薄熙来在重庆的若干故事，除了引发“政治地震”的毒杀尼尔·伍德被杀案本身，其余也都没有成为司法解剖的内容。

众多因薄氏政治而受牵连、被打击的人士和企业，正在努力寻求申诉或平反。处理此类申诉成为重庆官方此后的重担。当地媒体人士介绍，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已在进行，有了一些成果，但同样保持静默，“只做不说”。

薄熙来及其私人圈子留给重庆的是沉重的后遗症，其痕迹正在逐步消除，随着薄案的尘埃落定，重庆方面逐步会更加全面地检讨和纠正。

东北心腹空降重庆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王立军在重庆的影响，和他的职务并不吻合。但一直到他仓皇出逃，外界恐怕也不会知道他并不是薄熙来夫妇在重庆唯一的心腹。

据内地媒体公开报道，早在薄熙来入主重庆之前的2007年，情报人员出身、且与薄家关系颇深的于俊世就抵达重庆，住进日后的两江经济区北部新区栖霞路8号59号别墅，事后有媒体解读说，这是为薄熙来的入主做准备。

于俊世的公开身份是大连世源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人非常低调。在重庆的4年多里，他唯一的一次险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系因其饲养的名贵斗犬咬死人。此前，他饲养的烈犬就已经两次咬伤人，但都不了了之。2012年3月14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纽约时报》报道说，作为薄的亲信，于俊世与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同时被捕，开始暴露在公众面前。

据内地《财经》杂志报道，于俊世是王立军和薄熙来的牵线人。王立军于2008年中调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后迅速提拔为局长、重庆市副市长。2008年9月、2009年11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期间，于俊世先后两次为其支付在重庆租住的别墅租金共计20万元。2009年10月，王立军接受于俊世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杨某某予以释放。

薄熙来的另一个重要伙伴是徐明，这位大连实德的掌门人，系薄熙来在大连时的故交。查询重庆官方现有的档案资料可以发现，薄熙来入主重庆后，徐明也在2009年跟进，染指重庆市政建设工程和地产项目，依托系列新成立的平台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融资运作。

早在薄熙来事发之前，关于王立军、薄熙来、徐明的铁三角关系，就在坊间流传，大陆网民戏称徐明是薄熙来的钱袋子、王立军是薄熙来的枪杆子。于俊世虽不为公众所知，但他的能量在重庆政商两界却是公开的秘密。在重庆全面打黑时，重庆商业巨头人人自危，有传言说，重庆著名的摩托生产大腕就主动找到于俊世，希望不被薄熙来主导的打黑所波及。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正面回应。

实德系重庆圈地

据知情人介绍，徐明的实德系进入重庆，除了薄熙来本身的因素，还有一个不无偶然的机会。2008年2月7日，重庆蓝箭宾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与一位自称周晓雪的女子有染，被人偷拍下来，随后，雷政富遭遇敲诈勒索。感到危险的雷政富主动将此事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检讨报告，薄熙来让王立军调查。王立军成立了7·30专案组，很快查明系商人肖烨一手布置的桃色陷阱。2009年初，王立军将肖烨逮捕，收缴了光盘，雷政富和多名涉事官员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接下来还得到了

薄熙来的重用，升任北碚区区委书记。此后，雷政富倾力“配合”王立军的工作，在重庆市公安局建设用地方面提供了诸多便利。

正在这个时候，具有实德系背景的哈尔滨上和置业进入重庆，与北碚区蔡家组团签订了一个占地2500亩、金额达50亿元的框架合作协议。北碚位于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核心，集中了大量建设项目。但哈尔滨上和置业签订框架协议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2009年7月，一个名为重庆盛和建设的公司入驻北碚区。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风栖路6号，其母体公司是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高登国际”），法人代表为高登国际的副总经理李鹏翱。高登国际的前身，也是徐明的实德系。

但让人意外的是，实德背景的盛和公司还没有注册完毕，重庆北碚蔡家组团的项目就已经给了他们，甚至没有经过土地出让公告。工商信息比对和建设方备案材料显示，从账面上看，盛和公司最后并没有直接参与该项目的建设。

与哈尔滨上和一样，盛和建设同样只刮风不下雨，迅速成立了另一家具有实德系背景的重庆和生裕公司，拿到了包括上述地块在内的三块地。2011年1月27日，就在上述地块之一，重庆刑事技术中心开工。重庆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也准备在北碚建设。

也是在2009年8月，一家同样有徐明背景的光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并于2010年2月8日以6092万元的价格拍得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D分区D18-5号地块，性质为医疗用地。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四个公司先后登场，其中有三个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如今，上述地块几乎都抵押给了银行进行融资或进行股份稀释。除已经稀释掉的部分，重庆某知名地产企业，也准备接盘徐明的北碚地块。但故事在2011年11月出现了急转。

2011年11月13日晚，谷开来在重庆南山丽景酒店毒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随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矛盾因尼尔·伍德之死而迅速激化。徐明似乎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真相。2011年年底，其在北碚蔡家刚开工的一个项目在没有支付建筑商一分钱的情况下停工，成为烂尾工程；其拍下的其余地块，也长满了荒草。

重庆市招拍挂信息显示，徐明利用其北碚圈地进行融资的同时，走出监狱的肖烨也在雷政富的辖区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扩展，北碚区2010年度农综项目中标公示，重庆市北碚区2010年度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C标段工程项目被其拿下，合同金额97万余元，二标段合同金额则达

到171万元。在短短的2年内，肖烨在重庆中标32个，合同金额达到1.32亿元，其中，雷政富执掌的北碚成了他扩张神话的基地。

2011年底谷开来杀人、2012年2月初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薄熙来很快从政坛上坠落。几个月后，肖烨和11名被他套牢的官员，被流出的艳照门彻底击倒。此后，他们又因共同接受司法审判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土地财政支撑重庆奇迹

即便在薄熙来退出公众视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重庆创下的所谓经济奇迹，特别是民生成就，仍为其支持者津津乐道。

重庆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薄熙来究竟给重庆带来了什么？公开的信息显示，在薄熙来风头最劲的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达到惊人的16.5%，不仅在中国名列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也独占鳌头。这也是他一直对外广为宣扬的资本。随着他离去，之前不被公开的数据逐渐浮出水面，让人得以一窥重庆经济奇迹的真相——最大限度的政府投资、银行借贷，以及土地销售的快速扩展。

对重庆模式的最权威解释迄今为止来自市长黄奇帆。黄奇帆的理论是，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要赶超沿海地区，必须打造不同的发展路径。通俗地说，有别于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在外、原材料在外的发展模式，重庆的特点就是出口在外，原材料、劳动力在内。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遵循这一理念，美国惠普公司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引入重庆。至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200家已经落户重庆，大批零部件企业也接踵而来。当年重庆出口增速高达165%，毫无争议地雄踞全国第一。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表面上无限风光的数据，背后除了中央政府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使重庆拥有两个保税区）的支撑，还有薄熙来不惜血本的招商引资模式——最高标准地降低外资应承担的企业成本，最大限度地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大量融资进行基建，改善经商的硬件环境……

2011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高达76%，四川比例为72%，全国平均水平则为64%。单此项差别，就可以解释三者在经济增速上的大部分落差（重庆16.1%，临近的四川为15%，全国9.1%）。

在巨大的投入和高企的GDP背后，重庆的产出似乎并不理想，依然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入为607亿元，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的880亿元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2亿元。

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正式挂牌于2010年、规划面积达到1200平方公里的国家级经济区两江新区，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中，550平方公里的可开发面积，是2011年土地财政的核心。

综括重庆市的财政状况，其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大量外企并未贡献太多的税收增长，工商业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2011年增值税仅82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3%，增速也仅为5%。对重庆本土企业来说，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与大批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引进企业的竞争中，本土企业还没有出发，就已经输了。

“五个重庆”和民生造假

在对外包装中，薄熙来一再强调“民生、共富”，提出了五个重庆的口号—“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但在薄熙来倒台后，被媒体鼓噪和包装了数年的“五个重庆”很快现出了虚构写作和舆论过度包装的痕迹。和临近的同类型大城市成都相比较，即使在砸入数千亿元的基建巨资之后，重庆的宜居和畅通，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在被广泛宣传的民生工程——“森林重庆”上，薄熙来给重庆留下了个人喜好的强烈印记。2008年，薄熙来提出要用10年时间打造森林重庆，他喜欢银杏，于是，重庆大街小巷开始种植银杏。据媒体公开报道，从2008年到2012年，重庆市种植银杏达2276.75万棵。在最疯狂的2010-2011年，国内著名的苗圃基地成都市温江区的20年以上树龄的银杏几乎被抢购一空。

为了视觉效果的统一，一些原本生长良好的黄桷树、小叶榕被挖起，换种银杏。2010年4月，重庆市南岸区政府从财政拿出1亿多元投入江南大道的树种改造。江南大道两旁数百棵生长了数年的小叶榕被换成了一棵棵胸径在40-125公分的银杏树，有的树龄在100年以上，单价达到30多万元。

此后2年的实践证明，银杏并不适合重庆夏天接近40摄氏度的严酷气候，遮阴效果和生态功能较差。而且盲目引进和大面积种植的银杏，成活率并不高。以潼南工业区为例，移栽的银杏大面积死亡。

在重庆，银杏并不是唯一的尴尬。一度作为薄熙来重庆经验的微型企业项目，实际操作中也因其大跃进式的做法而变相走形。

被广泛宣传的重庆微型企业培育发展工程，鼓励重庆市的弱势群体创办微型企业，即办理个人独资企业和小型公司，每个微型企业政府补助2万至5万不等的创业资金，还可享受无息贷款和减免三年税收等优惠政策。重庆市某工商局人士说，这是薄熙来主抓的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其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执行过程中走样了。

据这位亲历者透露，为了完成这个所谓的民生工程，一开始就给各工商局、工商所下达了高额任务。比如，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长住加流动人口总计不足7万人的九龙坡辖区，要求每年新办100户微型企业。每月通报各个工商所完成情况并排名列位次。重压之下，弄虚作假成为常见现象。

为了完成考核的数量，工作人员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来申办微型企业，帮助自己完成任务；往往上半年完成任务后，遇到真正想开微型企业创业的人来办理手续，又压着不办，坐等来年。

据一位办事员介绍，他在受理材料时经常会看到熟悉的名字。由于高科技、创意类微企的创业补助资金最高，达注册资金的40%至50%，很多明显不具备相应文化水平的人却申办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动漫设计等高科技、创意类的微企。该人士称，有时，一家人申办3-4个微型企业执照，就可骗取政府补助资金十几万元。

在微型企业项目成了“唐僧肉”后，一些领导也开始染指。该人士回忆，有一天，某领导直接将一叠材料交给他员，让他火速办出执照，因为申办人士是财政局某领导的女儿。由于注册资金要一次性拿出10万元，才能得到2万-5万元不等的政府补助，弱势群体很难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来，使得这个原本想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流于形式，真正的弱势群体却享受不到。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享受这个所谓的民生福利？记者经实际调查发现，以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商局黄角坪所为例，该所九个人，就有三个职工的直系亲属办了微企执照。

薄熙来当政时，没有人敢对微型企业进行任何质疑。重庆市工商局一名经手人称，他专门上网检索重庆微型企业的新闻，发现全是铺天盖地的赞扬，他们这些了解内情的人，除了摇头叹息，一句话也不敢说。

薄熙来离开重庆后，重庆对微型企业乱象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如：

不准代办公司代办；一家人不准办第二个微型企业执照；工商人员不能里外串通让亲朋好友申办微企；不能收受申办者的贿赂；开始清查骗取政府补助金的虚假行为。2013年7月，重庆市工商局在全局范围内对内部职工办理微型企业执照的情况进行摸底，召集内部职工直系亲属办了微型企业执照的人开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之后，有些微型企业开始更换法人。

谷开来海外关系网起底

记者 / 吴如加 实习生 / 倪姗姗

由几个外国人组成的小圈子为谷开来打点生意，提供建议。为了避免薄的家族成员在商业活动中暴露，他们作为谷开来的代表，为其在海外注册空壳企业，管理资产。如同在古代日本，侍奉大名和将军的家臣团。英国《每日邮报》在描述这些代理人时，形象地使用了一个中文词汇——“white glove（白手套）”

“她担心有人给我们造谣，把她的那些律师分所一早都给关掉了，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几乎就是在家里给我做一些家务，我对她作出的这种牺牲很感动的！”

这是去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薄熙来面对着中外媒体称赞夫人谷开来的一番话。时隔一年有余，再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时，昔日的政治明星已坐上了被告席，而他一年前所说的这番话亦被舆论重新审视。

事实上，谷开来在过去20多年中，从未远离过商务活动，这些活动地跨中、美、英、法多国。在谷开来的周围，有着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小圈子，他们为谷开来打点生意，提供建议。为了避免薄的家族成员在商业活动中暴露，他们作为谷开来的代表，为其在海外注册空壳企业，管理资产。如同在古代日本，侍奉大名和将军的家臣团。

他们中包括法国著名建筑师德维莱尔（Patrick Henri Devillers）、美国商人拉瑞·程（Larry Cheng）,以及付出生命代价的（Neil Horwood）尼尔·海伍德。英国《每日邮报》在描述这些代理人时，形象地使用了一个中文词汇——“white glove”（白手套）或是“bai shou tao”。

来自中国的“肯尼迪夫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谷开来，1995年成立了自己的开来律师事务所。1997年，在一起中美企业诉讼中，谷开来亲赴美国，推翻了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对中方企业的不利判决，这件事被当时的大陆媒体描述成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谷开来从此声名鹊起。当时，薄熙来正担任大连市市长。

1998年，谷开来撰写的《胜诉在美国》一书出版，在书中，谷开来详述了在美国打官司的经过。2001年，薄熙来升任辽宁省省长，同年，开来律师事务所更名为昂道律师事务所。直到目前，在北京市司法局的

网站上，昂道律师事务所的词条下，仍可查询到“开来”律师。

2002年，《胜诉在美国》被搬上荧幕，这部20集的连续剧，描述了一位果敢、聪慧的女律师，与散发着个人魅力的“渤海”市市长，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共同奋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女律师爱上了市长。

这一时期的谷开来，在她的外国朋友眼中光彩照人。曾与谷开来一道在阿拉巴马诉讼案中工作的美国律师爱德华·伯恩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称，对于谷开来杀人一事感到难以置信。“她非常犀利，而且幸运的是，她的英文也非常好。”伯恩回忆起16年前的谷开来：“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魅力四射，非常吸引人。人们将她视作中国的肯尼迪夫人。”

当案子结束之后，谷开来邀请参与此案的美国人以及家属来到中国，并与时任市长的丈夫薄熙来在大连款待他们。在一场晚宴上，薄熙来热情地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受邀者辛凯因(Robert Schenkein)回忆道，他就像是一位美国政治家。

当时，谷开来发给律师朋友的名片上印的名字是Horus L.Kai。Horus是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在谷开来之后的许多海外商务活动中，她一直使用着这个名字。

谷开来：我要把你们丢进监狱

在伦敦的朋友圈子中，谷开来被视作品味高雅的夫人。许多和她接触过的当地人都为她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据《纽约时报》2012年7月报道，谷开来戴着一条耀眼的蓝宝石项链，她会在公寓中为朋友们用84摄氏度的开水泡上一壶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烫伤茶叶——并且为客人们弹奏琵琶。

但在生意上，她的强势却烫伤了朋友。一位曾在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与谷开来有过商业合作的伙伴——英国人霍尔（Giles Hall）——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达了对谷开来的不同看法：“她是一个极其冷峻、强硬的女人。”

1998年，谷开来带着儿子薄瓜瓜远赴英国南部的小城伯恩茅斯。从她的公寓里，可以看见一只悬停在半空中的热气球，这是当地著名的“伯恩茅斯之眼”。气球可以搭载着游客上升到150米左右的高空，俯瞰整个小城的美景。而霍尔正是热气球观光项目公司的总经理。

谷开来向霍尔提议，希望能把两只类似的气球出口到大连，并向霍

尔介绍了海伍德和德维莱尔。“德维莱尔是谈判人”。霍尔回忆，“很显然，她希望这件事能够秘密地进行，为此我们还签署了一份奇怪的保密协议。”德维莱尔曾对霍尔表示，最好在商言商，不要过问项目钱款从何而来。

当用于固定气球的一个绞盘，无法如谷开来所愿——不经过北京，而直接通过海运送至大连——这场交易陡然变得苦涩起来。

“显然，这牵涉到腐败。大连在她的丈夫掌控之下，只要一切直达大连，她就可以免去所有顾虑”，霍尔说。因此，当得知绞盘被送到北京时，谷开来显得异常愤怒：“如果你们胆敢踏入中国，我就把你们丢进监狱。”

“她确实能说到做到，在大连，他们掌握一切。在那里，每个人都害怕她。”霍尔评价道。

英国人海伍德

作为谷开来最重要的外国伙伴，海伍德于2011年11月，被谷开来毒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他的死因被掩盖，在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之后，案件的真相才浮出水面，并直接导致了薄熙来的垮台。

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海伍德身上都透着一股典型的海外英国人的特质——哈罗公学毕业，开着一辆二手灰色捷豹，喜欢007和《孙子兵法》，曾在英国下议院任职。借用另一位洋伙伴德维莱尔的话：“海伍德有英国贵族传统的高贵气质。”

海曾有传言他是军情六处的特工，但英国情报部门对此予以否认。海伍德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自学了汉语，来到大连居住，任教于一所当地的国际学校。后经人介绍成为薄瓜瓜的英文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英文水平都很不错。前墨西哥驻华大使瓜哈尔多（Jorge　Guajardo）可以证明这一点，日前，他在自己的推特上提到：“除了外交部之外，薄熙来是唯一一位与我用英文交流的中国高层官员。有趣的是他在庭审中也是这样（使用了英文）。”瓜哈尔多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曾两次和薄熙来会晤，进入会议室前：“工作人员会告诉我们把相机和手机放在车上，不能携带进办公室，这是在我会见中国政府官员中唯一见到过禁止带手机进入办公室的。”

以家庭教师为起点，海伍德开始逐步介入薄家的经济和生活。与此同时，海伍德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他的客户包括劳斯莱斯、阿斯顿·

马丁以及锰铜公司。

海伍德在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哈罗公学的录取政策异常严苛。海伍德生前称自己为薄瓜瓜的留学提供帮助，此外还参与了谷开来尼斯别墅的管理，并曾与谷开来关系暧昧。

2013年8月底，英国《每日镜报》采访据称是海伍德保镖的莱特（Michael Wright）。莱特称，当他第一次见到谷开来时，海伍德向保镖们介绍谷开来是“荷鲁斯（Horus）女士”，是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夫人。

据莱特回忆，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居住期间，与海伍德关系亲密，且二人逐渐对此并不避讳。“我见过他清晨从她的卧室中出来，衣冠不整，”莱特说，“尼尔还会带她去附近一家名为瓦伦蒂诺的意大利餐厅，或者另一家名为海洋宫的中餐馆，然后两人一起度过一个浪漫之夜。”根据英国工商部门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间的纪录，谷开来在英国期间的住宿地址是伯恩茅斯的楔石（Keystone）公寓。

《泰晤士报》也引述这栋公寓谷开来邻居的描述说，谷开来和儿子薄瓜瓜就住在这栋大楼的顶楼。海伍德是造访的常客之一，并曾经见到海伍德与薄瓜瓜在早上一起离开。海伍德住的是右边第一个房间，而且经常从窗户探出头来抽烟。

2007年前后，谷开来由于受到腐败调查，变得敏感多疑，以至于偏执地认为圈子内有人背叛了她。加之在尼斯别墅的持有及酬金问题上两人发生冲突，海伍德与谷开来的关系逐渐恶化。海伍德曾对朋友透露，谷开来甚至要求海伍德与其配偶离婚，并发誓忠于薄家。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由于与谷开来的争执，海伍德对自己的安全状况倍感焦虑，曾表示“生命受到威胁”，并计划携妻儿离开中国。

海伍德被杀之后，他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海伍德在北京郊区拥有豪宅，每月必须缴纳贷款，其子女所就读的英国达利奇学院中国分校，每年仅学费就高达22000英镑。

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

作为谷开来另一位重要的外国朋友，德维莱尔在谷开来受审期间回到中国，指证谷开来的犯罪事实。

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1987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中文和

建筑，在那里，他结识了他的妻子，关杰，一位出色的古筝演奏家。1992年，德维莱尔和妻子移居到大连，并在大连一家设计院谋到了职业。

关杰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关向应的侄孙女。在中共革命时期，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与关向应同为重要领导人。因此，《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上一辈的纽带使得德维莱尔得以接近薄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由于客户欠款，德维莱尔向薄家求助，以此为契机，双方开始熟识，薄瓜瓜称呼其为“德叔”。

90年代，薄熙来在大连大兴土木。在喜爱艺术的德维莱尔眼中，大连因此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城市，“薄熙来使全市充满了活力”。在与薄家接近之后，德维莱尔得到了参与一些建筑项目的机会，其中包括世界和平公园的设计。但是结果并未让德维莱尔满意，因为大连城市规划署只拨给了他十分之一的经费，这使得他此前的宏大设计无法如愿实现。

德维莱尔于2000年返回法国，妻子关杰则留在大连照顾自己的父母与幼子，两人在三年之后离婚。

2006年德维莱尔和父亲米歇尔共同出资，在卢森堡注册成立D2地产投资公司。米歇尔对儿子经商并不抱以太大期望：“在生意上，他一无是处。他是个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D2地产投资公司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即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谷开来在德维莱尔的协助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名为Adad Ltd的壳公司，并通过该壳公司在伦敦富人区购买了两套公寓。目前两套房产的价值合计超过200万英镑，但这部分地产，并未在近日对薄熙来的审判中，进入检方的起诉书。

针对外界质疑，德维莱尔对媒体表示，自己与薄家是友谊关系，从未领过薄家的经济报酬，离开中国时身无分文，“就像我到中国的时候一样，都是一无所有。”

德维莱尔已于多年前移居至柬埔寨，住在首都金边市中心一座漂亮的房子中。在那里，他和自己的老式丰田皮卡，以及中国造的电单车，过着质朴简单的生活。在当地法国人圈子中，这位艺术家显得神秘而优雅，人们议论他“彬彬有礼，精通亚洲文化”，却又“十分低调”。

直到谷开来杀人案浮现之后，由于德维莱尔与谷开来在商务上的合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柬埔寨警方逮捕了德维莱尔，此后德维莱尔自愿前往中国作证。谈及对这一事件时，德维莱尔引用老子的《道德经》

作为评语："当魔鬼没有了可以伤害的对象,它自然会自己消失。"（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尼斯的别墅

谷开来与她的外国朋友之间的矛盾总爆发，都源于一座位于法国城市尼斯的别墅，这一处别墅也是薄熙来受贿指控中最大的一笔财产。

尼斯距离度假胜地戛纳仅50多公里，同属蓝色海岸大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座别墅建在尼斯的一座小山丘上，地中海风光尽收眼底。三层别墅的建筑面积为350平方米，拥有6个卧室，总占地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带有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等。

根据薄熙来案庭审中检方提供的谷开来等人的证词，当她于2000年带薄瓜瓜赴英国留学时，即感到住房困难，遂萌生了在英国之外买套房子的念头。考虑到德维莱尔是建筑师，于是委托其选择房屋。德维莱尔便在尼斯和戛纳之间找到了这一处名为枫丹·圣乔治的别墅。房款连同装修费用，总计需300多万美元。购房款由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支付。

为了规避税收，并避免暴露实际持有人身份。谷开来同德维莱尔通过网络注册成立了罗素地产公司，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股权操作，最大限度降低公司透明度。公司设立的目的，只为了购置别墅，并无其他实际业务。

在购买之后至2007年，德维莱尔作为购买别墅的公司董事及法人代表，持有别墅。并负责对别墅进行装修和出租。

2007年，谷开来担心德维莱尔霸占别墅，遂将持有的罗素地产公司50%股权转让给海伍德，寄望海伍德能对德维莱尔形成制约。此时，海伍德与德维莱尔分别持有50%股权。海伍德取代德维莱尔成为别墅的管理人。

2011年，谷开来疑心愈重，认为"这两个外国人都不可靠，都有侵吞霸占我别墅的意图"，于是找来徐明商量，后将海伍德所持50%股权取消，与德维莱尔所持股份一并转给徐明的女友姜丰。不久，海伍德提出140万英镑补偿要求。

5个月后，谷开来于重庆毒杀海伍德。

2.徐才厚往事

从长兴岛到哈军工——徐才厚往事

记者 / 钟坚

编者按：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一天，徐才厚被宣布开除党籍。此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铲除腐败决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军队形象不容玷污》,表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

这名从大连瓦房店下属偏僻小岛长兴岛走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军校及工作初期都鲜有突出之处，谨小慎微，普通平庸。由于长期不被看好，徐才厚曾险些脱下军装转业回家。但因彼时军队对知识化、年轻化干部选拔的标准实际上异化为高学历化、名校化，使得并非优秀人才却占得年龄和学历优势的徐才厚时来运转。继而一路升迁，平步青云，直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据已被披露的腐败事实，徐才厚显然不是适合重用的人选。从当初的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到最后操纵干部任用，与家人一起上阵放手贪腐，徐才厚被军队重用并无报效之心，而是头也不回地一步步走向深渊。身居高位却如此贪婪，这名曾经的军内名校学员，给军队甚至国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以估量。

初夏，辽东半岛特有的温带季风气候，实在难以捉摸。6月27日，一夜的雷电交加、暴雨如注。翌日，天放大晴，大连长兴岛徐家庄草木零落，花残红销。

这是一个废弃已久的北方小屯，在长兴经济开发区行政版图上，早已没有它的标注，白天少有人来，夜里更是一片死寂。横贯长兴岛南北的城八线路边矮山丘上的这个小屯，也有其特殊和神秘之处，但凡岛上居民或者有心到访海岛人文胜迹的游客，无不知晓途经的这里是徐才厚祖居。

6月30日，中共在创建93周年前一日宣布：开除徐才厚党籍，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吃着苞谷饭、从长兴岛这处石打垒的四合院祖居走出的这位中共前军委副主席的政治生命自此画上句号。

据新华社6月30日报道，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出身苦寒之门，而后金榜题名，最终跻身中共军界权力顶峰。徐才厚成长经历可堪农人子弟仕途奋斗的传奇，但在命运进阶的关键期，又充满着历史诡秘的起承转合。

多年以后，无论徐才厚幼时的玩伴，昔日的师长，抑或是同窗好友，无不惊讶于这个看起来温润讷言、谦恭有加，又谨慎低调、好学上进的人，竟会悄然蜕变成国之大蠹、军中危卵。

“任官维贤才，朝庭得红星”，身为瓦房店徐氏宗族中“才”字辈的徐才厚，显然没有记住徐家的这个祖训，尽管徐才厚实现了祖上的夙愿，一朝高官得做，声势显赫，但最后身陷囹圄，身败名裂。来自军方的多个消息源称，徐才厚的落马料将改写中共军队贪腐的最新纪录。

偏僻小岛上的祖居

穿过长长的院落，熟练地打开院门的铁锁，张洪林径直走进里面的主房，抬头检查着前一天晚上的暴雨是否造成屋漏的情况。张洪林既是徐才厚在长兴岛的小学同学，现在又是徐家祖居的看护者，受托照看徐家祖居日常房屋通风，庭院除草。

这处建筑还保留着长兴岛五六十年代岛上原住民建筑的风貌。四间石头垒成的平房构成一个折尺型的农居小院，主卧还放置着老式家具等器物，厢房里放着一具石磨，院子东北角是一个用石头围拢起来的农家露天厕所。上世纪40年代初，长兴岛地藏庵村五组（徐家庄）村民徐维良的长孙徐才厚在石屋出生后，便与母亲和爷爷奶奶在此生活。

大连长兴岛最早只有两个乡，人口寥寥，岛上住民靠渔猎耕种为生。地藏庵村过去是长兴岛上一个比较知名的村落。地藏庵是当地一个寺庙名字，庙里供奉着地藏菩萨，此庙长年香火不断，上香供佛的人较多。其周边的村庄取名为地藏庵。地藏庵村有1至5个组，在山上的徐家庄属地藏庵村五组。

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岛上红卫兵嫌弃地藏庵村村名封建守旧，改为兴无大队，意思是“兴无产阶级”。文革以后，虽改回地藏庵，但早年村民的水费、电费单上还是兴无村。

辽宁瓦房店长兴岛徐氏族谱记载，徐氏至少已经繁衍至5代。徐氏男性分别按“任官维贤才”字辈排序，徐才厚的太爷爷是“官”字辈，祖父是“维”字辈，徐才厚的父亲是“贤”字辈，而到徐才厚这代是“才”字辈。在长兴岛徐氏有好几个分支，在山上的徐家庄是徐氏的一个分支。

在山上的徐氏家族基本属于一个宗族，人不多，最鼎盛时不过二三十户。徐家庄早年缺水，打井困难，要靠村民肩扛手提到山下提水，村人以种苞米和土豆为生，生活非常困难。徐才厚太爷爷徐官智希望子孙能出人头地、当官封爵，徐官智生六子，并无女儿。徐氏“维”字辈的六个儿子，一样都是耕地农民。

徐才厚的祖父徐维良是六子中的老小，徐先后娶了张王二氏，分别生下二儿一女。这便是徐才厚的父亲徐高贤和叔父徐日贤，徐才厚还有一个姑姑叫徐桂芝。徐才厚与其叔父和姑姑，年岁相差不大，在多子多女的那个年代，叔侄、舅甥年龄相仿者，倒也平常。

到徐才厚父亲徐高贤这一代，徐才厚的祖父格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徐高贤、徐日贤都能识文断字，因此在徐家庄算是个不一样的农家。徐才厚的叔父、76岁的徐日贤老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哥哥徐高贤没怎么在长兴岛呆过，他一直在大连西岗区的一个杂货店做伙计。

但徐家远房亲戚徐超锁纠正了这一说法。在他记忆中，文革时期，作为大连“五七战士”的徐高贤回到徐家庄“战天斗地”了两个半年。这应该是幼年的徐才厚最为幸福的时光，一家人终于能在一起团聚，而之前大多数时光里，孤身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徐才厚同爷爷奶奶、妈妈和叔父一起生活。

徐高贤结束岛上“五七劳动”的生活后，返回大连，把在长兴岛地藏庵小学读二年级的12岁儿子徐才厚带走，不久徐妻也跟着丈夫到大连生活，作别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徐才厚的祖父、祖母则继续住在徐家庄老宅，直至在祖居先后老去。

贫寒子弟岛外求学

12岁的徐才厚跟随父亲，搭乘小舢板，离开生养他的长兴岛徐家庄，离开地藏庵小学，转学到大连西岗区九三小学，插班三年级，从此开始了在城市的求学生活。

对少年徐才厚好学上进的印记，迄今仍深深刻在徐才厚本家二嫂的脑海里。86岁的老太太和他的儿子徐超锁是这个被废弃村庄的最后留守者，略微有点老年痴呆的老人甚至搞不清自己的年龄，但仍清晰记得徐

才厚小时候的一些情形。

“才厚从小就好念书，他爷爷奶奶都在祖屋住。他妈说你去玩吧，才厚说俺不玩，一定要背完课、写完作业收拾好书包才出去。”徐才厚的二嫂说，“才厚每天读书要从徐家庄走到地藏庵，来去十几里，一大早起床走路过去，中午老师管做饭。每月到家来收伙（食）钱。”

城市里的生活对农村少年徐才厚来说是崭新的，再也不用跋山涉水起早上学，也不用吃苞谷饭了。徐才厚的父亲徐高贤在大连西岗区的一家杂货店做伙计，因为有些文化，兼做账房。

徐家那时就住在大连西岗区平顺街31号，这里距离原址在西岗区黄河路上的九三小学不过500米路，每天走着过去不到10分钟。学校有统一的学生食堂，这里的老师也不再是既会做饭又会教书的多面手。学校教学设施和读书环境与长兴岛上的农村小学有很大的不同。

徐家当年居住的平顺街，是大连为数不多的老街，在日据时代就有，平顺街取意平安顺利。这一带原来都是低矮的瓦房棚户区，1993年大连万达集团对这里进行整体动迁，新建九三小区等几处居民楼。当地居民的说法是，这里是万达房产第一个项目，也因此获得了第一桶金，从此辗转各地，声名在外。

时光流转一甲子。平顺街31号，徐高贤父子当年居住的小瓦房，已然不可寻，原来的生活痕迹已经在历史中湮灭了，唯一有保留的可能是北京街社区的清真寺。6月底7月初，《凤凰周刊》记者在现场寻访九三社区的一些老住户，很多人都不知道徐才厚小时的居住地。就连社区工作人员也对这处地址感到困惑，建议去大连地名办询问，改名后的所在。

2013年中秋节前后，由军方人员组成的《徐才厚传记》组一行，寻访徐才厚的母校九三小学。大连市和西岗区政府联系了多位徐才厚的小学同学和任课老师。在座谈会上，经徐的同学和老师共同求证，平顺街31号，徐才厚在大连西岗求学时的住所，现在正是西岗区北京街派出所所在地。

据徐才厚小学同学文玉等人回忆，徐才厚的父亲在西岗区附近做工，农村出来的徐才厚沉默寡言，却特别好学，还担任过班里的学习委员。《徐才厚传记》组的人员还找到卧病中的当年教徐自然课的老师，老师对徐也赞誉有加。

1957年，14岁的徐才厚考入大连市第二十一中学，一样的勤勉好

学。徐才厚初中班主任李荣春老师了解到的情况是，徐才厚的父亲当时在西岗区做工，同学和老师隐约得知，徐家好像只他一个孩子。二十一中学现任校长王慧也听徐才厚昔日同学说起，徐初中时代为人老实，读书很用功，此后顺利考入大连市第八中学。

哈军工时期：

鲜有突出之处，始终无法入党

八中是大连的一所老牌知名学校，大连人都知道，分有初中部、高中部。当年，大连八中只有两个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下称“哈军工”）的，徐才厚就是其中一个，可见徐才厚在高中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不俗，当时位于东北一隅的这座知名军事院校红遍一时。

因为是保密的国防院校，哈军工不填志愿，而像清华、北大、北航等是公开填志愿表的。哈军工招生人员就从那些填表的学生中秘密甄选，基本上抽档考生需要达到清华的录取分数线以上，哈军工才会考虑录取。收档后，还要秘密地对考生进行政审和检查身体，所有项目都过了后，才告知被录取。

“挑上你了就得去，你不去还不合适，因为国家看上你了，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徐才厚在哈军工的同学滕叙兖所读的高中是大连二十中，大连当时去检查身体的有40多人，但最后考上的只有14个。

同成立之初“红二代”子弟聚集哈军工不一样。1962年，徐才厚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哈军工的学生必须全国统一高考，在滕叙兖和徐才厚进哈军工那年，平民子弟占了新生的十之八九，这些人都是通过实力踏进这所红色院校大门的。

在去哈军工报到的火车上，滕叙兖和徐才厚第一次见面了，同行的还有12个大连的新生。滕叙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徐看上去很腼腆，话不多，上哈军工的时候连共青团都没入，我那时是个团员了。”既是老乡，出身都相似，在火车上认识后，滕后来又和徐才厚分到电子工程系，但在不同的学员队，滕叙兖是637队，徐才厚是638队。而大连同去的其他同学有的分在空军系、有的在海军系，不同系的好几个月也见不上一面。

大学五年中，滕叙兖和徐常见面，在同一个教学楼，下课后体育锻炼也在一起，跑步、打球常常碰面。两人混的很熟，交情很不错。“现在看，徐才厚当时就是默默无闻的人，不是太张扬，他性格上也比较柔和，很内敛，很少看他跟谁瞪眼睛；他从来都老远跟人家打招呼，老远

就笑呵呵走过来。”

徐才厚给人印象就是特别的低调老实。哈军工的很多徐才厚的同学回忆称，徐才厚在大学期间似乎没有突出的才华，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些音乐禀赋。五线谱看一遍，马上能清唱出来，徐才厚因此是学员8队的乐队指挥，例行开会、学员队拉歌比赛时，徐才厚永远站在拉歌指挥的位置上。

徐的拉歌指挥手势很特别，动作一板一眼，夸张式的僵硬，却颇有节奏感。徐在上面指挥，有的学员在下面发笑。私下里，滕问这位老乡怎么学到这种指挥方式的，徐回答说是自己琢磨的。除此之外，徐才厚在哈军工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成绩属中上，也没有门门是五分。滕叙兖好像记得他当过一届副班长，还任过班里文娱委员，负责唱歌、排练小节目之类。

“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毛泽东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起码三分之二变质了。“四清”就是清政治、清财务、清仓库、清组织）开始后，徐才厚他们这届（63届）的学员就分别下到哈尔滨的农村搞运动，学校趁机选择在运动中表现好、群众基础不错的学员，发展“火线入党”。

“四清”结束后，滕叙兖在期间入党，有一次在学校碰到，徐才厚还向他取经，“你怎么入的党呢？我入不上挺难过的”。滕问他怎么回事？徐回答说，人家看不上我。徐挺难过的，讲了半天。

大学读了三年后，文革就来了，当时哈军工分了两大派，一个叫“造反团”，一个叫“八八团”，“造反团”里面都是干部子弟，势力大，手眼通天，滕和徐都跟着“造反团”走，以后内部又分裂成两派，一个叫山上派，一个叫山下派。徐才厚他们后来又在山上派跟着混。

造反最炽热期，升级为武斗，坦克都出动了。“徐才厚从不参与，有一次两派打起来了，他远远地看了一眼就走了。武斗时，很多学员都躲回家里去了，徐才厚可能也回去了。我听他们班同学讲，他们到徐家去看过他。他就在家里看书。”徐才厚的另一位同学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命运多次转折：

险些转业，因名校学历占尽便宜

徐才厚哈军工毕业后，在等待分配期，上头的一纸政策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北京要求对哈军工67、68届的毕业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这两届学生就暂时不分配具体单位，统统下放到部队农场和其他一些地方农场“接受再教育”，此时的哈军工亦因领导讲的一句话，“哈军工从部队里退出去，以后就不再是军校，变成地方大学了。”

哈军工的新名字叫哈尔滨工程大学，徐才厚这一届的学生就没有军籍了，领章、帽徽都摘下了。脱下军装的徐才厚和滕叙兖被分配到39军鹤立农场，不是同一连队，但相隔只一里多路。徐才厚的班长当时是个少将的儿子，前几年退休后的他两次到北京看徐才厚，徐还挺友好地说，“你是我班长啊！”徐才厚的这位班长对徐的印象挺好。

在接受“再教育”阶段，徐才厚的哈军工同学也普遍反映，徐表现很好：吃苦在前，开荒、种田、救火什么活都干，每年春天农场的山里都会着大火，火势吓人。徐才厚有两次救火，满脸被熏得乌黑。前述徐才厚的班长救火烧伤立功了。滕叙兖关心老乡徐才厚的安全，他向班长打听，才厚怎么样？班长说，才厚挺好的，“我烧伤了还是他把我拉起来的。”

但事后，没听说过徐才厚立功受奖。在鹤立农场有三四百哈军工的毕业生，同学间现在想起来，没听说过徐才厚那时有什么突出的事。徐才厚过去似乎一直普通平凡，不温不火，从来不是拔尖的。

在鹤立农场锻炼3年后，机遇的大门向徐才厚打开，军方重新考虑从哈军工挑选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对这所昔日的军事名校，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都记得。沈阳军区来人到鹤立农场，从三四百的哈工大毕业生中挑走了20来人，徐才厚就是其中一个。

能重新穿上军装，哈军工的同学们都很羡慕。而徐才厚为何能如愿？同学们的一致意见是，徐平素表现好，又是工人家庭出身，沈阳军区自然会看重根红苗正的子弟。离开鹤立农场去部队当兵前夕，徐才厚来跟滕叙兖告别。滕说，我可能以后被分到研究所去。徐说，研究所好啊，研究所越老越香嘛，干一辈子最后成个专家。滕由衷地说，我羡慕你呀，我愿意当兵去。

徐入伍后，先经过短暂的当兵锻炼，而后分在吉林省汪清县守备三师炮团，任连副指导员。在基层部队干了两三年后，徐才厚这才入的党。在部队工作的徐才厚最初跟哈军工的同学联系不多。同学圈里曾有谁提到徐才厚，有人告诉说，徐才厚已经结婚，其妻姓赵，生了一个女儿。徐才厚在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工作，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编编节目、写写材料。

1982年前后，在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工作的滕叙兖听说徐才厚要转业

回家了，想分到大连却不好安排。徐才厚此时已是吉林省军区的副团职军官，自觉职务到顶，升迁无望。就在徐才厚准备卷铺盖转业回家的当口，上级来了一纸命令说不要走了，到北京去学习。

徐才厚此次军队仕途重获新生，据信，并不是因为上头有人，而是此时军队倡导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徐才厚在基层显然算不上是优秀人才，与读书时一样，仍是普通、平凡甚至显得平庸，以至几乎转业回家。奈何其哈军工的军队名校学历再次让他占了便宜，时来运转。

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现在的国防大学）培训两年后，徐才厚正式开始了平步青云，从吉林省军区、沈阳军区到16集团军、总政治部、济南军区，一路职务变迁，令人眼花缭乱，直至中央军委副主席高位。这一段的快速升迁，是否有其他原因？或是有贵人相助？尽管有各种传闻，不同版本，尚无可靠可信之信息披露。

徐氏宗族希望后人出官的愿望，终于在徐高贤这一代得以实现。然而，在同学眼中，勤勉好学、老实真诚的徐才厚，如今已走到“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境地。在一路升迁的路上，是什么改变了他？或将随着案件审理，信息逐步公布，才会慢慢披露出来。

徐才厚的落马，在哈军工的同学中引起不小的反响。滕叙兖获知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后，专门撰文《徐才厚同学，你怎么混成如此下场？》发布在互联网上。文中，滕叙兖作为徐才厚的老同学，深感“意外、痛心和惋惜”，甚至夜不能寐。据滕叙兖介绍，此文发布后，哈军工老同学纷纷来电，谈看法，提意见。滕叙兖为此还专门将文章重新修订后再次发布。

滕叙兖在心中向已身陷囹圄的徐才厚大声疾呼：“才厚老同学，你怎么混成如此下场呀？你怎么如此糊涂昏聩呀？你要那么多的钱和房子干什么！”

滕叙兖感叹，徐才厚“蠢到连老婆女儿也管不住”，晚节不保、身败名裂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但同时追问，多年来，“他的上级领导干什么去了？军队高层纪检机关干部干什么去了？那些车载斗量的反腐规章制度、红头文件、宣传口号都是废纸吗？”

不过徐才厚的内心着实恐非老同学所能猜度。滕叙兖文章引用一位朋友的说法称，徐才厚调北京前曾对身边同事说：“我这次进京，恐怕走上一条不归路。”大家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他认真地说：“高处不胜寒啊！”滕叙兖感叹，“如果这位朋友说的是实话，徐才厚真是一语成谶。”

彼时的徐才厚，是否已经有了走歪门邪道的苗头，或是对贪腐行径之罪责心知肚明，尚存矛盾心理，已难考证。但最终结果，徐才厚在贪腐路上并未回头，直至“不归路”。

流产的将军传记

徐才厚少小离家，离开长兴岛已有半个多世纪，当年人丁兴盛的徐家庄已凋敝零落，成为一个废弃的村落。2005年，长兴岛镇升格为长兴岛临港经济开发区，大批村屯搬迁，由石屋土房迁到宽敞明亮的楼房。

地藏庵村跟周边的三咀、龙口等几个村合并入新港社区，地藏庵徐家庄的行政名号自此不复存在。徐家庄徐姓村民大部分都搬迁到长兴岛人叫“楼区”的新建住宅区居住。徐家庄人搬迁走后，当地政府怕村民重新回村屯，很多家的房顶都被拆去，但只徐才厚祖居及临近几户仍保持原样。

今日徐家庄荒草蔓延，土墙断壁，已不复有往日的生机。现在只剩四个村民，分别是徐才厚的二嫂和她儿子徐超锁，以及受徐才厚叔叔徐日贤委托看护祖居的张洪林两父子。徐日贤平素住在瓦房店，年岁已高，但时常回徐家庄看看。徐日贤与徐才厚的父亲是同父异母兄弟，据徐日贤讲，徐才厚身居高位后，很少能像以前那样方便找到他。

徐日贤的印象中，侄子徐才厚为人向来谨慎。徐日贤育有二子二女，但对这些生活在瓦房店的堂兄姐妹，少有受到徐才厚的照顾。徐才厚母亲在50多岁时去世，徐父又续弦，后者给徐才厚带来了三个妹妹，分别改徐姓，徐才厚与这些亲属往来不多。

在徐家亲属中与徐才厚关系相对较为密切的是徐桂芝，这个与徐才厚几乎同岁的近属住在长兴岛的楼区，徐才厚的姑父王传秀（音）过去还是当地民政干部。徐才厚有两个外甥，都在部队当军官，一个在北京徐才厚的身边，还有一个在大连海军基地。

徐才厚在今年3月中旬落马后，徐桂芝在长兴岛楼区的家也已关门三月，徐才厚的远房亲戚徐大海说，徐家人都到北京去了。

徐才厚尽管与亲属保持谨慎的距离，但对昔日的乡人、同学却仍热情有加。徐才厚的小学同学张洪林在1997年到山东拉面粉，从唐山途经济南，等卸车时候，正好有时间空档。张洪林知道徐才厚这时已是济南军区政委，便打车到军区大院门口，不多时徐才厚的秘书出来把他迎了进去。徐才厚与这位老乡兼同学热情地唠了一会嗑，前后也就十多分钟，便称要去山东潍坊检查军备工作。临走叮嘱张洪林再来济南时找他

叙旧。

徐才厚身居军队高位后，2003年，哈军工的校友会庆祝学校五十周年。徐才厚也应邀穿着便装前来，当时他坐在主席台上，徐才厚同班同学就在下面喊，“才厚才厚，你下来，下来。”徐才厚也应声下来坐在他们班同学堆里，坐在一起的同学这个打他一巴掌，那个摸他一下，嘻嘻哈哈的。这些老同学觉得，徐才厚跟过去一样，没什么架子。

刚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时，徐很谨慎小心。徐的昔日好友、在香港经商的同学刘苏民到他家里去，看到大热天吹个小电风扇，就说要送给他一个空调，徐才厚连连摆手，“我哪敢啊，主任家都没装空调。”徐才厚也从来不让同学到单位去见他，要见面都到家里。

徐才厚的另一位同学回忆认为，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及之后济南军区任职时，徐才厚是比较谨慎的，害怕出事，他胆子还比较小。该同学猜测，他犯错误应该是任军委副主席之后。但这一猜测与诸多军内人士的反映并不吻合：徐才厚及其家人贪腐，以及将军内干部的提拔、晋升玩弄于股掌等各种不端行径，早已引发不满与反映，对其操守广泛质疑的时间，远远早于此说。

只是徐对同学、故旧倒是一直没忘。2000年以后，徐才厚当年的同班同学有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多，花费不少，大家将徐的军，要其请客。徐一同意，随员马上就办了。徐当时说，“我腐败了一次。”有一年的同学会上，徐对同学说，班里同学年纪大了不容易，别的我帮不着忙，你们家里孩子有什么困难，我都管。

徐才厚同班同学曾去一个西部城市游玩，徐才厚得知后，亲自给当地军区领导人打了电话，说我一批老同学过去玩，你们接待接待。当地军区领导于是热情招待首长的同学们。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的徐才厚也不忘过去培养他的家乡学校，他几次给大连九三小学、二十一中学以及八中赠礼题词，不忘师恩。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论滕叙兖还是《凤凰周刊》采访的其他徐才厚的同学，均对徐才厚的军内政治生涯并不了解，尤其是徐才厚进入北京之后，更加陌生。他们对徐才厚往事的描述难免不带有同学间美好想象成分。不论是与军内人士对徐才厚长期以来用人、德行等各种情况反映，还是与官方刚刚公布的徐才厚部分贪腐事实，均有巨大出入。

从2013年9月中旬开始，《徐才厚传记》写作组工作人员，专程赴长兴岛徐氏故里、大连西岗徐的母校等地，寻访徐的成长往事，这本构思中的将军传记还未完工，故事主人翁徐才厚已锒铛落马。

6月30日傍晚，《凤凰周刊》记者从徐家庄驱车，向西蜿蜒数百米，找到西南后山腰上坐落着徐家的祖坟墓葬群。当地居民说，以前通向徐家祖坟是一条只够一人走的小道，现在的土路是当地政府为他家专修的，可容小车通过，两边挖了水沟。2005年之后，徐曾回到徐家庄专程拜祭祖坟。

徐才厚的远房亲戚徐大海说，要是徐才厚不落马的话，这条道就要铺成柏油路了，现在估计不会再列入当地政府计划了。(应当事人的要求，张洪林为化名)



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

记者／钟坚

徐才厚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却搞出了个宗派山头主义猖獗的“徐家庄”，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扳转向他的私家领地。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徐才厚成“笼中缚虎”已4月有余。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军政治工作高级干部，“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公开谈及徐才厚案。

此前的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宣布对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军事检察院侦查查明，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徐才厚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军方评论员“谢正平”评徐案时说，徐才厚从高级干部沦为阶下之囚，光环褪尽、荣耀尽失，怎不令人唏嘘？“谢正平”还称，作为贪腐分子的徐才厚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检侦方简要地向外界透露了徐案侦办过程，之前徐案处于隐秘审查阶段，案情可谓密不透风。徐才厚案发前后，中央高层领导人拿下“军中

大老虎”的决策过程，以及徐案的查抄详情，初涉案件细节等，外界均知之不详。

9月中上旬，《凤凰周刊》记者获悉，被羁押看守中的徐才厚膀胱癌复发，病情危重。10月27日，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就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确认了徐患膀胱癌的实情。据军事检查机关负责人介绍，徐才厚于2013年2月确诊患膀胱癌，已经多个周期治疗。今年6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徐才厚立案侦查后，本着既严格依法办案、又体现人道关怀的精神，协调医院对其进行了积极治疗和医护保障。

徐才厚是中共建政以来查办的级别最高的军中将领，习近平主席亲督力办铲除军中腐败势力大后台，海内外舆论好评如潮，军中正义之士也额手相庆。退役少将罗援在《解放军报》法人微博发文，力挺查办谷俊山、徐才厚案件的有功人士、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他说，正是刘源的坚持和担当，特别是对党的一片赤诚，才推动了军内这场反腐。“如果不是刘源和刘源们，特别是中央的支持，这件事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想象！”

“徐贪婪、滥权和腐化的行径超乎想象，根本不敢相信系位高权重的军委领导人所为。”多位接近解放军高层的知情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徐才厚被查惊雷犹在耳，但之后军界波澜不惊，并未迎来人们预想中的倾盆大雨。对照近期大陆中纪委查办周永康等党政大员贪腐案的特点来看，似徐才厚这等副国级高官，与其关联的贪腐案件和涉案人数应不在少数，但或许是徐案案情复杂和军队查办贪腐案的特殊性，与徐案相关的案件至今人们依然少有听闻。

10月30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态，对徐才厚及其家人涉嫌受贿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将依法进行处理。对于其他涉案人员，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军方发言人的这番表态，海内外读者仍在观察和期待。

“肯定要动‘大老虎’了！”

如果用一条抛物线描绘徐才厚的仕途轨迹，198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正值解放军摆脱组织臃肿、人员知识老化，向精兵高效的机械化、合成化部队转变迈进的关键时机，也是徐显达仕途迅猛上升期。

自任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副团职干事以后，因年轻、高学历优势，已摆脱“被转业”境况的徐才厚，官运变得非常顺达。从1982到1985年，三

年之内由普通副团职军官擢升为正师职的大军区二级部部长。五年后，晋升正军，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十六集团军政委。两年后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社长。仅仅一年之后再次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年五十出头便跻身大军区正职。短短十年的火箭式蹿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据悉，徐才厚在中共十五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

1996年，徐才厚从总政副主任位置上平调至济南军区任政委，三年许，完善其任职履历后，徐才厚再一次调回总部机关。1999年，他与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郭伯雄同时进京，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分别担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和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

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还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这点，当年仕途如日中天的徐才厚绝不会想到。

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宣布退休，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徐才厚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次年，在辽宁大连市长兴岛徐家庄后山一处荒地，徐才厚家的祖坟被修葺一新。作为徐家长孙的徐才厚和另外两个堂弟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祖宗墓碑上，显示其已完成光宗耀祖的祖训。（有关徐才厚早年经历及其老家报道，详见《凤凰周刊》2014年第20期封面故事《徐才厚往事》）

从吉林省军区的一位普通政工干部，前后历时20余年，徐才厚升任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二号人物。在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徐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仕途攀升至人生的最高点，直到2012年卸任退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军委领导人，徐才厚掌管了230万解放军及80多万武警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免大权。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徐才厚的人生抛物线不再舒缓平稳，即便已是退休高干身份，亦未获得意想中的平安落地，相反，其命运急遽而下，星光黯淡，终成阶下之囚。

2014年3月15日，正在301医院病床上的徐才厚被叫走，某军委领导当面宣布，对徐进行组织调查。当失魂落魄的徐才厚回到医院时，已经进不了301医院西院，而被直接送到东院小南楼。有本港媒体描述称，“几个工人当着徐才厚的面，‘’地往窗户上钉上隔离栅栏等安防设施。”

西院是301医院专为地方省部级、军队军级以上领导治病的专区。徐被转至东院，其万劫不复之命运已显而易见。当晚其在北京的妻女也随即被抓，其秘书秦某亦被控制。

“3月15日当天，在京的部队就大面积知道了。因为徐才厚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之后，院方把原来住在301医院东院小南楼的人全都迁走了，而原本的警卫人员也都换了。”接近军方高层的北京知情人士称，301医院的人都知道徐才厚在哪里住，住院楼层转换和病员迁移，整出这么大动静，消息就非常快地传出来，再也无法瞒住。大家知道，这次“肯定要动他了”。

徐才厚被立案调查的当天，恰好是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宣布成立之日，选择在军队宣誓决意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这天查办徐才厚，意味深长。当日，习近平以组长的身份出席了军委深改组第一次全会。徐被查半个月后，军中另一巨贪谷俊山被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

8月30日，有内地人士微博传言：已被开除党籍的徐才厚又被开除军籍，剥夺上将军衔，此微博消息随后被删除。按照解放军纪律条令，这位涉嫌违法乱纪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原二号人物”被开除军籍和取消上将军衔，应符合军纪军规的处理程序。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的徐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确认了这一事实。对此，中国军网评论员称，党中央没有因为他身患重病而在党纪处分上放他一马，中央军委自也不会在军规执行上手下留情。

拔出“萝卜”带出“徐”

徐才厚被立案调查在今年3月，但在十八大前的2012年初，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被纳入总后和军委纪委的视线后，徐才厚与腐败有染的各种传闻就不绝如缕。

总后勤部机关上下大多知道副部长谷俊山“朝中有人”。从河南地方部队的小吏擢升到总后机关任职基建营房部多个要职，谷俊山官运亨通，几年一个台阶，要不是总后勤部党委刘源等人的竭力举报和抗争，谷俊山说不定真能如愿得到他所说的“总参第一副总长、上将”的要职。

刘源从军事科学院调任总后任政委之前，谷俊山的张狂已在总后勤部形成小气候。北京知情人士称，初时，尚未篡至总后高位的谷俊山已敢与其上级、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几次三番顶撞。

谷俊山最终在总后任副部长，不久，又晋升中将军衔。“等于说廖根本压不住他。”知情人士称，即使是对刘源，在拉拢和试图“媾和”不成后，谷的本色也开始外露。在多个场合，谷俊山对刘源开火发飙，毫不避讳称自己背后有强硬靠山。

谷俊山的嚣张跋扈加速了其命运的终结，腐败的一波潮水退却后，其背后靠山开始显山露水。（《凤凰周刊》此前已对谷俊山案作详细报道，详情请见2014年第11期《谷俊山案大起底》，以及2012年第29期《原总后副部长谷俊山被移交司法》）。

在调查谷俊山案期间，疑有徐才厚等背后势力的反复作祟、阻挠办案进程，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谷俊山过关。但总后党委牢牢咬住谷俊山腐败的相关线索不放，深查细纠，终于梳理出谷俊山涉嫌犯罪的扎实证据。

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曾告诉《凤凰周刊》，2011年底前后，在初步查明谷俊山涉嫌违法违纪的重大线索后，总后党委就直接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作了专题汇报。

2012年1月下旬，几番内外部交锋较量之后，黔驴技穷、已成强弩之末的谷俊山终被拉下马来，军纪委宣布对谷俊山进行调查。北京知情人士披露，在谷俊山被调查前，徐才厚把他接走了。谷俊山尽管自知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多次送给徐贿金，共计达4000多万元。

这一年，徐才厚也自知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仍想竭力庇护自己培植多年的亲信，维护既往的军内势力不倒。但事情发展并不如徐意想的那样美满：他不但保护不了亲信，连自己的运势也开始下行。当年11月，徐才厚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高位上退休。

麻烦开始更多地呈现，徐的亲信谷俊山“进去”之后，挖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知情人士透露说，谷也越来越感觉到，“没人能像承诺的那样保自己，开始如实交代问题，包括几次上千万元行贿徐才厚的情况。”徐才厚用了将近20年精心构筑的权力大厦开始倾斜，各种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不断发酵。谷俊山贪腐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徐才厚。

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本该到场的卸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全程缺席，引起外界遐想；之后不久，军方官媒以看似无意的《徐才厚为王

喜斌专著＜从这里走向战场＞作序》为题发表消息，以打消外界对徐已出事的猜测；2013年国庆招待会上，身着戎装的徐才厚以退休军队老领导的身份出席，引发海内外舆论猜测其已“平安无事”。不过，此时的徐才厚，已是满头花白头发，与往日神情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活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军队老同志、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新春问候和祝福。徐才厚得以在中央电视台报道镜头中两次一闪而过。镜头里的徐才厚再次以满头白发示人，其身形消瘦，面带微笑。此次露面，再次令徐才厚是否逃脱传闻中“落马”命运引发外界猜想。但显然已不足以打消公众疑虑。

4月，在福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王直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中，徐才厚的名字缺席，外界疑窦再生。而这次徐才厚确实已被限制自由，接受组织调查。3月15日当晚，徐才厚妻女及秘书秦某被拘押的同时，徐家也被查抄。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同时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院处理。

查办徐才厚这样级别的“军中大老虎”，显系中央高层直接下命令，中央从内部拘押审查到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用时仅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举拿下徐才厚，足以彰显新任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和意志，在过去都是从未有过的。”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说。

徐这座大山被扳倒只半月，新华社公布，对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军事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四项罪名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值得注意的是，对徐才厚、谷俊山两个军中巨蠹的查办、公布过程如此复杂交错；尤其是谷俊山案竟然至今已经耗时长达近三年之久仍未完结，足见徐、谷系列案件查办之艰难，以及徐才厚对谷俊山案查办的干扰和阻挠。

徐宅查抄数目惊人

早在两年多前，谷俊山被调查后，徐才厚便卷入谷俊山案贪腐传闻。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谷俊山是徐才厚的主要利益输送者之一。谷俊山身为军中大蠹，贪腐详情官方迄今虽未有公布，但从大陆诸报端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贪腐数目已很惊人，谷的官场靠山徐才厚的贪腐数目，可能更在谷俊山之上。

接近军方的北京知情人士披露，身患膀胱癌的徐才厚在查出病患后不久，解放军301医院、307医院就集中专家对其进行诊治，病情得到有效控制。2013年下半年，住在301医院西院高干病房的徐才厚常常焦虑不安，外面有关他涉贪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徐日显惶恐。春节前，他决定出去转转，顺便打探一下消息，“走动走动”。

今年春节前，徐才厚跑到海南三亚转了一圈，却无心看风景，而是以看望在那里休养的老领导为名，到处请托和求助，企图脱罪免责，平安过关。

徐才厚并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但从三亚回来后，徐却到处放风，跟人说他没任何问题了，老领导都给他打了包票。徐似乎也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自我安慰、造势毕竟起不了作用，该来的还是来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党内纪律审查程序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对徐才厚进行调查。3月15日，即正式宣布对其进行组织调查。

事后种种迹象显示，徐对自己被抓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可能一直都认为，自己官当得这么大，中央不至于拿他“开刀”，反腐大火不会烧到他身上。在徐才厚之前的大陆政治生态中，惩治腐败虽已沸反盈天，厅局、省部级官员落马如缤纷秋叶，但官至副国级、已退休的中共高级干部，确实较为少见；而在军内，则更无先例。

3月15日当晚，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豪宅进行查抄。接近军方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查抄结果大大出乎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意料，“原本以为社会上有关徐才厚涉嫌贪腐的传闻很厉害了，且从谷俊山案发至今都两年多了，徐才厚即使有什么贪污，财物早就转移完毕，家里断然不会有东西了。”

但打开徐才厚这处2000千平方米豪宅的地下室后，办案人员还是吓了一跳：徐宅地下室里到处堆放着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一时点不过来，只好拿秤称了一下，再贴上封条。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1吨多重！有的打着包甚至都未开封，而徐宅内各种金银珠宝更是不可胜数。

在徐宅的仓库里，还有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和田玉，各种名贵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制品一大堆。成堆的和田玉大多原封不动，有的只是去了玉石的一层外皮，露出里面的大概成色。“璞玉有那么十几块，查抄的现金和玉石都是分开放置的。”该知情人士称，徐宅仓库还有唐、

宋、元、明历朝的各种古玩器具和字画。这些物品的主人还无暇打理，都杂乱地放在屋子里。

从这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豪宅里查抄的财物堆积如山，办案人员只得临时叫来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疲惫不堪的办案人员对所有查抄的财物都一一列了清单，事后向徐才厚出示对质。面对家里被查抄到的大量赃款赃物，徐才厚只得低头认栽。

徐才厚涉嫌贪腐的证据被初步锁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两次在党内和军队高层内部通报徐才厚案情：4月上旬，就徐的基本案情对军队大军区以上的高级将领做了通报；5月下旬，又对全军师一级领导干部进行通报。

近期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人当着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面评价徐才厚案，称“徐的疯狂聚财敛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北京一位退职上将的秘书也向《凤凰周刊》记者痛心慨叹道，“徐才厚贪腐如此严重，玷污了解放军过去一直塑造的朴素节俭的美好形象，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全家上阵受贿索贿

徐才厚的大学同学滕叙兖曾对媒体分析，徐才厚果真晚节不保，与他官越当越大、守不住自己的底线有关，而周围有一帮小人围着他转，如谷俊山之流，令其放松警惕，也可能是没管住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徐妻姓赵，辽宁大连人氏，在机关任职普通官员。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完全不认同滕叙兖的看法：当官者出了事就应自己负全责，如果责任都可以往老婆孩子身上推，是封建主义流毒，是歧视妇女的表现，也太不男人了。

内部通报中，徐收受的4000多万元贿金，有说系谷俊山所送。徐虽知自己保不住谷，竟然还是笑纳了。在谷俊山风雨飘摇之际，徐才厚仍敢收受谷的巨额贿金，可见其贪婪成性，已不可救药。

巨金烫手，徐才厚心惧当时紧张的反腐形势，对4000多万元的巨额贿金，据称，徐并不敢直接收入囊中，而是转给其昔日的一个亲信保管，该人也不敢存在私人账户，最后将其放在一个公共账户里。

本港大公网7月中旬消息称，徐才厚涉贪被开除党籍后，曾任徐才厚秘书的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贡献证实被免职。

52岁的张贡献，长期供职于总政治部，曾任总政办公厅副秘书长、

秘书局长、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办公厅秘书长，前年底调任现职，成为解放军首个“60后”副大军区级将领。张贡献落马的原因，有人说系受到徐妻赵氏一笔贿金的牵连，张是徐才厚案发至今为数不多的落马亲信之一。

徐才厚在原办公地点、八一大楼地下，还有一个秘密储藏室，里面放满了现金，由其秘书和一名负责勤卫的女战士看管。徐才厚生活作风极其糜烂，“窝边草”也绝不放过。事后，他答应给这名女战士“入学提干”，可是一直不兑现。徐才厚退休后，这名女战士绝望了，有一天，从山东老家开来一辆面包车，把徐地下储藏室里的现金装了一整车，连人带钱一起“失踪了”。徐才厚自知理亏，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敢叫人追查。此事成为知情人茶余饭后的一件糗事、谈资。

像大陆的大多贪官一样，徐也在全国各地置办房产，但这些均通过其妻女操作，徐才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房产的细枝末节，甚至连徐自己都不甚了了。接近军方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了查办徐案中的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

徐才厚未被调查时，外界盛传徐在上海有4套房产。徐认为是假的，是别人栽赃陷害，大发雷霆。于是他主动给某军方高官打电话，让其派人去查，以自证清白。军纪委的人再次查核之后，发现该处房产确实不是以徐才厚名义登记的，房产使用登记人填的是徐才厚年仅3岁的外孙的名字。

徐才厚的老婆赵某正是该起受贿案的经办人和受贿人。据透露，某行贿人找到赵某表明心迹，一开始，赵某认为是普通的上海房产，表示不要。但对方安排其到上海实地一看，这是四套打通的师职军官经济适用房，房间装潢豪华，地段也很不错，赵某这才欣然收下。事后查明，该房产是谷俊山弟弟“进贡”的。徐才厚在四川成都亦有豪宅别墅，受贿人同样是其妻赵某。赵某一开始去成都的别墅看了，嫌小；对方于是加修扩建，占地数亩，赵才同意收下。

徐家在四川的别墅据称是成都军区某负责人一手操办，该位官员也在徐才厚案发后落马。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报开除党籍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中将是否与此事有染，目前尚无法从官方渠道证实。

到徐宅跑官要官的人多了，不仅徐才厚的妻女，其身边人包括秘书、司机也浑水摸鱼，大发其财。接近徐案的北京知情人士称，徐才厚案发，徐的司机也已被抓，许多军内行贿者都是通过此人向徐才厚进贡。徐才厚司机每每从给徐的贿金中抽取一些财物，日积月累，竟也置

下不菲的家业。

徐才厚的“贪内助”赵某案发后被限制自由，协助审查。在办案人员对其严肃的政策攻心后，据称，赵某全线瓦解，不几日，又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见人便称：“我有罪，我有罪！”徐才厚独女徐思宁在总政联络部系统工作，但知情人称，很少见她上班。

《凤凰周刊》记者6月下旬赴大连长兴岛徐才厚祖居采访时，在后山的徐氏家族坟地看到，徐才厚祖父的墓碑上刻有“曾孙女徐思宁”字样。海外有传徐才厚女儿结婚时，谷俊山曾送其2000万元贺礼。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徐思宁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与前夫感情甚笃，但因不孕被迫离婚；第二任丈夫，徐思宁与其关系不睦。徐才厚指令其女再次离婚，但两人已育有一对双胞胎。

徐才厚案发，徐妻女、秘书秦某都悉数被抓，分押四处。徐才厚年幼的外孙落得无人照看的境地，有关方面只得召回离婚后被徐指令到河南某部的前女婿回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徐才厚病重病危期间，军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通知其妻赵某前去探视，不料赵某竟然拒绝，毫不念及夫妻之情。可见，贪腐分子徐才厚已到了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

徐才厚被公布的另一罪状是，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知情人士透露，徐才厚不仅在军内以权谋私，更将利益之手伸往军外。

2011年5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家能源企业，肆意开采矿产资源，破坏了当地农牧民的草原。该盟西乌旗一牧民被当地运煤大卡车辗压致死后，引发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不得不亲自处理，但事态一时无法控制。

内蒙古属北京军区所辖，军队也随后介入调停处理，据称，徐才厚当时派北京军区一位将领前往内蒙古坐镇和协调，积极向农牧民补偿，此事平息之后，该企业老板转手给徐才厚上千万元的“感谢费”。该家企业行贿者姓名尚未得知，但大陆《财经》杂志今年披露，已落马的大连阜新首富王春成与“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有染。王的辽宁春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在内蒙古投资能源产业，王在内蒙古的分公司也一度遇到来自当地牧民、官场的各种阻力，最后都逐一解决。

据报道，徐才厚和王春成的“交情”始于王春成儿子的伤害致死案。王的儿子王帅当年因故在酒吧与人斗殴伤人致死。王春成被指在化解此

事时，通过大连的关系人结识徐，徐通过政法界的关系，最后摆平此事。

无独有偶，《凤凰周刊》记者在长兴岛采访期间，当地亦有数个消息源指称，长兴岛一位领导之子，曾在瓦房店滋事杀人，也靠徐才厚出面“解决”。该官员对外一度以徐才厚家族亲戚自诩，曾在长兴岛投资的某位日籍人士，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曾听大连市官员说过此事。

两起地方凶案都传由徐下力铲平，或非空穴来风，可见徐才厚不仅军权在握，与大陆政法界某些高层应有密切往来。

徐案后续查处仍待披露

在6月30日官媒对徐才厚案件首次正式通报中，就徐的违法犯罪事实，通稿将其归为两类：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在10月28日官媒发布的徐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在这两类违法犯罪事实后面，都加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表述。

从官方表述看，徐才厚罪状的第一条就是在军队中买官卖官。大权在握的徐才厚掌管着数百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人事任免调配权，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全军中高级军官们的政治前途和职务升迁，徐一句话可定乾坤。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将校想要“进步”，善于钻营者都想傍上这棵大树。

不过徐宅非等闲人士可进，即使军内外一般显赫官员来见，也得大笔财物奉上。京城有传言，徐才厚在位期间，外人想见到徐才厚本人，因为要通过秘书等关卡，请托送礼至少在百万元以上。徐才厚把持军队政工、人事大权十多年，其间卖官鬻爵，经他之手违规提拔的不知有多少，而徐才厚靠“批发”官帽敛得多少财物，如不系统、认真查究，已不可竟数。

众多行贿人中，谷俊山是大方买单者之一，也是令徐才厚这只“大老虎”浮出水面的诱因。知情人士透露，在此前全军高级干部小范围通报中，初步查实，徐才厚的案情是收受4000多万元的贿金和4套房产。但徐才厚绝不仅有谷俊山一个行贿者，更多的人潜在水下，仍未暴露。

在徐才厚被开除党籍、查办不久，四川省军区一位正军职少将官员被抓。知情人士称，该名少将官员的落马系送礼引发。办案人员在查抄徐宅地下室的贿金和赃物时，发现一箱装在茅台年份酒包装箱里尚未开

封的现金，内有该官员要求“进步”的简历。办案人员顺藤摸瓜，该官员很快招供了“为求进步”向徐才厚行贿的事实。

有本港媒体报道，军中数名少将涉及贪腐正接受或协助调查。但与地方查办和周永康案有关联官员大刀阔斧的力度相比，军队查处徐才厚这只“大老虎”相关的涉案人事，显得异常低调。

按照军队干部任免规则，正师以上军官需要军委领导批准，以徐才厚过往资历地位，他的身边人、与其有权钱交易的人，职务至少应在正师级、副军级甚至正军级以上。

徐才厚案发后，中共军队却在全军上下清查近些年来晋升异常过快的副师级以下的干部，重新对其政绩、晋升途径和程序进行审查，其中奥妙，颇值得玩味。

徐案进展从目前迹象来看，大多围绕与谷案关联的细节而展开，与徐才厚有交集的其他案件并无牵扯暴露出来。

而徐才厚案的最终涉案数值也还没有最后落实，但估计全部摊开或比谷俊山还大。官方评述，对羁押中重病的徐才厚，官方仍予人道关怀，积极救治。但客观上，因晚期癌症复发，命悬一线的徐才厚，即使已被起诉，最终能否以戴罪之身服刑完毕，难以预料。

与多位老领导决裂

徐才厚从中共十五大起就担任中央委员，2002年又从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提升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然后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前后在军队经营近20年，可谓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难以撼动。

所幸是，军中还是有正义力量在顽强地与腐败分子作斗争。总后政委刘源上将当初对垒谷俊山时说，“我不仅要把你挖出来，还要把你背后的土壤挖出来，我官不当，命不要，也要跟你们干到底！”

“实践证明，刘没说假的，谷俊山、徐才厚就是有这么大问题。”北京知情人士说。

徐才厚被抓后，一位自称“军中资深媒体人”撰写的文章在海外网络上流传。该文称，“徐才厚身为军委副主席，他把军队搞成了宗派山头主义的‘徐家庄’，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给扳转过来，通向他的私家领地。培养了大群穷奢极欲、见风使舵、谄媚逢迎、投机专营的恶人，他们充斥在全军各个层面，把持话语权、晋升

权，把党委变成为他们赚取利益的机构，演绎出一幕幕剧作家都编不出来的政治丑剧！”

自称谙熟徐才厚腐败轨迹的“军中资深媒体人”称，“‘徐军副’在这八年中，以谷俊山为首的鬼魅越聚越多，在他身边建立起一道邪恶的屏障，屏蔽掉一切正能量，一切正直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瓜分利益，破坏了我军健康的干部生长土壤，使军中吏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腐败时期。他彻底背离了从军之初的信仰和理想，失掉了共产党员准则，丢弃了马列主义信条。”

《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对徐才厚贪腐问题，军队许多老领导、老干部，早就非常有意见，知他问题成堆，但检举乏力。总政系统一位退职少将称，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届总政主任比较，总政系统对徐评价甚低，而贪腐敛财却无人能出其右。

一些耿直的老领导在听闻徐才厚各种腐败传闻之后，曾对其敲打、劝诫。但徐才厚已不愿回头，与老领导们陆续决裂。

有知情者透露，其中一位老领导听说徐才厚与京城某些恶俗之人走得热乎，便在徐来家中看望时当面批评。“几榔头”砸过去，徐才厚已无法忍受逆耳忠言，便很快与其疏远。

徐才厚的另一老领导也曾多次批评、敲打、提醒过他。该老领导在一次在京体检时训诫徐才厚，历数其负面传闻，怒从中来，拍了桌子。两人不欢而散。“这类事情成了徐与一干老领导决裂的分水岭，从此与老上级们不相往来，表明他在贪腐路上去意已绝。”

“十年！二十年！整整两代军中栋梁被废出局，人民军队培养多年积累下来的优秀人才被葬送，人才断层无法挽回，致使新军事变革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军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更严重毁坏了党的声誉。”该人士称，“这么多年来，徐才厚的权力没有监管和制约，腐败登峰造极。”退休少将罗援也颇为担忧：“吏治腐败非常可怕，它会伤筋动骨，它会挫伤一大批人的积极性。长此以往，部队还能不能打仗？很难说！”他表示，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

“徐才厚、谷俊山的腐败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军队的事情短期内可能还没完。”接受本刊独家采访的北京知情人士也称，过去的十年，是国家对军队投入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十年，徐才厚把持军政人事十余年，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搞坏了部队的政治生态和风气，耽误了军队发展重要时机，给中国军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徐才厚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他的罪行不可饶恕。



3.周永康的石油帝国

开篇语：朋党周永康

从石油领域到执掌四川，再到政法系统，周永康始终在编织复杂的官场圈子。圈内多为周永康的老部下，或是周永康特别重用之人。

周永康似乎可以对他们任意提拔和调配。他们要么随着周永康的足迹转战各地，要么在周永康离开该地区或系统若干年后，依然唯其马首是瞻，仕途进退也仍有其操纵的痕迹。其中结党营私、“小山头”、“小集团”的意味显而易见，对正常干部人事安排的干扰也显而易见。

而一贯玩弄朋党之术的背后，从已被披露的信息看， 充斥着难以估量的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都为周永康及其家族、朋党的权力和财富服务。土地、资源、权力皆是其任意攫取和变现的囊中之物。

细致梳理和剖析周永康及其圈子庞杂的政、商足迹， 所涉案情以及外围的商界甚至黑道势力，其中教训与隐忧触目惊心。如何从制度上完善和变革，防范和治理此类结党营私之风气和祸患，则是亟需解决，更加艰难的问题。



草莽周永康

记者／闵云霄 张蕾

作为同学中的另类，周永康原本也是国家珍贵的石油人才，但在职业起步阶段，就已显现草莽之气：远离业务，钻营政治，讨好上级，批斗同事，维护身边人利益。诸多与其日后掌权时期大搞山头主义，拉帮结伙，形成家族、集团式贪腐相暗合的个人特性，已有线索可循。当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不再染发，第一次以白发苍苍的形象示人，并“再次表示认罪、悔罪”时，康清明正在盘锦辽河油田机关广场上，和几名退休干部谈笑风生。

康清明在当地也被众人戏称为“康师傅”——这本是内地民众在网络世界中对周永康的代称。康清明曾是周永康到辽河油田参加工作后的首任领导，应该算是“康师傅”的师傅。

辽河油田是周永康事业的起点，46年前，25岁的周永康从石油大学毕业后来此工作，在这里娶妻生子并一路升迁，仅用16年时间就当上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同时成为盘锦市首任市长。1985年前往北京，履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最后官至政治局常委。

与此后位列国家领导人的显赫相比，青年周永康的辽河油田岁月，只能算是草莽时期。而他本人，也在此事业起步阶段，显露出草莽之气：原本是有为青年、高级工程师，却又善于钻营、处世圆滑、耍两面派。在职业起步阶段就已经远离业务，钻营政治，显现出惊人的手腕和冷酷，给同事扣帽子、反复批斗也在所不惜。再加上命运眷顾，竟能始终保持高速提拔之势，直至顶峰。

在此期间，由于地位尚低，且年代所限，无太多经济利益可供争夺，周永康仅仅是官运亨通，不断升迁而已。但诸多与其日后掌权时期大搞山头主义，拉帮结伙，形成家族、集团式贪腐相暗合的个人特性，已有线索可循。

随着官位的升迁，周永康与康清明等老同事渐行渐远，形象也越来越模糊难辨。许多老同事依然是工程师、石油人，周永康却已在电视新闻中大起大落，直至满头白发，身陷囹圄。《凤凰周刊》记者赴辽河油田寻访周永康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还原周永康崛起草莽的发迹史。

勤快的实习技术员

地处盘锦的辽河油田曾是中国第三大油田，目前原油年开采能力1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年开采能力8亿立方米。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盘锦尤为贫瘠，被称为“南大荒”。在开发了胜利和大庆两个油田后，地质部1967年从大庆抽调多套人马组成大庆六七三厂（因成立于

1967年3月而得名），意在寻找更大规模的油田。誓师大会那天，多个钻井队矗立的钻塔红旗飘展中发誓：一定要在辽宁“南大荒”上抱出“金娃娃”！

周永康曾在辽河油田40周年的一封贺电中称，其是在1968年初怀着为石油事业奉献青春的理想，主动请缨从大庆来到辽河，参加了下辽河盆地前期石油地质勘探工作的。

他工作的第一站，即是康清明担任主任的六七三厂下属的一个地质勘探队。勘探是石油开采的最前站，所有工作全部野外进行。和很多勘探队工人一样，实习技术员周永康开始了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的野外考察生活。在职业的最初生涯，青年周永康显现了才华和实干的精神，至今在老领导的回忆中，仍是值得肯定的。

辽河油田冬天极冷，作为拓荒者，周永康跟其他工人一样，经受了恶劣的天气与环境，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艰苦条件下工作。从住地到工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解放牌敞篷车，往往到工地时，人都冻僵了，要司机抱下车，活动十多分钟后脚才慢慢有感觉。

当时辽河油田被称作盘锦垦区，跟劳改监狱毗邻。盐碱地只适合种水稻，荒草甸和芦苇塘遍布四周。他们吃高粱米，喝水坑里的水，住风一吹就透的铁皮房。

“雨天走的是泥水路，晴天风吹一身灰，住的是帐篷，睡的是草垫子，吃的是定量的窝窝头，喝的是池塘里的‘鸭子’汤，”关于在辽河油田的艰苦，原石油工业部部长、曾担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总地质师的王涛想起来也终生难忘。他在《中国石油报》上撰文称：大家扛着50公斤重的整袋水泥，在苇塘窄小的堤埂上跋涉4公里……由于堤埂只能单行，不能歇、不能放……在运送路途中有一处水塘，有的人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只能光着脚往前走，脚被芦苇茬扎了不能包扎，手表掉了无法寻找，任凭成群结队的蚊虫袭击……

康清明对《凤凰周刊》回忆，周永康那时表现得非常勤快，“搬东西、扛爆破线，什么活都干”。“每天主动到我办公室问有没有开水，帮我擦桌子，有什么事主动向我请示，争着打扫院子”。周永康同时还负责给康清明写讲话稿。“每次几百到一两千字不等，条理清晰，稿件写得很好。”很快，周永康就开始在地质团任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1975年2月，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波及盘锦，近百座公路桥涵以及防洪堤、排灌站等大型公共设施遭到破坏，近半数油井停产。盘锦一个大坝出现险情，为了抢险，康清明和周永康“在大坝上睡了七天七

夜，天天和工人们一起扛装有泥巴的草袋子，将大坝加高，围堵洪水。”彼时，周已经是辽河油田勘探局物探处处长。

物探处仪器修理站的周学政告诉《凤凰周刊》，1977年7月，盘锦另外一场大水导致大凌河大坝面临垮塌，组织辽河油田参与救灾，负责爆破的周学政准备好120公斤炸药，大约50米外的周永康催“快放”，周学政说，“怕伤着你，你跑开我才放”，周永康离开后，周学政爆破成功，洪水泄流。在同事的关照下，周躲过一险。

狠斗下属，自己屹立不倒

1963年，大陆石油短缺，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试图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依靠石油系统的力量进行一次石油大会战，来改变大陆落后的石油工业。中共中央商讨后，石油系统的第一个大会战在东北松辽地区打响。

在那个“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找到大油田”、“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激情年代，周永康作为石油院校的一名大学生，同样喊过响亮的口号，声称自己“深深为大庆会战的宏伟场面、英雄事迹和奋斗精神所鼓舞和吸引”。

1966年6月，面临毕业的周永康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全院的中心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自觉革命”。在学校闹了一年革命之后，1967年，周永康被分配到大庆油田六七三厂。

作为当时国家树立起的工业典型，大庆油田可谓家喻户晓。1970年的辽河会战中，周永康又被调到辽河油田，任辽河油田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区域室技术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地质和勘探专家童晓光是辽河油田的开拓者之一，从1966年到1979年的十三年间，一直从事辽河油田石油地质和勘探部署的研究。童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评价称，“那一批人里，无论是专业业务还是政治素质，他（周永康）都是最突出的。”

不过童晓光很快发现，周永康的志向并不在于业务。不遗余力地在政治上钻营，争取政治上的肯定，似乎才是周永康更大的兴趣所在。

一位周当时的同事对媒体回忆说，“（周永康）离任物探处处长时，就跟他的那帮哥们儿说，以后我跟你们走的人生道路完全不一样了。”

此时，曾经勤快的实习技术员已然发生了变化，令人对其印象深刻

的不再是勤恳或是石油专业技能，而是过人的政治斗争的头脑，以及一旦有权力在手，就敢搞斗争，扣帽子，对同事下得了狠手。这样的手段和技巧，令其不断获取更大的权力。

按照童晓光的描述，1968年年底，地质队开始进行“整党运动”时，刚来不到一年的周永康已升任为整个地质队的整党小组副组长。“一到整党会议的时候，无论是比他级别高的连队领导，还是年长不少的老专家，都要听他讲话并进行思想汇报。”对于如何以政治表态为利器，抬举自己，藐视权威，初入仕途的周永康就已稔熟于心，其政治头脑可见一斑。

“无论各个派系怎么斗，周永康都能蹿到领导的位置”，辽河油田科研小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干部对《凤凰周刊》表示。他对周永康总能坐收渔翁之利的本领记忆犹新。

一位员工私下对《凤凰周刊》透露，整党过程中有人被批“反革命”，一位姓金员工出于正义感，提议“不要随便扣政治帽子”，结果反而被周永康扣上帽子，并揪住不放，下令到各单位批斗100场。大权在握的周永康最终将其“批了50多场才罢手”。其用心之毒、手段之狠，在文革浪潮中得以不断历练。

童晓光记得，队里最早的100多人里，陆续有18个人因接连不断的运动给“搞了下去”。但资历尚浅的周永康却在此过程中打牢自己的根基，始终屹立不倒。童晓光说，周永康虽然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但是心在行政工作，离业务越来越远，但童的重心依然放在技术上，所以两人虽为邻居，但接触渐渐减少。

当时甚至有说法认为，周永康与前妻王淑华的婚姻，或许也有“从政治出发”的考虑。

在辽河油田科研小区，一位周永康的老同事透露，周在石油大学曾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对方成分不是很好，工作没多久后两人告吹。另一位王姓女士告诉《凤凰周刊》，当时一个叫吴洪民的四川人将王淑华介绍给了周永康。

王淑华，河北唐山人，技校毕业后来到天津大港油田，之后又被派到辽河油田。在媒体的描述中，王淑华“很瘦，皮肤较黑”，“面相很显老，看着比周要大好几岁”，而且“学历上有差距”，似乎是王淑华配不上周永康，但事实上，在那个出身论和成分论盛行的年代，王淑华的工人家庭出身足以令周永康艳羡。介绍之初，王淑华不接受周永康，“周永康多次去找王淑华，两人才确立了关系”。一年后，周永康就与其迅速完

婚。

“王淑华在一个女子小分队当队长，有次组织活动，我们要她表演节目，她上台打起了几拳，大家不断鼓掌。”多位老员工对王淑华的评价是：人好，能干，生活简朴。

一个可以佐证的细节是：1980年代初，王淑华参加自学考试，盘锦没设考点，必须到60公里外的营口考试，“当时周已在局里担任要职，有人对王淑华说，让她要个车大家和她一起去，最后她自己坐客车转两个站去考试”，辽河油田纪委的一位退休员工告诉《凤凰周刊》。

但周永康与王淑华的感情并不和睦。有媒体援引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原总地质师吴铁生的话说：有次周永康在石油部开会，王淑华曾大闹会场，原因是王怀疑周“在外面有人”。

辽河油田多位受访者推断，周永康和王淑华大约在1997年离婚。1999年，在离婚两年之后，王淑华却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石油大学老教师贾昌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当时她和石油勘探学院其他教职工一起，到位于十三陵附近的石油疗养院开会，会议休息期间，王淑华到路边溜弯儿，却被一辆军车给撞死了。

周永康何时开始“在外面有人”尚不得而知，但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可见，王淑华过世两年后的2001年，周永康迎娶了比自己足足小26岁的央视前女编导贾晓晔。贾在同事中的口碑远不如王淑华在油田的口碑，尤其是后来，“比较贪玩，上班有一天没一天”。

被沿袭的特点：会处事，照顾手下利益

拥有教授级高工职称的周永康，在辽河油田并不被认为是专家型官员。有媒体引述对一位原辽河油田总工程师的采访称，周永康在辽河油田期间，大多数时候从事管理和政务工作，尤其“在协调上下级关系上”颇有才能。

“很会处事”，是当时周永康被公认的过人之处。康清明也这么认为。不过联想到日后位高权重之时营造的庞大贪腐圈子，当年周永康的“很会处事”，个中滋味就显得颇为复杂。让领导舒服、让下属或是身边人得实惠，是周永康的强项，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在其“处事”时，这些实惠显然重于应有的原则或单位的利益。不过最终受益者，则是不断升迁的周永康本人。

一次，康清明和物探处书记纪航聊天，快到中午，周永康进来打了

个招呼后，直接去食堂打了两个菜，买了一小瓶酒，端回来给自己的两位领导在办公室吃，然后转身就走了。“他知道我们俩人熟，仅仅端菜来，但不陪吃饭，做得恰到好处”。

周永康“很会处事”的能力同样体现在对下级的关系上，他很擅于利用职权照顾手下的利益。周学政说，有一次，仪器站一名员工和司机开着地震仪器车去火车站接人，回来后和一辆拖拉机相撞，周学政作为仪器站的负责人也被单位罚赔60元。但周学政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在物探处大院写大字报喊冤，最后是“周永康知情后让财务补发了扣款”，替周学政免除了责任。

康清明甚至会跟周永康开玩笑说，“你个‘两面派’，谁都不得罪。”在他眼中，周永康八面玲珑，黑白通吃，“什么人都接触，油田里有几个相当差劲的人，他都提拔得很高。”

一位熟识他的退休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周永康“讲江湖义气”，为周永康做事，他一定会回报：“连洗脚丫鬟（指为其做过各种琐碎小事儿的下属）都照顾到了。”“他很讲江湖义气，你为我做过事儿，我一定会回报你。不然，在官场人家凭什么为你卖命做事儿，你又怎么继续往上走呢？”

周的这一草莽时期就有的特点，显然被沿袭到了高升“庙堂”之后。从日后周永康历任秘书的位置安排来看，周永康显然是照顾有加，甚至多有周永康为此干涉人事任免和组织原则的信息披露。周永康的几任秘书在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后，也确实一直在为周永康“卖命”。

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周永康的“提拔”。周永康在石油学院实习期间的老师高强（化名）对《凤凰周刊》讲述了一段往事。1964年，周永康入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同校毕业之后留校的班级辅导员。周永康一直对该老师充满感激。时隔多年后，他回校时获知该老师依然在实验室工作，曾经向学校领导举荐，称其是难得的人才，但这位老师以喜欢业务研究为由，拒绝了行政提拔。

石油大学老教师贾昌明曾表示，周永康在班上30多名学生中，“表现很平庸，在学校都没太听说过这个人，后来他到石油部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我学生。”高强也对周永康并无太多印象，直到周永康仕途顺畅，官职越来越高时，他才关注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学生。

尽管周永康的表现并未吸引老师们的注意，却让当时的校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文革期间，北京石油学院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正针锋相对。有媒体称，周永康当时是“保皇派”，对当时校党委书记刘长亮多有

保护。但也有回忆者称，他在“保皇派”里也“算不上号”。

刘长亮1963年担任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倒，文革结束后，在辽河石油勘探局担任党委书记、盘锦地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等职，1980年8月奉调回京。贾皋原是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参加辽河油田会战，1973年3月任辽河油田勘探局局长。

文革结束后，刘长亮被重新任用。1970年及随后的十年里，刘长亮任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治委员。

周永康当年也许不曾料到，昔日对领导的“保护”，日后会换来领导对他的“提携”。但将这些细节拼凑起来，或可勾勒出周在学生时代已经表现出高超的算计和拿捏平衡的能力：虽为学生会主席，却在“保皇派”里“算不上号”；虽然老师们对他印象平平，却能让校领导铭记于心。

两年提拔一次，16年官至正厅

在辽河油田，不同的人口中，对周永康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显示出周永康确实有工作能力和过人精力，另一方面是一切为其政治前途服务，诸多事情又难以评说。

有人说他关心下属。“深夜加班，周永康亲自买东西去给我老公吃，我从外地调来，不用讲人情，周就安排下属办了户口”，前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介绍说。

也有人认为他作风严厉。有一次管子站给钻井队所送的钻杆中，一根有隐伤的钻杆被钻井队发现，如果这根有隐伤的钻杆下钻后突然断裂，将会造成卡钻井毁的严重后果。周永康知道后，毫不留情地让管子站一班人亲自到该井队检讨错误，并且班子成员轮换抬着这根钻杆到各井队“巡回检讨”。

但也有人说他急功近利，在政治任务来临时擅长连夜表演。证据是1979年2月16日晚，对传达中央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通知，周永康要求办公室机关人员连夜讨论并收集情况，早7点必须拿出综合材料。为“深入传达中央精神”，周在前半夜就亲自跑遍油田各个会战现场。

还有员工批评他工作弄虚作假。另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退休员工对《凤凰周刊》说，“本来按设计需要打14米深的井，在周永康的带动下，打了9米就宣布提前完成任务，还得到表扬。”

同事们对其褒贬不一，周永康本人的仕途却已经顺风顺水，一路高

升。1973年，作战指挥部变更为辽河石油勘探局，根据中国石油新闻中心后来的报道，“周永康组建了辽河油田物探处，并任第一任处长”，辖436名下属。同时，周也是三二二油田地质指挥部革命委员会的7名常委之一。此时，周到辽河不过五年多时间。

其间，康清明调去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后来当营口市副市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的时代，被飞速提拔的康清明很快又回到辽河油田油气处当第一副处长。

到了1976年，周永康再次被提拔，担任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1979年升任副局长。

当时的辽河油田有众多和周永康一样的大学生，甚至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周永康升迁速度如此之快？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与原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刘长亮和副院长贾皋密切相关。

“师生情谊让他们在感情上有诸多亲近，这成为周永康在辽河油田不断升迁的契机。”高强告诉《凤凰周刊》。

“刘长亮发现这个小伙子挺能讲，又是石油学院的毕业生，文革期间又没有造他的反，对他印象很好。”贾昌明也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肯干事，口才好，“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的周永康，于1983年出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同时被任命为盘锦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70年，39岁就出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总地质师的王涛，属于专家型管理者，亦对周永康比较赏识。

1970年代末期，中国准备对外合作开发海洋大陆架的石油，王涛担任南海东部石油公司总经理。1985年，王涛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时刚刚54岁，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石油部长。

也就在1985年，周永康告别了自己深耕18年的盘锦，调任石油工业部担任副部长。

关于周永康升任的原因，《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了另外一个版本：1980年代初，分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余秋里视察辽河油田，当时周永康刚出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不久。到1985年底，据说是在余秋里的亲自点将下，周永康从辽河晋升进京。

不管在哪一个版本中，周永康几乎都以两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升迁，在康清明等老同事看来，“的确太快了。”

“另类同学”终至身陷囹圄

辽河油田方面似乎不愿意与周永康有更多纠葛。辽河油田物探处的保安直接拦住上门的采访者，《辽河石油报》的一位负责人也表示不愿意提供刊有周永康报道的老报纸。但在多位辽河油田老员工的回忆中，周永康口才出众，颇有决断。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他此后任职中石油，也被同事形容“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在他的经营下，1983年9月，辽河油田原油日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1.8万吨，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周永康在辽河油田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此后，他又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身兼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等多个职位。地方政府和油田的双重经验，让周永康的仕途更加光明。两年后，他调到国务院任石油部副部长，成为政坛新星。

据内地媒体报道，1990年代中后期，曾担任周永康秘书的杨广吉去中石油总公司报送材料，忙完后想去看望周永康，可是被周的秘书拦下。杨正要硬闯，周永康闻声出来解释：“你看，正好中组部的人找我谈话呢。我现在正忙，没时间接待你。”当时周永康还兼任着胜利油田的党委书记，杨广吉已经猜到，“可能是在谈提拔的事儿”。

2002年调至公安部任部长后，“就无法拨通周的电话了”，康清明说。2007年，周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

离开北京后，周永康多次回盘锦，但是以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身份出现的只有2009年和2012年两次，公开报道显示，周与油田退休代表、石油学院的老同学等举行座谈、一一握手。当年钻井处一帮老秘书曾叫杨广吉一块儿去看看老领导，被杨谢绝。

“我不想联系了。”杨广吉对媒体表示。

据统计，2008年1月到2012年9月的四年半时间，周永康17次参观、考察或为中石油系统题词、贺电，是次数最多的高层干部。

2013年12月以来，周永康的哥哥、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周滨岳母以及贾晓晔的姐姐等人相继被查，涉及水电、石油、旅游、投资等，其发家过程不乏国内石油系统的利益输送。周永康多年来苦心孤诣构建的

财富帝国轰然倒塌。

在此前的回忆中，周永康对其在辽河的18个春秋多有赞美，称为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以及锻炼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并称，辽河人的博大胸怀、英雄气概和求实作风，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脉相承，始终激励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

但在2015年6月11日宣判后，周永康承认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周氏命运令老同事不胜唏嘘。童晓光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据贾昌明介绍，周永康的同班同学们，大部分终其一生都在技术岗位工作。

但周永康作为同学中的另类，选择的却是另一条草莽式的人生道路：不事业务，精于钻营。在这条道路上，不论是作为国家珍贵的石油人才，还是作为中共领导干部，如今年已73岁的周永康均未“修成正果”，始终只是枭雄、草寇式的人物。这与诸多同期起步、终身奉献石油事业，甚至刻意与周永康保持距离的故人们形成鲜明对比。

草莽周永康确实爬到了故人们难以企及的高位，却又免不了轰然崩塌，老来身陷囹圄的惨痛境地。不但自己误入歧途，晚景凄凉，亦连累为数不少的亲人、下属失去自由，等待法律的裁判。

周氏石油圈

记者 / 张蕾

周氏人生开阖已定，反腐尚未棋到终盘，石油系统的积弊是否能够破局，或成为周案未来影响的重要观察窗口。

周永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3年10月，中国石油大学建校60周年，彼时周永康再一次回到母校。他和同班同学小范围聚会。第二天，他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出席了一系列活动。他跟校友们谈笑风生，跟大学生们谈心，回忆自己在学校的时光。在诸多观察者看来，这更像是为击碎“遭调查”传闻的一次刻意安排。

53年前，周永康的石油生涯也从这里开始。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之后的40多年间，他利用权力在石油系统建立起了深厚的人际根脉，并借此进行利益输送。

寒门骄子

1961年，19岁的周永康从家乡江苏省无锡市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中国石油大学就坐落于此。

中国石油大学后来迁址，目前这里除了有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之外，亦是石油系统的家属区。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成为家属区广场上聚集的人群闲暇的谈资。

“在学校期间，他算不上出类拔萃。”周永康曾经的实习老师高强（化名）如此评价。在学校期间，他对周永康并无太多印象。直到周永康仕途顺畅，官职越来越高时，他才关注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学生。中国石油大学35年校庆，周永康被邀请到已经迁址到昌平的母校重聚，高强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出席，这是他第一次在周毕业后与其重逢。“他还是挺看重师生情谊的。”高强如是评价。

周永康曾就读中国石油大学物探专业，彼时这个学校还被称为“北京石油学院”，是1952年中国仿照苏联教育体制对大学拆分建立的专门学科的八所高等院校之一。物探系的专业课主要包括地基、测量、物探方法等，这些训练给周永康日后工作奠定了专业基础。

中科院院士王铁冠比周永康早一年入学，“他在班里当班干部，不能说他不优秀，否则也不会一步步地成为政治局常委。”王铁冠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按照高强教授的说法，1964年，周永康入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同校毕业之后留校的班级辅导员。周永康一直对该老师充

满感激。时隔多年后，他回校时获知该老师依然在实验室工作，曾经向学校领导举荐，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这位老师以喜欢业务研究而拒绝了行政提拔。

高强教授向《凤凰周刊》记者回忆，成立十多年的新中国求贤若渴，为了改变当时大多官员善战但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国家在多个高校设立了后备干部重点培养项目。周永康因为在学校的出色表现入选。

按照苏联高校五年教育体制，1961年入学的周永康应该在1966年毕业。但是毕业当年，整个中国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北京的大学生们响应中央号召，批判彭真、罗瑞卿等反党错误，北京石油学院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正针锋相对。有媒体称，周永康当时是“保皇派”，对当时校党委书记刘长亮多有保护。

在学校闹了一年革命之后，1967年，周永康被分配到大庆油田六七三厂做地质员。当时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尽管周永康在后来回忆起这次分配说，他“也面临留京还是到外地的选择”，但是作为当时国家树立起的工业典型，能分配到大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肯定。

平步青云

1963年，大陆石油短缺，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试图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依靠石油系统的力量进行一次石油大会战，来改变大陆落后的石油工业。中共中央商讨后，石油系统的第一个大会战在东北松辽地区打响。

“会战”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大陆石油生产中集中各方力量的方式。在1970年的辽河会战中，周永康从大庆油田调到辽河油田，任辽河油田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区域室技术员。

全国其他的钻井队也支援辽河油田，有当时的工人回忆，“当时各个钻井队把钻机拆卸装车，星夜启程赶奔辽河。下车后不问吃，不问住，刨冰层，找井位。”

辽河油田冬天极冷，作为拓荒者，周永康跟其他工人一样，经受了恶劣的天气与环境。当时辽河油田被称作盘锦垦区，跟劳改监狱毗邻。这个盐碱地只适合种水稻，荒草甸和芦苇塘遍布四周。

他们吃高粱米，喝水坑里的水，住风一吹就透的铁皮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来自各油田参加会战的21个钻井队、10个作业队及采油、

油建等相关生产单位参加了誓师大会，辽河石油大会战序幕由此拉开。

文革结束后，曾在周永康求学时任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的刘长亮被重新任用，1970年及随后的十年里，刘长亮任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治委员。按照高强教授的说法，师生情谊让他们在感情上有诸多亲近，这成为周永康在辽河油田不断升迁的契机。

在辽河油田的13年里，周很快被提拔为党支部书记、大队长、辽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政治部主任，直至任辽河油田勘探局副局长兼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

在多位辽河油田老员工的回忆中，周永康口才出众，经常脱稿发言，且在重要的事情上颇有决断。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他此后任职中石油，也被同事形容"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一位熟识他的退休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周永康"讲江湖义气"，为周永康做事，他一定会回报。

在他的经营下，1983年9月，辽河油田原油日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1.8万吨，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周永康在辽河油田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这一期间，他与河北女工王淑华结婚生子——两个儿子分别为周滨和周涵。若干年后，周永康和王淑华离婚，王淑华因一次奇异的车祸去世。从此之后，周涵跟周永康有所疏远，而周滨则利用周永康在石油系统建立的深厚人脉经商。

1983年，周永康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身兼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等多个职位。地方政府和油田的双重经验，周永康的仕途更加光明，两年后，他调到国务院任石油部副部长，成为政坛新星。

大庆油田和辽河油田的艰苦经历让周永康记忆深刻。2012年，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访问时回忆说："我学的是石油勘探专业，毕业时也面临着留京还是去外地的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选择了去大庆油田工作，从一线技术员干起。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冬天零下30多摄氏度，从住地到工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解放牌敞篷车，往往到工地时，人都冻僵了，要司机抱下车，活动十多分钟后脚才慢慢有感觉。"

他感慨道，在基层20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为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令他终生难忘。

1988年，国务院撤销石油工业部，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担任副总经理八年后任总经理，成为正部级企业高官。1998年，周永康结束了32年的石油行业生涯，出任新成立的国土资源部首任部长。

据财新网报道，周永康在中石油时，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1993年中石油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从而让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

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主导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尽管周永康在中石油取得诸多成绩，随后官拜政治局常委，日本《朝日新闻》社驻中国记者林望认为，跟薄熙来是一个明星官员，处处处于镁光灯下不同，周永康异常低调，因此在他看来，周永康一直是一个神秘人物，外界对他的了解远远不够。

周永康唯一一次被流传于网络的讲话是在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之后。1994年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文艺演出，随后场馆起火，288名中小学生死亡，周永康亲赴克拉玛依维稳，他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语气铿锵地说，“稳定压倒一切。不要把事情扩大”。

树大根深

2013年12月，原石油部部长唐克离世。但是在葬礼上周永康并未出现，这加重了他被调查的猜测。唐克是原石油工业部部长。观察人士认为，唐克在仕途上对周永康有知遇之恩。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石油工业，在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与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的余秋里及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主持下自行形成一个系统。

香港《明报》认为，1964年期间大庆油田开采的案例，及在文革时期树立了两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或可成为石油系统权力兴起的标志。

随后大陆的石油工业经历了快速发展，从石油生产的统配统支到一亿吨石油大包干，从会战模式到公司管理模式，石油企业从借债发展到融资上市，从政府管制到市场定价，从行业分割到石油石化重组，周永康在石油系统内建立了深厚的根脉，并且和他的同僚们牢牢掌控中国的石油系统的利益。

在周永康被调查之前，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原昆仑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李华林，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冉新权，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王道富，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原中石油集团总会计师、党组成员温青山以及周永康之子周滨等先后被控制调查。

他们大多有胜利油田工作经验，同时也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时的旧部。据路透社报道，中石油集团另外还有六名高管被拘押，正接受调查，但这些案件尚未公开宣布。

蒋洁敏是此次反腐风暴中落马的最高级别中石油官员而备受关注。1993年，蒋洁敏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1994年，蒋洁敏来到了被其称为“第二故乡”的青海。在经过几个月的短暂过渡后，他身兼党政两职，担任青海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蒋洁敏上任一个月后，青海油田就迎来了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副总经理周永康的视察。周永康勉励青海油田：“柴达木石油人要立下雄心壮志，加入到实现战略接替的行列中来。”

2007年上半年，蒋洁敏成为中石油的总经理以及董事长。2008年2月，王永春从总部调任地方，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大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同年同月，冉新权被提升为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而原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王道富，在3个月后升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

2011年4月，王永春兼任大庆油田原职位的同时，升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至此，周永康的旧部蒋洁敏、王永春、冉新权、王道富等人均进入中石油系统的高级领导层。

在同一时段和周永康产生交集的还有时任胜利油田党委调研室主任郭永祥。1990年后，郭永祥跟随周永康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工作，被提拔为处长，并随周到国土资源部以及四川省委任职。2014年4月，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长期封闭的石油系统内，周永康建立起了巨大的根脉。此时，周氏人生开阖已定，反腐尚未棋到终盘，石油系统的积弊是否能够破局，或成为周案未来影响的重要观察窗口。



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周永康（左一）来西安石油大学与学生亲切交谈

周永康四川布局

特约撰稿员 / 龙军



2010年1月5日上午，周永康在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视察，周永康左侧为李春城

周永康在四川仅主政3年，但其以周氏杀伐决断，组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随着一路升迁，对四川政商两界的影响达到了顶点。四川，也因此成为周永康除石油系之外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势力范围。 2014年7月29日，在风传了一年之后，周永康落马。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实际上，早在一年半以前，随着李春城的落马，周永康精心布局的西南政商大盘，就已经全面崩盘。而以刘汉、邓鸿、何燕、吴兵等为代表的周家西南商业帝国，也逐渐呈现在大众面前。

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间，在石油系统就养成的小圈子手腕更加娴熟。打击本土官员、操控人事、安插亲信。仅主政3年，就已经在四川政界、商界都建立了稳固的“独立王国”。甚至在其离开四川之后，其秘书、亲信仍能长期操控局面，并为其家人谋取源源不断的利益。

最后的西巡

2012年10月14日，中共十八大之前半个月，周永康考察了成都市

锦江区莲新街道，以及成都市高新西区的两家企业和四川的政法系统。

这是自200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周永康第四次视察四川。一个月后，周永康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至今日，周永康的此次四川之行，被外界进行了诸多解读。

据知情人介绍，周到成都之前，当时的成都市以及辖下的一些区县都接到了市里传达的重要通知，要做好迎接视察的准备工作。但让他们意外的是，出面协调并检查各方接待准备工作的领导，除了省市办公厅、安保部门，还有时任文联主席的郭永祥。而郭在检查接待准备工作过程中的强势，让他们印象深刻。

一个知情人说，当时他很纳闷，还问领导，文联怎么也负责迎检了？后经人点拨，郭是周的老秘书，之前周永康每次来四川，郭都是主要的接待人，他才恍然大悟。

另据成都市官方知情人介绍，周永康2012年10月的四川之行还另有玄机。官场上流传着他在十八大之前的四川之行，其主要目的是为四川“周系”打气。因为在此前的2012年7月初，四川黑老大刘汉家族掌控的四川宏达集团什邡市钼铜项目，引起了什邡市群众的群体抗议，一度造成严重的警民冲突。刘汉此后则以给周永康的长子周滨输送巨额利益闻名。

这次抗议，以四川警方强力维稳和什邡市叫停宏达集团钼铜项目而结束，但这次危机或许引起了周永康的担心。

也就在此时，与周滨关系密切的神秘富豪吴兵的中旭系，似乎嗅到了异样的味道。2012年冬，中旭系表面的掌舵人吴兵将其在四川隐秘会所——天蕴中心的员工分批召到北京，进行了集中培训。据参加这次培训的员工介绍，这次蹊跷的培训以保守公司秘密为主要内容。在随后的2013年春节期间，一直待在北京的吴兵回到了成都，在天蕴中心里低调隐居，深居简出长达一个月。

这期间（2012年），四川政商两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四川官场已经传言李春城情况不妙，而周在成都的另一名亲信——曾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何华章也被调任遂宁市长。由李春城一手打造的四川传媒航母——成都传媒集团出现了众多的人事变化，该传媒集团的若干广告公司和文化公司也纷纷被拆分。这种拆分在2012年底李春城落马之前，达到了高潮。

时间回溯至2010年6月18日至19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

议在成都召开。会议期间，周永康专程视察了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城乡统筹改革样本——温江区万春镇。此事在当时被媒体解读为，李春城的城乡统筹模式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

据温江区政府知情人介绍，为了争取成为周永康的视察地点，成都市各区县，甚至一些公司都秘密地在相关层级展开了“公关活动”，为了能挤进备选名单并报给周永康办公室的相关人员，有的单位甚至为此花费巨资。

但最后温江区捷足先登。在成都市的近郊区县中，温江的经济指标处于落后位置，但温江具有别的区县无法比拟的优势——周滨的中旭系四川总部基地在此。该基地以中央某部四川分部的名义，获得了温江区大约90亩黄金地段的土地，其位置就在温江区新政府大院旁边。周滨中旭系在四川的“第一桶金”，也是从2002年成温邛高速公路温江段项目开始。那一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高升公安部长，并迅速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在事后被证实为暗箱操作的那次股权投资中，周滨的代理人在成温邛高速公路项目的买进卖出，盈利达9000万元，且不包括前期的分红利润。

据温江政府相关人士介绍，成温邛高速公路温江段项目的掌控权不在温江地方政府，而是由当时的成都市市长李春城一手直接把握。而四川官场已经传开，在接下来的换届中，李春城是市委书记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

果然，2003年6月，李春城在当了两年半的市长之后，高升为成都市委书记。

杀伐立威

在普通人看来，众多的黑幕爆料之前，周永康的四川任期并无引人注目之处。但四川政、商界人士对周永康在四川的立威过程，则印象深刻。

1999年，周永康从国土资源部空降四川时，四川省委书记为川人谢世杰。此后谢世杰转任省人大主任。

周永康从北京带来的人马，包括从石油系一直跟随到国土资源部的周的大秘郭永祥，以及随身秘书冀文林等。但初来乍到的周永康，一度遭遇四川本地官员的抵制。

匿名四川资深媒体人告诉《凤凰周刊》，周永康到四川后，感觉工作很不顺手，于是决定对四川本地官员开刀立威。他选择的着力点是具有腐败重灾区之称的交通系统。

2000年3月，周永康绕开四川省政法委和省公安厅，直接从泸州、凉山、达州等相对边远的地方抽调检察官秘密组成了专案组，对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郑道访进行调查，并将矛头直指交通厅长刘中山。据上述知情媒体人士称，专案组直接向省委书记周永康汇报，周的秘书郭永祥，负责全程掌控事件的进展。

周永康在几乎完整掌握了郑道访受贿和行贿的证据后，于2000年4月16日晚，突然授意召开省委会议，让部分省委常委“听取调查组情况汇报”，“逼四川官场表态”。4月17日，郑道访被召回成都，立即双规。

2000年5月27日，刘中山被双规。但刘中山始终不认罪。2000年9月，刘中山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郑道访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

在侦办刘中山、郑道访案时，周永康还顺便拿下了乐山市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李玉书。李玉书后被注射执行死刑，成为1949年后四川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员。

经过四川交通厅的大案，四川行政体系一片肃然。在查办上述案件之后，四川本土官员派系的影响力快速弱化。

上述媒体人士分析，周永康杀伐决断，迅速达到了在四川敲山震虎的目的。

据熟悉四川省委工作的媒体人介绍，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间，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如他曾在省委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成都周边圈养黑熊取胆的事情，其中一句话是，“看到黑熊被取胆的惨样，眼泪都下来了”。

周永康强力治川，也包括对黑社会的打击。2001年初，周永康针对四川百姓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猖獗现象，启动了代号为“百日狂飙”的打黑行动。但据当地人介绍，从“狂飙-A”到“狂飙-C”，在这一系列行动中，一些横行多年的黑社会头子却从容逃离，如在内江横行十多年的某著名黑社会头子远走金三角第四特区孟拉，并经营大赌场。也就是在周的任期，内江的黑社会继续发展，太子湖区域则成为当地著名的地下赌场聚集地。

当地警方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们的武器不如黑社会

先进。若干年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周滨和四川著名的黑恶势力刘汉家族，早已经结成了同盟。

整肃媒体

周空降四川后，第二波的整肃就瞄准了四川市场化媒体，对媒体进行严控。周出台了18条禁令，基本控制了所有的报道空间。谢世杰时期成都报业开放的舆论空间，一夜之间逆转。

据该媒体人介绍，在周永康之前，成都市有7家市场化的日报，一度成为大陆媒体重镇。周永康则放手整肃。

整肃的导火索被认为是，刘中山在被判死缓后，仍在法庭上坚称："我有错，但我无罪！"2000年9月，成都《商务早报》引用了刘中山"我有错，但我无罪！"作为报道该案的标题。这被周永康看作是对其权威的挑衅，从而引起了一轮大清洗。2002年4月，隶属于成都报业集团的《商务早报》和四川报业集团的《蜀报》被关停。

2001年1月2日，《成都商报》头版报道了南充市蓬安县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蓬安县委副书记赵从容撞死三人后逃逸，震惊全国。这篇报道的负面舆论效应，让周永康大为震怒，周令四川省委宣传部写信对《成都商报》进行严厉批评，并指示严肃处理这一媒体"越轨"事件。报道此事的记者陈清被开除。

有说法称，时任《成都商报》总编的何华章等人立即在"高人"的指点下，携带数百万元现金赶到北京，找到了有周永康"国师"之称的曹永正，在曹的斡旋下，二人仕途转危为安。

曹永正与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关系密切。由于卷入中石油腐败窝案，2013年7月，警方查封了曹永正控制的年代能源位于北京的总部，公司银行账号也遭冻结。曹永正已经潜逃至国外。

长期安插的班底

周永康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四川本土官员，其本人也擅长从犯错误或身处逆境的官员中，发现他心目中的"人才"，并实行"直升机"式的提拔。

在何华章向周输诚后，周迅速将何从《成都商报》总编提升为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过渡一年半后，又直接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后又升任成都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从此全力以赴为周永

康及其心腹李春城的政绩摇旗呐喊。

《成都商报》也一夜之间从一份花边新闻为主的媒体成为成都“第二党报”，并承担了组建包括电视、广播在内的中国第一家传媒航母——成都传媒集团的重任，构建起周氏舆论的制高点。

2012年4月，缺少地方主政经验的何华章转任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这被当时的四川官场解读为，是为何仕途更进一步所做的准备。但和众多周系官员一样，随着周氏政商关系网的破灭，其仕途也戛然而止。2014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周系官员在四川职位最高的李崇禧，也有与何华章类似的经历。2000年初，周永康接任四川省委书记不久，时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本土官员李崇禧正被人举报，仕途堪忧。李审时度势，立即向周靠拢。

彼时，周永康刚刚空降四川，需要建立自己的人事班底。周于是力排众议，在当年8月将李崇禧提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重要位置，并于同年12月，将李升为四川省委常委。2002年5月，周在即将离开四川之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岗位。其后，李担任了近10年省委副书记，其中有5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作为周系四川本土官员中最大的实力派，在周永康升任中央领导后的十余年间，为维护周氏家族在四川的政商关系网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1年9月，年满60岁的李崇禧不再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十八大后，李崇禧在2013年1月又兼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而在此之前，周系在四川的另一员大将——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候补中央委员的李春城，已于2012年12月2日被调查。

李崇禧的地位亦岌岌可危。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初，李崇禧在全国及四川政协所担任职务被陆续撤销。

在“二李一郭”三名周系四川干将中，李春城是典型的“外来户”，但也是仕途最被看好的一个。李系辽宁海城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95年，年仅39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

1998年12月，李春城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后，李春城迅速投入周的阵营，并获得重用。

李春城与李崇禧被周同时擢升，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回到成都升任市长。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2003年6月更进一步，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事实上，周永康重用李春城和李崇禧时，这两人都正处在被举报和调查的关口。有说法称，李春城因偷梁换柱地将自己秘书违规从黑龙江调到四川，导致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王荣轩的愤慨，但因周永康的庇护，此事也不了了之。

从2001年2月升任成都市长，到2011年9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掌管成都长达十年。而李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四川政商两界拥有相当影响力。这都确保了周永康在四川影响力的延续。

据熟悉四川官场运作的人士介绍，周永康得势之日，李春城的爱将何华章一度在成都的传媒和广告业占垄断地位，并在地产领域所向披靡。甚至拆迁业务也要插上一脚。成都市甚至四川的重要优质资源，都成了以周氏为核心的利益团体随意夺取的猎场。

当然，在周永康的四川班底中，最核心的还是周随身带来的两个秘书——大秘书郭永祥和随身秘书冀文林。尤其是郭永祥，被视作周永康在四川的眼线，是四川官场上的“大哥”级人物。

2000年1月，长期跟随周永康的郭永祥随周来到四川，先后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等关键职务。2002年底，周永康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赴京上任时带走了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2006年1月，郭升任副省长。2009年，郭永祥年满60岁，爱好文学的郭选择任省文联主席“发挥余热”。

但随着中共对周永康腐败问题调查的深入，本应“安全落地”的郭，在201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2014年4月，郭被“双开”，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梳理周永康主政四川的短短三年，其迅速通过强硬的手腕，完成了在四川官场的人事布局，特别是在四川省的最高权力机构——省委常委会，安插了三个举足轻重的亲信：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周在四川的种种布局，让其在任中央领导的十年间，延续并扩大了周氏家族在四

川的政商利益。

商界的班底

除了政界的人事安插，周永康在四川期间还扶持了众多日后在四川叱咤风云的企业，包括刘汉家族的宏达集团、何燕的国腾系等。

据宏达集团官网显示，周永康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两次视察宏达集团，2003年，周滨将阿坝州的一个非优质旅游项目转让刘汉，获取了2000万元转让费。周滨还代刘汉持有电力公司20%的股权。

据成都银行界人士介绍，周永康的家人还主导了成都市安防系统的安装，而何燕只是这些项目的实际操作人。统一部署下，曾经独立于地方政府的银行安防采购体系，也必须服从于“大局”，有关方面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才能很好地和天网系统对接。此外，四川会展巨头邓鸿的发展，则从头到尾被烙上了周氏的痕迹。

2000年前后，周永康大打四川旅游牌，九寨旅游成为四川旅游的龙头。邓鸿在九寨开发了天堂洲际会展中心，创办了成都双年展，并全面接管四川的会展会务业务。后在李春城的全力支持下，2004年，邓鸿的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会展基地，并成为当时成都官方唯一的会务会展场所，承接大小政府和公司的会议接待，邓鸿的会展集团也因此成为李春城成都作为会展之都政绩的展示窗口。这种垄断一直持续到2013年，随着李春城的落马，戛然而止。

周永康在四川的经济领域与石油、化工进行深度捆绑，日后引起诸多反弹的彭州年产80万吨乙烯、年产1000万吨炼油项目，也是在他的任期内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于2006年开工。

2008年5月4日，成都市出现500余名市民到九眼桥“散步”，反对给成都造成巨大污染的彭州石化项目，引起了各方的高度紧张。四川政法部门紧急出动，进行严厉控制。“散步”不了了之。2013年5月4日，成都市民再次发起反彭州石化项目，四川方面如临大敌，将维稳责任分包到每个单位和社区，将“散步”扼杀在“摇篮”中。

周永康离开四川后，其家人在四川的生意突飞猛进，从基础建设投资到水利、地产、能源以及金融全面扩张。其中，其心腹们在四川，特别是成都李春城辖区内实行的“优质资源国有化”后形成的几大投资集团，成了向周滨输送利益的基础，包括收购周滨的股份。

据四川传媒界资深人士介绍，周永康家族在四川的人脉经营和经济扩张，在2011年底达到了顶点。此时，因为涉及韩桂芝案、成都市委市政府新办公大楼事件而坠入低谷的李春城，仕途依然一帆风顺。这被解读为周永康在四川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

2011年底，与李春城关系密切的成都传媒集团内部甚至传出，李春城可能在十八大后成为河南或四川省长人选。这个预言似乎很快得到了验证。十八大后，李春城再度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十八大之后仅一个月，2012年12月，56岁的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

周氏在西南苦心布置的人事圈子，自此逐步瓦解。

“少主”周滨的财富帝国

记者／孙杨

只要将周滨的发迹史与其父周永康的官场履历放在一起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滨的每一次机遇、转折，都与其父的仕途升迁节点暗合。

“中旭阳光能源公司？搬空好一阵子了，人都去哪儿了不清楚。”8月3日，北京东北四环外、方恒国际中心C座内，年轻的物业人员一脸茫然地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并不知道，这个外表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司，过去一年多来发生了怎样的巨变，甚至牵涉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级别官员的腐败窝案。

位于望京东部的方恒国际中心，很长一段时间曾是该区域内最大的一处纯商务综合楼盘，由写字楼、酒店、商场等多座建筑组成。其中，1号楼是写字楼，从公开的名录上可以看到，目前大约有50余家企业入驻，使用率颇高，大部分是科技、能源、电子类中小型公司。

相比之下，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旭阳光能源”）似乎是其中的大块头，因为与大部分楼层是被几家公司共同使用不同，6层的全部空间均被它一家独享。

不过，《凤凰周刊》记者早在今年3月初，第一次来到该公司6层办公地点时，就发现这里已人去屋空，楼层指示牌上一片空白，所有房间均大门紧锁，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内部被搬得干干净净，不仅一张纸都不剩，甚至连前台墙上原本的公司名称也被拆下，仅剩斑驳的痕迹。

时隔5个月的今天，该楼层仍然空置，只是地面上的灰尘增厚了不少，还多了几张从门缝塞进去的房产中介小广告。

中旭阳光能源是过去一年多来大陆最著名的隐形富豪——周永康长子周滨的“老巢”之一。当这个曾经陌生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包括“中石油窝案”、“四川官场地震”等一系列近两年内发生的腐败大案中，都有这个神秘的身影出现。而在他打造的庞大政商财富帝国中，很多见不得阳光的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正是从这里生发的。

如今，随着案情的逐渐明朗，真正的“大老虎”现身，这家公司曾经的大部分股东均已身陷囹圄，周滨政商帝国是如何炼成的也真相大白——因为只要将其发迹史与其父的官场履历放在一起对比，就可以清楚

地看到，他的每一次机遇、转折，都与他父亲的仕途升迁节点暗合。

事业起步　即在关系网中

自从2013年8月周滨的名字第一次在内地媒体上出现，坊间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人们只能通过接近他的人士的形容得知他“身材高大，眼睛细长”、“低调、但也没什么内秀”的模糊形象。

直至今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才有一张模糊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从网络流出，照片中的周滨圆脸、微胖、发际线较高。没人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外表平平的中年男子，却是串起最近一年多来一系列落马高官和涉贪人员错综复杂案情的关键之人。以周滨和其父为中心，铺开了一张庞大的政商关系网。

这是一张耗费了超过30年时间精心编织的人际网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根本不会预见到，作为周氏父子盘棋上的棋子，人生将会发生怎样的逆转：升官、发财，但是最终身败名裂。

虽然随其父周永康祖籍无锡，但是据公开资料显示，周滨出生于1972年1月的东北。彼时，他的父亲周永康已至而立之年，作为一名油田技术员，正在中国石油史上著名的辽河油田大会战中“奉献着青春”。

从大庆油田走出来的周永康一定没有想过，20多年后，襁褓里的儿子将会和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黄汲清的孙女结为夫妻。

尚没有公开资料显示周滨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不过，在他年幼时的记忆里，父亲一定是长年在外奔波的。因为周永康的履历显示，1973年至1990年间，他曾先后在辽河石油勘探局、石油工业部、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胜利石油管理局、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单位任职。

周滨的童年可能不是在富裕奢侈中度过的，因为这一时期，父亲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比较艰苦。不过，待到上世纪80年代末，周滨即将考大学时，周永康已在石油领域工作超过20年，打下较深的根基，并且一步步高升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党组副书记。

周滨日后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的第一条线，是在大学搭架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周永康秘书的李华林，在他的一手安排下，周滨入读西南石油大学（原名西南石油学院）。

入读西南石油大学显然有些子承父业的意味，这所由石油工业部在1958年创办（后由中石油主管），当时位于四川南充（现已迁至成都）的学校，虽然在大陆众多大学中籍籍无名，但在石油人眼中，却是著名

的学府之一，不少师生直接来自石油系统内部，很多人在毕业多年后，都成了石油领域的管理者。日后与周滨产生交集的中石油落马官员李华林、王道富、冉新权等，均是周滨的“同门师兄”。

同样是在大学时期就进入周滨关系网的，还有他的同学米晓东。虽不是同一个专业，但是长周滨2岁的米晓东，却与他住在同一宿舍，据媒体报道，两人甚至是睡上下铺的关系。而且米晓东也是石油子弟，他的父亲曾在新疆中石油油田工作，在中海油成立后调至南海西部公司。

另一个巧合是，与四川系落马高官李崇禧关系密切、同样正在接受调查的四川省蓬安县委女书记袁菱，曾经在西南石油大学任教，任教时间与周滨就读时间重合。不过，尚没有证据显示，其二人在大学期间已经熟识。

周永康本人也十分关心这所大学，在西南石油大学官方公开的学校大事记中显示，“1989年1月20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副总经理来院视察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恰逢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第二波留学热潮。与80年代的留学热潮相比，这一时期不少人已经不再希望学成后留在海外发展，而是把出国当做一种镀金机会，方便回国发展时自我加分。即将大学毕业的周滨也在这股热潮中，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攻读石油专业研究生。

此前，一直有消息盛传周滨赴美读书是李华林帮忙安排的，不过，李华林是在1992年出任中石油休斯顿办事处副主任，与周滨不在同一座城市，尚不能确认是否“照顾”了周滨。

在美国德州，周滨还遇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重大转折点——与年长自己1岁的黄婉相恋并结婚。黄婉就是有“中国石油之父”之称的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的孙女。而这一时期，周永康也已经升为中石油总公司的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两人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

也正是这位妻子，日后与岳父黄渝生、岳母詹敏利一道，成了周氏父子权力寻租的得力帮手。

周永康四川布局 助子掘金西南

2000年前后，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周滨和黄婉一家，决定回国施展拳脚。

刚回国的周滨，曾供职于全球最大的石油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的

中国分公司，职位是“工程师”，这一安排后来被媒体查证与李华林难脱干系。因为斯伦贝谢公司总部即位于德州休斯敦市，自1980年代起，该公司便与中石油展开了密切的合作，还曾招募了诸多西南石油大学的学生。时任该公司总工程师的罗放，还是李华林和周滨的学长。

似乎周氏父子注定与四川有着不解之缘。这时的周永康已经离开石油系统，在短暂任职国土资源部部长之后，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开始主政一方。而其子周滨，也从这里开始发迹。

在四川，周滨财富帝国中另一只重要的“白手套”——吴兵，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商界的吴兵，多年一直默默无闻。2001年成立“中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旭投资”）后，他的生意突然突飞猛进，先后在成都参股开发了文殊花园、锦上花和艺墅花乡等几个高档小区。

随后，吴兵更开始涉足高速公路建设和水电站开发等政府项目。2002年，周滨投资4590万元拿到在建的成温邛高速一个路段的股权，建成后，其股权被成都交投集团以2.8亿元收购，吴兵从这次交易中净赚近亿元。

吴兵的崛起，与四川系落马高官李春城、郭永祥等密切相关。当时，李春城任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以及四川省委常委，而郭永祥则担任四川省委常委和秘书长，郭是周永康最为倚重的秘书。

通过这样的关系来看，吴兵和周滨搭上线绝非偶然。吴、周合作也确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2002年起吴兵开始投资水电站开发项目，注册成立了四川蕴和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及四川天丰水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后者的股东之一，即周滨的岳母詹敏利。

2006年投资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是他们在水电领域最重要的一单生意。据公开数据显示，该水电站建成后平均年发电量31.18亿千瓦时，一年卖电收入就可达9亿元左右。

大渡河干流规划有22级水电站，开发基本由国电集团包揽。在外人看来，民营企业中旭想从央企口中夺食，必须拥有通天的本领：一方面，水电站项目的审批权掌握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发改委等中央部委手中；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也会从多方面干预。不过，有周氏父子做后盾，上述问题全都迎刃而解。

正是由于吴兵与周滨在四川的合作始终愉快顺畅，后来当周滨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北京之后，吴兵和他创建的中旭系也得以继续鞍前马后，

为周滨操盘更大的业务。

周滨在四川发展时期，还结识了一批当地官商，这些“外围人士”日后都成为他权力寻租以及手中项目的接手人。

涉黑富商刘汉曾在2003年以2000万元的价格买下周滨手中一个实际价值仅几百万元的旅游开发项目，目的是攀附关系。因为此时，周永康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以及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稍早前有大陆媒体爆料称，通过周滨的协助，2003年前后，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刘汉曾成功从公安机关查处名单中撤出。之后，两人继续保持密切联系，2005年，由于四川省发改委以保护资源为由，限制刘汉公司掌握其电力公司全部股权，周滨还曾亲自出面，代刘汉持有20%的股权。

不过，仅从对外公布的对刘汉庭审情况来看，尚没有公开证据证明周滨曾直接出手帮助刘汉。

随父进京 生意网络更加庞大

如果说在四川的几年，周滨初试身手尝到了甜头，那么真正让他的财富帝国发展到巅峰的机遇，出现在他进京之后。

2003年，随着父亲跻身中共最高决策层，周滨也将生意重心转移至北京。2004年4月，由詹敏利担任大股东的北京中旭阳光石油天然气科技有限公司（后改名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准备集中于石油领域发力。

在该公司官网上，曾公开标注是致力于石油天然气领域信息化服务的IT公司，主要服务对象为中石油、中石化。但是随后的2年，公司并没有大规模展开业务。而周滨本人，也继续躲在幕后，需找可供寻租的项目和审批权力。

2007年，周永康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蒋洁敏、李春城、李东生、冀文林等其曾经的秘书、下属们，也纷纷被扶植为各自领域的掌权人物。而黄氏家族、吴兵和米晓东等在内的周滨的“白手套”们也全部汇拢过来，这张编织已久的人际关系网，终于完成了。

在亲属与心腹们的合力运作下，中旭阳光能源成立三年后，分三次拿下了中石油旗下十余省级分公司共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系统信息化的实施与管理业务，占了中石油信息化改造计划名单中一半的加油

站。

这是令周滨财富帝国爆发的第一单大生意。到2010年，中旭阳光能源已经完成了所有实施工作，业务范围涉及加油站的物流、仓储、销售和财务等核心领域。

据大陆财新网报道，“中旭阳光能源的工商登记年检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该公司营业收入非常平稳，分别为1.09亿元、1.16亿元和1.3亿元。”“该公司还从事设备业务，应收款所涉及单位包括塔里木油田、吉林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等中石油下属公司。”

凭借过硬的关系和独家的渠道获得稀缺资源，然后高价转手，这种掮客模式是不少“官二代”的生财之道。凭借其亲属的权势，周滨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油田、土地、进出口合同，以及买官卖官和“捞人”平事。

很多时候，由于周滨本人不便亲自出面，他的三只主要的“白手套”便开始各显神通。

以吴兵为“大管家”的中旭系，一方面活跃在前文提及的水电、石油、地产、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另一方面还开始进军影视文化圈。通过投资基金会和影视公司等方式，涉足电影、演出、话剧、京剧等领域。具体业务有2010年在上海举办迎世博大型音乐会、投资四川甘孜州成立60周年的献礼电影《康定情歌》及公安部下属单位参与摄制的电视连续剧《警察故事》等。

周滨的大学同学米晓东，则走出中海油，帮助周滨打理油田买卖、海外石油设备采购生意，以及北京公租房土地开发业务。

2007年，米晓东来到中石油长庆油田总部所在地西安，参股成立了陕西秋海汲清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陕西德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没有什么实际业务的钱袋公司”，后者则仅以千万元的资金便得到了长庆油田的两个地块的开发权。

事后，米晓东将公司股权连同项目一起，以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外围接手人——民营企业家王乐天，一举为周滨获利数十倍。

当然，能够拿下中国第一大气油田长庆油田的两个地块，仍离不开周父老下属们的帮忙。当时长庆油田的掌权者即日后落马的王道富、冉新权。至于时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的蒋洁敏，更被曝光操纵了长庆油田两个油块的“换包”。

今年2月，北京媒体曝光昌平区一个原本应该竣工的重点公租房项

目被撂荒，原因也涉及米晓东及其公司，这让周滨在房产土地方面的寻租生意也同时曝光。

至于周滨岳母詹敏利，更是全方位地帮助周滨打点生意。据媒体统计，为了方便承接和出售周滨通过关系获得的审批权和项目，至少有9家公司是以詹敏利之名成立或参股的，业务涉及石油石化、房地产、物业、投资等。

在中旭阳光能源办公地点方恒国际中心，詹敏利在2009年至少购入8套物业。据房地产销售网站的公开数据显示，该楼2007年开盘时均价1.68万元/平方米，目前二手房售价已达5万元/平方米左右。

“白手套”们还擅长利用股权变更来规避审查。中旭系成立以来，股权转让频繁，大多是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其中仅2007年11月至2010年2月，发生的有据可查的变更就达到8次。

这一时期，更多的“外围”靠上来，其中接手长庆油块开发的王乐天，仅凭借买到的油田就盈利颇丰。而日前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并失踪的刘迎霞，也被曝光其基金招募业务涉及中石油腐败窝案。

此外，在这张政商关系网中的“官二代”们也会合作发财。如郭永祥之子郭连星就曾担任由詹敏利和米晓东于2011年投资成立的成都海利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

自2009年起，周滨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旭阳光能源的股东名单中，并出任董事长一职。至此，周滨的权力寻租到达巅峰，权力和人事谱系也进入最复杂的时期。

因父卸任 逆转崩盘

时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永康卸下了所有官职。周滨的财富帝国也迎来了拐点，不过这一次不再是上升和扩张，而是调头向下。

就在其父卸任当月，周滨已经开始低调起来，他的名字悄然从中旭阳光能源的股东名单中消失，改由妻子黄婉取代。

有媒体将这一事件看做是周滨案发的征兆，但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半年多，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已经倒下。

2012年3月20日，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陶玉春被有关部门控制，接受调查。昆仑系案发。不过，直到当年9月份，该消

息才被媒体曝出，而此时，人们还将关注点集中在此事对中石油业务和股价的影响之上，丝毫没有想到，之后将牵出中石油系统一个比一个位高的贪官。

2012年12月，主政成都11年的李春城被带走接受调查，四川官场地震开始。

2013年3月，中共新一届政府开始高调的反腐“打老虎”行动。

随着出身中石油系统、四川系、政法系统的一系列官员落马，越来越多的线索显示，这些人都在同一棋盘上。

2013年下半年起，形势更是急转直下。8月1日晚，吴兵在北京西站被带走调查。国庆节前后，米晓东被带走调查。

12月，周滨和黄婉从北四环外的家中被带走。整个调查和抓捕行动进行得异常低调和平静，即使是在中共正式宣布消息之后，周滨曾经出没的别墅区和公寓仍与往常无异。

近日，《凤凰周刊》记者分别探访周滨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观唐别墅，以及鸟巢附近的华亭嘉园公寓，物业及保安人员均表示，对这里的业主周滨全无印象，面对记者也完全没有表现出更多的警惕和紧张。

2014年3月，周滨的两个叔叔及家人被控制调查。政协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被广泛传播。

舆论纷纷发出疑问，周滨家族和他的代理人们到底凭借什么能力可以调动如此多的国家资源完成权力寻租？站在周滨背后更暗处的一个身影愈发清晰，“大老虎”周永康的名字呼之欲出。

7月29日，中共官方发布消息，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共中央决定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下，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周永康30年苦心布局，除了满足自身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之外，最终也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血脉，即周滨的荣华富贵、高枕无忧。

然而权力终究要被关进“笼子”，周氏父子均没能逃脱法律制裁。

周永康认罪

记者 / 段文

中共历史上首个因贪腐被查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庭认罪并对一审无期徒刑判决明确表示不上诉。
“我服从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不上诉。”周永康说。

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案一审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永康被认定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三罪并罚，合并后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被告席上的周永康满头白发，穿一身黑色夹克套装，内着白色衬衫。在平静听完判决后，除了明确表示不上诉，他还缓缓自省：“我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周永康案宣判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文章称，对周永康案件的依法处理，彰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昭示了中共依法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文章还称，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无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坏法纪、践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严守法条的司法进程

周永康本人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13年10月，他回到其母校中国石油大学参加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彼时，关于他“涉贪腐被调查”的传闻已在民间流传颇广，周永康在该露面活动中，态度刻意的亲民，他在校领导陪同下出席了一系列活动，与校友、师生谈笑风生。那次露面后一个多月，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承绪去世，11月26日，周永康名字出现在《浙江日报》报道的吊唁名单中，位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这也是周永康名字最后一次正面出现在大陆官媒上。

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消息称，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五个月后的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周永康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至此，周永康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依据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两个月，但“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特别是有“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以及“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等情形的重大复杂案件，侦查羁押期限可以放宽三至五个月。2015年4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对周永康案侦查终结，并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当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刑诉法第20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周永康案从4月3日提起公诉，至6月11日一审宣判，整个进程显然完全是在法条框架内进行的。

中国大陆的司法是两审终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上诉期限为十天，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算。尽管周永康已经在宣判时当庭表示不上诉，但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其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必须等到6月20日24时截止才能开始生效，而2015年6月20-22日适逢中国大陆的端午节假期，刑诉法规定，“最后一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因此，周永康的正式入狱服刑日期按照法律测算，应该从2015年6月23日之后开始。周永康服刑的监狱应该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公安部直属的秦城监狱。

之所以要严格界定周永康入狱服刑的时间，是因为“无期徒刑”并不意味着终身监禁，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据此推算，周永康最早也得在2017年6月23日之后才能首次申请减刑，法定的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起始时间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按此推算，周永康无论如何最少也得在监狱服刑至2028年6月10日才有希望以自由身份重返社会。到那一年，1942年出生的他已经86岁。

当然，如果仅考虑尽早出狱而不需要自由身份，周永康还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在狱中服刑期间申请保外就医。但近几年中国司法部门已经严格了保外就医的申请和执行程序，必须确认“身患严重疾病”，而且“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至少“服刑七年以上”才能保外就医。保外就医期间，罪犯要接受所在地公安机关日常性监督考察以及监狱部门至少每年一次的全面考察，一旦考察发现罪犯“经治疗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的”，就需要重新收监服刑。

未公开开庭的审判

周永康对于其受审地天津市并不陌生。作为曾经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国大陆最高政法领导，他曾多次视察过天津的政法系统。

2012年8月20日，周永康在任期间最后一次视察天津政法系统，并在天津市召开执法规范化建设座谈会。他在会上称，“执法规范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不懈努力。”当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周永康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式退休。三年之后，周永康作为犯罪人亲身体验了天津政法部门的规范化执法。

在周永康案之前，天津政法系统办理过的案件中，被告人级别最高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该案于2008年3月25日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4月11日一审宣判，陈良宇被认定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一审宣判后，陈良宇也未提起上诉。

相比于七年前的陈良宇案，周永康案无论是其个人级别还是案情的复杂和重大程度显然都高很多，天津市政法机关也倍加重视。

2015年1月15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边学文调任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据天津官媒的报道，边学文为法律科班出身，曾连续三年荣获天津市优秀公诉人比赛冠军，并先后参加过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受贿案及陈良宇案的公诉专案组工作。

78天后的4月3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定管辖，就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向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边学文即为公诉人之一。

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指定管辖决定书受理周永康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担任该案审判长的则是该院分管刑事审判工作副院长丁学君。公开资料显示，丁学君为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1984级本科生，1988年毕业参加工作。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案一审宣

判，丁学君表情庄重、语调铿锵宣读判决书的场景，经央视新闻播放后，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周永康案件后，鉴于其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决定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因此，周永康案5月22日的一审开庭并未对外公开，至一审宣判前，未有任何有关该案庭审的信息被披露。

新华社报道称，天津一中院受理案件后，向周永康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同时告知了其相关诉讼权利和义务。周永康委托的两位律师多次会见了周永康，查阅了全案卷宗。开庭前，法庭召集了由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参加的庭前会议，就管辖、回避、庭审方式、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是否申请证人出庭等与审判有关的问题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组织控辩双方进行了庭前证据展示。庭审中，法庭围绕起诉指控的事实进行了调查，控辩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并对证人进行了交叉询问。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法律适用、量刑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对周永康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符合事实、于法有据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法庭均予以采纳。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了周永康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据新华社报道，5月22日的不公开开庭结束前，周永康作被告人最后陈述时说：“我接受检方指控，基本事实清楚，我表示认罪悔罪；有关人员对我家人的贿赂，实际上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我应负主要责任；自己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犯罪事项详解

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该报告提及的周永康“罪状”分为六大部分：1，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2，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3，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4，泄露党和国家机密；5，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6，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

报告称，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

恶劣。

不过，由于报告是中央纪委所作，依据的是党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党纪严于国法"，但"国法高于党纪"。周永康案移交司法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依法作出的起诉意见，剔除了一些中央纪委报告中提到的周永康"罪状"，如"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等。因为根据现行的中国《刑法》，"通奸"不是法定的犯罪行为；目前有关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也未涵盖"权色、钱色交易"等内容。

检察机关最终依法对周永康提起的起诉集中为三项犯罪行为：

一、受贿犯罪，周永康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二、滥用职权犯罪，周永康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周永康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

以上三项犯罪的具体事实与情节，在案件一审宣判后也得以披露。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5月22日，周永康案一审的不公开开庭中，法庭通过传唤证人吴兵（四川富豪，中旭投资公司控制人）出庭作证，并播放周永康儿子周滨、妻子贾晓晔的作证录像，宣读、出示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照片、鉴定意见等，证实周永康利用职务便利，为吴兵、丁雪峰（原山西吕梁市长）、温青山（原中石油总会计师）、周灏（辽河油田公司原党委书记）、蒋洁敏（原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谋取利益，收受蒋洁敏给予的价值人民币73.11万元的财物，周滨、贾晓晔收受吴兵、丁雪峰、温青山、周灏给予的折合人民币1.29041013亿元的财物并在事后告知周永康。以上合计认定周永康受贿犯罪金额折合人民币1.29772113亿元；

通过传唤证人蒋洁敏出庭作证，宣读、出示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副

书记）等人证言、司法检验报告等，证实周永康滥用职权，要求蒋洁敏、李春城为周滨、周锋（周永康侄子，曾任宏汉投资董事长）、周元青（周永康弟弟，其妻周玲英在无锡商界涉足液化天然气生意）、何燕（四川女富豪、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曹永正（四川年代投资公司大股东）等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21.36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14.86亿余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通过出示、宣读泄密文件等物证、曹永正证言、搜查笔录等，证实周永康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在其办公室将5份绝密级文件、1份机密级文件交给不应知悉上述文件内容的曹永正。

新华社报道称，周永康对所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证据均当庭表示属实、没有异议。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永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绝大部分贿赂系其亲属收受且其系事后知情，案发后主动要求亲属退赃且受贿款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滥用职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但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根据周永康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最终判决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以上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其他涉案者命运待定

根据新华社报道的庭审情况，周永康案显然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犯罪案件，该案牵涉人员众多。但目前公开信息显示结案的只有周永康本人。

周永康儿子周滨、妻子贾晓晔于2013年年底涉案被查，至今尚未有进一步司法处理的信息披露。周滨系周永康的长子，生于1972年1月，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曾任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贾晓晔则是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1968年出生，山西大同人，曾在中央电视台任职。

在众多涉案人中，李春城是最早落马的。2012年12月2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彼时距离中共十八大闭幕、周永康正式退休仅仅两周。作为周永康任职四川时期最重要部属之一的李春城涉案被查，被视为中央查处周永康系列案的发端。大陆官方消息显示，2015年4月23日，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李春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目前该案尚未判决。

尽管与李春城同样均为周永康的重要下属，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前中国石油总经理蒋洁敏比李春城晚了近一年才出事，2013年9月1日他被中央纪委带走立案调查。官方消息显示，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3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蒋洁敏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其中，蒋洁敏被指控受贿犯罪的金额为人民币14039073元。目前蒋洁敏案也尚未宣判。

周永康案5月22日不公开开庭审理时，蒋洁敏以“证人”及“行贿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昔日的上下属时隔一年多后，在这样的场合相见，不知道二人作何感想。

除李春城、蒋洁敏二人外，周永康案庭审中涉及的相关人士，目前没有其他人进入司法审判的信息。

据湖北省宜昌市公安机关消息，2013年6月30日，四川女富豪、周永康的女性朋友之一、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燕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宜昌市公安局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该案系公安部指定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管辖。

大陆媒体报道显示，四川富豪、被外界称为“周氏家族大管家”的吴兵于2013年8月1日晚在北京西站被有关部门带走；2013年12月，时任中石油总会计师、党组成员温青山被带走协助调查；2013年12月，周永康的弟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被带走调查，具体案情未公布；2013年底，周永康的侄子周锋被调查，具体案情也未见公布；2014年1月，时任山西吕梁市长丁雪峰被有关部门带走；2014年4月底，辽河油田公司原党委书记周灏被有关部门带走。

以上人员的案件目前尚未有更详细的官方信息披露。

作为周永康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重要涉案人，曹永正目前的情况也不详。曹永正原名曹增玉，1959年生于山东青岛，后随父所在的新疆建设兵团到准噶尔盆地南缘生活。1982年，曹永正从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先后当过党校老师、出版社编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气功

热”时，他在新疆以“特异功能”闻名。其后曹专注发展政、商与演艺界高端人群的关系，与多位四川、政法、石油系统的高官结下深厚私交，被一些人尊称为“国师”。有大陆媒体报道称，曹永正是周永康“最为信任的人”。目前官方没有关于曹永正的信息披露。

相信随着周永康案的宣判及判决生效，其他涉案人员的命运最终也将逐步尘埃落定。

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周永康是中共历史上第四个走上法庭接受法律审判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之前的三人分别是陈伯达、张春桥和王洪文。该三人均为文革结束后中央查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同案犯。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这个被称为“历史审判”的政治案件，庭审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共持续了67天，先后开庭42次，其中王洪文的庭审过程甚至进行了电视直播。

周永康案是34年以来，又一次前政治局常委走到被告席上。他也是中共首位因为贪腐被立案查处并依法审理判刑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

根据官方统计，包括周永康在内，中共十八大以来截至本刊发稿，大陆已经有106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如此多的“老虎”落马，令人触目惊心。2015年6月12日，周永康案宣判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周永康案宣判后第四天，6月15日，周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则于一早的6点发布了一篇重磅文章《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

文章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不放松。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考校纪检干部对政策和策略的把握能力。

文章提出，用从严治党的尺子来衡量“树木”和“森林”，有点有面、点面结合，把查办腐败案件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大局结合起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坚决把隐藏其中的“烂树”连根拔掉，防止病毒蔓延。对于问题严重的腐败分子，一打就要起到警示效果。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认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向。

文章强调，纪律审查不能大水漫灌、水过地皮湿，不能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不能根据自己掌握的问题线索，哪个容易就先查哪个；也不能跟着感觉走，满脑子都是线索和案件，失去了对全局的判断和把握。必须突出重点，形成足够震慑。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三种情况同时具备的是重中之重，必须马上严肃处理；有两种情况的要重点关注，抓紧处理；有一种情况也要认真对待，不能放过。

该文章被视为解读当前中国大陆反腐败形势及今后反腐败工作的重要风向标。（实习生王悦对本文亦有贡献）

苏联式干部任用制度亟需改革

——专访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记者 / 李克难

记者：作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涉及的面极大，牵扯的利益极多，对周永康的查处对中共治理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永忠：周永康是我党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被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但不应当满足于查处这样一个大案，而应当进一步反思：他是怎样在现行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中腐败的？他为什么又在不断腐败的状况下还能够提拔到最高级别？最重要的是，周永康案件事实上已经露出中共现今仍然沿用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头。我曾在十八大前提出，新一届将面临的“三个不得不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周永康案则是最鲜明、最直接、最具体为这“三个不得不关口”作注。我们不能只抓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权力过分集中是“总病根”

记者：在中国，腐败案件出现这种窝案现象已非常普遍，周案更是反映出一个腐败网络的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其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李永忠：邓小平早在30多年前的“8·18”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苏联、东欧和我们一切问题的“总病根”。制度其实分两个层次：一是写在纸上的条款，这是低层次的制度；二是保证这些条款得以施行的组织体系，即高层次的制度，其核心就是权力结构。

在我看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革命党时期总结的“老三大建设”，长期执政下，若中共沿用的还是革命党时期“老三大建设”，就很难胜任其历史使命。执政党最重要的是要健全制度，而制度建设核心就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目前沿用苏联模式问题之一是权力结构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以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期为例，这个权力结构决定了，一是在四川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中共四川省委进行监督；二是，在中共四川省委中，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周永康进行监督。

权力的叠加倾向于腐败。尽管周永康在四川省任职期间也有所作为，四川省委书记这个职务为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做了很好的铺垫，但他作为封疆大吏也同时栽培亲信，以及巨大的利益的输送。作为一个大省，四川省委书记的职位比他在石油系统、在国土系统获得的权力更充分、更广泛。只要对他在四川省委书记这“一把手”岗位上进行深度剖析，都可以从中找到现行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之弊。

记者：在周案中，一些与周相关的人，如他的几任秘书，能够跟随他从一个系统调到另一个系统，而在周离开某个系统后，还能够在该系统内保留他的代理人，这种现象是否已经严重违背了中共的人事组织规则？在现有的人事组织规则上是否存在明显的缺陷，使得这样的利益圈子能够形成？

李永忠：这是苏联模式的第二个根本性弊，即是它的选人用人体制。早在133年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有一个重要论断，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而133年后的今天，我们选人用人还是以等级授职制，以委任制、任命制占主导地位，甚至是压倒性的方式。而各种形式的选举，实际上是控制性选举，以此来实现组织意图，因而才会出现那么多的高票甚至全票当选。

执政60多年，我们至今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甚至比70多年前的陕甘宁边区的选举都不如，第一没有竞选；第二没有比较大的差额；第三没有秘密投票间。所谓的组织意图，更多的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意图。领导喜欢的，迅速提到领导身边；而群众拥护的，则永远留在群众中间，“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实属必然。

而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进了班子没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圈子没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周永康则充分利用现有体制弊端，每到一地就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他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用得顺手的人带到哪里；临离开时，便将信得过的人留下来充当代理人，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网。这并非孤例，一些深谙此道的领导干部，都利用此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小团伙。

我们往往感觉到，从县、市、省到中央，有过秘书背景的人容易得到提拔，且更容易担任领导岗位。这种血亲、姻亲和身边工作关系，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应该有具体的制度进行安排和规范要求，让他们在提拔条件和岗位安排上，比别的干部更严格。

升迁的机会基本上不来自于老百姓，而主要来自于领导上级，这种

用人的导向必然导致尾随、依附领导。我曾经撰文讲过“两森现象”：“领导干部的优秀楷模”——孔繁森，在副处级岗位上干了十多年；而腐败分子——王宝森，从副处级干到副部级仅仅用了十年。冀文林的升迁也同样可以看出玄机。1966年7月出生的冀文林，参加工作五年后才入党，30岁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但自从当上周永康秘书后，从主任科员到副厅局级干部只用了不到六年（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厅级副主任）；2013年初，不到47岁就被选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副省长。我们党的很多优秀好干部却很难得到应有的提拔，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不屑于依附于哪个领导。一些干部中早就流传：培养一个好秘书，比养一个好儿子管用得多。

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决定了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逆淘汰”只能愈演愈烈。

苏联式权力运行定律

记者：除了一些特殊关系的人以外，苏联模式的用人体制在实际运作中是如何使得腐败集团形成的呢？

李永忠：苏联模式权力的运行和选人用人还遵循着三大定律：第一“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莫来。如果一个水平不高的人担任主要领导，那么这套班子所有成员都会理性地选择装得比领导水平低。谁的水平如果敢于高过主要领导，谁在班子里就会马上不被待见，而且绝对没有希望接班。

“武大郎”也不笨，他会随时用各种办法测定你是否真心依附于自己，因而会做一些指鹿为马的测试。因而就有了第二个指鹿为马定律。比如领导准备提拔一个人，但这个人能力素质水平不行，反对提拔他，或不表态的，就不是自己人。再如要上马一个工程，效益不好但里面有利益输送，凡赞成者才是自己人。

中国沿用苏联模式已经60多年，能力不足不是某个或某些领导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有素质有能力的人很容易被“逆淘汰”。不少干部在办公室、在家中挂的牌匾是“难得糊涂”，有的甚至明确称，之所以能到高位全靠一个“忍”字，而那些不装糊涂的优秀人才，绝对没戏。

第三个定律叫做买路钱定律——不给好处者无望。一些武大郎式的人物一旦掌握重权，需要通过输送利益来判定下属依附自己的程度。喜欢政治好处的，就歌功颂德；喜欢经济好处的，就送金条，前两者不缺的送美色。而不予好处者，则升迁无望。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最后都必须折算成第三定律来兑现。在周永康案件中，那么多人都死心塌地地依

附他，在薄熙来案中，他妻子杀了人，也会有人帮他打掩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最后都会形成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文化。一个权力圈子内的人都会相互扶持，拼力挣扎，将这样一个圈子端掉也会非常的困难。

改革是最终出路

记者：为了防止这种腐败集团的出现，应当在制度上进行什么样的变革？

李永忠：如果不及时推行用人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会相继出现三种层面的权力交易形式：第一是权钱交易，这是最低层次的腐败。第二个层次即权色交易，这个色不单指美色，而是泛指所有的非物质化贿赂。

权色交易要隐蔽得多，是多次性的复杂交易。比如业绩交易：你把你的工作业绩给上级，上级会很快得到提拔，然后再来提拔你；比如信息交易：黄光裕曾把某股票会被拉高的信息告诉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的妻子；再如色情贿赂，把女明星装作某次偶遇送给你，然后由我去付款。

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出现最高层面的腐败——权权交易：我是某省的省委书记或某政治局委员，我把你的儿子弄到手下重要岗位，你把我的女儿弄到你那里，这样我们的子女很容易接我们的班。而当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大学里知识分子的知二代都搞这种联手时，社会阶层就逐渐板结化，任何改革都没有空间，最后只有革命。

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腐败从权钱交易上升到权色交易，如果发展到权权交易的话，反腐败就更加艰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反腐的核心就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避免第二个、第三个周永康的出现。查处周永康不是目的，震慑问题官员和贪腐官员也不是目的，利用周永康案的契机，尽快设立政改特区，通过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在形成局部的科学权力结构后，再复制到全国、全党，这才是查处周永康案最有价值的地方。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十年前由于村级财富急剧增加、监管不力，村支部书记违纪违法被抓，村民上访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百姓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为独立于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第三方权力。这十年，他们有效地监督保证了没有一个村干部违纪违法，没有一笔村集体财产流失，没有一个村民去上访。习近平当时在浙江任省委书记，他看到了这个异体监督的成功案例，并在九年前带队调研，

充分肯定了这个村的经验。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在我看来，经改看小岗，政改看后陈，如果能够把后陈村的经验推进到乡一级、县一级甚至更上层，我们将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新路。

十年政法“大管家”：法治且行且困顿

记者 / 李克难

“我们不能做碌碌无为的‘庸官’，更不能做欺压百姓的‘恶官’和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的‘贪官’。”

在2002年9月四川省纪委一次会议上说这句话时，周永康还是四川省省委书记。3个月后的中共十六大，周永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出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由地方大员一跃成为中央要员。12月7日，他正式接替贾春旺任公安部部长，成为继华国锋之后首位进入政治局的公安部长，并由此开始了其在政法系统中的纵横。

从2002年出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到2012年走下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也是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合法权益受侵害不时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访急剧增加的十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显示，从1993年到2008年，参加者达到15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数量，由8709件上升到12.7万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维稳”的表述尽管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出现，但从21世纪初开始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维稳开始与经济发展一起，成为官员能否晋升或者免职的关键因素。在这个维稳体制不断膨胀的十年间，一直作为政法系统主要领导的周永康尽管不能说一手缔造整个维稳体系，但也承担着最重要的操盘手的角色。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维稳形势日渐严峻，维稳系统的地位也在中共权力谱系中不断升高，周永康也在此过程中权势日隆。而从石油系统以来操控人事的陋习，被周永康带到了政法系统，出现了奇特的升迁和任命，最终编织成围绕在其周围的政法亲信圈子。

执掌公安部

21世纪的头十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的加剧，犯罪数量也逐年蹿升。据中国法律年鉴数据，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公安机关侦办的刑事案件数量从每年450万件增加到每年950万件。

周永康接任公安部部长时的中国，正处于犯罪高发期。另一方面，公安系统疏于管理、办案经费不足、正规化水平低等问题亟待解决。

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的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毛立新告诉记者，同其在政法委执政时饱受争议不同，周在担任公安部长的几年中，其作为

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他的一系列整顿确实解决了多年来大陆公安系统的一些痼疾，同时他的改革也为公安系统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从而使其在公安系统内部名声颇佳。

周永康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推出“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严禁携带枪支饮酒；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严禁参与赌博。违者轻则纪律处分，重则辞退开除。此举大力整治了当时松散多年的公安队伍。尽管这些多年前已是公安部门的规定，但更简明的规定、更严厉的实施，促使公安系统的行为发生改变。

“五条禁令坚持到现在，从公安队伍扩大到整个政法队伍，推行的力度和执行效果都是空前的。”

在毛立新看来，尽管周永康仍然延续着中共官员惯用的运动式治理手段，但在现实的公安队伍状况下，运动式的整治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五条禁令”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公安系统“三项教育”、“执法规范化建设”、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的“大接访”以及“大追逃”等，周永康的整警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这一系列运动式整治的指导精神，大多来自于2003年11月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

在大陆公安系统历史上，更早一次全国范围的公安工作会议还要追溯到1996年。周永康上任后不久便召开的这次会议则为周的治警精神定了调：政治上可靠，群众路线以及公安队伍正规化。会上周永康提出的“三个观念”：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在相对保守的大陆公安系统中，仍有让人眼前一亮之处。

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使得公安部门的一些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一是经费的保障，实现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在周的治内，公安系统的基本开支实现了通过地方财政得到保障，尽管一些地方仍然通过当地财政对案款返还来获得办案经费的补充，但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基本完成。

在基础建设方面，大陆公安近年来斥巨资建设的金盾工程，也在周永康任内打下基础。该工程旨在使大陆公安获得网络信息化技术支撑，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监控体系。

毛立新认为，在“条条”（部门）与“块块”（地方）时常相互掣肘的大陆政府系统内，与他的诸位前任相比，周永康在公安部门能够风生水起，做其前任做不到的一些事，与他在中央的身份不无关系。例如在禁

酒的问题上，多年来一直无法落实，根本在于地方公安领导是地方党委所任命的，公安系统没有权力罢免。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永康则有足够权力罢免地方党委任命的公安干部。

“公安机关内部对他的评价，特别是在他任职的早期，是非常高的。”毛立新回忆道，由于公安部门受益很大，在公安部门内部，周永康得到的评价也都比较正面。

尽管周永康对公安系统的专业化整肃、公安财政制度的完善有其贡献，但在另一方面，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公安部门仍然需要通过案款返还的方式充实办案经费，从而促使公安部门通过破获高额案款的案件获得办案经费。

警权扩张之弊

2003年11月18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的决定》（亦称13号文件），明确提出各级公安局长“进班子”。

决定提出，“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确保公安机关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按照《宪法》和各级组织法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公、检、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门的地位最低。因为它属于行政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政府领导，政府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检察院则属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大产生并向其负责。在行政级别上，法、检部门的院长、检察长也和同级政府副职相同，较公安局长要高半级。

13号文件发布后，内地诸多省市公安部门领导逐渐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兼任模式直接导致公检法三家，公安一家独大，警权扩张，公检法三家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难以为继，被学术界认为有碍司法公正。

在诉讼案件中。法院、检察院是监督公安机关的，但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后，由于政法委书记又协调法院、检察院工作，监督无法进行。

直到2010年4月中组部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省级公安厅（局）长改由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或政府党组成员兼任。

政法“大管家”

2007年中共十七大，周永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接替退休的罗干，全面负责中共政法工作。从而，周永康成为大陆政法系统“大管家”。

作为体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机构，政法委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式微，只作为公检法机关间相互联络的机构存在。到80年代末提倡党政分开的时期，中央曾一度发出文件，撤销中央政法委，改为政法研究室。但在1989年后，中共政法治理思路骤变，中央政法委不仅得以重建，而且在维稳压力逐年增大的环境下权力一步步扩大。1991年，中共中央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办公。1994年，政法委的权力由五项扩大到七项，1995年又从七项扩大到十项。1999年，610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办公。2000年，新成立的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也与政法委合署办公。

当周永康2007年接任政法委书记之时，政法委已经成为大陆综治维稳的核心机构，控制着国家法治发展的走向。不同于过去十年逐步推进的司法改革，中国法治的发展遭受巨大阻碍。

“在周永康主政期间，法学界一种一致的声音是，中国的法治在倒退。江平教授甚至将之称为‘大倒退’。我是认为，在周永康这几年，中国的法治起码是放缓，甚至也有倒退。”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是既定的，在推进制度的改良和进步，离不开政法委主动的推动作用。但在实际中，周永康时代的政法委在政策推动上有着明显的公安色彩，在一些法律和政治观点上是非常保守偏左的。塑造出的整个氛围都是向左转，从而使前些年有些好的苗头的改革措施，在那几年基本上停滞下来。以权压法的倾向更趋严重。

在已从苏州大学退休的宪法学家周永坤看来，从21世纪初开始，政法委对司法的介入，对个案的干预已经非常严重，周永康主政下的政法委只是将这种权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权力的扩张集中体现在其主政期间所颁布的法制改革文件中。

在2008年底确定、2009年3月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 - 2013）》中提到，“完善人民法院自觉接受党委对法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党组织、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的工作机制。”

周永坤认为，在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

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已经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此后的各个文件也从未提出党委对具体案件有干预权力。因而在周永康时期政法委对个案的干预是没有任何法律和党的规章依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政法委行使权力都是根据领导意志、红头文件行事，人治色彩非常严重。

“维稳沙皇”

抛弃法治理念，依赖人治，其结果不仅是冤假错案的不断产生，也导致民众通过上访等方式进行维权的行为。而在地方官员维稳一票否决的压力和刚性维稳对待公民维权的思维下，通过各种截访、劳教、“黑监狱”等严重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行为泛滥，维稳成本也随之不断攀升。

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期间，“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行高压维稳政策，人称“维稳沙皇”。中国维稳经费逐年升高，超过国防开支。

2011年，《财经》杂志《公共安全账单》一文估算，当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达到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6011.56亿元。有外国媒体解读为当年中国维稳开支首次超过军费开支。

在上述13号文件中，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首项具体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公安机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总任务，并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当作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永康不再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在当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周永康发表了《认真总结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和经验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文章，对自己担任政法委书记做了一番总结。文章称，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绩：优化了司法机关职权配置，实施量刑规范化，强化了完善了检察院、法院上下级关系；通过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提高了对严重犯罪的惩治能力，强化了人权司法保障；培养了一大批干警和法律人才；进一步解决了政法经费装备困难。

而法律界的看法显然并不那么正面。

张建伟告诉记者，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当时无论是学界还是人大，都感受到法治大环境的恶劣，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修法不仅不能有所进步，甚至可能会有所退步。因而都尽量希望能延迟对刑诉法的修改。

尽管整体环境并不好，但张建伟认为政法委也并非没有对法治有有益的推动，但这种推动只是在特殊事件的影响下才得以促成。2010年，失踪后怀疑被杀的赵振晌回到赵楼村，致使一起冤案最终昭雪。此后，最高法院起草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和《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都是在中央政法委主持下，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五家会签，使得两个规定能够在2012年同时生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确立。

2008年底第三轮司法改革启动，到2011年底60项改革任务宣告完成。但在2011年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所作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里，大多数改革举措仍是机制改革和工作方法的改进，绝大部分改革任务的完成也只是出台相关文件。该报告认为，中国司法改革一直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伴生出司法改革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导致在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动力不足，停滞不前。只有积极鼓励公民参与才能打破司法改革的死结。

此外，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曾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2010年11月周永康前往重庆调研，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这些支持，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的重要政治筹码。

政法亲信网络

如同在石油系统和四川，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十年也不乏网罗、建立朋党和亲信。在十八大之后一系列落马的政法系统官员中，能够清晰发现与周永康存在不正常密切关系的主要有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原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以及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等。

李东生曾在中央电视台和宣传主管部门工作多年，在2009年调任公安部担任正部级的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之前，并无任何政法系统工作的经验。据外媒猜测，他的调任同周永康有密切联系，因为周永康现任妻子贾晓烨曾在央视二频道工作多年，而李东生在2000年调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前，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副台长。2008年2月李东生当选山东省全国人大代表。

据大陆中国广播网新闻称，李东生与周永康相识于全国两会。由于当时媒体对四川报道较少，四川方面便召集一些中央级媒体吃饭。席间李东生与曾为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相识，又得知周永康妻子在央视工作，于是便攀上了与周永康的关系。

而原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据《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前安全官员和一位党政智囊的话称，梁克被调查原因涉及帮助周永康利用国安情报系统进行监听。

作为周永康秘书帮派成员的余刚，2000年前后曾和冀文林一同担任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处级秘书。据澎湃新闻报道，余刚曾于2001年至2002年到广东鹤山市挂职出任副市长，2002年结束挂职回到北京后，很快便担任了周永康的秘书。2014年7月2日，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中央纪委将其双开。今年7月18日，最高检察院决定对余刚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绍，中纪委通报的信息中，“与他人通奸”的情节，很可能指的是余刚与大陆某著名民歌手的非法同居。该T姓民歌手曾经以演唱主旋律歌曲、影视歌曲而闻名。据透露，该歌手与余刚非法同居，公开出双入对多年。该歌手此前因为牵涉其他违法、违纪案件，甚至涉及军内外腐败行为，早已被另案处理，正在服刑。

随着中共反腐不断推进，或将有更多与其相关的案件细节及人物浮出水面。

而于同日被中纪委以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开除党籍的谈红则曾担任周永康的警卫秘书。

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消息发布的第二天，7月30日，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相继召开党组会议，公安部召开部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大会，表示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并要求深刻汲取周永康的教训，引以为戒。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还特别指出：周永康出现严重违纪问题，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教训十分深刻。

4.起底谷俊山

谷俊山贪腐内幕

记者／钟坚

2014年3月31日傍晚，新华社发布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案件的最新进展：当日，总政军事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四项罪名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此系案件沉寂两年有余之后，大陆官方首次发布这位总后高官的涉案信息。

2012年2月，解放军总后副部长谷俊山中将的名字从国防部官网消失后，有消息称，谷因贪腐案而被军纪委调查。2013年底，谷俊山的贪腐案情陆续在大陆媒体曝光，但旋即又悄无声息。

接近北京总后高层的消息人士接受《凤凰周刊》记者独家采访时披露，谷俊山最后涉案300多亿元，谷贪污受贿达6个多亿。“可能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案，也是解放军历史上最大腐败案。”但查办谷案延宕两年有余，殊为不易。谷俊山背后的各种军内势力拉帮结派、盘根错节，迟滞了办案进程。此案近日得以提起公诉，系因谷的后台之一的X某突然失势被查，“X某及其老婆、女儿、秘书半月前被抓，分押各处，官方称监视居住，协助调查。”

此前，已有大陆媒体报道，军方办案人员从谷的河南濮阳老家查抄出大量金银财宝、特供茅台、虎皮、象牙。在北京，谷还有多处会所别墅，与谷有涉的一名知名军旅歌手亦已被关押至江西某处。

谷案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十八大后军队反腐第一大案。有军内人士称，此案牵涉广泛，解放军总部机关、海、空军和二炮等单位已有40余军官接受审查，由谷俊山案件引发的震荡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谷俊山坐大至今，因为背后有靠山支撑。”上述消息人士称，其背后X、Y、Z等势力曾数度力保谷过关，而围绕后者的反腐大幕或方拉开，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种力量的博弈将在台前幕后渐次登场。

“房叔”的灰暗印记

北京万寿路一带，早年是水网河田的乡村，中共建政后，这里逐渐聚集了诸多解放军总部机关办公场所和国防企业。从万寿路路口向南不到500米右转，进入太平路，就分别可见总后后勤学院、军交监理部、营房土地管理局、设计院等军队单位。太平路22号，是总后设计院所在

地，解放军全军营房管理办等多个部门也在里面办公。

1月22日，谷俊山的秘书、50岁的乔希君在外逃多月后投案自首。乔希君为大校军衔，正师级军官。2012年2月，谷俊山被双规后，乔闻风而逃，公安部将其列为A级通缉犯，抓捕乔的悬赏金额为5万元人民币。

通缉令上登记的乔希君地址就是总后设计院。《凤凰周刊》记者获悉，该院内也有谷俊山的一处隐秘会所。从总后设计院出来，斜插几步便是谷俊山曾经办公的总后大院。熟悉总后的军内人士称，谷俊山当年刚进北京时就住在此地，之后尽管拥有多处住宅会所，但谷仍常住该院内。

总后设计院原属谷俊山分管部门，一位曾到过谷俊山会所的知情人士向记者描述："谷的住宅在设计院内一个角落，原址是一个假山花园。为了不引人注意，设计者在通往谷俊山住处的外围和小路两侧种上碗口粗的竹子，生性喜温湿的竹子原本不适合北方水土，设计者特意在竹林下铺设了热力管道，以便竹子生长。高大的竹林将谷俊山的住宅遮得严严实实，若不是有人引路，外面很难发现这里还有住所。"

竹林深处的住宅旁边是一座礼堂式样的会所，两者相连，谷案发后，住宅和会所已被办案人员查抄。这仅是谷俊山在京城众多房产的一处，"总后揭发（谷持有）300多套（房产），专案组最后落实的是60多套。"上述知情人士称，北京紫竹院公园附近谷的一处会所位置优越，环境幽雅，院落外观呈现古、现代混合风格。仅在京城，谷俊山持有这样的会所不止一处，对外以将军府或将军俱乐部相称。

谷俊山被拘押后，京城多处涉案的在建或已建军产处境尴尬。其中，总后设计院门口附近，有栋不高的小楼，现场只搭了框架，外墙和内饰都尚未动工。知情人士称，谷俊山曾计划将这里作为总后的宾馆对外出租，但从开工到现在，都没有地方部门的规划审批手续，现在"没人知道下步该怎么办，做什么用。"总后设计院内的一位军官如是说。

军中震荡波

到2010年为止，谷俊山由河南濮阳军分区军中小吏爬升至总后副部长、大区副职高位，统管全军营房基建等事务，让他"翻船"的是一次军内的例行审计。

2011年初，解放军审计署在对某大单位营房基建和土管部门的审计中，发现某大区级的营房局长A在该工程项目中涉嫌贪污，军队纪检人

员带走A后，很快牵出行贿人港商B，此人供述出谷俊山。

总后党委随即介入调查，逐步发现涉案资金不断增多，旋即向军委领导人作了谷案的专题汇报，由解放军军纪委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在专案组成立后，向军内高级领导以及涉案的各军兵种、军区三次通报中，每次贪腐和数字内容都有增加。有知情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谷俊山涉案案值300亿元，谷贪污受贿有6个亿。”这一贪腐数值可能在解放军有史以来未见。

谷俊山军队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其在濮阳老家的亲朋好友从事涉及后勤营房装具等军品生产经营的案情陆续被发现，他的秘书乔希君、谷的弟弟“谷三”、妻舅张涛等人相继归案，谷氏5个兄弟姐妹中现已有3人被抓。

更大震荡还在军队系统蔓延。由于谷俊山职权所管辖的事项较多，涉案人员亦在军中分布广泛。目前已知总参、总装、总后和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等不少中高级军官涉案被查。有军内消息称，已有40余人被问责，部分与谷俊山有利益输送的高级军官被停职反省，涉案者则一律由军纪委查办处理。

某位曾在二炮部队任职的军官透露，某部副军职少将C，其女婿在总部担任要职，藉河南老乡关系，与谷俊山相熟已久。谷出事后，少将C的女婿亦被办案人员带走，目前该少将已被双规。

一位军方人士称，原本C已获升职令，准备赴二炮后勤部担任副部长，不料因谷俊山案牵连，成为二炮部队组建以来查处的级别最高的贪腐军官。

谷俊山案件在解放军中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凤凰周刊》记者陆续接触到总后基建营房系统的军官，谈及谷案，大多回避。有军内人士称，空军某部技术局政委D为了提拔通过谷俊山送礼，谷事发后，D很快被纪委带走，与其熟悉的某地方企业老板也被抓捕。

有了解谷俊山案的空军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空军也有多人接受调查。但由于案件尚在侦查、审理阶段，大部分涉案军官都只是协助调查，并未定性。据该人士解析，这些被带走的军官或可分两类：一类是因公事向谷俊山行贿，如部队的营房建设项目的审批被谷俊山卡住索贿，不得不向其行贿，而本人在其中并未谋取私利；另一类是本人也参与不法利益输送的。

此前，海外互联网上流传以空军34师“西郊机场某部几位专机工作

人员”名义的一封公开举报信，揭露谷俊山案所涉军中黑幕。有军方人士称，34师已经在第一时间辟谣，称该公开信并非该师人员所写。该人士分析认为，公开信或出自军中对谷俊山腐败不满的人，结合尽人皆知的一些腐败情节，再掺杂其他内容后整合而成。

有军队官员说到谷俊山时颇为不屑，从内心并不认为其算得上是真正的军人，而是称其为商人或是“招待所长”。

至于谷俊山案件处理的后续，另有知情人士分析，谷俊山案审理、定性之后，如无意外，必定会给公众一个交代。不过，因涉军事保密需要，军检公诉、军事法院审理的案件多不公开审理，以谷案之复杂，从公诉到结案还需时日。

“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

了解谷俊山底细的军官称，2001年，谷俊山刚入京任职总后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在机关唯唯诺诺，处处小心。

谷俊山到总后不久，担任武警总部副政委的刘源平调至总后任副政委，成为谷俊山的上级。但刘源不久又升任军科院政委，到2010年刘源以正职上将之衔回到总后任政委时，谷俊山也已升任总后副部长，成为总后党委班子成员。

“在总后机关，上上下下，人人都知道谷俊山上面有靠山，不止X，还有Y、Z等，特别是前者更像是谷俊山的世纪伯乐。”接近总后高层的北京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后期，谷俊山在濮阳军分区后勤时获X赏识，由此改变转业地方的命运。X主管军队干部工作多年，是全军赫赫有名的实权派人物之一，谷多年快速提升，所向披靡，与其关系如影随形。随着职务的提升，谷俊山也日渐跋扈。

2011年，专案组在对谷俊山调查期间，有军内传闻称，谷俊山对总后某部长说“别看你是军委委员，总后部长，我让你离开，你就得离开，你别挡我的道，我也不挡你的道。”一位接近军队高层的人士称“谷俊山甚至告诉刘源，‘我下一个职务是总参第一副总长，上将。4个中央委员中，也将有我一个，你不挡我的道，我也不挡你的道’”。

这些传闻难与当事人对证，但2011年12月28日，总后的一次军以上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刘源发表讲话称，在总后系统，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这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我宁可丢乌纱帽，也要跟腐败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此番讲话后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一位知情军官告诉记者，当时，谷俊山与刘源同坐大会主席台。刘虽没点名，但台下高级军官们心知肚明，“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刘源的这番内部讲话，后流传海内外网络。海外有媒体以中国将军反腐为题报道此事。

北京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初步查明谷俊山涉嫌违法违纪的重大线索后，总后机关党委专门就谷俊山违纪案向原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作专题汇报。此后，谷俊山案件由军纪委专案组接手。

“刀刀见血”

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查办谷俊山过程中，“军中的某些势力一直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初，谷俊山被举报在上文所述的军队营房工程中受贿400万元，为了洗白自己，“谷俊山串通港商B作伪证，让B找到办案人员退赃，并称此案跟谷无关。”北京知情人士披露，此法无效后，“谷又托人告诉港商B，‘向办案人员承认是你自己收了400万，跟别人没关系’，谷还向该港商承诺以后还会多关照他。不久，谷令其妹夫拿着400万现金和军纪委的退赃账号，交给港商B，让其退款了事。”

“港商分两次把钱汇给军纪委后，做全了谷俊山没有贪污受贿的证据链。”办案人员准备结案，但总后前期案件侦查人员找到港商B，得悉此事原为谷俊山指使，并将此信息反馈给军纪委专案组。上述知情人士称，港商B竟能拿到军纪委账号、专案组人员的私人电话，令办案人员惊诧不已。

2014年1月中旬，海外网站上一封化名为“甄情达”的举报信曾详细描述了在查办谷俊山案时诸多曲折的细节。一位接近核心信息源的高级军官分析称，“信件提供者绝非一般人”，因为“不仅里面涉及谷俊山案的一些细节，包括最近一月军队腐败的具体人和事，非军内人士不可能知道得这么详细。最为关键的是，举报信所说的内容，大量与军内相关单位给军委报告中说的内容高度一致，甚至连原句都有照抄的。”

专案组调查谷俊山一案中，发现上海新江湾机场大宗军用土地出让过程中涉嫌营私舞弊，房地产商陈某向谷俊山巨额行贿。此事进入调查程序不久，陈某突然逃至加拿大，专案组被迫中断有关此线索的追踪，公安部为此发布国际通缉令。作为谷俊山的关键行贿人，陈某脱逃时谷俊山已被双规，军方人士分析，由此可见，谷俊山失去自由期间仍能与外界通报消息，活动能量惊人。

知情人士透露，专案组还发现谷俊山在被调查期间重金收买黑社会杀手，筹备刺杀一位高级将领。谷俊山不仅向杀手提供了该将领在颐和园附近的详细住址和生活规律，还帮助准备了作案工具。指示杀手，待该将领的专车到住宅门鸣一声喇叭，住所门开后即可动手。“反腐不简单，可以说刀刀见血。”不过这一说法目前尚未获得印证。

上述知情人士称，对谷俊山案的查办获得前后两任军委主席的全力支持。总后廖锡龙部长和刘源政委曾多次向习近平主席面汇案情，习近平在相关部门的呈批件上亦有十多次批示。中共十八大后，谷俊山案的查办渐趋明朗。2012年1月19日，困境中的谷俊山如常出入总后机关，他还参加了河南濮阳籍在京领导人新春团拜会。

半个多月后，谷被军纪委正式羁押。

谷俊山经营术

谷俊山过去十多年的仕途顺风顺水，从正军少将到大区副职中将，谷只用了两年多时间。谷俊山的战友透露，谷俊山早年在河南濮阳军分区分管三产时任军分区后勤部供应科科长，当时还是个副营职军官，为了顺利晋级，谷俊山不惜借高利贷送礼买官，最后当上军分区后勤部部长。“谷的人生哲学，只要有钱，没有办不成的事，几乎都可以做到路路通。”

谷俊山的“经营才能”在上世纪80年代已有发挥，他任职的濮阳军分区早年与中原油田合作办第三产业，倒卖油品等各类紧缺物资。谷俊山利用军职在各类贸易中非法逃税。一位曾在国税部门任职的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当时谷俊山负责的项目需缴纳500万税赋，时任濮阳市国税局上门催其缴税，谷俊山回复‘你可以找我们司令，也可以找市委书记、市长，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要钱没有，要血有几盆，给你几盆。’”。

谷俊山的老家在河南濮阳华龙区东白仓村，谷俊山出任总后副部长后，其亲属在河南当地，利用谷的职务牟利，这些报道去年已见诸多家媒体。《凤凰周刊》记者跟踪谷俊山案时调查发现，濮阳市区、街道领导提及谷俊山名字时隐晦难言。谷俊山的弟弟谷献军还是华龙区人大代表，在专案组将其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后，当地人大仍未将其罢免。而东白仓村村民直到谷家被抄，才敢公开议论此案。

“谷俊山老家抄出的1800多箱茅台原份酒，有100年陈，有50年，有15年的，还有11张东北虎虎皮，几十根非洲象牙，这些东西都是谷俊山不要的东西，在北京会所住宅放不下，才派人放在老家藏匿。”一接近专案组的人士告诉记者，“办案人员起初搞不清谷俊山财物藏匿何处，后

来由为谷俊山豪宅服务的当地人带领，才从别墅墙基等处挖出大量赃物，仅黄金就足有400公斤。”

知情人士称，谷俊山不仅在老家藏匿大金船、纯金毛泽东像等物，还用受贿所得金条铸造了三尊几十公斤重的金佛，放在北京会所，其中两尊已送出。在受贿后期，谷不收金条而只要金粉。谷俊山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任职期间，多次在营房基建项目上索贿。如某军队歌舞团向总后申请扩建歌舞团的排练厅和排练楼，预算为8000千万元，谷俊山下拨资金1.9亿元，同时向该歌舞团基建负责人索要500万现金和5公斤黄金。

“谷俊山后来都要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北京消息人士称，谷还充当掮客，专案组调查出不少军官找谷俊山“跑官”，在谷案发后，这些人也悉数落马。

谷俊山向下敛财之余也时时向上进贡。一知情人士称，谷送礼方式是“准备一辆12缸的奔驰600，里面放上上百公斤的金条，车钥匙直接给送礼对象。”谷还善于公关高级军官的亲友，“谷得知其主要靠山X对女儿十分怜爱，就一次送了几套豪宅给他女儿”。

谷俊山令人吃惊的升迁和贪腐记录，源于他在军队内部已经打造上下勾连的关系网，军内对高级干部的各项监督制度在这类网络下几近失效。接近谷俊山的人士称，谷初中毕业，发言稿都需秘书执笔，他还提前关照秘书勿用生僻字，以免他念错。但他的档案学历上先是填着空军第二技校毕业，后改成河南濮阳教育学院毕业，再后来又改为中专、大专、在读研究生，直到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他的出生日期由1952年先后三次改动至1956年，立功经历也连改5次，增加了4个三等功。谷为父亲雨花台烈士身份造假，此前已被媒体广泛报道。《凤凰周刊》记者1年多前曾找濮阳市华龙区等部门核实其为父亲办理烈士身份的细节：谷俊山亲自打电话给河南和濮阳市民政系统落实此事，并在濮阳为其父修建了烈士墓，修书立传。但雨花台烈士多为1949前牺牲的，谷俊山的履历生辰为1954年。

军内传言，谷俊山在总后的几次升迁，特别是出任总后营房部部长之时，廖锡龙和刘源等人都不同意，但在军内更高层的干预下，谷俊山顺利升迁。这一传闻真实性目前已不可考，但谷被公诉前半月，其军中靠山X及其家人、秘书均被专案组带走调查的消息，至本刊截稿时仍未见官方证伪。

了解案情进展的人士还透露，在移交司法候审的日子里，关押中的

谷俊山有段时间每天都会“哭上好几个小时”。

起底谷式军产腐败

记者 / 钟坚

解放军保留与市场主体联合开发房产的经营模式，原为解决驻城市部队团以上干部住房困难问题，却被贪腐军吏们变成谋取巨额私利的工具。

谷俊山和其前任王守业，在军队土地开发、基建营房等领域接连形成巨额贪腐。

上世纪90年代末，大陆军队停止经商活动后，军队房地产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留，即军队一般采取有关单位和市场主体联合开发房产的经营模式。尤其是驻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部队，面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住房等生存条件逐渐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本来这是军委总部用于解决军队团以上干部住房问题，照顾和关爱广大中高级干部的生活，给予其必要的生活和住房保障的不得已举措。”北京军情分析人士指出，军委总部这一初衷却在现实中落空。谷俊山在此间经营十数年，食黍无数，或创下中共建军历史以来的最高贪腐纪录。

大陆军方在此领域并非没有制度。一退休老营房部长介绍，军队一直对诸多不法行为明令禁止。只是到了王守业、谷俊山等人任上，被扭曲破坏，而近期大陆军方的一系列动作，或可看作是对此补救。新华社3月28日消息称，军委巡视组近期在对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党委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土地转让、经济房建设等方面，发现一批重要问题线索，其中涉及北京军区巡视组相关官员。从去年7月起，解放军高调宣布在全军范围进行为期两年的基建和军产项目大清查（以下简称“两查”）。“两查”整饬活动或为谷案之后军方亡羊补牢之举，以冀图追根溯源，清查和堵塞在该领域存在的各种灰色利益输送通道。

地产商落逃

谷俊山案的关键行贿人之一陈某，曾是上海新江湾城区块中一个项目的持有人。

新江湾城位于上海东北角新兴的商业开发和住宅区，10年前由空军上海江湾机场大部分土地“军转民”开发而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空军仍是江湾这块区域最大的持有者。在江湾城标志性豪宅祥生御江湾对

面，是解放军全军最大的军职退休军官安置房别墅群。

数年前，陈某以协议价从军方手里得到13亩多的土地，从事商业地产开发。谷被双规后不久，陈某听到风声，遁身国外，该地块迄今仍是一片空地。

在上海杨浦区的房地产圈内，很少有人知道陈某。王肖山（化名）曾代表上海地质勘查设计院中标陈某的新江湾城的地产项目，因为工作的关系与陈某有过接触。王肖山称，陈可能是山东人，“他在上海圈基本没朋友，说是事业重心在北京。”陈某行事风格低调，日常跟随只有一人。

2003年2月，陈某在上海杨浦区政立路505号注册成立了上海录润置业有限公司。实际上，政立路505号只是陈某录润公司的注册地，陈某几乎不常驻上海，而是频繁往来于京沪二地。几年后，这个在上海地产界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从军方手里拿下了新江湾城大宗军用土地使用权，陈的23-5地块总面积在11万平方米以上，规划中包括写字楼、酒店式公寓等商业地产项目。

上海江湾机场1949年后一直归解放军空军使用，鉴于该机场已影响了上海东北区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86年5月批复，同意迁建机场，腾出机场土地作为上海市建设发展用地。“总计13000亩地，9000亩转民用地归上海市政府，空军还留4000亩。”上海城投控股副总周浩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以淞沪路为界，两边是不同属性的土地。留归空军的土地也并不作军用。

陈某协议拿地正处上海新江湾地产版块热炒时期，从军方拿到的地能比上海土地交易市场的土地挂牌出让价优惠很多。但地产圈内人士介绍，从军方手里协议价拿地并不容易。在江湾机场留存的军用地块，有的属于空军房管局，有的属于南空上海房管处，还有属空军机场营房部系统，要分清不同部别的土地的归属，且找对人牵线，需要在军内有很深的人脉资源。

王肖山认为，陈某在2008年前后拿地，2010年才拿到土地证。而陈某只完成了简单的土地勘察设计招标，却不急于开工。“他就是倒手卖地赚钱。”王肖山说，在地价持续飙高的2010年，陈某曾跟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接洽，但未达成合作。陈某的上海录润置业有限公司，以及23-5地块最终易手时，接盘者为曾排名胡润榜44位的浙江女商人邹蕴玉。

2012年7月份前后，邹蕴玉举行了该地块的开工仪式，其后，中标

建设单位江苏地基工程公司入驻打桩，“我们把毛地的地平都做好了，也打了部分桩基，前后垫资了几千万，到年底甲方录润置业却说没钱投了。”项目工地留守张师傅说。

今年1月中旬，邹蕴玉被传跑路，依托该地块推出的“新华信托·上海录润置业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传出到期无法兑付，沪上投资者一度恐慌。新华信托上海分公司曾否认该产品无法兑付，但上海录润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此前邹蕴玉公司派遣的淦彤军，变更为新华信托派驻项目公司董事会的张奎。

黑幕一角

陈某逃亡后，当年他的新江湾城地块的协议出让价、陈与谷的利益输送等细节，尚不得而知。但有上海房产界人士称，至少在表面上，“该地块的所有手续都是完备的。”

新江湾城23-5地块现在被称为上海新江湾城街道412街坊9丘，位于地铁10号线三门站对面，《凤凰周刊》记者3月23日下午在现场看到，早年从陈某手中几经易手的这块土地至今仍是空地，四周都已高楼林立，该地块最新持有人为新华信托上海公司。上海同建监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称，没有接到工程开工的消息。

在新江湾地块军队房地产经营活动中，23-5号地块并不是唯一留有疑团的项目，同为新江湾地块上的另一起军用土地租赁纠纷至今余波未平。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西门，国权北路上全军老干部安置房施工区域的后侧，祥生御江湾东向正对面，有三栋拆了一半的钢结构建筑楼，落日余晖下，三栋钢结构旧楼上白底黑字“还我血汗钱”横幅引人瞩目。祥生御江湾小区的门岗刘姓保安说，去年6月他到这里上岗时，就看到现在拆了一半的破败景象，被拆楼距今至少已有2年时间了。

国权北路附近商店的一位老板告诉记者，刘源带人查处了这处租用军用地的违章建筑，杨浦区原某常委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确有此事。

这处建筑可追溯至2009年2月，一位张姓商人找到空军上海房管部门，租下了复旦大学新江湾校区右侧、国权北路上的11.25亩军用地，租赁用途为文化教育、餐饮服务业；租赁期限自2009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止。此后不久，张老板在该地块上开建了3栋6层钢结构的临街建筑，用于商业开发。

2010年10月，该地块上的违章项目因无规划和施工许可证，被上海国土与规划局监察总队叫停。1年后，这块土地权利人变更为老干部建设管理局，军委总部计划在此地块附近建设一片全军军以上老干部住宅区。老干部建设局通知张某，要求立即拆除租赁土地上建造的三幢房屋，三幢楼的工程造价事后审计为5000多万，拆除意味着承建单位无法收回成本。

2012年2月18日，老干部建设管理局向张某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一纸诉状递到杨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法院判决支持老干部建设管理局，但空军当时提供给张姓商人的租赁手续也并不完备，有传闻称张姓商人与空军房管部门关系非同一般，未领取军用土地租赁许可证，只凭借一纸租赁合同，就在军用土地上违建的商住楼，附近的空军上海房管部门对此也未加制止。

过去十多年军队大规模的资产经营开发活动中，类似上海新江湾地块军产开发中的纠纷，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大量未经确权登记的军队房地产资源被军产管理使用单位未经审批，私自投入市场，某种程度上成为军队一些部门腐败的死角，也造成诸多的军地纠纷。

全国房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树英曾多次处理这样的纠纷，“有的根本什么手续都没有，军队就把这块地拿给你开发了。因为地可以变钱，部队首长一拍板，把钱拿走了，导致业主无法办理产权证，但烂账纠纷一大堆，他也不管了。”

2013年，最高检和总政治部对军人违反职责罪进行修订，其中对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罪规定：在军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过程中，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军队内部负责人或承办人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价值三十万以上的或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给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应负主要刑事责任。

“现在是很多军队不想应诉，能捂住就捂住，部队亏了就亏了，被人家告了才没办法。”朱树英说，以往军队中的违法转让军用土地、房产行为鲜有被军法惩处的，无总部审批的项目，亦往往能通过总后追加审批补救。

在谷俊山腐弊案发后的2013年，总后已下令暂停全军范围内的土地出让、房地产租赁项目，并展开对基建项目和房地产领域的“两查”活动。对过去谷俊山时代批建的项目进行溯源追查。

“被扭曲的房产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缺少经费保障的大陆军方首次下文，规定军队闲置土地、空置营房等亦可以作为一种生产经营资源投放市场。掌握军饷粮草的军队后勤高官们忽然意识到，过去看起来不值钱的军马场、农副业生产基地、废弃靶场等军用土地，闲置的空余房产有相当大的市场价值。

在军队房地产开发资源中，军用土地出让获利最为丰厚。按有关规定，军队土地转让、出租时的土地收益金，由总后统一收取，并按交易总额的5%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不参与军队土地收益的分成。而留给军队的土地收益，列入专项资金管理，用于军队的房地产事业和干部住房建设，国家免征相关税费。

军用土地出让一般有地方政府收购储备、直接在当地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转让和军队单位主导实施三种。朱树英律师谙熟军队房地产开发运作流程，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军队土地出让都是军队单位自行组织公开转让，鲜有当地政府收购储备后再出让，因为后者意味着地方要收走土地上的大部分收益。

如原空军上海江湾机场迁建补偿的谈判，上海市政府就与空军进行了长达10年的土地回收补偿谈判，而后才签署了江湾机场原址部分土地使用收回补偿协议。“双方主要在补偿价格和回购面积多少等问题上展开拉锯战。”参与军方谈判的上海城投集团一位高层称。

1997年5月1日，空军正式与上海市政府交付土地。在土地储备阶段，上海新江湾城开发有限公司陆续向空军交付了总计30亿元的土地补偿金，换取9000亩的毛地。

解放军留存空地，有限度地从事房产开发换得土地出让金，初衷是为解决内部干部住房问题。军队房地产合作开发多采用联合建房、合作开发模式，即军队出地皮，地方合作方出钱，双方利益分成。客观上，军队经适房等项目的建设仅依靠营房部门无法完成，需与地方合作开发。

历经多次裁撤合并的中国军队拥有庞大的房地产资源。军队用地大多是国家无偿划拨或调拨，来路复杂。有的是中共建政时期，解放军接手的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房地产；有的是文革前政府拨给军队的房产；有的是地方和军队党政机关相互借用调整的土地等。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放军响应中央号召，抓好军事训练之余，又积极从事农副业生产，军队因此借用或征用了地方很多山地、草原和农田，种植粮食作物，饲养牲畜。时过境迁，当年这些土地有的已处市

郊结合部，属城市规划征迁范围，经济价值不菲。

军中借此进行不法操作的，并非谷俊山一人。以南京市新街口某高档楼盘为例，其土地原是总参下属某研究所的军产。但该研究所负责人私下与地产商勾结，通过地方政府将其转变性质，变为商业开发土地，从中谋利。经人举报，总参开始调查，但楼盘已售卖给了购房者。此后，该研究所所长、政委均受刑责，但原本属于军队的土地，已经无法再收回。

军产利益链

军产资源乱账，亦令谷俊山这样的人得到中饱私囊的便利。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军用土地没有确权领证。”负责军队基建和房地产资源两项普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去年向外界透露，解放军拥有的土地和房产数量至今不明。

参与全军“两查”工作的一位总部军官表示，军队房地产和基建项目的底数，原计划自去年开始，二三年内查清楚，“但我估计没有这么容易，有些情况比较复杂。”

作为军队庞大的战略资源，军队房地产资源应集中统一管理使用，这一点在军方发布的各类文件规章中早有明确。如1990年代初，就在以财政部、国家土地管理局、总后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军队有偿转让空余军用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中首次规定，转让空余军用土地，不论数量多少，均应报总后勤部批准。获得批文后，才能进行土地的“军变民”。

而后在三总部联合颁布的《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中，系统地对军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作出规定，再次明确转让军用土地使用权，不论数量多少，一律报总后勤部审批。如涉及军事保密，土地转让还须经过总参审批。

但军队各单位与地方合作开发地产逐渐成为常态，原有的约束纷纷被突破。军队房地产领域目前执行的是2000年版的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上面对一些问题也没明文规定。“这为军队有关单位留下很大的操作空间”，也容易造成军队房产开发纠纷。一位资深房产律师称。

军用土地使用权出让，一般先由转让单位进行土地开发可行性认证、合作对象资信调查，向军区一级营房部提出申请；经过军区审核，

按程序上报总后军委总部，得到批复后再向总后和大单位后勤部缴纳土地转让费和土地管理费，领取军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才能到当地政府办理土地出让、权属过户手续。

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流程，一块军用地完成“军变民”过程，事实上寻租空间众多。熟悉军产转让的知情人士透露，军用地交给地产商后，常不按规定比例上交5%的地价款，比如说上报地块名目写着是军队保障房建设，其实是商品房，其中少算价值由地产商与军队相关人员分成。

这些虚假地产项目在逐级申报过程中，地产商需要一路向上打点，“军队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往往上下一个体系，如总后高官或大区某个营房部门的批复，都需设法摆平。”

基建营房部尽管只是总后的一个二级部，营房部部长和分管的总后副部长军衔亦顶多是少将和中将，但该部门相当于集地方的国土部和建设部于一身，在地产商眼中炙手可热。

囿于历史原因，大陆军队的军营在城乡分布广泛。近年来，大陆一些城市进行建设规划时，常常与军队营区冲突，为了与军方协调，地方官员只能赴京找总后分管基建的高级军官解决。而谷俊山接管全军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审批后的几年间，是大陆房地产热度最高的时期。围绕军队土地的整个利益输送、交换链条，他既是示范者，亦是诸多被输送利益的攫取者。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谷俊山要求地产商从他手里拿地，中间利润差价的60%归自己。

2004年，中央政府规定对大陆土地市场实行招拍挂制度，列入开发的土地进入土地交易中心公开出售，价高者得。但军用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却直至2007年才推行。并且，招拍挂结束后，仍要经过总后审批。这样，军用土地开发的决定权，又回到了谷俊山手中。

2008年，空军上海江湾机场留用土地分别以每亩70000多元和每亩90000多元协议出让给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价格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且用地性质为商业、办公用地。据称，两家房产公司都是从军方手里协议转让土地，而其中一家房产公司上海胜境置业有限公司还有港资背景，当时的上海媒体对这两家房产公司能以如此低价拿地感到不解。

这一年全军已经推行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招标制，即使是采取协议方式出让土地，军队法规亦明确，转让费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价。

军队房地产运作往往独立封闭、自成一体。军队内部的房地产管理

条令条例也跟地方的行政管理不衔接，由此产生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造成军队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朱树英律师曾担任两届上海市政协常委，有一年，他写提案建议上海警备区对所辖土地和房地产资源进行确权登记等摸底清查，然后完善法规，加强管理。但这一提案如泥牛入海。在上海政协出面与军方沟通后，朱树英接到军方来电："你的建议很好，因为我们是部队，部队内部会重视。"此后再无下文。

2014年初，有军方人士向记者透露："'两查'当务之急是摸清军队土地和房产两项的底数，存在什么问题，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接下来，军方要组织大批法律人员来解决和梳理这些争端和乱象。"

总参南京维权中心主任黄伟则告诉朱树英，"在今年的第二阶段，军方要完善军队合作开发房产领域的立法，对已滞后的军队房地产管理条例进行修订，以尽快实现与地方诸多房地产管理法规并轨。"

经历王守业、谷俊山等人多年把持之后，中共军队相关领域如何回归正轨，或将需要耗费相当时日。

5.蒋洁敏“商仕”末路

记者 / 张蕾

1972年，一个小名叫“胜利”的17岁山东阳信青年，来到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成为一名修井工，开始了他“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的人生旅途。他就是41年后的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2013年3月18日，蒋洁敏出任国资委主任。9月3日被免职，成为新一届政府中首个落马的正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后首个被查处的中央委员；同时他也是国资委历史上首个接受组织调查的主要领导。

参加工作41年的蒋洁敏，在石油系统工作长达37年，期间曾有任青海省副省长4年的履历。其刚升任国资委主任时，媒体曾以他和其他几位有国企高管经历的部级官员为例，解读政企干部双向交流的“商而优则仕”现象。

然而，半年时间不到，蒋洁敏的落马，让“商而优则仕”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据内地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有接近国资委的人士透露，自从蒋洁敏出任国资委主任后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从中石油突然离开似乎早有隐情。

胜利22年

当修井工时，蒋洁敏展现出的吃苦耐劳以及勤奋好学，就让李正国记忆深刻。

李正国曾任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技术检测中心党委书记。在他看来，当时修井工不仅活累，而且吃不太饱，回到宿舍，工人们几乎全都倒头就睡。

但是蒋洁敏不同，“回到宿舍看书、学技术。这在学徒工里很少见。”李正国说。

当时几乎每个修井工都显苍老。这是因为他们整天在野外风吹日晒，吃饭不准时，如果遇上井喷和冲沙，内衣都会被油浸透。

或许是这样枯燥劳累的修井生活难以满足蒋洁敏对未来的憧憬。于是在艰苦环境中，学习改变命运成为他秉持的信念。虽然，这意味着他要比工友们付出更多。

他的命运最终改变，自1972年进入胜利油田，一直到1994年离开

胜利油田赴任青海石油管理局，22年间从技术员、大队长、采油厂党委书记，直到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常委，一路升迁。

1982年，蒋洁敏完成了山东大学经济专业的学业。尽管一些内部人士怀疑其求学这段经历的真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他已经转型为企业的一名管理者。

或许艰苦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蒋洁敏深知工人的需求，在1987年，蒋洁敏在胜利孤岛采油厂主管矿区建设时，推行“4321”政策，他自己组建后勤团队养殖耕种，这一政策的推行让每名员工每月能确保领到4斤鸡蛋、3斤鱼、2斤肉、1斤油。基础生活质量的提升，让长期处于艰苦环境下的石油工人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这些惠民政策的实施，为蒋洁敏赢得“人性化领导”的评价。在蒋洁敏离开胜利油田约20年之后，职工们依然对这项福利充满赞赏。

为了解决石油工人的后顾之忧，他在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推出丰厚待遇，全力引进优秀教职工，试图改变石油工人子弟的教育困境。1990年，孤岛走出的大学生超过10位。

原孤岛采油厂党委副书记袁础告诉媒体说，蒋洁敏任职孤岛采油厂的时候，油气产量达到高峰，约在580万吨/年，而且保证每年都有新发现。

1993年，蒋洁敏升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此时胜利油田的控股企业——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石油大明）正式成立。作为石油行业首家股份制试点企业，石油大明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这段经历也为蒋洁敏在中石油进行股份改革和筹备上市打下基础。

青海“蒋大胆”

1994年，蒋洁敏来到了被其称为“第二故乡”的青海。在经过几个月的短暂过渡后，他身兼党政两职，担任青海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青海油田敦煌基地以东是七里镇，七里镇因为距敦煌市区7公里而得名；基地东边是茫茫大漠。在1992年之前，青海油田敦煌基地尚未建设之时，青海油田工人们均生活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冷湖镇。

因为冷湖镇地处高原，风沙大，气候恶劣，盐碱地亦不适合植物生长。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得从200余公里以外的敦煌市运输而来。1992年，工人们和青海油田机关从冷湖镇迁移到了甘肃敦煌七里镇。

这些在戈壁上长年战风斗沙的工人们每三个月回到这个基地休养，随着规模逐渐扩大，住宅楼不断扩建，这里逐步成为科研、教育、职工轮休、轮训以及机关单位所在地。　　尽管工人生活条件提高，但是青海油田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效益下滑、人心浮动、士气低迷。蒋洁敏的到来称得上是临危受命，且上级对其颇有期待。

一个显而易见的表现是，蒋洁敏上任一个月之后，青海油田就迎来了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周永康的视察。周永康勉励青海油田："柴达木石油人要立下雄心壮志，加入到实现战略接替的行列中来。"周此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蒋洁敏强烈的个人领导风格确实给这个当时正处于困境的油田带来清新之风。

采访中，诸多退休工人对于蒋洁敏的评价是"敢想敢干，思路清晰"。"他告诉我们说，放开手去干，干错了是他的，干出成绩了，算我们的。"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

当时蒋洁敏从勘探开发研究院等地请来专家召开研讨会。专家论证认为，青海油田油气资源量保守估计为40亿吨。这个结论颠覆了之前关于青海油田油气资源含量不丰富之说。

根据《中国石油石化》的报道，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周永康听到此事后"很吃惊"，表示支持青海油田搞勘探。

不久，蒋洁敏提出"进行二次创业，实现三个翻番"的奋斗目标。即：到20世纪末，实现探明石油天然气地质储量4亿-5亿吨；油气年产量达到200万吨以上；生产经营扭亏为盈；职工收入有较大提高，简称"三个翻番"（储量、产量、效益翻番）。

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随后，蒋洁敏又提出"以气补油"，将资源开发重点从石油勘探转向天然气勘探开发，使青海成为中国第四大气田，并加强输气管道建设。这让青海油田人至今津津乐道。

蒋洁敏在此时展现出的工作作风让人称道。"他胆子大，工作作风强硬。"一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因此，他获得了一个绰号叫"蒋大胆"，青海油田也成为蒋证明其能力的一个舞台。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退休工人透露的一则往事，则展现了蒋洁敏当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998年，在蒋洁敏的极力主张下，青海油田在江苏宜兴丁蜀镇跟聂

某共同投资开办了一个塑材门窗厂。双方合同约定，青海油田投资4300万元，占股份的80%。聂某投资20%。该人士透露，聂某是蒋洁敏在胜利油田工作时一位领导的儿子，跟蒋洁敏颇为熟识。

但是20%的资金却迟迟没有到位。随后聂某又在浙江余杭独立开办一个金属型材厂，专门为这个门窗厂提供塑材。但是因为聂某每次提供残次品，致使塑材门窗厂经营困难，而青海油田方也不断更换经理，生产大受影响。

聂某的型材厂生意越做越红火，2007年10月，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塑材门窗厂宣告破产，所有的资产拍卖30万元。此事尚未得到青海油田方面的证实。

与薄熙来交集

1999年11月，蒋洁敏调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重组与上市筹备组组长。

一年之后，蒋洁敏再度回到青海，任青海省副省长。这一调动被媒体解读为上层的维护之举，让因为在重组过程中得罪人的蒋洁敏暂避风头。

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为了给蒋洁敏积累地方任职经验，从而获得更大的提升。

2001年，他负责青海省省政府常务工作，并且分管省政府办公厅。在青海省政府的任职经历，蒋洁敏本人在此后也绝少对媒体提及。跟蒋洁敏有过交往的多位政府人士和媒体人士以“此人现在太敏感”为由均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不过，薄熙来和蒋洁敏在此时产生交集。彼时薄熙来任辽宁省省长，而青海恰恰是辽宁省的对口帮扶省份。根据媒体报道，2002年10月8日，以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为代表的辽宁省党政代表团40多人到青海视察，他们开展交流和经贸洽谈，其中青海省常务副省长蒋洁敏全程陪同。

在这次访问中，辽宁省和青海省共达成经贸合作项目45个，项目总金额21.3亿元。项目涉及农牧业、商业等。薄熙来一行还在蒋洁敏的陪同下参观青海铝厂等多家企业。

无法确定这是否是薄熙来跟蒋洁敏交往的开始。但据不愿具名的中纪委人士透露，蒋洁敏确实与薄熙来存在利益关系，具体情节尚在调查

中。

此前不久，《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蒋洁敏与薄熙来亦多有交集，并通过在薄熙来的任职地兴建石油炼化项目等方式，帮助薄“提升政绩”。

同时“薄在辽宁省任省长时，蒋洁敏就推动中石油在辽宁扩建或兴建原有的石油炼化项目；薄后来去了重庆，蒋又如法炮制。”

但是随后有网友对此说法质疑称，薄在辽宁任职时，蒋洁敏在青海任职，“蒋洁敏在青海副省长位置就能指挥中石油到辽宁投资？”

不管蒋洁敏在地方上是否取得政绩，青海十年无疑是蒋洁敏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十年里，他横跨政企两界，既在青海油田取得了丰硕的企业业绩，又为此后擢升积累了地方政府工作经验。

不过在2007年11月，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此时蒋洁敏已经任职中石油总裁，中石油很快在重庆市长寿区投资近150亿元，建设一个具备生产成品油650万吨能力的炼油厂。2009年，中石油将这一炼油项目的产能提升至1000万吨级。

业内人士分析称，中石油在重庆的炼化项目，原油是从缅甸运来。与此对照，中石化则更多选择在南方沿海修建炼油厂，无疑更为经济。

拓展国际市场利弊

蒋洁敏是2004年再次回到中石油公司，任董事长和总裁职务。在蒋洁敏之前，陈耕执掌中石油虽仅有两年，但是在非洲、中亚、中东均有斩获，其中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超过40亿美元的股权，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收购案。

蒋洁敏延续了他前任的国际化战略，并且极力加快中石油走向国际的步伐，这对于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极为重要。

2007年8月，蒋洁敏主导中石油开始打造中国和土库曼斯坦近万公里的跨国输气管线。随后，蒋洁敏又代表中方和土方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康采恩关于扩大天然气合作的框架协议》。根据这份最新协议，土库曼斯坦每年将向中国出售4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多于此前约定的300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30年的天然气供应将进一步获得保障，而这将通过规划中的这条中亚天然气管线输送。

其时，中国石油及其控股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成为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的主力军，中标和签订的石油勘探开发项目（合同）分布在印尼、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秘鲁等多个国家。

按照计划，中石油集团将扩大现有海外勘探开发项目的生产规模，并加大新项目开发力度。但据知情人透露，蒋洁敏的落马，正是与他进行的海外收购有关。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一位曾在中石油工作的人士证实，中石油在加拿大等国收购的油气田项目，疑点颇多。“在那些地方，花几十亿美元收购的项目，之前说是资质良好，结果轮到中石油自己开采，才发现其实资源贫乏。海外还有专门的机构，专门做这种把贫矿包装成‘富矿’的‘以贫扮富’的生意，卖给中石油赚钱。”

一位业内人士向本刊透露，中石油在加拿大收购的是油砂矿，开发成本比较高，其“贫富”决定于国际油价的市场行情，油价高，则有利润空间，油价低则收益贫乏。

近年,中石油不断加大在中东地区的投资。但中东地区始终局势动荡、大国博弈频繁。中石油在中东的项目始终面临巨大风险，并屡遭诟病。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曾称，中国石油企业的国外并购多位于中东、非洲等政治敏感区域，这些区域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给海外投资带来了诸多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高风险项目能否为中石油带来高收益则存在很大的变数。

以中石油联合英国BP公司中标的伊拉克鲁迈拉油田项目为例，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扣除投资成本后每桶油酬金仅为2美元。从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耗时两年，才从伊拉克运回200万桶价值人民币12亿元的原油，投资回报率为10% - 15%。但这个看似不错的收益率，由于该项目有较大的风险，其实并不算高。

而2010年1月，中石油联合法国道达尔公司、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竞得的哈发亚油田项目，同样是服务合同，每桶油酬金更是低至1.40美元。

反观国内，中石油在一些合作项目中，则出现“反向”的疑点。中石油曾推行新政，将一些资源贫乏的油气田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发。“但在实

际操作中，却出现了之前明明说是‘贫油田’，结果卖给民企之后，人家采起来却原油滚滚的情况。”

上述知情人士称，这样的疑点项目，以位于陕甘宁地区的长庆油田最为典型。似可为佐证的是，8月底落马的中石油高管，就包括了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股份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2007年十七大期间，作为十七大代表的王道富曾对媒体公开介绍，长庆油田在“低渗透油井，单井产量非常低”的情况下，积极开采原油的“先进事迹”。

正当蒋洁敏主导中石油向国际进军时，中石油的股价不断攀升,成为全亚洲最赚钱的上市公司，并且“全球市值规模第一”。

但是随后中国A股市场权重接近1/4的中石油不断下跌，到2008年4月22日最低价15.35元，跌幅高达68.42%。

业内人士认为，这和失败的市场发行战略有关，蒋洁敏难逃其咎。

2008年，在辞去中石油总裁职位前夕，蒋洁敏公开面对媒体，他向遭受深度套牢的中小投资者道歉称“深感对不起大家”。但这并未影响到蒋洁敏仕途。

“天不亡蒋”？

在媒体的报道中，蒋洁敏好大喜功，并且善于夸大政绩来凸显成绩。

在大庆油田石油产量达到峰值逐年下降后，急需开发新油田的形势下，2005年，蒋洁敏视察大庆油田旗下的海拉尔油田时，提出“58553”的“宏伟”目标，即：用5年的时间，探明8亿吨储量，动用5亿吨储量，形成500万吨产能，年产量达到300万吨以上。

2008年，大庆油田先后动用近万人开展了“海拉尔大会战”，但据知情人透露，探明储量仅提交5亿吨，而且在提交的这些储量中大多为低品位、没有开采价值。截止2013年6月，海拉尔油田动用储量仅为1.9亿吨，建成产能仅为200万吨，且很多都是虚假产能，而年产油更是不到100万吨。

位于河北省的冀东油田同样充当了提升蒋洁敏政绩的角色。蒋洁敏到冀东油田多次考察之后，2007年冀东油田对外宣布，发现了规模储量达10亿吨的南堡油田。蒋洁敏估算“预期实际储量可达75亿桶”，并表示“未来五年内将投入400亿元。”

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当时只是在原有油层上面发现近百米的油层，但为了夸大政绩，蒋洁敏报喜说发现大油田，就上报高层，并开展大面积建设。

2010年有媒体报道称，钻井人员发现其储量小于预期，这片油田的储量被高估了。甚至“采储量仅为一开始宣传的1/5，甚至只有蒋洁敏预估的零头。”

这两个油田在媒体报道的喧嚣中逐步归于沉寂。

不断发生的安全事故，也让公众不断质疑蒋洁敏的管理能力。2010和2011年，仅在大连，中石油集团所属企业就连续发生“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10·24”火灾事故、“7·16”火灾事故、“8·29”爆炸火灾事故。

2011年11月，国务院认定这4起事故均为责任事故，给予蒋洁敏警告处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蒋洁敏事后“非常狂妄，得意忘形”以至于在一次饭局里，端起酒杯说，“天不亡蒋”，令在座者为之瞠目。

吊诡的是，几乎在国务院批复调查的同时，2011年11月22日，中石油大连新港储油罐区油品码头，又发生原油罐着火事件。

蒋洁敏也一直高调反腐倡廉，在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集团公司党组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的要求和部署，把推进反腐倡廉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取得了良好成效。要‘把惩防体系植于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之内、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之中’”。

但是最终，他依然被腐败击倒。

事实上，蒋洁敏被调查的传言已久。去年9月，蒋洁敏任中石油董事长时，曾有网友爆料他神秘失踪，蒋洁敏也确实有一个月左右未曾出现在公开场合。

今年3月18日，蒋洁敏辞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时，曾经一度传闻不断。

有传闻称，此前拟任国资委主任人选名单中并没有蒋洁敏，蒋的升官是得高人指点，并鼎力相助，也有分析认为是调虎离山。但这类传闻无法得到证实。

但更多的消息指中央是借调离蒋洁敏一职，来做中石油窝案的调查。据内地媒体报道，就在蒋洁敏出任国资委主任之际，国资委的一些公开邮箱塞满了各种各样关于蒋洁敏的举报信。

中组部在宣布蒋洁敏出任国资委主任的同时，也宣布张毅担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兼副主任。

这次任命让国资委系统人员曾感意外。自2003年国资委设立十年来，只在最初两年出现“双首长”制，当时李荣融为主任，李毅中为党委书记，2005年2月李毅中调任安监总局局长后，国资委的主任与党委书记一直由同一人担任。

值得注意的是，张毅在出任国资委党委书记之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而在那之前，张毅在纪检系统曾工作长达18年，被媒体称为 “老纪检”。其中，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其曾先后担任中央纪委秘书长，中央纪委副书记 、秘书长，中央纪委副书记。

一位“老纪检”，一位曾被警告处分的前高企高管搭班子，这样的安排，颇耐人寻味。

种种迹象显示了蒋洁敏仕途的凶险。中共十八大之后，蒋洁敏果然成为首位落马的正部级高官。此前诸多不利猜测终于得到印证，“天不亡蒋”的神话戛然而止。

三、“老虎”的各色沉浮

郭正钢沉浮录——“最年轻少将”和他的商贾妻子

记者 / 钟坚

中共中央纪委近年来多次强调，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等四类情况，郭正钢竟全部沾边，浙江省军区门口针对其妻的抗议也早已沸沸扬扬。这些都未能影响郭正钢的持续升迁：从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升任省军区副政委，并获少将军衔。如此“重病”仍能提拔，幕后运作过程令人不解且惊讶。郭妻明显不具备开发军地项目的实力与能力，却能手握军地，呼风唤雨，祸害民间，背后各种权力如何发挥作用，亦需厘清。

3月2日，中共军方权威部门对外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015年2月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当晚，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账号发文称：“天上掉下个郭正钢，释放啥信号你懂的”。文章以调侃的口吻说“郭正钢今天火了，比郭德纲还火。在被查之前，那可是‘坐着火箭往上飞’……今天郭正钢被查，绝对算得上是‘天上掉下个郭正钢’”。

能在大陆两会期间获官方媒体以“你懂的”相称，足见郭正钢案件的特殊性——此前一年，两会期间官方话语出现“你懂的”一词，指涉的是级别远远高于他的周永康案。作为前任中共军方高层主要领导之子，郭正钢的特殊身份显然引起了官方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大陆各社交平台上，郭正钢落马新闻的传播密度，也瞬间达到了与其少将级别不符的“刷屏”程度。

2014年3月15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成为中共军队反腐的高潮。此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多次就军队反腐严厉表态，并要求彻底肃清徐才厚案恶劣影响并吸取教训。此次郭正钢等一批军级以上干部落马，显示了中共军队反腐步伐并未停滞，反腐决心值得期待。

1970年出生的郭正钢在落马之前，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共最年轻的少将之一。郭以少将军衔公开出现是今年1月14日，其授衔应是在此之前不久。然而，2月即被立案侦查，可谓是任职“最短暂少

将”。

郭正钢如何“往上飞”，又如何“往下掉”，沉浮之路值得玩味。在中共持续、坚韧的高压反腐态势之下，郭正钢案所体现的军队权力泛滥、权钱交易、军队土地管理弊端等沉疴与潜规则，得以逐步暴露。

“掉下”的不仅仅是郭正钢，其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又名吴宥萱）也随之坠落。郭遭军事检察院带走，吴芳芳也告失联。在杭州，这位年近五十、其貌不扬的女子小有名气。从商20多年未有太大成就，却在不惑之年，从平民门第突入郭氏豪门。这桩奇特的婚姻之后，开着军车、升格为少将夫人的吴芳芳在郭氏权力庇护之下，军产生意越做越大，染指项目越来越多。

无奈吴芳芳实非能够操盘如此规模项目的人才。尽管在军区拿地如探囊取物，其老旧的“圈钱”式开发手段却以不断失败而告终。最终成了至今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以至于2013年以来，在吴芳芳军产项目中被骗、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们多次在浙江省军区门前聚集、抗议，甚至高呼“郭正钢还钱！”。

中共现役高级军官的妻子在其丈夫所属单位土地上开发商业项目，并引发群众上门讨债、抗议，显然与军队应有形象严重不符，亦与郭正钢的军人身份和职责严重不符。

中共中央纪委近年来多次强调，要把十八大后还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四类党员干部作为重点查处对象。郭正钢竟疑似违反上述全部四条。尽管尚无官方信息显示郭正钢落马与其妻的生意关系有多大，以及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违法、违纪情节，但就《凤凰周刊》记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其与商人妻子的“往下掉”，已经不算意外。

但郭正钢案为何拖延至今，仍有诸多令人费解之处。尽管与中共高层的要求全部违背，省军区门口的抗议也早已沸沸扬扬，郭正钢仍能在近年来稳坐钓鱼台，持续升迁，最终官至省军区副职，少将军衔，其考核与提拔过程，令人惊讶。郭妻明显不具备开发军地项目的实力与能力，却能拿军地呼风唤雨，祸害民间，背后各种权力如何运作，如何发挥作用，亦待揭开面纱。

落马前曾被短期调查

2月11日晚7时，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召集各

常委开会。会议时间极短，仅约半小时，议程也只有一项，追加许可最高军事检察院向浙江省人大报送的《关于提请许可对省人大代表郭正钢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书》。

浙江省人大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2月10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就接到了军方提请对郭正钢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人大主任会议当即许可了军方报请的这一事项。10日下午4时，在西湖边浙江省军区大院郭正钢的办公室，“军事检察院的人向他出示了法律文书，让他换上便装、戴上口罩，将其带走。”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称。

有消息源透露，郭被带走当日，军事检察院人员连夜搜查了上城区清波门省军区家属院内郭正钢的家。

郭正钢是浙江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在去年年末的军队人事调整中，由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转任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成为大陆为数不多的“70后”将军之一。

“部队办案先期都有调查，取得证据，掌握了部分材料后再抓人。”文职三级、军队著名作家石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从目前情况看，郭正钢涉嫌违法的证据不能说已全部落实了，但应大致已有方向，还需要通过找他本人来深入侦讯。

知情人士向《凤凰周刊》披露称，郭被带走几天后，郭的司机也被带去协助调查。办案人员正告他，对郭正钢的监视已有5、6个月了，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检方还询问郭的司机，郭有无转移资产之类。

多位浙江军界人士亦证实军事检察院工作人员曾长时间驻点浙江，但有人以为这跟浙江当地军地纠纷和老干部上访有关，很少有人与郭正钢产生联想。更早的去年7月，郭正钢夫妇传闻被纪委人员带走协助调查，此传闻在海外传得沸沸扬扬。

去年7月中旬，本港媒体《明报》报道，郭正钢夫妇因涉及相关案件已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此后8月初的浙江省内一个公开活动上，郭正钢以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再次出现，消解了外界的疑惑。不过，多个军内外消息源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郭氏夫妇去年7月前后确实被军纪委人员找去问话，短期调查后返回。

吴芳芳在去年与商界朋友的一次聚会上，还主动向大家解释了被问话的内情。知情人透露，吴称是因为上头调查夫家送给其子出生百日的礼物——一张银行卡。吴脸上挂着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她的朋友们，“那张卡上不过二十来万元钱，都被她用于在杭州江干区四季青面料

市场的装修投资上了。”这一细节尚无更多信息源证实。

看上去，郭正钢的政治仕途仍然很顺利，甚至有了新的变化。郭最近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是2015年1月14日，浙江当地媒体在报道浙江省军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时，郭正钢佩戴少将军衔亮相，职务也由原来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改任副政委。但了解郭的人则发现，电视画面上的郭少将形容憔悴，不复有以往神采。

资质平庸、进步飞快

对郭的新职务军衔，大陆媒体多有解读。不解内情的部分人士认为，这是郭正钢年少得志，擢升少将，委以重用。事实上，按大陆军官任职条例，副军职的大校在满规定年限后，晋升为少将是常规动作。郭2010年晋升大校，去年“八一”前后，已满任职年限。

不过，有熟悉军内人事的知情人表示，郭正钢被授予少将军衔及其职务调整仍有令人费解之处，从理论上讲，由政治部主任转任省军区副政委也是提拔。早已发现问题，为何还“带病授衔”、“带病提拔”？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郭正钢由部队的部门主官转任省军区的副政委，表面上似予以重任，但实际上属于转任闲职，或为后期的查处做铺垫。在易职副政委后不出三月，郭正钢便被军事检察院正式拘捕。

郭少将2月被军事检察院带走后，陆媒波澜不惊，系事出有因。按大陆省级人大的议事规则，司法机关对涉嫌违法的人大代表采取拘捕等强制措施，要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常委会许可的决议通报一般须见报。上述浙江省人大官员称，郭正钢事涉“政治敏感性”，人大最终决定不予见报公告。

不过在更早的一段时间里，在兰州军区所辖的47军成长的郭正钢并不为多数人所知。47军是郭父的老部队，让自己的子女在前辈工作过的地方经受锻炼在大陆军界似乎不难理解。郭正钢起初在47军通讯团下属分队担任指导员，成为野战军部队一名基层政工干部。

郭正钢的一位昔日同僚称，郭正钢走路很有特点，“两个膀子左摇右晃，像个‘甩子’似的。”

“在团里的时候，郭父一开始不管他，任其自己发展。”郭正钢老部队的一位领导告诉《凤凰周刊》，身为政工军官的郭正钢在这方面能力一般，讲课、备课等水平很是普通，“没有他父亲，小郭是上不到现在位置的。”上述领导评论说。

在团里待了没几年，一纸调令，将郭从部队基层调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机关任职，“郭那时分管总后院校的招生工作，是个闲职。”海外舆论曾有反映，郭正钢在总后任职经常不上班。在北京总部机关任职期间，郭正钢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有知情人介绍，郭的前妻是总参通讯总站的干部，浙江杭州人，郭与前妻育有一女。

2007年，37岁的郭正钢从总后空降到浙江省军区任职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全军最年轻的正师职干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后，中共军队破格提拔了一大批经历过战争锻炼的年轻的优秀师、团职干部，此后便无先例。

从基层到总部，再从总部下放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军区“锻炼”，在军内拥有充分资源的郭正钢已走上快速擢升之路。

无名女商人“一夜暴富”

郭正钢空降浙江那年，年届不惑的杭州淳安女商人吴芳芳遇到她生意场上的最大抉择。

杭州城市东扩后，2007年六七月份，位于杭州下沙九堡地块的浙江省军区农副业基地土地对外招租。“这是部队土地第一次投标，四块地，500多亩，”当年参与军地招投标的杭州银沙实业总经理周正华回忆，5个标的土地共有20多家投标企业参加，军方还成立竞标小组，实行暗标形式，“最后中标的几家企业凭着实力和自己的报价单争取到这块地。”

“中标企业需交纳3000万元保证金，听说吴当时手头只有1000万。”吴没什么钱，正为几千万的保证金着急，一位投资户透露，吴芳芳想法取得一块地的租赁权，后来向绍兴柯桥的三个老板借了3000多万元，从其他企业转手获得了另一块军用地，“很高的利息借的，现在还在还着本息。”

温州商人李锡藻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吴芳芳拿下下沙的军用土地后，建第一个市场项目的时候，还向他借了250万元。李后来几次向她索要，“她总是信誓旦旦地承诺，明天给，后天还，但明日复明日，结果不了了之。”这以后，李锡藻就没法再找到她。

在商贾大腕云集的浙江，小商人吴芳芳实属籍籍无名之辈。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经商，尽管折腾过很多行业，但与她相熟的一个朋友感觉她“好像也没赚到什么大钱”。不过，有人却称她有一定魅力，公关社交能力出众，能让很多圈内人围着她转，“这个女人胆子比男人还大。”

吴芳芳拿下下沙军用土地过程中是否有权力的影子作祟，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一介小商人在并无资本实力情况下，几乎以空手道手法获取偌大的军产项目，虽宣称经过公开招拍挂程序，但其结果确实令人惊诧。

与吴芳芳有过合作的杭州某集团俞总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吴芳芳曾与某集团合作开发湖北天门义乌小商品城。吴出任湖北天门义乌小商品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没有股份，只是让她帮助市场招商。”俞称，吴经商之术，似乎乏善可陈。

湖北天门的小商品城的招商，吴芳芳采用“售后返租”那一套，以最高8%的年回报率吸引客商，“当初弄得轰轰烈烈，结果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俞总抱怨说，对招进来的商户，如此高的回报率公司根本无法兑现，市场不久就瘫痪掉了，吴留下的烂摊子，公司最近才刚收拾好。

同吴芳芳有过商业合作的人，对她的评价不高。吴芳芳的朋友、曾经打算参与接盘的一位杭州商人在分析吴芳芳几番操盘失败的原因时说，“她做大项目都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给出的回报率奇高，与租金不成比例。”

吴芳芳在2007年介入下沙军用土地开发后，她的事业似乎大开大阖起来，前期顺利的招商，吸引了大量中小业主的投资款，吴芳芳也一夜之间从一个普通小商人成为身家亿万的女浙商。

因为租用军产搞开发，吴芳芳开始频频接触军界人士。彼时，吴芳芳是一个有夫之妇。吴芳芳的前夫是杭州司法系统的一名资深法官，两人是高复班的同学，“在班里就谈上了恋爱，”熟悉吴过去经历的一位人士介绍说，吴芳芳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其前夫考了几次终于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淳安县法院。

上世纪90年代初，吴芳芳和前夫结婚，吴招工分配在桐庐县分水镇医院，她前夫在淳安。两地分居的吴一度想调到淳安千岛湖老家，几经努力，事情有了眉目，但最后功败垂成，“淳安这边医院要她，但分水那边却不放。”上述人士说，吴一气之下下海创业。

吴芳芳第一次尝试经商，“由一个杭州人带着做柴油生意，那时我看到过的。”朋村村民吴亮（化名）说，吴做柴油生意的时候，赚了一点小钱。后来到淳安县城中心的排岭开了一家饭店，但又亏了钱，就不开了。

“公子哥式任性”

吴芳芳搞军产开发之初，和郭正钢并无交集。“那个时候，两人不认识。”但吴芳芳与前夫的感情这时出现了问题，“以前去吴芳芳滨江的家里，都碰不到吴，从大儿子生出后，两个人就不住在一起。”吴的一位干亲说，她一星期都不回去一次，有时甚至更长时间，难得会在家里找到吴芳芳，“那时她大概在外面跑生意”。

与前夫若即若离间，吴芳芳似乎另有一段短暂的感情。吴军产项目建设方的一位项目经理称，对方是一位20多岁的富阳小伙，给吴芳芳开车。这位何姓小伙后来成为吴芳芳公司的副经理。吴芳芳起初几乎与何谈婚论嫁，但在结识权势更大的郭正钢后，两人遂闹分手。那小伙狮子大开口，要吴给他一部车子，600万元，再在杭州富阳当地造一幢别墅，“这个事情是事实，在工地上的人都知道。”该项目经理称，此时吴手里正好有大量的投资款，吴基本满足了他，小伙的别墅还是吴让项目方的一个老板去给建的。

2011年11月初，吴芳芳与结婚21年的前夫离婚。“吴芳芳的离婚是因为认识后面一个老公还是其他原因，我也搞不清楚，”接近吴芳芳的一位身边人分析，也可能是吴芳芳做生意牵涉到向部队租地皮什么的，他们两个才开始熟悉起来的，没有人能知道他们间的秘密。

接近吴芳芳圈子的一位商人说，吴芳芳能吹胡侃，善于交际应酬，作风豪放。已近天命之年还常穿红色高跟鞋、超短裙和低胸上衣。

这一年的郭正钢正在舟山警备区代职，当警备区政委。在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任上蛰伏4年后，郭由政治部副主任转任警备区政委。虽同为正师级，但后者是带兵部队。让郭赴基层代职，其再次提拨意味已十分浓厚。

郭正钢代职过的舟山警备区一些官兵，对其印象却非常一般。“以前警备区机关干部拿文件找郭，都找不到他的人，”该警备区一位要求匿名的军官称，郭正钢任警备区政委时，基本不到下面的团里去。

已是正师大校领导职务的郭正钢常会表现出“公子哥式任性”，其办公室案头的文件常堆积像座小山，一些非他参加不可的重要会议，他到场后一言不发，轮到他说话时，他照本宣科念完稿后，有时会突然甩手离去，令其他人很是难堪。

这些都丝毫不影响郭的政治仕途。2011年底，郭正钢到舟山警备区代职已满一年，他接到去国防大学进修的通知，这通常是大校军官擢升前的信号。2012年对郭正钢来说更是发展关键的一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2岁的郭正钢在完成最高军事学府的例常进修后，会收到副军职

晋级命令，一步跨入副军少将序列。

奇特的婚姻

2012年或者更早时候，离婚后已单身的吴芳芳与郭正钢开始了一些实质性接触，“就是从租用军队的地开始的，本来吴这样的人，接触不到郭正钢的。”知道郭吴婚姻的一位人士称，不算有钱的吴芳芳与仕途正旺的郭正钢最后竟会以婚姻的形式走到一起，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吴芳芳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老家在离杭州500里外的杭州淳安县威坪镇黄金村，这是千岛湖水库形成后典型的库区村，由湖山、朋村、黄金里三个自然村合并，人口748人。吴家住在朋村，与中国大陆的其他农村一样，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很少见到年轻人。《凤凰周刊》记者去探访朋村时，一位村干部证实，吴芳芳从小在朋村长大，与其老母方水英相依为命。据吴家一位邻居介绍，他儿子与吴芳芳同岁，出生于1967年。而在大陆媒体《财经》杂志报道中，吴芳芳的出生时间为“1969年4月”。目前，尚无法获知吴的准确年龄信息。

有朋村人介绍，吴母方水英早年从淳安县二都那边嫁到朋村。吴芳芳的父亲叫吴开四，是地道的朋村村民。吴开四的一位昔日好友说，吴开四在家排行老四，年轻时当过几年海军，复员后被安置在邻县桐庐分水镇马刀厂当电工。因为丈夫是吃工资的城镇居民，在生产队时期的方水英，地头农活相对朋村其他村民干得少些。

吴开四一子一女，但幼子早年不幸溺亡，因此吴开四对女儿吴芳芳很宠爱。吴开四50多岁患肝癌去世。方水英后来又在当地找了个长她几岁的退休老师作伴，但前几年，吴芳芳的继父也因病去世。

吴芳芳户口幼时随父转为城镇户口，也在分水镇。朋村很多年长的村民都记得吴开四家的女儿读高中前的模样，“个子小小的，进出不太做声。”成年后的吴芳芳多数时间都在父亲身边，村里人了解得不多。

不过吴的再婚却在面积不大的朋村一时引起轰动，“听说她老公是军队的一个高级干部，公公是原中央的一个大领导。”因吴一直在外打拼，村人不知道吴芳芳再婚的时间，但水英家的女儿二婚嫁了个高官，却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是小山村朋村建村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事。

关于郭吴结合的内情，似乎也没外人想的那么顺利和风光，其间甚至经历了一番波折。某知情人士提供的说法称，郭吴在一次应酬后开房，“40多岁的吴怀孕后，吴一度带着她的老娘挺着个大肚子跑去省军区郭的办公室，要求对方给个说法。”而这时据说郭和前妻还没离婚。上

述隐秘细节外界难以得知，未获更多证实。亦有其他说法称准确性待考。

郭的这一绯闻发生后，在军内小范围内传播，但很快得到有力的遏制。郭正钢此时正完成国防大学进修，等待晋级上升的关口，负面舆论的扩大或许不利于郭的仕途，事情最终以郭的前妻离婚退场结束。

2012年12月21日，郭正钢和吴芳芳顺利办理结婚登记。

不受影响的升迁

2013年正月初三，高龄产妇吴芳芳为郭家添了一个男丁。“生了儿子的吴芳芳看起来很高兴，逢村民就打招呼，”朋村一位村民看到，吴芳芳夫妇和老母亲方水英春节期间回村里，“夫妇两人肩并肩走着，吴芳芳的老公长得还算高，穿着便装，脸上没什么笑容。”

与郭正钢结婚后，吴家特意翻建了老宅，一座外墙为乳黄色的二层小洋楼，装潢极其考究。新房子装修好后，吴家照例还住在杭州，平时房子由吴芳芳大伯家的儿子照看。

除了老宅翻建和春节、清明几个大节，平时吴芳芳基本不回老家。

这年春节前后，郭正钢大校顺利接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一职，晋身副军职，成为全军最年轻的“70后”副军职干部。2013年4月，郭正钢以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浙江省的一个公开会议上首次亮相。

似郭正钢这一级别的高级军官，经历如此婚姻风波仍安然高升的情况，并不多见。退役高级军官杨培田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军队高官婚姻出情况影响升迁，历史上有过几个案例。上世纪50年代浙江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原来的老婆形象一般，他看上了医院的护士，想跟后者结婚。此事汇报到中央军委，周恩来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但最后他不听劝告，非要与年轻的护士结婚。结婚后他官降一级，撤销少将军衔。

后来安徽省军区也有过这样的案例，当事人被连降2级。“从婚姻法角度说，婚姻自由，军队高级干部要跟领导汇报离异或结婚等家庭情况，但没有特殊情况组织上不会干涉。”杨说，只有是公众人物，男的职级比较高，社会影响搞的很大，组织上才会做一些劝说工作。

“郭有其特殊的背景，这些都不算什么，至于他的前途，很多人也会自动帮他安排好。”郭过去部队的一个领导慨叹，普通军官拼命干，熬个3、5年，动一下职务就差不多了，但郭正钢这类人不在这个起跑线

上，“他们一下到浙江，一下调北京，去哪里，都不用自己费心，因为背景放在那儿。郭的上级也明白，把他提拔上去了，给领导一个好印象，自己也有机会。”

担任省军区要职的郭正钢工作上仍然不上心，与他共事过的下属反映，郭能力平庸，且不喜理政事，“周六、周日从不加班工作，谁都别想找到他。再重要的事，他也不会理的，后来索性大家都不找他了。”

吴与郭的婚姻即使是在郭正钢的同事、下属及领导眼里，也并不被看好。在同事眼中，当年郭吴结合，一则或许迫不得已，二是郭可能以为吴有不菲的身价。吴芳芳是房产商且开发军地的事，在省军区政治部及省军区领导层亦早为人知。但一些普通官兵可能不尽了解。而从2012年瑞纺市场投资户维权开始，郭的家丑渐为人知。瑞纺市场的投资户因项目烂尾，商铺无法交付使用，之前承诺的返租无法兑现，投资客建立了维权QQ群，穿了特制衣物在市场和城市的要道聚集维权。2013年，中央某驻浙新闻媒体有记者调查瑞纺投资户聚众事件，吴芳芳亲自赶往该新闻机构软磨硬泡，有关机构的领导也打电话给该媒体压发稿件，最终得遂。但瑞纺之后的中国五金装饰城投资户却推动更大一波的维权浪潮，投资户们每逢周末或约定的时间便聚集在省军区门口，要求退租还钱。

杭州西湖断桥和南山路军区门口，成为维权者们经常碰面的常见地，从省内外赶来的投资户们聚集最多时有三百人之众，投资户们高喊吴郭归还血汗钱的口号，有时队伍从西湖边一路叫到省政府门口，引来国内外游客的疑惑和关注。每逢得悉投资户维权消息，浙江省军区门口必定如临大敌，各类障碍物层层架起。投资户有时分兵堵住军区大门和侧门，连连呼喊郭吴“还我血汗钱”，直至被警察驱散。

数百市场投资户车轮战式的维权，使得郭正钢的家事几乎路人皆知。吴芳芳所开发项目将郭正钢拉进漩涡。尽管如此，在维权的投资户们看来，丑闻并未影响郭的职务升迁。2015年1月14日，郭正钢现身浙江省军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时，已佩戴少将军衔，职务也由原来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改任省军区副政委。

少将夫人的生意

郭正钢儿子出生百天的时候，按照民间习俗，郭家在杭州摆了一个庆生宴。“一共三桌酒席，二十来个人。”吴芳芳在杭州的一位家族干亲被通知出席，这位干亲的老婆在替吴带小孩，代表吴家族出席的只有他们夫妻俩，吴芳芳在朋村还有亲大伯的几个堂兄妹，吴都没叫他们。“来

的都是很大的官，有部队和省里的领导。”吴的这位干亲说，他们领导间相互介绍，“看到我这个平民百姓，也很客气。”

即便为郭家族生了孙子，平民人家子女的吴芳芳，在郭家地位也很尴尬。原兰州军区47军的一位军官称，吴的婆婆还认郭的前妻，吴芳芳也不往北京去。有说法称，大陆一位商界人士曾专程去西安登门拜访郭正钢的长辈，言谈中“提及吴芳芳的名字”，对方勃然变色，从凳子上腾地站起，连声大叫道，“我们家没有这个人。”

2013年以后，嫁入豪门的吴芳芳搬进西湖边吴山广场附近一处军队家属大院，这一带的住宅楼每平方米均价在5万元以上，所住居民非富即贵。吴身份非往日可比，她深居简出，出入座驾也由原来的红色奔驰换成一辆凌志军牌越野车。

开着军车、已成为少将夫人的吴芳芳在生意场谈判桌上的筹码自然不同。2012年开始，几个军地项目经营不利后，吴芳芳想介入杭州城区四季青面料市场的承包管理，这是一个发展近20年成熟的黄金市场。因为广大业主强烈抗议抵制，2013年1月，出于维稳和对吴公司实力的考虑，江干区政府明确出公告四季青面料市场停止与吴公司的合作关系，中止一切合同。

然而，2013年11月，在一片反对声中，吴芳芳又突然宣布正式入驻四季青，一口吞下这块她觊觎已久的“肥肉”。

当地媒体报道，吴芳芳承包接管后新市场方迅速开出价码：把四季青面料市场摊位的租金从原来的18000元每年增加到75000-82000元每年，增幅高达465%，付款方式从原来的一年一付改为五年一付，每个摊位一次性至少要缴40万元左右。

“我当年也想要四季青这个市场，找了很多关系，但还是让吴芳芳拿走了。”吴芳芳的一位竞争者说，毫无疑问，凭吴芳芳的实力和个人影响力，绝没可能拿到这个项目。

在杭州下沙，吴芳芳除了现有的两个军产项目外，中国五金装饰城的东面、江干区德胜东路2539号还有一块吴租得的土地，同属军用地。《凤凰周刊》记者现场看到，高架桥右侧、闽浙汽配城边上的这块空地目前仍是一片荒芜，平地上只建了一座小办公楼，空地估计有上百亩。“吴芳芳原来打算建汽配城，但后面资金跟不上搁下来了。”有知情人士称，这块地后面吴芳芳怎么取得，他并不知情。

该知情人称，在下沙武警农场与军区乔司农场之间的位置，吴有一

块十余亩的军用地；另外在军区湘湖农场，吴还租了块土地与人合作搞物流。这些信息尚无法从军方获得证实。

吴芳芳甚至将手伸向浙江以外的部队军产经营管理上。2011年5月，她一度染指苏州驻军部队的几幢酒楼的餐饮承包经营，但不到一年，吴芳芳退出并转租他人。去年4月，吴芳芳被当地驻军告到苏州法院，法院依法判吴支付租金、违约金等费用共计近400万元。

北京大领导打来的电话

以往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吴芳芳一直用着其父取的本名，而在2012年12月，与郭正钢结婚后，往来的商务文件和合同签名上，吴芳芳三个字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名字“吴宥萱”。

与现任丈夫结婚登记时，吴芳芳就用了吴宥萱的新名。吴芳芳改名的情况，连她在同城生活的前夫也并不知情，《凤凰周刊》记者2月上旬电话联系吴芳芳的前夫时，对方对吴宥萱的名字大感诧异，这表明至少在2011年4月，前夫与其离婚时，吴芳芳还用着本名。

吴芳芳与郭正钢结婚后，其担任董事长的杭州瑞纺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法人的名字亦变更为“吴宥萱”。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更名时间在2013年3月29日。

跟吴芳芳相熟多年的一位浙江商人透露，吴芳芳平素极为迷信，花重金请了台湾和内地的多位风水先生，商业开发、土木建设、生活琐事动辄问计风水师。在建造几个市场时，吴曾叫人半夜在市场多处放置了很多辟邪物，以祈福安。

今年1月的一次饭局上，吴芳芳主动向同桌的朋友说起自己改名吴宥萱的缘由。吴说自己当初嫁入豪门时，专门请浙江天台的一位风水大师重新测字算卦，大师替其改了现在这个名字。吴还称，自己和现任丈夫生的幼子的名字“郭某一”，也是拜这位风水大师所赐。

吴前几年专门请了风水师同郭正钢一道赴陕西礼泉县郭的老家，到郭的祖宅坟地等处看风水作法，测字卜凶。吴还请该风水师为夫家的一位老爷子问了旦夕祸福。大师给吴芳芳口里说的“老爷子”测字的结果是：老爷子吉人天相，没事。

吴芳芳的几个军产经营项目却并不吉利，开始问题成堆，2013年开始，吴的军产项目——杭州市郊下沙九堡几处市场因大规模拖欠投资户返租、材料商建筑商工程款、合作伙伴的投资款等，相继爆发群访群诉

事件。

郭吴结婚后原来住在西湖边清波门的军队家属院，但不久便搬走了。“可能是怕债主知道家里地址，”知情人士称，两人在吴山通宝城后面租了个房子住着，其间又换了一次住址，搬出去一阵子后，随后又搬回家属院。郭吴搬回来后，他家周边的院墙上都安插上了碎玻璃，附近也装了铁门，说是为了整个家属区的安全，“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弄过。”

投诉举报累加后，吴芳芳手头的几个军产开发项目的获得程序也被重新检视。有消息源称，2014年前后，总后先后派出两拨人马到浙江省军区进行专门调查，“吴的项目现在听说有问题”，浙江省军区一位退职副司令告诉《凤凰周刊》。他称，具体情况不便细说，建议找军方了解。

2014年年末，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傅怡少将在退职一年后被带走，“先是南京找他谈话，后来才进去。”傅的一位战友告诉《凤凰周刊》，去年他侧面跟傅提过醒，“现在上下反腐倡廉抓的比较紧，但愿大家都没事，万一有事，还是主动点好。”他说傅现在只是协助调查，是否跟吴芳芳的军产项目有关，或其他别的事，还不清楚。目前，大陆官方渠道尚无法证实傅怡被带走协助调查。

去年11月，中央巡视组巡视浙江，投资客们排队上访。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吉林在随后回馈浙江方面时表示，浙江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问题反映集中，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

中央巡视组将相关反映批转军方，《凤凰周刊》记者获知，在南京军区的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点名通报了浙江省军区某农场军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专门就此指示，以后军区一些部队将逐渐从生产经营中转型，但对过去已经存在的问题，也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处理好。

作为高官家属，军方责令吴芳芳零资产退出军产经营。

根据大陆2004年2月18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之后2010年2月24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得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等。

多重压力之下，吴及郭家人或许也急于将烂摊子转手他人，此前她与浙江一家民企频密接触，但多次磋商未果。多位消息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去年6、7月间，接盘方企业董事长声称，意外地接到北京一位军界大领导的电话，这位领导他以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电话里对方让他帮忙接盘。

来自北京的电话看来最终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2月10日是吴芳芳承诺给建筑商偿还部分工程款的最后日子，“因为民工等着领钱回家过年，”浙江某建筑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说，当天上午，他等来的消息是吴芳芳老公被抓了，吴本人也联系不上。

在朋村，吴芳芳也算光宗耀祖了一阵，“可惜她好景不长！”知道吴芳芳近况的朋村一位村干部摇头叹息，吴要是不折腾，不嫁给高官老公，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副处级亿元贪官是如何炼成的？——马超群覆灭记

记者 / 郭天力

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包括北京二环附近住房7套）……马超群，这位被提拔为副处级仅仅两年时间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研员、北戴河区自来水总公司总经理，迅速“走红”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自称高官之子、家藏巨额财富、动辄威胁上级、言行乖张暴戾，马超群一案聚集了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元素。在其就任北戴河区自来水“老大”的17年里，他的权力意志随着自来水管道延伸。如果不是开罪有着深厚背景的国企开发商，马超群的自来水帝国或许至今巍然屹立。

连日来，20多家媒体活跃在秦皇岛政商各界，勾画出马超群一家的多张鲜活面孔，和这个家庭在秦皇岛留下的片片印痕。

《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马超群成为“小官巨腐”的典型，既有一般性，更有特殊性。级别不高，权力不大，马超群的“自来水王国”何以能在北戴河区乃至整个秦皇岛市、甚至是河北省纵横捭阖，无人能敌，其间关系因果，实际上远比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琳琅满目的财产更值得侧目和探究。

特警的枪托

2014年11月12日，新华社河北分社播发了一条常规稿件，文中称，河北省某科级官员家中查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和68套房产手续。这个未点名的报道迅速引发了媒体关注，当晚，此科级官员即马超群的信息被披露。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马超群已被抓捕。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三，海滨小城秦皇岛的节庆未尽。当晚，公安、纪检、检察、特警等各路人马向北戴河自来水总公司围拢。

一位秦皇岛特警告诉记者，此次抓捕他并不知情，参与围捕的可能是外地警力，以防起用本地警员走漏风声。“可见这次抓捕的级别之高，和被捕人员的特殊。”这位人士称，在秦皇岛，乃至在河北省抓捕贪官的历史上，这样的抓捕规模，堪称罕见。

北戴河自来水公司位于区政府大楼西部，穿过一条100多米的通道，便到了公司自动伸缩的大门口。这道大门平日紧闭，2月12日晚

上，面对大队警察，门卫来不及请示领导，赶紧开启了大门。

这家公司的员工告诉《凤凰周刊》，马超群在公司大院内盖了个二层楼，当做他的宿舍，周末回秦皇岛市区。2月12日晚间9时许，警员敲开了马超群的房门，向其出示了司法文书，面对一屋子荷枪实弹的特警和公安，马超群撕烂了司法文书。

有大陆媒体称，马超群撕文书时特警用枪托打了他的头，马超群的母亲张桂英曾告诉媒体，此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大哭说：妈啊，我被公安抓了”，马超群被控制后，何以仍能打电话，秦皇岛市有关部门并无解释。

除了马超群，调查人员同时突查了其弟马重群的养鱼场。马重群与前妻孟秋红离婚，但仍住在一起。孟秋红回忆，当晚，张桂英给马重群打了个电话，马重群出门时被守候在屋外的持枪特警控制，随后，大批调查人员进屋搜查，将“用于支付渔场工人工资的数万元现金”，和马重群一并带走。

孟秋红立即通知张桂英，张桂英决定当晚转移财产。“这么多钱放在家里，怕说不清。”张桂英叫来女儿马青茹和外孙，用两辆车将40多箱钱从位于开发区的专家公寓别墅搬到另外一处住处。她说，女儿和外孙都不知道拉的东西是钱。

一夜之间，张桂英引以为傲的两个儿子，都失去了自由。

财产罗生门

“马家的巨款，并非办案人员第一时间发现，而是时隔数日之后找到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大量的钱放在一个小房间内。当公安和检察院人士发现牛皮纸和水果箱子内装的全是百元大钞后，“所有的人都有种进入银行金库的感觉。”

当时负责清点欠款数额的某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媒体，巨额现金的清点累坏了办案人和点钞机。现场堆积的大量现金，有的因为长时间未动，已发霉长毛。

张桂英解释在家中放置巨额现金而不存入银行，是方便随时借给别人赚取高额利息，但发霉长毛的钱款，并不支持张桂英的讲述。

张桂英11月13日向媒体发布信息称，从马家抄出的巨额财物，均系其去世两年的丈夫马炳忠赚来的，跟两个儿子并无关系。在张桂英的描述中，马炳忠很能折腾，经营范围横跨医疗、房地产、矿山等行业，曾

入股唐山一个铁矿，分红拿到了6000万元。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购置房产。马炳忠还曾在村子里购买宅院，在城市拆迁中获得巨额收益。

但这位71岁老人的澄清之辞充满矛盾和未知，不仅没有扭转舆论局面，反而将马超群一家拖入更大的舆论质疑中。秦皇岛检方明确表态：从马超群家抄出的巨额财产，跟马炳忠没有一分钱关系。

几乎就在张桂英向媒体记者“澄清事实”的同时，13日晚间新华社发布消息说，马超群的巨额财产，系勒索而来。

“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秦皇岛一位干部称，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在北戴河的一些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通水管，他都去索要钱财。

在北戴河北部的崔各庄村，马超群有一栋占地十几亩的别墅。一位知情者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该别墅系马超群以关系半价购入地皮，再让有通水需求的企业建设，一分钱没花，别墅就建了起来。

该知情人士称，马超群的部分房产，与北戴河的房地产开发不无关系。“房产项目建好后要通水，开发商得给马超群若干套房子，否则不给通。”

日前，记者走访其位于秦皇岛市和平里一处建筑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别墅时，其邻居告诉记者，马超群是十几年前购入此处房产，但并未装修入住，直到去年才带着工程队前来装修。据此推算，马超群当时担任北戴河自来水公司经理一职时间不久。

马炳忠的前同事王先生告诉《凤凰周刊》，“马家房子众多，来源正当的恐怕没几个。”

马家的68套住房，来源复杂，各方各执一词。秦皇岛检方以案件正在侦办为由未向媒体透露其房产具体来源。

自来水“土皇帝”

1985年，18岁的马超群参加工作，进入当时的秦皇岛市公用事业局。有一段时间，他的工作类似于现在的城管队员，负责维持市场秩序。“他经常到市场上勒索商户。一个肉贩因为不想白给他肉，两人发生冲突，打了一架。但马超群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调到了效益更好的自来水公司。这是一个人人艳羡的工作机会。”一位知情人士回忆。

秦皇岛市首创水务（原秦皇岛市自来水总公司）一位资深员工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1997年，北戴河分公司的经理调任市自来水总公司担任副总，原职位空缺。“当时，总公司很多中层干部都想调任北戴河，但是当马超群表达任职意向后，其他人都乖乖退出——不敢，也不想和他竞争。”

有熟悉他这一段经历的人士介绍，马最初的职务是行政科科员，很快被提拔为行政科科长。“他文化水平不高，脾气又暴躁，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提拔他。”这位人士告诉记者，马超群进入相对独立的北戴河区自来水分公司后，“经常没有任何来由，就上前搜人家钱包，把钱包里的百元大钞全部拿走，然后笑嘻嘻地说：就当你请我吃饭。被搜身的人无可奈何。”北戴河区自来水公司多位职工证实，马超群脾气特别差，经常一言不合就打职工耳光。

“马超群特别贪财。他有一个表侄女大学毕业后让其帮忙找工作，他还向这位亲戚要了5万元好处费，把那位亲戚气懵了。”谈及对马超群的印象，该公司退休职工杨之元（化名）摇着头说：“非常非常差！”他向记者介绍，马超群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听过：我打击报复人不会过夜。如果有人得罪他，他的报复绝不拖到第二天。

一位马超群曾经的员工举例称：马超群曾与一位Z姓副总经理产生矛盾，强行令此人提前退休，办理退休第二天，Z姓副总经理想回公司办点事，竟被门卫拦在门外：“马总不让你进来，说你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不能再进公司。”

尽管马超群口碑差，但他在自来水系统的地位却越来越稳固。此后，他将弟弟马重群、妻子张丽焕全部调入秦皇岛自来水系统。其中，马重群1999年进入山海关自来水分公司担任经理，其妻担任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会计。“秦皇岛自来水公司快成马超群的私企了，想安排谁就安排谁，没有他办不到的。”该公司一位王姓员工说。

另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有一件事在自来水公司流传颇广：有一次总公司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大会，坐在台下的马超群旁若无人地大讲笑话，引得全场大笑，甚至湮没了领导的讲话声。台上的总公司领导们连连摇头，却又不敢拿他怎么样。

马超群被抓当夜，消息便在自来水公司职工间迅速流传开来。“一开始，大家当然很高兴，可还有点担心，因为马超群这个人，确实背景‘超群’，大家担心他哪天又被放出来。”杨之元告诉记者，在马超群被查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自来水公司仍很平静，直到今年5月之后，马超

群不仅没有出来，连他的儿子和其他一些亲属也陆续被抓了进去，才“有长期被他无故欺压的员工，在公司大门口放炮庆祝”。

时至今日，陆续接受各大媒体采访的多位员工，仍不敢实名，“马超群身边经常有些文身小弟，而且，我们还听说他有枪，砍刀之类就更不用说了。”杨之元说。

多名员工称，马超群养着多个跟班喽，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服他的人，“他的车里经常放些刀枪棍棒之类，明显不是一般人的做派。”

同事们的担心后来得到证实。5月，马超群的妹妹马青茹以涉枪罪名被检方批捕。“他的妹妹都有枪，马超群有枪就更不用说了。”在员工们看来， 这些小弟平时在单位晃荡，几乎成了马超群“专政”的工具，整个公司无人敢反对他的决策。

2011年，北戴河自来水公司独立，三年来，每年产生1200万元亏损，马超群还申请财政补贴。

蹊跷案发

马超群的案发，至今存有多个版本的说法。马母张桂英介绍，去年年末，马超群发现现任秦皇岛市城管局局长马壮贪污100万元和其他违纪违法线索，准备向纪委举报，结果，举报信尚未发出，马超群被抓。

在马母看来，马超群的落马是因为政治斗争。

《凤凰周刊》也从秦皇岛市城管局内部人士口中获悉，马壮与马超群均系抚宁人，同姓马，但二人多年前就结下梁子。

“马壮看不惯马超群的嚣张，个别地方与其对着干，马超群非常不满，一直想着扳倒马壮。”这位内部人士说，今年1月底2月初，百度“秦皇岛吧”和百度视频曾出现多个网帖，举报马壮公车套用牌照、包养女人、出入豪华酒店等问题。这些帖子被认为是马超群所为。但秦皇岛纪委和城管局纪检监察室并未对这些帖文进行回应。

与此同时，马超群与北戴河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矛盾也公开化。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此前，有电力背景的某国企开发商在北戴河投建了一座五星级酒店，临近开业时，酒店方面向北戴河自来水总公司提出通水要求。

但是马超群向其提出了100万元的额外费用。“让马超群没有想到的是，急于开业的酒店竟然当场答应。马超群却当场反悔，说，既然你们

这么有钱，那就准备300万吧。”

一下子涨价这么多，该酒店负责人面露难色，只得向总公司汇报。“这家公司并没有马上就范，而是寻求秦皇岛政府部门支持。秦市政府人员找到马超群，提醒其注意。然而，马超群却再次提价到500万元。”这位知情人士说，政府人员将信息反馈给了开发商。

这位熟悉情况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开发商的一位女老总，亲自驾车到石家庄，与河北省主要领导当面反映情况。新华社补充的细节称，这家开发商带着马超群的索贿录音。

尽管各个不同渠道的线索均指向了北戴河某五星大酒店，但是面对传闻，该酒店一直保持沉默。

“儿子”与“干爹”

《凤凰周刊》记者获悉，马超群之子马某2010年进入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专业，但是记者在河北省查不到马某录取信息。有熟悉马家的知情人向记者透露，马超群曾经在天津购房，2008年，将其子的户籍迁往天津市南开区，马某是在天津参加的高考。“以马某在河北省的学习水平，他很难考上长春理工。”另一位知情人称。至于天津这套房产是否在68套房产名单中，尚未确定。

一位马某的校友透露，马某平时较为低调，吃穿无华，“不要说女朋友，他好像连朋友都没有。”这位人士称，马家案件曝光后，师生皆惊。

马某在人人网的最后一条状态，更新于今年4月11日，其时，其父已被捕多日，马某在当晚10时写道：“很思念。”

熟悉马超群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马超群患有糖尿病，平日不抽烟不喝酒，却执迷于金钱。

“政治上，马超群树敌；商业上，也得罪了很多人。即便不是因为马壮，或者传言中的国企开发商，在反腐力度加大的今天，马超群的‘自来水王国’也到了‘亡国’的边缘。”当地官场观察人士说，因为马超群被查，秦皇岛市城管局2012-2013年度的“精神文明单位”称号被撤销，每名员工5000元的“精神文明奖”也被取消。

采访中，秦皇岛本地人多有疑问：为何马超群得以爬上高位，而且被这么多人厌恶也不会落马，甚至敢公开叫板比他级别高的官员？

业内人士分析称，自来水公司表面上是服务性质的企业，但事关国计民生，且缺乏市场竞争者，工程招标与验收集于一身，监督乏力，在房地产业界怨言不小。著名地产商潘石屹曾发微博说：“我问公司采购总监：为什么马超群能贪污这么多钱？采购总监回答：能不贪嘛，现在电力、热力、燃气、市政的工程都可以公开招标，唯独自来水不让招投标。这就是根源。腐败的根是不公开透明，黑箱操作。腐败的根在于垄断。”

大陆一家法制官媒刊登评论认为，供水公司总经理位置虽然级别不高、官职不大，可是自来水公司却是国有垄断企业，握着一方水土的公共水资源，县官不如现管。

秦皇岛被称为“夏都”，每年暑期，大量中外游客涌入，再加上中央领导来此办公或者疗养，北戴河的地位十分特殊。在这里，几乎常住居民都能讲出若干段不同时期领导人的传闻逸事。

“中央领导来到北戴河，吃、穿、住、用都需当地供应，再加上领导人有时会微服私访，普通百姓有机会接触到中央领导，也就不足为奇。”一位当地人说，马超群正是主政特殊地方的特殊行业，难保无虞。

而在一些认识马超群的人看来，借助手中的“水权”，马超群通过各种途径与前来北戴河的高层官员接触。“有一次，马超群曾想通过疗养院搭桥，与某大领导见面，遭到拒绝，待领导走后，马超群便给这家疗养院断水。消息传开，有的地方就认为，不就是见个面嘛，给他安排。此外，马超群还通过大领导秘书的关系，千方百计与大领导见面。”而马超群通过关系谋到手的一些荣誉称号，诸如劳模之类，也成了他与领导见面的砝码。

秦皇岛市一位与马超群家族相熟的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据马超群吹嘘，1997年，马超群来到北戴河后不久，某中央机关疗养院迎来了一位大领导。“这位领导喜欢钓鱼。领导一个人钓鱼也没啥意思，就想找个人一起钓。无意中，这位领导与马超群结识，马超群极力向其推荐自己的妻子张丽焕。张丽焕的钓术极佳，经常钓上大鱼，人又灵活，一来二去，张丽焕与这位领导便熟络起来。马超群见此，每每向人炫耀他与这位领导的钓鱼之缘，甚至公开称其是这位领导的干儿子。”

这位人士说，起初，很多人并不相信权势显赫的领导能与并无特长的马超群挂起钩来，但是，随着领导退居二线，来北戴河次数增多，传言日渐丰富。再加上马超群经常向人炫耀他与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合影，更给人感觉其人本领通天。高层的影子，无形中成了马超群的保护

伞和护身符。所以，即便马超群颇有过火之处，但是当地官员均不敢得罪，甚至有的官员开会时看到马超群，怕马给自己弄难堪，悄悄离去。

“因为他自称是其干爹的官员级别太高，你就是不信，也没有证实的途径，而人家对领导的了解和亲密合影却是摆在明面上的。”这位人士点评道，“干爹”的影子，成了马超群在秦皇岛政商两界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屡试不爽，最终将其推上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象之中。

另一个独立信息源此前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马超群被抓后，其妻曾开一辆装满现金的小轿车奔赴北京，找关系捞人。“这个消息从侧面印证了马超群为何在当地飞扬跋扈无人敢惹——北京有人。但是，张丽焕的捞人之行无功而返：没人再敢收他的钱。”有消息称，马超群一案在侦办过程中的确受到过干扰，马超群等人的羁押地点，曾数次变更。

《凤凰周刊》记者获悉，马超群的巨贪已惊动高层，将由更高层面的办案机构介入，届时，马超群的背后之手，或将一一现身。

景春华："小节"不严的省委秘书长落马

记者 / 郭天力

2014年1月，河北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被带走调查。一年后，他的同僚和上司景春华也加入了"被带走"的行列。3月4日，石家庄桥西区工农路719号门前，人烟寥落。这里是河北省常委的居住地。仅仅3个月之内，两个常委在这里消失了踪影。

两会前夕，一直在河北官场秘密流传的景春华将遭查处的传言得到证实。3月3日晚，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景春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组织部长梁滨之后，河北落马的第二只"老虎"。

文物保护的真心与假意

2014年1月，河北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被带走调查。一年后，他的同僚和上司景春华也加入了"被带走"的行列。

中纪委公布景春华被查的时间点，让不少河北官方人士意外之余，也感叹一声："传闻终于落了地。"早在2014年8月，在当地流传的多个版本的"打老虎"传闻中，景春华的桥段最多。

履历显示景春华是山东广饶人，但与其交往过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景满口唐山话，"他应该是跟着他父亲到的唐山开滦煤矿，在唐山长大。当时开滦煤矿很有名，职工来自全国各地。"

一位曾任职于河北共青团系统的人士透露，景春华曾先后任职于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和共青团河北省委副书记， "个子高高大大，一表人才，有一定的演讲水平。"

1997年，景春华结束共青团任职，开始履职地方，任承德市委副书记，是该市"三把手"。4年后，景春华升任市长。承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河北地位独特。这里远离省会石家庄，与京津的联系更多，被称为京津"后花园"。300年前，清廷在这里建了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上世纪90年代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承德政府在文物资源保护和开发上担责重大。

当地官场观察人士李先生回忆，景春华新官上任，一把火"烧得漂亮"："当时，在避暑山庄德汇门不足200米处，建了一幢8层高的建筑。这楼已经封顶，只剩装修工程，但是当地文保人士一致认为，该建筑影

响避暑山庄景观，与文物保护相关规定不符，政府部门却下不了拆除的决心。景春华到任后，楼被拆平，原址建起了假山游园。”

在距离避暑山庄丽正门仅一个街区的火神庙环岛处，高楼林立。当年，这里地处避暑山庄的建设控制地带，开发强度和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但是，两栋30层的高楼德汇大厦和热河大厦还是在反对声中建成了。”一位熟悉当地官场的人士介绍，当时身为市长的景春华反对修建这两幢大楼，但另一市委主要领导则支持，“河北省一位副省长来承德视察时，景春华当着不少官员的面表达对这两幢高楼的不满：‘这俩楼什么玩意儿，多影响避暑山庄景观’。”

2003年，承德举行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活动，来了很多专家学者，景春华继续公开表达不满：‘等将来承德有钱了，非把这俩楼炸了’”。

“当然，这样的段子不知是出于保护避暑山庄的真心，还是与同僚暗中较劲。“另一位官场人士如是回忆，景春华在任期间，承德的部分历史建筑遭到毁灭性打击，肃顺府就是其中之一：“肃顺府是非常精美的四合院，开发商打着保护的旗号对其进行修复后，现在成了个烤鸭店。”

引发对景春华口碑明显诟病的是2002年年末，承德发生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文物盗窃案。时任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监守自盗，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盗窃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倒卖至海外。 “我们都认为，造成众多文物流失的严重恶果，怎么说也是一起责任事故，但承德文保系统竟然无人受到处理。”当地官场人士告诉《凤凰周刊》。

“填两条河就有了地”

多位河北当地人士均评价景春华性格较为豪爽，江湖气息很浓，偶尔会口无遮拦。滦河是引滦入津的重要水源地，因而天津市考察团曾到承德考察滦河生态保护情况，景春华设宴招待，一位陪坐的官员回忆，景在席间随口说：“我们承德为了保障给你们供水，做出了很大牺牲，你们应该给我们补偿才是呀，要不我们的老百姓会往滦河水库里撒尿。”天津来客闻言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这一细节，目前尚未获更多证实。

2006年，景春华任市长4年后，再任衡水市委书记。一位衡水当地人士告诉本刊，衡水的经济地位在河北排名靠后，景春华认为是当地思想不够解放的原因，于是经常搞“解放思想大讨论”：“2007年的一次解放思想中，衡水电视台还进行了直播。景春华说，大家总是认为发展慢的原因是缺乏土地指标，为什么不能动动脑筋？衡水南部有三个河道，

现在降水这么少，不如填两条河道，留一条就行，这不就有了地了？”在座者闻听均忍俊不禁，至今仍是当地官场“经典段子”。

一位中央驻冀媒体人士认为，景并不喜欢被关注，有一年全国两会，景春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会。“我们约了采访他，他本来已经同意了。我们第二天提前10分钟赶到约定地点后 ，等了好久不见他来。后来他的秘书告诉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亦有河北当地媒体人士作证，去年冬天的河北两会上，曾有多名记者追访景春华，但是景无一例外全都拒绝。

没有明说的“小节”

景春华2008年离开衡水，赴任河北省委秘书长。按照惯例，省委秘书长都是省委常委，但是景春华担任省委秘书长的两年多里都没能进入常委，颇为反常。河北官场人士告诉《凤凰周刊》：“景春华的材料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后，河北迟迟没有得到批复，所以景的常委身份迟迟下不来。这可能反映了中央有关部门对景不够放心。”

2013年9月，景春华出现在央视《焦点访谈》一期关于河北省民主生活会的节目中。当时，他批评河北省长说：“庆伟同志作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一把手’，对政府的会议多、文件多、会议经费多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月12月的《人民日报》报道，在2014年12月26日的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景春华在自我批评时说，自己尽心尽力、如履薄冰，生怕工作出现疏漏，思想上更多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服从服务省委和书记省长上，主动谋划、积极建言不够。在工作作风方面，主要问题是小节细节把得不严。牋？

随后，河北省委常委成员在进行真刀真枪的相互批评时对景春华提出，他在整治文山会海上，成绩很大，但与中央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常委会发言少；老好人思想有所滋长，或多或少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有时不拘小节。牋 ?没有人明言这些微妙的“小节”指向何事，《人民日报》在评价河北这次民主生活会时，称会议“直奔主题，辣味十足”，让常委们出了汗。报道刊发1个月后，景春华失去了改正他那些“小节”的机会。

争议周文斌案

记者 / 闵云霄 实习生 / 谢忱

曾经被媒体称为中国内地“最年轻、最帅”的大学校长，

其落马后被指控受贿两千万元，揭示大陆高校腐败的冰山一角；

庭审中翻供称被报复陷害，映射出大陆官场的复杂生态。

阳春三月，全国的学子开始重返校园。南昌大学4500余亩的新校区——前湖校区内（含2005年合并江西医学院900多亩）有湖有山，山水交辉相映，鲜艳的花枝在微风中摇动，滨湖的广场上一圈人在放风筝……花园式的学校里，师生们惬意生活、学习。

但作为校区主要建设者的前校长周文斌已经无法享受这一切。

1960年10月出生的周文斌，曾被称为中国内地“最帅”和“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自2013年5月9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周文斌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官至正厅级。他举债20多亿修建南昌大学，取得巨大成效，也在此过程中“出事”落马，但他在庭审中翻供称，“这是江西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类的冤假错案。”

庭审期间，周文斌对检方指控全不认罪，并爆出惊人内幕：声称其被调查，系已落马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在江西省委书记任上时对他的报复。

事实上，在周文斌案以前，江西省内多个腐败案件庭审中均出现类似对苏荣的举报，如原江西省新余市人大主任周建华亦称其被“双规”是因为举报了苏荣妻子，遭到苏荣的打击报复。不过周建华案已于2013年7月一审结束，周建华被判处死缓，其时苏荣尚在任，官居副国级。

其后形势发生变化，苏荣于2014年夏天涉嫌贪腐被查，周文斌案则于当年12月9日开庭一审。此番庭审，共计22个工作日，跨越了羊年春节，持续时间长达三个月，至2015年3月4日全国两会召开才宣告结束。创下大陆刑事案开庭时长之最。

苏荣主政江西七年，曾掀起反腐风暴，大批干部落马。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其落马后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被官方指称："苏荣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利用影响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

目前，苏荣案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其案情有待未来司法文件逐步厘清；周文斌案则在等待一审的判决结果。

由于官方缄默，外界无法获知周文斌等人对苏荣举报的虚实，但江西官场的盘根错节足以让人充满想象空间。

漫长的审判：

22个工作日、三个月的开庭

2014年12月9日，周文斌身着黄马甲囚服被带上南昌中院被告席。他背后，三百人的旁听席座无虚席——江西省史无前例地组成"高校校长团"前来旁听，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昔日最年轻的"211"大学校长，人群中略有唏嘘之声。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在长达22页的起诉书中指控，周文斌利用职务之便，从2002年元旦期间收取第一笔10万元贿赂款开始，一直到2013年4月他在上海浦东机场收受的最后一笔1万元"好处费"为止，11年一共收受26人的100余次财物，价值合计2000多万元。最大金额的一笔受贿款，是某投资公司为获得并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方面的关照，先后9次送给周文斌的人民币410万元和30万元港币。

此外，检察机关还指控，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周文斌两次个人决定挪用南昌大学公款人民币5875万元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

周文斌案的第一公诉人，居然是2003年南昌大学毕业的学生。她的毕业证书就是周文斌签发的。该公诉人大发感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用在南昌大学吸取的法律知识来指控曾经的母校校长。这不仅是被告人的悲哀，也是几万学生的悲哀。"

不过，庭审开始后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细节：周文斌当庭要求享受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出庭的待遇——不穿黄马甲囚服。

周文斌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周文斌的姐姐和妹妹走到旁听席第一排，近日，房祖名出庭受审并未穿黄马甲囚服，要求审判长允许周文斌将身上所穿黄色马甲（囚服）脱掉，审判长认为周的姐姐属于扰乱法庭秩序，被法警带出法庭。

接下来，周文斌本人也表示不想穿黄马甲。他举例说，此前天津和平法院下达通知称刑事被告人出庭可穿着便装，深圳也出台规定禁止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更早在2013年，河南就进行了庭审改革，要求被告不剃头、不穿黄马甲。

审判长回应称，也注意到河南、深圳等地出台规定被告人在出庭时不剃头、不穿黄马甲，最高法也有这方面的司法改革动向，但并未下发正式文件，因此不批准周文斌的请求。周文斌反问："既然没有文件说可以不穿黄马甲出庭，那有没有文件说非穿不可呢？"他随即把身上的囚服脱下扔在了地上。审判长最终默许了他这一行为。

巧合的是，周文斌案庭审尚未结束，2015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争取到不穿马甲待遇的周文斌，在漫长的庭审期间，每天身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黑边眼镜，每次开庭提着一个塑料袋来，庭审结束又提着这个塑料袋离开。

法庭上，周文斌全面翻供，声称自己被非法取证，曾在"双规"期间被罚连续站立10天，不准睡觉，也不准坐下。长时间的站立让他的脚长满了水泡，两腿间出现大面积"渗水"现象。办案人员曾安排四名医生治疗，目前他的腿上仍留有损伤痕迹。

自称"连字典都能背下来的"周文彬，面对自己的供述材料，每一次都能清楚回忆出当时做供述的地点、时间、场景，甚至连当时是谁对自己进行的讯问、对方的长相、跟他说了哪些话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案子非法证据满天飞，还有不少伪证。在南非这样落后的地区，当年审判曼德拉时，公诉人发现案件存在问题，把案卷一扔，跑到曼德拉跟前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送到监狱里。'那时的南非都能做到，我希望法庭也能实事求是地审案。"周文斌说。

周文斌还自制了一份案件要素/证据综合评价表，输入各种评价的指标和数据，最终即可评价出证据是否属实。他请求法庭用投影仪播放，被审判长拒绝。法庭上，周文斌时而表情轻松，面露微笑；时而当庭"咆哮"，引经据典，对各种法律名词、条款如数家珍。

江西省一位已经退休的正厅级干部对《凤凰周刊》表示，他并不认

为周文斌的口才、笔才如外界媒体报道的那么好，只是思路清晰而已。

22个工作日、三个月的庭审期间，周文斌自己在法庭上就自行辩护了两天半，“这是江西法院史上最长的一次，可能也是（大陆刑事案件）被告人自己辩护最长的一次”，一位法律界人士如是说。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对《凤凰周刊》表示，周文斌案允许媒体用各种形式直播，体现出司法的公开公正公平。尽管当事人在法庭上较为激动，也可能引发舆论审判的不利后果，不过，这毕竟是法庭直播好的尝试。将案件问题在定罪前表现出来，远比之后对冤假错案再翻案好得多。

他还认为，该案反映出诉讼过程中，法院和律师之间仍存在尖锐对立。但这种对立并非是立场问题，而是相互尊重的问题，这是法治社会中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周文斌案庭审结束后不久，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张忠厚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周文斌有无受贿事实，受贿多少，法院都会一笔一笔搞清楚。法庭会根据事实来认定，被告人承认的没有证据不能判，被告人不承认的有证据一样判”。

风云变幻：

江西6年落马42名厅级干部

根据周文斌在庭审期间的举报，苏荣在主政期间，曾引进了南昌中寰医院这一港资医院。然而，医院建成后却亏损严重。苏荣便打电话给周文斌，要求南昌大学收购该医院。周与南昌大学附属医院沟通后，一致认为该医院难以经营，拒绝了苏荣的这一要求。

周文斌家属告诉《凤凰周刊》，周文斌曾在看守所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南昌中寰医院老板是苏荣的东北老乡，两人交往甚密。2012年暑假过后，该老板每周从香港飞南昌，会先拜会苏荣，再到周文斌办公室来催办此事。“由于南昌大学附属医院坚决反对，认为该医院难以经营，所以就采用蘑菇战术，把此事给拖黄了”。

在调离江西的前一天，苏荣再次提出让南昌大学托管南昌中寰医院，周文斌再次拒绝。随后，苏荣提出，让周自行辞去南昌大学校长职务，前往江西师范大学或江西财经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周文斌说可以辞去南昌大学党委书记一职，但希望留任校长一职。

周文斌认为，“苏荣对此怀恨在心，这可能也是触发他临走前对我

下毒手的一根导火索。苏荣在调离江西前，要求江西纪委对周文斌启动调查。2013年3月19日开始，周文斌案的行贿人陆续被抓。

次日，苏荣调往北京专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再兼任江西省委书记。2014年6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不过，江西一位退休厅级官员告诉《凤凰周刊》，他不认为周文斌是完全冤枉的，其翻供主要是希望借苏荣案转移视线。

事实上，苏荣已不是第一次被江西“出事”官员举报。除周文斌以及本文前述江西新余人大主任周建华外，江西鸿源数显科技公司负责人桂松在2014年夏天涉嫌偷税漏税等罪受审，在质证陈述中，桂松也指称苏荣批示授意江西省纪委牵头公检法各部门制造冤案。

桂松的辩护团队称，人称“于姐”的苏荣妻子收受一福建籍开发商逾千万元贿赂，帮助其以成本价受让该宗地块，在未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开发房地产项目，获利数十亿元。

中共十八大以来，江西官场震荡不休。2014年6月3日，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查。公开资料显示，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赵智勇被视为是苏荣身边的“大秘”。赵智勇被免4天后，苏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苏荣落马两个月后，江西省发改委主任李安泽也被中纪委带走。2014年3月，江西副省长姚木根被调查。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江西省检察院依法立案查办县处级以上官员85人，包含厅级9人，同比上升21.4%。到了2014年，查办县处级以上官员101人（其中省部级1人、厅级13人），同比上升18.8%。也就是说，两年共查22名厅级干部，加上2008年到2012年的20人，一共42名厅级干部。

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曾言：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反腐败斗争就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其落马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年2月16日宣布，苏荣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所涉问题包括：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无米之炊”：举债20多亿建大学

2002年12月，42岁的周文斌任南昌大学校长，当时被媒体称为中国内地“最年轻、最帅”的大学校长。他履新时接受《江南都市报》专访时称，南昌大学要高起点，高水平，建成全国第一流的校园，要超过清华、北大。

但是周文斌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缺钱。据《江西日报》报道，在昌东、昌北两个高校园区，江西省政府投入的1200万元先导性资金，撬动了100个亿的大市场。

周文斌的观点是，“办大学需要大量的资源，发展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永远是一对矛盾。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战略的制定争夺到资源。”他的操作思路是：“自己省一点，上面的钱要一点，别人的钱用一点，以后的钱用一点”。

公开资料显示，南昌大学整个校园园林景观投入1亿多元，校前区广场、校大门广场、卧龙广场三个广场投资近8000万元，校园内自由女神、贝莲、中华正气龙三座雕塑投资800多万元。另外，一座水体面积100多亩的人工湖投资也超过了4000万元。

在实际操作中，南昌大学的学生公寓采取的是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连同配套的食堂商业街等项目，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该款项全部由香港多伦多集团出资并负责建设，学生公寓建好后给予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期满后产权归校方。据新华社报道，上述公司拥有校区内步行街15年的经营权。

据了解，南昌大学2000级学生每月伙食补贴为40元-60元。多位不愿具名的学生向《凤凰周刊》表示：2003级秋季入学时，这笔补贴是存在的，但周文斌上任后，这笔补贴再也没向学生发放。

同时教师补贴也被削减。南昌大学部分教师中，周文斌流传有一个叫“周扒皮”的外号——因为很多院校，在年头定的制度，比如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一篇文章多少钱的奖励，到年尾就被改变，“（他）时时刻刻就想扒掉老师的待遇”。

大规模的建设，让南昌大学背上了大额债务。2007年，曾任该校副校长、新校区建设总指挥的邵鸿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及南昌大学的债务问题，“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需采取用新贷款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

债务压力之下，南昌大学通过老校区土地置换、省政府专项资金、重组债务调整银行贷款结构、延长还款期限进行化解。公开资料显示：

2008年，原江西医学院北院校区65亩地以总价5.1亿元出售，另外南昌大学北校区一块临街地块，也被开发成商业楼盘，拍得1亿多元。

由于南昌大学剩余的银行贷款大部分在近3-4年内将到期，压力仍然非常大。2009年3月，据江西媒体报道，江西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决定，调整南昌大学的银行贷款结构。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于2009年2月初通过了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中国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参与的债务重组银团贷款项目，即把南昌大学在未来3-4年内需全部归还的12亿元贷款分摊在今后的16年内支付，使得每年还本资金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左右。

大规模的建设也滋生了一连串腐败。南昌大学原基建处处长周光文最先涉案被查，其被指控先后收受贿赂计人民币341.7万元、港币65万元、美元6.5万元，于2011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周文斌案的起诉书则显示，其在南昌大学校园建设中因工程承接等基建建设产生的“好处费”，占其被指控的总受贿金额2000多万元的九成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纪委网站“案件查处”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36名高校官员落马。高校腐败显然已经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前述江西省退休正厅级官员告诉《凤凰周刊》，周文斌的问题不在于采取什么建设模式，而在对权力缺乏敬畏之心，“想干事，能干事，但有时乱干事”。

双面人生：大学同事褒贬不一

周文斌的父母均是普通工人，1977年从江西调到湖南衡阳。周文斌年轻时当过知青队长，他自称“拉纤、烧砖，双抢（抢收、抢种庄稼）这些重活脏活都干过，还当过伙头军，烧100多个人的饭”，为了晚上复习功课有照明灯，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蒸饭，休息时便在油灯下自习。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周文斌考入位于江西南昌的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此后便一直在南昌工作、生活。

2013年春节，是周文斌最后一次回湖南老家。其一位家属告诉《凤凰周刊》，“如果有钱，他早就在老家给父母买新房子了”。周的姐妹等人家庭条件一般，直到周出事，一家几个人前往南昌参与开庭，四个人住一间宾馆，“都是没有窗户的特价房”。

周文斌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和同学吴某结婚，两人育有一

子，目前在美国已博士毕业。吴在南昌大学担任行政工作，因为一度接受调查，她拒绝了《凤凰周刊》的采访。

担任八年教师后，周文斌于1990年12月走向管理岗位——华东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系副主任。1994年12月任院长助理。1995年10月，35岁的周文斌被推荐担任华东地质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官至副厅。

2001年3月周文斌被江西省委组织部任命为华东地质学院（后更名为东华理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顶替因年龄原因退休的李学礼。

周文斌调任南昌大学校长后，从2002年12月至2005年4月期间，该校党委书记人选一直空缺；从2005年4月至2007年2月，周文斌一度党委书记、校长“一肩挑”。

知情官员称，当时江西高层对周文斌非常器重，但后来因接到的反映太多，已对他极不放心。于是，58岁的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郑克强，被派到南昌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参与磨合医学院合并时的班子矛盾及处理巨额债务问题，同时希望通过人事变动控制好周文斌。

该知情官员认为，省里对周文斌失去信任的原因是：江西省审计厅曾三次对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日元贷款、二级学院问题进行审计，向省里报告了许多严重问题。

在不少人的眼中， 周文斌还是一个十分“豪爽”的人。东华理工大学以前同事介绍说：他工作有干劲，胆子比较大；他比较重视搞活动，例如仪仗队的活动他都会参加。在主政南昌大学期间，他不止一次提出“要将南昌大学建成全国

第一流的校园，超过北大、清华”， 他也因创新敢为受到南昌大学很多师生的好评。

2011年的南昌大学90年校庆活动中，周文斌和其他校领导共同演唱了一曲《心手相连》的视频点击过百万。2013年4月，周文斌开通微博：“我这个当校长的如果再不开，就会显得有点OUT(网络用语表示‘落伍’)了”。

周文斌的学生胡春华，现在是南昌大学副教授，他告诉《凤凰周刊》，周擅长计算机，喜欢游泳，是排球高手，在东华时经常参加排球比赛。大学高等数学课程经常考100分。

胡春华介绍说，念硕士的时候，周文斌还在东华理工担任院

长，“说给我们买一台工作用的电脑，从他的课题费出，正在学校走这个程序”。学校采购部门的人认为不用，说院长的电脑正好要换，换下来直接给你们用，学生们很开心准备到采购部去搬，但被校长一句话就打回来了，说公是公私是私，学校的东西不能搬走，还把那个处长骂了一顿。

在胡春华看来，周文斌非常廉洁。“他所有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去过他家，师母从来不让别人进去，我们要拿一点东西去送，被直接往外扔”。

南昌大学一位教授告诉《凤凰周刊》，周文斌不是很看重钱，而是比较看重自己的将来。南昌市政府旁边有栋楼，每个高校校长可以给一套，周文斌为了避嫌没要。

但是另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老教授的看法正相反。他告诉《凤凰周刊》，周文斌喜欢拉帮结派，对他好的人爱拍马屁的人，肯定重用再重用，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其他的人，经常被打击再打击。“比如有的老师培养的学生，都会被指使来叛变、捣乱，更糟糕的是他撒谎成性”。

“我总是跟香港各大学的校长相比较，他们的年薪都超过了千万元港币，还不要管那么多事，而我的工资一年才区区几万元人民币。”在一份检方出具的悔过书中，周文斌称：“我与南昌大学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甚至把它当自己的‘私有领域、私家花园、独立王国’，我就是这里的君主。”

周文斌在法庭上也曾公开承认，他在南昌大学是非常受宠的——“我要自己提包，我的司机、我的秘书抢着给我提，就是学校的副校长，哪个不抢着给我提啊”。

前述退休教授称，周文斌刚来南昌大学时，教务处请周文斌发奖，前面一排都是教学委员会的，全部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但周发完了转身就走，“你第一次到学校来，总要握个手什么的吧”，该教授认为，这是对学者的不尊重。

另一位南昌大学的教授则称，周文斌挥金如土，“他要是喜欢的人，拍他马屁的人，要搞一个会，大手笔。而其他人正儿八经的搞学科建设，就无情打击。中央音乐学院搞一个活动，他主动花很多钱去承办，这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2013年5月9日，周文斌在南昌大学美术馆出席赵坤陶瓷雕塑展开幕式，当天身着白色衬衣、灰色西裤，穿着干练。到场采访的当地媒体

记者回忆，周文斌在发言时声音比较小，也没有什么逻辑，语无伦次的，精神状态看上去不太好。次日，他被宣布“双规”。

一位熟悉周文斌的江西官员告诉《凤凰周刊》，周文斌给他的印象是，比较干脆利索，做事胆大，甚至不计后果，脾气倔强但不太外露，比较有心机。在他看来，周比较喜欢与老板私下来往，外出喜欢住高级宾馆，他不抽烟，但能喝酒，喜欢唱歌，穿名牌。

在部分教师眼里，周文斌是个很高调的人，甚至有些跋扈，周还被指“动手打过一个教授”。

（实习生赵梦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高劲松：平庸政道亦落马

记者 / 闵云霄

相继三任市委书记接连落马，

既有“能吏”仇和，也有“庸官”高劲松，

昆明成为观察大陆本轮反腐风暴的独特样本。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市在2015年全国两会之后，成为了新一轮反腐败风暴的漩涡中心。

3月15日中午，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不到两个小时，云南代表团从人民大会堂返回驻地不久，代表团成员、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被中纪委工作人员带走，接受调查。

仇和涉嫌贪腐被调查的新闻余热未息，4月10日下午，云南省纪委再抛“重磅炸弹”：昆明现任市委书记高劲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高劲松去年8月底才接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一职。在其上任前一个多月，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被免职，待遇从副省级降至副处级。张田欣是2011年12月从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任上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张的前任是仇和。

不足一年时间内，昆明相继三任市委书记接连接受调查或被免职，当地官场生态，以及在大陆反腐风暴中的位置，均备受关注。

《凤凰周刊》记者调查发现，高劲松在云南官场属于比较低调的官员，与饱受争议的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不同，高劲松在诸多当地官场人士眼中有些“平庸”，多位受访者称，高劲松“口碑还不错”，但能够举出的可圈可点之事又非常有限。

无论是“能吏”仇和，还是“庸官”高劲松，最终都折翼在2015年这新一轮反腐风暴中。除了令昆明官场圈子引发关注，也证明了反腐风暴中“能人容易落马”、“少做事就不出事”以及“能人才容易贪”等刻板印象其实都不准确。

距省级官员一步之遥

1963年出生的高劲松是云南泸西人，17岁即参加工作，职业履历始终在云南范围内。

高劲松的官场生涯终于昆明，也始于昆明。他曾历任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秘书、调研处副处长（正科级）、昆明市五华区区委书记助理。

1996年7月，33岁的高劲松出任昆明市五华区副区长。此后历经五华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务，高劲松于2001年升任昆明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时年38岁。

短短5年时间，高劲松换了5个岗位，顺利完成从副处到副厅的跃升，让很多干部望尘莫及。

2008年1月，高劲松离开昆明市，调任云南省第三大城市玉溪市任代理市长，两个月后正式出任玉溪市市长，官升正厅。2012年12月，他转任云南省第二大城市曲靖市任市委书记，开始主政一方。

2014年7月12日，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被免职。7月16日，张田欣被宣布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断崖式降级”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其后，昆明市委书记岗位空缺长达一个半月。

2014年8月28日，昆明市召开干部大会，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维佳宣布，云南省委对昆明市委书记人选高度重视，经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由高劲松担任。

高劲松在会上表示，深感责任重大，要推动昆明市改革、发展、稳定和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实现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

昆明市多位官员告诉《凤凰周刊》，张田欣“出事”后，昆明官场盛传会从中央或者其他省份“空降”新的书记，但最后却是高劲松，很多人都感到意外。

不过，按照大陆官场的惯例，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一般都要进入省委领导班子、担任省委常委。但高劲松任职昆明市委书记8个月，直至被查，始终未能进入云南省委常委。

4月10日，高劲松落马消息公布，消息最早来自云南省纪委，而非中央纪委。

云南官场震动不小

目前官方尚未公布高劲松违法违纪的具体细节，但有大陆媒体公开报道称，高劲松涉嫌向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输送数百万元的利益。

2014年8月29日，已调任全国人大担任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白恩培，被中央纪委宣布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白恩培从2001年10月起任云南省委书记，至2011年8月调任全国人大，主政云南十年。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云南一直是多事之地。原副省长沈培平、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欣等多人已先于白恩培落马被查；2014年夏天，大陆多家媒体还长篇报道了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据传感染艾滋病自杀身亡事件。云南省一位退休高官告诉《凤凰周刊》，"治理云南官场，比治理滇池还难。"

众多落马的云南高官中，最让外界震惊的是仇和。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空降"昆明，担任市委书记并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此前他已经是备受舆论争议的官员，其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期间 "大拆大建"并推出各种改革措施，饱受争议。但主政昆明后，仇和丝毫没有"收敛"，其强硬作风在上任后不久立刻展现：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昆明下辖的五区、一市（县级）、八县，以及各市直机关的党政官员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间，"昆明纸贵"。

作为个性十足的明星官员，仇和在昆明显得比在宿迁任职时愈发"霸道"。他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刻都不敢耽搁，更有著名的"瞌睡门"：2008年2月20日仇和主持的一次招商工作会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打了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之后该人辞职。

仇和在昆明沿袭了他过往的改革措施：大规模进行城市拆迁，拆城中村、拆二手车交易市场、拆小商品批发市场，甚至为了市容要求居民窗户外的防盗笼也要拆除，不支持的公务员直接被要求回家……其一系列的举措遭致众多批评。

2011年底，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专职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此后其低调了许多。十八大后更加彻底"韬光养晦"。

2013年9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罕见地对昆明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六点反思，称"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更称有的干部"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这被视为仇和当政以来遭遇的最大麻烦。不过，2014年底秦被调往北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尽管秦光荣离开了云南，仇和也未能平安落地。在仇和落马前，与

其关系密切的一个开发商已经被查，历来主张“大拆大建”的仇和不得不被人质疑其当初高调“出于公心”的城市建设背后，是否存在私利驱动。

仇和落马后仅三天，其从江苏带到云南工作的原秘书，现任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不及一个月，昆明在任市委书记高劲松被查，云南官场人心浮动，“现在谁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个，会查到谁”，当地人士称。

想干事却没干多少事

与仇和及张田欣两位前任市委书记相比，高劲松此番落马前略显“默默无闻”。他为数不多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是2014年10月的晋宁群体事件被动出场。

当时高劲松刚接任市委书记两个月，2014年10月14日，昆明市下辖的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施工人员，与项目所在地的富有村村民发生群体性冲突，共造成9人死亡，其中6人被活活烧死，24人受伤。

知情人士称，该片区曾获得张田欣大力支持，但在过去三年里，村民、施工方和政府三者之间冲突不断。

该事件由高劲松牵头处理。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其中采取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人合计21人，施工方6名、富有村村民15名。

93岁的原云南政协副主席杨维骏告诉《凤凰周刊》，晋宁事件后，他曾经写过一封信，请市委老干局将书面建议转交给高劲松。杨维骏是从原晋宁县委书记蔡德生口中以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杜筑华处获悉：晋宁当地所征用的许多蔬菜地属基本农田，包括富有村在内十多个村子被征的土地全是蔬菜基地，至今从未出示过国务院的批准文件。

杨维骏希望高劲松能认真探讨征地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一直未见回复”。最终等来的是高劲松落马的消息。

云南省一位已退休的正厅级官员告诉《凤凰周刊》，高劲松不是一个强势官员，比如他刚刚调任玉溪市长，曾打算复制仇和在昆明的大拆大建模式——仇和于2007年12月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其时，高劲松尚在昆明担任常务副市长，到2008年1月调任玉溪，与仇和有两个月的工作交集。他显然还是受到仇和的一些影响。但高劲松的想法被玉溪市委领导班子否定了，高劲松也就没再继续坚持。

“在玉溪，他很想干事，但实际没有干多少事。整体给人印象是低调，比较亲和。”玉溪当地官员向《凤凰周刊》如此评价高劲松。

2008年 6 月，高劲松赴任玉溪不久，发生阳宗海水体出现砷浓度超标的严重污染事件，影响到当地两万多群众的生产生活，引起国家环保部等多个部门的重视。当年10月，高劲松主政的玉溪市政府专门就此发出公开信，向社会致歉，承认阳宗海水污染事件暴露了政府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而且“有关职能部门存在执法力度不够、督查落实不力、审批把关不严、以罚代管、疏于监管、整治违法行为避重就轻敷衍了事等现象，致使污染企业多年逃脱监管，违规生产，最终酿成了此次严重污染事件”。

玉溪市下辖的澄江县有面积512公顷的化石地，化石物种多样。至少有177属193个动物物种，分别归属于16个动物门类和分类位置不定类群。古生物研究学者表示，澄江化石地保存了早期复杂动物出现之后不久形成的完整海洋生物群落。

2004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4次批示“要保护澄江化石群、保护世界化石宝库、保护这个极具科学价值的自然遗产”。

出任玉溪市长后，高劲松在2010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上提出建议：“建议国家支持澄江动物化石群保护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之后他还专门致信温总理，引起了温总理的高度重视，并就澄江动物化石群保护和申遗工作批示，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和云南省政府密切配合，全力支持。

2012年7月，澄江化石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化石类世界遗产。

与高劲松有过接触的玉溪一当地人士称，高工作思路清晰，对人和蔼，没有官架子，而且记忆力非常好，“他作为市长，每天接触很多人，但是第二次遇见他，他还完全记得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我做什么的。”

不过，高劲松离开玉溪到曲靖担任市委书记成为一把手后，风格立即就变了。权柄在握的他为了提升城市形象，第一个动作就是对违规和影响市容形象的广告牌大力拆除，据公开报道，截至2013年7月，曲靖市强拆广告牌2656块。此外，曲靖计划投资70亿，对曲靖市中心城区人有棚户区（危旧改）项目、珠街西海湿地公园项目、城南片区城市防洪调节库项目、拆临拆违和拆墙透绿工作等十多个项目进行改造，拆迁面积达30万平方米。

前述玉溪当地人士告诉《凤凰周刊》，他有一次出差到曲靖，“听说当地市民给高劲松取了一个外号叫‘高遇拆’（意指是遇见什么就拆什么），我非常意外，这怎么同仇和干的一模一样！”

亲民路线与廉政外表

高劲松非常注重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云南当地媒体曾有报道，赴任曲靖后，高劲松四天行程一千多公里，跑遍了曲靖下辖的9县（区、县级市），其调研活动轻车简从，随行的只有市委秘书长，没有县级领导干部的座谈会，没有按部就班的发言。

在会泽县，高劲松还给挂钩联系的5户群众发联系卡，告诉农民：“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有困难我会尽力帮着解决。”还鼓励农民的孩子：“我们是亲戚了，你好好学习高伯伯才高兴，考取大学我来喝喜酒。”

据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会泽县大海乡二道坪村李吉祥的儿子曾按照联系卡上的信息，给高劲松写了一封信，告知他父亲生病的事。高劲松得知这个情况后，虽然未能抽身去看望李吉祥，但还是立即托付当地干部代为探视，并帮助解决困难。

一位接近高劲松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高在外界的口碑不错，他平常也很注意细节，曾经有企业家约他打麻将，但是被拒绝；社交场合高会礼节性喝几杯酒，但从不抽烟。

高劲松在昆明市担任常务副市长时曾推行阳光政务，他公开发言称：“昆明市相继发生了胡星、曾华等‘昆明市原规划局长’因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案件，他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办事不公开，人民群众对权力难以进行有效监督。”

2013年10月，高劲松在曲靖市领导干部廉政教育视频培训会上叮嘱，“凡是打着我的旗号到各县（市、区）、各部门办事的，请大家一律拒绝，我一定不会责备任何一个干部，请大家加强对我行使权力和廉洁自律的监督”。

当年11月8日，《云南日报》曾刊登高劲松撰文的《既要廉政更要勤政：不廉无以立身，不勤无以成事》，高劲松在文中写道：一个干部能力再强，工作再勤奋，如果在廉政上出了问题，就丧失了根本;一个干部再廉洁，但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必然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对领导干部来说，廉政是基本要求，勤政是更高要求。

高劲松引用古人“不为千古靖节名，只留清白在人间”的话说，官员们都有一种青史留名的从政理想，但怎么能真正留得住呢？“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不是自己的果实不能摘，不是你的到手也白搭。实践证明，谁能把贪欲踩在脚下，谁就是把正义扛在了肩上。”高劲松称，一定要淡泊名利。云南大学教授任新民曾表示，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在玉溪，高劲松做事均不张扬，“在做官为人上，高劲松非常重视征求不同意见，关心和尊重他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不过，前述云南省退休的正厅级官员告诉《凤凰周刊》，高劲松只是善于包装自己，其实他八面玲珑，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很强。

高劲松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4月3日。据《昆明日报》报道，高劲松主持昆明市领导干部大会并发表讲话，学习贯彻省委九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全省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专题研讨班精神。

“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发现他真的没有做过几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感觉太平庸。”昆明一位政界观察人士对《凤凰周刊》如此说。

（实习生赵梦媛对此文亦有贡献）

漯河政协常委王华涉黑案内情

记者 / 张蕾

一个曾在街头打架、盗窃的少年，通过在河南漯河市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

十余年逍遥于两桩人命嫌疑之外，且官至当地政协常委。

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王华，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王华在漯河数十年屹立不倒？

2013年之后，绰号为“黑孩儿”的杨玉忠和他的恋人付勤香的尸骨才被他们的家属找到。作为当时照看王华赌场的“兄弟”，杨玉忠和付勤香在1999年12月28日，像空气一样没了影踪。

那时，王华在漯河风头正盛，先后担任河南省商会副会长、漯河市政协常委。

两者的家人在此后从未间断寻找。直到王华在2013年元月被抓，他的同案者为了立功，向警方提供了王华杀害杨玉忠和付勤香的线索。接近警方的人士称，杨玉忠及其恋人付琴香在银都大酒店王华的办公室里被打死，尸体被装进编织袋，运至西平县老王坡，用汽油焚尸灭迹。当时西平县警方在焚尸现场提取了残存的遗体样品保存。

直至2014年，漯河市打黑专案组对遗体样品进行了DNA比对，确认了两具遗体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9年两人失踪，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直到王华被抓获，公安局并未立案侦查，也未有任何失踪人口的记录。

2015年4月11日，当地警方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黑孩儿”被害案已经侦查完毕，目前已经移交检察院。

王华面对的官司并不止这一起。此前的2015年3月24日，漯河市检察院指控王华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放火、赌博、开设赌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破坏生产经营、交通肇事、包庇、窝藏等十多项罪名，该案在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开庭审理，30多名同案者当庭受审。

一个曾在街头打架、盗窃的少年，通过在漯河盘根错节的社会网

络，用血腥和暴力打压对手，靠威胁、敲诈、侵占等手段攫取财富，随后进入政界，官至当地政协常委，靠官方身份为生意保驾护航，成为媒体口中乐善好施的典范。王华入狱后，考问远未结束。

复仇

王华如日中天时，他名下的漯河银都大酒店也曾风光无限，当年还接待过世界级别拳王霍利菲尔德。然而如今，这里满眼狼藉：酒店门口写着“银都大酒店”的巨大风景石倒在地上，白色柱子被喷涂上黑色大字“杀人现场”、“杀人偿命”。大厅里空无一物，一堆椅子从里面堵住旋转门。

这混乱来自于王华曾经涉嫌杀害的杨玉忠和付琴香的家属，王华被拘捕后，他们到银都大酒店抗议。酒店对面商铺老板回忆，去年5月13日早上8点左右，这条街面已聚集了上百人，这些人涌进银都，挂起巨大横幅，涂写黑色大字，控诉王华杀人。并在酒店大门摆满花圈，两侧搭起灵堂，奏响哀乐。

当时酒店的客人不得不全都退房，酒店暂停营业。抗议的人群不断涌来，占满了这条不宽的马路。十几个人将门前的风景石套上绳子，合力将石头拉倒。警察们到来后也无力阻止。抗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政府出面答应关闭银都大酒店后才平息。

王华被抓之前，已有诸多王华的反对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上访、反映情况，但王华一直安然无恙。一位司法系统人士称，“每个部门都有王华的上访信，但是一看是反映王华的，全都随手扔在一边，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知道，王华的关系非同寻常。”

根据杨玉忠家属的描述，杨玉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贩卖衣服攒下不少积蓄，但很快在赌场上输光，只好投靠王华，帮他照看赌场。

漯河检方起诉书称，1998年至2006年底，王华为牟取非法利益，积累组织财富，扩大组织规模，组织犯罪嫌疑人在漯河银都大酒店东二楼、银龙度假村、金信公司等地采用百家乐、电脑版俄罗斯轮盘等方式，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并且找人分别监督赌场的管理、会计、卖码、望风、接送赌客等具体业务，获取非法利益。

杨玉忠应该是王华赌场中的一员。杨玉忠的家属称，1999年杨玉忠服刑10个月，出狱后，杨玉忠一直说“华哥”会给他一笔钱。他向王华多次索要，但迟迟未能拿到。1999年12月28日，杨玉忠接到一个电话后

出门，一去不回。

直到2013年，王华被抓后，向警方招供杀害杨玉忠和付勤香一事，受害者家属累积数十年的怨恨情绪终于全都迸发出来。

纵火

漯河地处河南中南部，发展迟缓，1986年才升级为地级市。王华很早就在这座小城出了名。

1981年王华因为盗窃水泥预制板被收审过三个月，之后8年在当地的服装鞋帽公司上班，1991年后开办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和公交公司，逐渐发家。2013年案发时，他担任漯河市三鑫稀土有限公司董事长、漯河市政协常委等职。

王华身材高大，微胖，双下巴，国字脸，嘴唇偏厚，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他的生意对手形容，王华凶狠、难缠、不择手段。进入政界后，王华剃去胡须，在众人面前温文尔雅，常常面含笑意。

奠定王华“江湖地位”和社会上“威望”的，是他的“仇家”宛振雨被纵火烧死之后。

宛振雨在上世纪90年代的漯河经商，颇有影响，知名度甚高。因为生意上的债务纠纷，宛家人把王华砍伤。警方的审讯记录显示，孙培国称，王华想“让宛振雨在漯河街上丢丢人”，要“弄点汽油把宛家的金店烧了。”

接下这单“脏活儿”的人是孙培国。

孙培国与哥哥孙培超、嫂子苗会菊商量后，决定不找外人，“自己干，钱我们自己赚。”

孙培国告诉警方，1998年10月18日凌晨，孙培超和妻子苗会菊骑车到宛家的金店，把装汽油的塑料袋放在木条箱里，再把箱子靠在金店的卷闸门上，然后将卫生纸包着火柴放在塑料袋上，苗会菊点了一支烟放上去后离开。很快金店一片火光。

宛振雨和妻子孙淑兰正在金店看门，命丧火海。公安机关的审讯记录显示，王华承认前后给了孙培国30万元，但一直否认指使孙培国纵火杀人。

之后数年，王华一步步官至漯河市政协常委。“由此也看出王华的背景深厚。”一位不愿具名的漯河官场人士称。

当时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现场侦查后认为，是电源插座起火导致，属于意外的火灾事故。宛家人无法接受，因为“附近根本就没有电源插座”。

1998年10月19日，在漯河市一位领导的要求之下，警方派人重新勘察现场。之后，并未给受害人家属明确回复。无奈之下，直到当年的11月20日，由宛家出钱，带领办案人员到沈阳等地做了火灾鉴定，才得出外来火源引起火灾的结论。

火灾发生两个月之后，源汇区公安分局消防监督科正式出具了《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此次火灾事故的原因有可能属于纵火，应立案侦查。并抄送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源汇区人民法院。

但是王华始终没有被调查。孙培国回忆，王华找到他说，没事了，警方已经认定为是电源起火事故。王华陆续付给孙培国30万元，孙培国和王华每次见面都带着录音设备，他对王华直言，“不得不防着你把我灭口了。”

王华听后十分尴尬，手指哆嗦着把烟放进嘴巴里，一再声称自己很讲义气，一辈子也不会干灭口的事。

宛家一直向警方请求对王华进行调查，但警方始终未对王华立案。

事情峰回路转于2007年。

当年4月，苗会菊在其家中向吸毒人员出售海洛因，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苗会菊发现孙培超另有新欢，儿子也被孙的大姐带走，房子被租给了别人。苗会菊惊怒不已。孙培国担心哥哥得罪了嫂子，她会去自首告发他们，便萌生杀掉苗会菊灭口的念头。但孙培超不同意，并将孙培国的想法告诉了苗会菊。

苗会菊决定告发孙培国兄弟两人。她找到宛家，称知道谁是凶手。2012年12月26日，苗会菊向漯河市公安局实名举报：1998年的大火幕后指使者为王华。随后漯河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这起纵火案重新展开侦查。王华的代理律师陆永歌认为，公诉机关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王华指使纵火杀人。宛振雨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代理律师李肖霖则称，纵火凶手跟死者并不相识，且纵火前后付给孙培国30万元，如果不是王华指使，与常理不符。

王华在漯河经营多年的关系网开始就此缓慢崩盘。

发家

王华发家于收购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1997年，漯河市市委书记程三昌响应中央政策，在漯河开启了国企改制的序幕。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当时有160多名职工，退休职工80多名，占地40余亩，有办公楼、仓库、万祥街门市部，按照当时的地价和房价，总资产超过3000万元。

一名老职工回忆，当时改制时，公司的运营状况良好，每年有几百万的收入。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程三昌，体改委领导、市外贸局局长秦建忠力主拍卖，并支持王华购买。

程三昌被漯河当地人称为“程卖光”，在1995年至1999年的任期内，亲手卖掉国有企业27家，个人获利上千万元，他随后潜逃新西兰，至今未归。此次中纪委的百人通缉名单，程三昌榜上有名。而2014年，秦建忠在任漯河市党组成员时已经被双规。

耐人寻味的是，程三昌的前任，原漯河市市委书记王有杰因为受贿，并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而程三昌逃走之后，接任漯河市市委书记的刘炳旺又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罪，被判刑17年。

程三昌的改制方案遭到职工的反对。为此，外贸局和体改委派驻了联合工作组，口头免去了外贸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所有职位。在拔掉“钉子”后，程三昌提出新的改制方案——谁出钱多谁来做公司的法人代表。

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职工回忆，当年职工一方出资了255万元，王华暗中以他人名义出资350万元，最终掌控公司。

1998年10月，改制完成后，漯河畜产品进出口公司更名为华中对外贸易公司，新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王华以及他的华颖集团就搬进了华中对外贸易公司办公，公司财务、办公室、后勤等各科室负责人被更换，公司原职工大多离开，整个公司由王华控制。

王华将这间企业的门面房出售，并且在集资房的名义下，把公司的四栋仓库拆除，报建商品楼出售盈利。

官商

王华两次涉嫌命案，却能逍遥一直未被调查，杨威或是关键人物之一 ，杨威时任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据一位熟悉王华的人士称，2011年，王华的两个属下反水，拿着材料去派出所报案，称王华敲诈勒索，报案材料中有详细的敲诈勒索过程，派出所立案后，很快接到上级部门通知，要求立即停止调查。

这和当时宛家以及杨玉忠家属的遭遇相同。杨玉忠和付琴香失踪后，家属们去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报案，在派出所的楼道里遇到了杨威。

杨威同时跟王华及杨玉忠熟识，他热情地跟杨玉忠的家属们打招呼，让他们去刑侦大队报案后就匆匆离开。杨玉忠的家属报案后，十多年都未获立案。

宛振雨的家属回忆，当时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但警方“就是不调查”。王华案发后，时任源汇区公安局副局长杨威、漯河市源汇区公安民警孙景炎均被拘捕。

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称，1998年的火灾中……“根据火灾调查管理范围应该立案侦查，时任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副局长的杨威违反规定，明知道该案应当刑事立案，而长期不安排，不督促办理刑事立案手续，明知道王华为重大嫌疑人而不组织、不安排对王华采取侦查措施，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杨威刑事责任。原源汇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孙景炎作为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也违反规定，不立案，且私自提审证人，应以滥用职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两个科级公安系统官员能培养出横行漯河二十多年的大哥吗？”一位接近政府人士称，王华在当地政府的人脉远甚于此，当地官员见到他多以“华哥”相称，曾经很多人都笑称，“华哥是公安局的政委”。

王华于2002年开始任漯河市政协委员，步入官场。2007年开始连续两届任市政协常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场人士称，当时讨论漯河市政协委员的人选时，王华曾经遭到诸多人的质疑，但是一位市里主要领导当场表态支持王华，王华顺利当选。

王华的“江湖”名声在当地并非秘密，媒体人士也多对王的作为有所耳闻，但在当地媒体上，王华仍被称为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一位漯河媒体的高层回忆，他在举办一次慈善活动时曾找到王华，希望得到捐助，因为听到一些王华的“江湖”往事，原本不报希望，让这位人士意外的是，王华爽快地答应了。

当地新闻媒体2012年11月报道了王华向漯河福利院捐赠电梯的事迹。在这篇新闻里，王华被称为“扶贫济困、乐善好施传统美德的慈善人士”，体现了“企业家的爱心、义举和情怀”。时任漯河市市委、市政府的几位官员出席了这次捐赠，并与王华一起剪彩。

王华从商界涉足政界，各种名誉纷至沓来。资料显示，王华曾

获“河南省百佳慈善大使”、“河南省关爱新农村十佳慈善人物”、“漯河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王华还身兼多个社会职务，曾任漯河市召陵区工商联主席、漯河市工商联副主席和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

王华被抓后，为排除干扰、减少阻力，河南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专案组，抛开漯河市公安局，直接组织警力办案。流传于漯河的“华哥”传说，终于落幕。

徐钢的双面人生

记者 / 郭天力

无实权时刻意隐忍、低调；一旦身居要职，强势一面暴露无遗。徐钢的仕途表现，是大陆官场中典型的双面人格写照。

意料之中，这是福建当地人士对中共十八大后福建“首虎”，原副省长徐钢落马的反应。

有关徐钢落马的负面传言已久。三年前，徐钢主政泉州大张旗鼓搞城市建设时，即有人在网上发帖指责其以权谋私为弟弟的公司输送利益，还有不少地产商“酒友”等等；2014年3月，中纪委第九巡视组对福建省进行了巡视，已升任副省长的徐钢也专门被叫去接受问话。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回来之后的徐钢就一直显得萎靡落魄，有时甚至公开场合连胡子也不刮，与其以往仪表整肃的形象判若云泥。这些细节似乎已经预示徐钢的政治结局。

一年后的2015年3月19日，徐钢接到通知称让其第二天到省委开会。次日，徐钢准时抵达会场。除了福建省委主要领导，会场里还有几个陌生面孔——他们是来自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随即，徐钢被宣布涉嫌违纪违法并被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徐钢就被带离福建前往北京。

徐钢的落马，在福建官场，尤其是其曾主政五年的泉州造成剧烈反响，“泉州的官场地震即将来临”，当地一人士称。

低调与强势

现年57岁的徐钢是福建浦城人。徐钢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就读于复旦大学管理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属于福建高官里并不多见的名校科班出身，而非后来仕途中通过党校、在职等方式获得学历。

大学毕业后，徐钢分配至福建省经委综合处，从普通科员做起，他先后担任过福建省经委综合处主任科员、福建建阳县副县长（挂职）、福建南平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福建省经贸委办公室主任、福建省经贸委主任助理、莆田市副市长、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从科级走到正厅，徐钢用了20余年时间。熟悉他的人士称，徐钢仕途前大半期，隐忍、低调，温文尔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徐钢还曾经被公派英国利兹大学管理学院进修过一年（1995年8月—1996年10月），“喝

过洋墨水”的他更加注重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

2003年，踏入仕途21年后，徐钢被提拔为福建省交通厅厅长，这是他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一把手”经历，也由此开启了他在实权部门12年的纵横捭阖。上述知情人士称，其政治野心以及性格中强势的一面也就此暴露。

据陆媒公开报道，福建省交通厅的一名官员曾公开表示，徐钢在交通厅作风强势，处长们经常被骂得灰头土脸。另有一副厅长则称，早年当处长时，还可以批几百万元的项目，但徐钢到任后，当副厅长的他连一百万元的项目都批不了了。

一位泉州市退休官员也向《凤凰周刊》证实，徐钢有时候说话很不给人面子，开大会的时候也会公开批评一些处级甚至副厅级官员，当地一些干部对他很有意见，有官员私下对其评价极低，甚至称其“简直不是人”。

徐钢落马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发布过一条报道，称徐钢为“三不书记”。文中称，2008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考虑全省港口综合发展，原则同意了省交通厅关于湄洲湾港口（主要包括泉州、莆田）体制一体化建议方案。但时任泉州市委书记的徐钢先是同意，后却又因利益不平衡极力反对，并采取一系列非正常手段，激发民众掀起舆论焦点，导致“省令难行”。后来又将此番闹事策划之责栽赃当时省交通厅，以至于泉州港、福田港改革事宜最终没有着落。由此，徐钢被评价为“不讲政治，不守纪律，不懂规矩”。

徐钢的强势还反映在推进泉州市委市政府搬迁新区上。泉州人士高金融曾在市委任职，他告诉《凤凰周刊》，泉州新行政中心位于远离主城区的东海片区，徐钢到任时，新行政中心建设正酣。2010年1月，新址宣告竣工，但公务员们都嫌太远，周边配套不完善，上班不便，希望搬迁工作“能拖一天是一天”。但“徐钢大手一挥：搬家！从此大家都要长途跋涉二十来公里上班。部分公务员颇感不便。”至今，泉州新政府大楼已启用近四年，周边配套依然匮乏，人烟稀少。

不过，也有不少人士对徐钢“性格强势”的评价不以为然。一位泉州官场人士向《凤凰周刊》表示，徐钢性格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坏，他还是很有礼貌，也比较给人面子。他的强势是相对于一定级别的泉州高官，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徐钢会口无遮拦地批评。

这位人士透露：“大约在2010年，他给几十个市直部门、近百名面临退休的公务员提了半级，让他们提前两年退休。面临退休的人少上两

年班，还能多拿工资，给后人腾位置，痛痛快快退休了。所以这些人里头有不少说徐钢好话的。但这种让人提前退休的做法在泉州并不多见，里头蕴含着跑官风险。”

在泉州市委机关工作过的张先生告诉《凤凰周刊》，他与徐钢虽然接触不多，但能感觉他不是落马后媒体上渲染的不近人情、劣迹斑斑的人。“有一次临近年末，有一帮四川籍农民工到市政府大楼拉条幅讨薪。徐钢看见后上前询问缘由，并当即给企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让其马上解决工资问题，直到对方给了确切答复他才离开。”张先生说，这件事是他亲见。还有一次，徐钢出席一个接待活动，不管是领导席还是普通员工席，他都一一上前，给每一桌都敬酒，“他酒量真的不错”。

文化与商业

2008年4月，徐钢由福建省国资委主任调任泉州市委书记。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官方资料显示，泉州的经济总量连续十几年来都是福建省排行首位，远超省会福州市和特区厦门市。但过往经验，作为福建最富庶之地的一把手，泉州历任市委书记的仕途终点却大都止于副省，鲜有进入省委常委的机会。

徐钢当时是福建官场的红人，他极有希望破除泉州这一“仕途魔咒”，泉州各界对其到任也曾寄予很高期望。当地人士认为，徐钢毕业于名校，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又去英国留过学，还曾经长期在经济部门任职，希望其给泉州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徐钢似乎也不负众望，履新泉州不久，就主导通过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大张旗鼓在全市域内进行文化产业开发，高调提倡保护古迹，重塑泉州的“文化底色”。2012年6月，泉州还举办了首届文化创意产业节。徐钢在开幕式上说，泉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空间广阔，有着无限的潜力。

泉州是大陆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任主官对古城区内的地产开发均持谨慎态度。徐钢的文化产业开发政策既定，古城区内古城改造项目便成为开发商争夺的焦点。

泉州下辖的晋江市（县级）安海镇西村村民王愿望告诉《凤凰周刊》，安平桥主题文化公园项目是徐钢发展文化产业的典范之一，该村200多亩基本农田被以建文化公园的名义征收，但土地最终变成高档别墅区。村民为此多次向国土部门反映该问题，晋江、泉州和福建省三级国土部门的书面回复始终回避公园变成别墅区的根本问题。“这都是徐钢

主政泉州时，大搞文化产业的后遗症。”王愿望称，如今徐钢虽落马，但他也因多年上访成了地方政府的眼中钉，至今滞留北京有家不敢回。

王愿望等人认为，保护古迹，大家当然欢迎，但徐钢的文化产业其实是以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为代价，为地产商做嫁衣，这才是徐钢“文化治泉”的实质。

泉州市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文化创意项目T淘园，《凤凰周刊》记者日前走访该园区发现，这里已经基本上被饭店、歌舞厅等经营场所占据，所谓“文创园”，名实难副。

徐钢的一位前同事告诉《凤凰周刊》，徐钢主推的文化产业项目，往往以商业地产的面目出现，与文化无涉，甚至还导致古城文脉被毁、村民上访等负面传闻。“这些项目在推进阶段，他与部分开发商的关系微妙，也引发了外界对他的猜疑，由此被称为‘地产书记’。”

不过，“地产书记”也好，“三不书记”也罢，相关负面评价并未动摇徐钢在泉州主政的地位，甚至未影响到他此后于2013年初晋升福建副省长。

举报与删帖

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由于徐钢在城建等项目上强势推进，他与规划、建设和开发商四方就敢拍板项目，完全不将泉州市委、市政府班子成员放在眼里，引起了部分官员不满。矛盾在2012年达到顶峰。也就在这一年，一篇题为《揭秘福建地产书记徐钢》的网文开始流传。该网文将徐钢如何与高层接近获得上位机会、如何控制房地产开发和泉州人事布局，描摹得绘声绘色。徐钢看到后，匆忙找人删帖，并要求看过的人不得扩散。

曾看过该网文的一位泉州前市级领导称，帖文未可尽信，里头真真假假，但是一些关于土地审批权等非常细节的东西，如果不是内部人或者是代表内部人利益的人士介绍，普通人很难编得出来。“可以肯定，徐钢的一些做法肯定损害到了有关方面的利益，引发举报。”

对这份举报材料，泉州市政府某在任官员向《凤凰周刊》透露，文中提及海峡电子汽配城项目一段属实。“这个项目以汽配城名义低价拿地，结果汽配城所占比例极小，大多数都是房地产，导致被征地农民多次上访。泉州是侨乡，上访者中很多是华侨。有一位加拿大华侨实名举报该项目问题，结果举报信被徐钢批转给被举报部门，导致这位人士遭受人身威胁，不得不仓促离境。但其他上访者依然每年到省市三级纪检

部门查询案件办理情况。”这位官员表示，徐钢被指与该项目难脱干系。

徐钢落马后，这篇三年前的帖子重新被人发布，现在已经没人再删帖了，任由网民回复。有多个消息源均指，该帖文系泉州某位市级领导所发，但泉州官方对该说法保持沉默。

泉州多位退休干部告诉《凤凰周刊》，帖子出现后不久的泉州春节老干部座谈会上，“因为这个帖子指向性很强，目的就是搞臭徐钢，徐钢非常愤怒。他当场说写这篇帖子的人是叛徒，要和其单挑。”

一位认识徐钢、现居福州的官场人士则对《凤凰周刊》说，徐钢多年在福州省直机关任职，真正在地方任职的经历不过三年，泉州经济发达，官场大都是本地人，徐钢作为外地人挤进这个圈子，想推行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强势，恐怕会被本地人架空，一事无成。“但他在一些项目上的做法并不十分干净，如为亲属暗中输送利益，更引当地人不满，受到举报，在所难免。”

除了官场上，泉州群众对徐钢也从期待变成失望。特别是2012年4月1日，福建省交通厅对外公布，泉州港以及莆田港的兴化湾港区，合并组成新的湄洲湾港。原泉州市港口管理局、莆田市港口管理局及其相关机构相应并入福建省湄洲湾港口管理局。这意味着，沿袭上千年的“泉州港”的名称，将被“湄洲湾港”所取代。这一决策让爱港心切的泉州人难以理解。当时，泉州民间爆发了“护港运动”，甚至有人将讲述泉州港历史的书籍烧毁，表达古港“沦陷”的愤怒。图片传到网上，引发各界热议。

泉州当地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在这场舆论热潮中，徐钢的表现既未能获得上层首肯，也让泉州民众对其不信任，两头不讨好。由于徐钢主导的泉州官方对民间组织的游行和网上声援实行打压、删帖，泉州百姓认为徐钢“卖港求荣”，民间甚至称徐钢为“死港”（闽南语“徐钢”与“死港”发音相近），称其要将泉州港置之死地之意。

舆论压力之下，泉州港的名称得以保留，这一结果令省里的通知成为一纸空文。有消息称，徐钢主政的泉州官方也令福建高层不是很满意。

福建一官场人士称，该事件客观而言，“徐钢抵制与支持均不对，属于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但其左右摇摆同时也反证他对地方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认识，不少当地人由此对徐钢的发展理念彻底产生怀疑，认为他能力平庸，难堪大任。

反腐与涉腐

徐钢仕途中，曾多次强调反腐的重要性。2008年夏天，他到任泉州仅三个月，便召开全市预防腐败工作会议。徐钢在会上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强化表率，明确责任，狠抓落实，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纪律保证。

根据《泉州晚报》的报道，徐钢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在泉州，一些群众不是在找熟人，就是在去找熟人的路上。这是一种滋味苦涩的文化怪象。"为此，他多次发起"破解熟人经济"的大讨论。

但泉州一位官员告诉《凤凰周刊》，徐钢虽然不断提出破解"熟人经济"，他自己却不断从"熟人经济"中获益。比如徐钢的弟弟就是做生意的，徐钢的官位坐到哪儿，其弟的生意链就延伸到哪儿。据该官员介绍，上世纪90年代徐钢在莆田当副市长时，他弟弟就在那边经商谋财；后来，徐钢担任交通厅长，其弟的生意便转到了交通领域，"近年来交通建设力度巨大，里头蕴含着大量的商机。徐钢弟弟既做沥青生意，也转包交通工程牟利。如果不是徐钢的关系，他能拿到这些项目？"

徐钢落马前，泉州市委常委、南安市委书记骆国清已于2014年初涉贪腐被查；徐钢落马后不久，骆国清的继任者、现任南安市委书记黄南康亦应声落马。多个消息源指称，徐钢与骆国清和黄南康二人的关系绝非普通。"黄的上位，正是依靠徐钢这位熟人。徐担任泉州市委书记的消息传来后，黄南康大喜过望。他对多位人士公开说，徐钢是我铁哥们儿，你们找到我就是找到了徐书记。"前述泉州官员称。

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黄南康的妻子任职银行系统，徐钢妻子也在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任职，每年为该银行大量揽储。徐调往福州后，徐妻亦调任该行省级分行工作。这种丈夫当官、妻子利用丈夫影响力揽储的组合，在中国大陆曝光的反腐案件中并非个例。

泉州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有上市公司几十家。市域内的晋江、南安等地均有特色产业享誉一方。与民营企业家的交往，也成为徐钢任期内难以回避的课题。

去年12月，泉州曾爆出一件骗税大案。泉州市国税局原局长蔡俊伟涉及骗税案被抓。据悉，蔡俊伟岁数不大却家资亿万，其从国税局辞职后曾到安踏集团就职。目前此案详情官方尚未披露。《凤凰周刊》记者多方打听，得知此案由省级部门带队查办，案情连国税系统中层领导都不知悉，"涉案金额肯定很大"。当地有人士称，蔡俊伟与徐钢私交很好。不过这一说法，《凤凰周刊》未获得当事人证实。蔡俊伟案发后，

安踏总裁丁世忠被指牵涉该案，但他很快发布声明称与蔡案无关。2015年的全国两会，有本港媒体报道称，身为人大代表的丁世忠请假缺席，引发猜测。4月7日，晋江市召开一年一度的工商业千人大会，当地商业人士称，往年的明星人物丁世忠缺席。由此，当地关于丁世忠的传言流传开来。不过，4月初安踏公司曾在香港召开股东大会，丁世忠出席了会议。会后还接受媒体采访，称有信心实现今年营业收入突破百亿。4月30日，安踏公关负责人士也向《凤凰周刊》表示：丁总现正常巡店，未受蔡案和徐案影响。5月8日，丁世忠现身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了第3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泉州也是全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中石化、中化都在当地有石炼化项目，还有众多民营炼化企业。其中，中化泉州项目是中化集团在全国最大的炼化基地。该公司2006年在泉州注册，此后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总投资达到数百亿元之巨。身为泉州一把手的徐钢，曾多次到这些企业调研，并接待企业总部委派的负责人。

福建一位不愿具名的厅级官员透露，曾长期在石油系统担任领导的某高层领导之子，近年来染指众多石油项目被查。此人在泉州亦有生意，“徐钢被指给这位高官公子的石油生意提供便利，并从中牟利。除了福建本地的线索外，这是导致徐钢落马的另外一环。”

徐钢落马前四天，中石油副总经理廖永远被查；徐钢落马后一个多月，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被查。有分析人士称，此三人的落马或非偶然，应与同一案件有关联。

2011年底，徐钢在泉州党政干部反腐大会上表示，年终将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要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不碰“高压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谨记平安是福！

回忆起这次大会，高金融叹口气说：“他是这么说的，但真到了年底，过节送礼的车照样堵得水泄不通。这样的反腐工作，纯属面子工程啊！”

唐山前市长陈学军的黑金江湖

记者 / 郭天力

祖籍江苏的陈学军，深耕唐山政商界38年，从基层民警做起，

由公安系统转为多年主管唐山重要工业区的开发，直至唐山市市长要职，

在当地商界被称为“隐形富豪”，在官场上亦被认为“高层背景深厚”。

唐山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百年名企开滦煤矿就诞生于此。唐山地下蕴藏着储量丰富的煤炭、钢铁等资源，这片“黑金”之地曾造就无数财富神话。中共自十八大反腐大幕开启后，唐山本地十多位官员落马，职位最高者即是陈学军。

2015年6月5日下午5点多，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陈学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数分钟后，中纪委网站上也发布了同样信息。这一时间距陈学军卸任唐山市长仅过去3天。此前大陆某媒体报道商人车峰因涉嫌经济金融领域违法被调查，文中描述车峰的“圈子”里有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并点名陈学军也在其中。

祖籍江苏的陈学军，深耕唐山政商界38年，从基层民警做起，由公安系统转至多年主管唐山重要工业区的开发，直至唐山市市长要职，在当地商界被称为“隐形富豪”，在官场上亦被认为“高层背景深厚”。

片警起家

洼里乡位于唐山东部开平区，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煤场，紧邻的205国道上，拉煤的大卡车往来不断，烟尘飞扬。38年前，18岁的陈学军来到洼里乡派出所当内勤，这个基层民警的身份被外界视作他在唐山仕途的起点，此后11年，陈学军一直未获升迁，直至1988年4月，陈学军突然越级升任唐山市开平区公安分局洼里乡派出所副所长。

彼时洼里乡社会环境复杂:进出煤矿的205国道两侧分布着不少“大车店”（外来货商临时居住的小旅社），多提供色情服务，鱼龙混杂。各个煤矿之间也竞争不断，严重程度不一的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曾与陈学军在这里同事多年的尚平（化名）回忆：陈学军读书不多,但颇具手

段，“他对混混们说，你们要打架，不要在我的地盘打，小混混们很怕被陈学军收拾，有的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经过他的整治，洼里的治安比以往好了很多。”

这被外界视作陈学军获得晋升的“政绩”，但与陈家相识多年的冯晓云认为，其中还有陈学军父亲的一份影响。冯晓云介绍，陈父曾在唐山市工商局担任领导，头脑灵活，曾开过水泥厂，供应唐山的一些大型国企，获利颇丰。“受父亲影响，陈学军在当民警时就开始经商，”冯晓云当年也曾与陈家在商业上有往来，“他曾开办多个小企业，包括一家小钢厂，都赚了不少钱。”

从上世纪80年代至其后的30年，公务人员经商在大陆许多地方都是不公开的秘密，也是地方商界生态的组成部分，陈学军经商显然也并未给他的仕途造成明显障碍。此外，冯晓云和尚平均认为，陈学军在当上洼里乡派出所副所长后几乎连年晋级，也源于开平区某女领导的赏识。尚平记得在参加一次会议时，“这位女领导公开说，陈学军是个人才，必须提拔。”

陈学军与这位女领导关系密切在当年的唐山并非秘闻，多位官场人士均对此记忆深刻：“这位女领导与河北省一位高级官员交往颇多，陈学军此后仕途顺畅，或与女领导的推介相关。”一位曾在开平区任职的官员如是分析。

一记耳光

开平历来是河北商贾重镇，建国后划归唐山市管辖，这里即为陈学军起家之地，多年后他出任唐山市市长，也仍住在开平的一座高档社区——东城绿庭。该小区被当地人称作最好的住宅区，小区中央有十余栋英伦风格别墅。

东城绿庭的开发商与陈学军相识多年，情谊匪浅，陈学军常与商界各领域富豪宴饮，一位早年在酒桌上与陈学军相识的人士称，陈讲哥们儿义气，喝酒十分豪爽，喝两斤白酒不显醉态。一位唐山市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陈学军和他的富豪朋友们互有协助，“这些富豪经常帮陈学军‘平事’，每当网络或纪委出现举报陈学军的材料时，这个平事团队便会出现。他们会先用钱封嘴，如果不行来硬的。所以，陈学军落马前在网络上没什么负面传闻。作为回报，陈学军也会帮这些富豪在商场上挤下竞争对手。”

官场与商场都没有永远的朋友。陈学军与当地著名房地产商B即因土地公案由密友反目。B名下的房地产公司曾是唐山的龙头企业，2008

年唐山的房地产市场热度不减，陈学军将两个优质地块交给B开发，B交了3亿土地出让金，并办妥大多数项目手续时，却收到政府一纸通知，两个地块开发权被转交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开发。一位接近此事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陈委托一位富豪做说客，上门退还土地款，但屡次被B拒绝。B专程到唐山市政府办公室找陈学军，当着多人的面，陈学军扇了B一记耳光。二人至此彻底决裂，B开始长年上访。“他连唐山的房子都不卖了”，另一位认识B的人士称，“直接住到了中纪委监察部门口的小宾馆里，持续举报陈。”

目前，其公司注册地址已无人办公，部分项目处于烂尾状态，该公司此前的售楼处，也成了家具卖场。

高层人脉

2006年，陈学军的仕途生涯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当年唐山正在推进平房改造，但拆迁工作进展缓慢，一位政府人士回忆，陈学军主导此事后，大量的破旧小区被迅速拆平，建成高楼，唐山的城市面貌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改观。第二年，陈学军仕途更上层楼，成为市委秘书长。在这个过程中，陈学军也收获了积极评价，一位市政府官员回忆他当时敢想敢做，颇有魄力：“如果没有当年的‘大手笔’（拆迁），唐山还有很多人至今住在震后盖的简易房里”。

一位接近河北省组织系统的人士告诉本刊，在确定唐山市长候选人时，原定的候选人并非陈学军，陈可能的去向是河北另外一城的市长。陈学军在唐山深耕多年，自然不愿意离开大本营去人地生疏的城市。第二天，该方案即被改变，陈学军成为唐山市长候选人。经过投票，陈学军如愿当选唐山市长。

陈学军任职市长后，逐渐与一位唐山市政府主要官员不睦，凡是有这位官员出现的会议和场合，陈学军均不出席，“他自认有高层人脉，对其他官员态度不够友好。”一位熟悉他的官员说，而当年提拔过陈的官员，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

唐山官场传闻，陈学军处在北京某高级政商圈中。有一年，陈学军曾在北京主持在京唐山人春节团拜会，一位出席过该活动的人士称，团拜会上出现数位在京身居要职的唐山籍人士：“陈与这些领导互动频繁，显得关系不错。”

盘桓唐山政界近40年，陈学军人脉广阔，他的亲友们也从中获得益处。陈学军在洼里当民警时与洼里卫生院当医生的孙慧芬成婚，两人育有一子，取名为陈某。陈某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就职于电力系统。一

位接近陈家的人士称，陈某喜欢石油生意，在唐山多地参股加油站，也涉足矿山买卖。

成也“圈中人”，败也“圈中人”

作为煤铁重工城市，唐山一直吸引着资本和权力对此间的财富争夺。而陈学军曾多年分管国土、工业等实权领域。陈学军从2003年4月开始，以唐山市副市长职务兼任南堡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到2012年2月，陈又以唐山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主管著名的曹妃甸工业开发新区，任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唐山两大重要的工业开发区，均曾在陈的负责之下，尤其是曹妃甸开发区，作为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至今投资达到数千亿，一位熟悉曹妃甸建设的人士告诉本刊，陈学军对南堡开发区和后曹妃甸新区主政投资建设介入颇多，陈某的儿子陈某介入吹沙造地和其他工程项目，引起诸多非议，“部分公司合起伙来，举报陈学军家此类问题。”

大陆媒体此前曾公开报道，陈学军进入马建、郭文贵和车峰等人的富豪圈。熟悉唐山政情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2014年落马的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亦是该圈子成员之一，景、陈二人交往颇多。景春华1973年在开滦矿务局唐山矿四采区当工人，后升任开滦矿务局团委副书记。从1987年6月到1992年，景春华任职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在这期间，陈学军一直在公安系统内，从普通民警直到开平区公安分局局长。“不管是从高层关系，还是个人积累的财富，陈学军都有足够的资本进入他想进入的富豪和高官圈子。”一位唐山政界人士说。

一位接近唐山纪检部门的人士称，陈就任唐山市长后，曾两次遭遇河北纪检部门的调查，但均最终脱身，“陈出身公安，反侦查能力强。”这位人士观察到，每次被查后，陈学军都会邀请几位富豪朋友到郊外一个幽静院落躲几天。这个院落位于洼里乡北部，唐津高速西侧，人迹罕至。

2015年6月1日上午，唐山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突然免去陈学军唐山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陈不再担任唐山市市长。唐山官场在5月下旬对这项人事调整已有传言，在唐山市长任上的陈学军，被调往石家庄担任河北省住建厅党组书记。一位当地官员告诉《凤凰周刊》，陈学军赴石家庄上任前一天晚上，不少同事一起聚餐，为陈送行，“虽然大家表面上一片祥和，陈学军也应和着大家，但是那个气氛还是有些尴尬。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陈此番去石家庄，可以说是’凶多吉少’。”

一位接近河北省纪检系统的人士称，陈学军被抓，除了涉及在唐山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涉及为某北京高官洗钱，数额惊人。陈学军被带走调查后，先监视居住在石家庄西北某宾馆，“多位唐山富豪离境躲避风声，基本都是当地钢铁和地产大亨”。

本刊记者获悉，陈落马后，唐山市公安局某退休副局长亦被带走协助调查，唐山市政府某秘书也与外界失去联络，曹妃甸管委会也陆续有十位官员处于协助调查中。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落马幕后

记者 / 杨桐

6月4日，监察部官方网站公布一则短短几十字的消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皖西小城六安，随着这个前市委书记的落马而陷入一片骚动。

倪发科从安徽省六安市升任安徽省副省长5年后，最终没能实现软着陆，来自六安的轮番举报令其轰然落马。

倪发科被查起因颇多，在任职六安市委书记期间，他不仅深度介入该省企业大昌矿业经营活动并持有暗股，在其主导的多个土地转让项目中存在经济问题。倪发科在六安任期内的大拆大建，亦令其与老干部群体结怨颇深。自其2008年升任副省长后一直面临不断的举报，每年都有倪被调查风声传出，今年终于传言成真。

六安官场亦因倪的落马引发地震，从年初延宕至今，且有继续发酵之势。倪发科1999年10月调任六安履职，2002年就职市委书记直到2008年2月。倪发科的功过是非在六安政商界争议极大。其支持者颇多，认为倪在任期间，六安经济从全省垫底升至中游，倪发科功不可没；他的反对者亦众，举出倪发科“经营城市”期间，掌控最佳地段的多是他从芜湖带来的一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倪发科亦有近亲在六安经营房地产。

但不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倪发科落马均不意外，称其出事不过是时间问题。主政六安期间，倪发科精明干练之余，处事亦不乏专断跋扈，他的从政轨迹和落马之路，是观察大陆官场利益规则的难得范本。

“六安来了扒市长”

倪发科被“双规”的消息于今年年初已在六安官场不胫而走。从1月28日召开的安徽省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上可见端倪：1954年出生的倪发科此时尚未到退休年龄，即便不再连任副省长，按照常规，也可担任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开始选举前，安徽省人大已接到中纪委通知，将倪发科的名字从人大主席团名单中删除，之后也未有其新职务安排的消息。

3月27日上午，倪发科在科技厅与合肥市领导陪同下视察合肥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这次公开露面后，外界推测倪发科已平稳着陆，但时至5月，随着六安市副市长权俊良从市政府办公室被纪委带

走，六安市许多官员已断定倪发科仕途就此走向终点。

当时被纪委带走未归的还有六安一名黄姓地产商，黄为六安盐业房地产公司的实际老板（法人代表为其亲属陈武），在梅山路的繁华地段开发有数处高层楼盘，直到6月初官方公布倪发科案发消息后才被允许回家。

另有消息人士称，早在去年年底，六安市供电公司某前任领导亦传出被纪委约谈。因该领导任职六安供电公司期间，该公司盖了两栋家属楼，开发商是倪发科的亲属。该人士称，倪的亲属起初并未出资，供电公司先期以每平方米800元的造价提前支付了工程款，令其得以“空手套白狼”获利。

地处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的六安曾以农业为核心，倪发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1999年，倪发科从芜湖市委副书记的任上调任六安任行署副专员，当时的六安尚未设市，行政上由安徽省委派驻的六安地委管理所辖六县。安徽省将倪发科调至六安，已有撤地建市打算，倪发科在芜湖当常务副市长期间政绩突出，调其来六安就是为了发展经济。

次年，倪发科成为新成立的六安市首任市长，提出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执政理念，并规划城市向东南扩大框架。一位曾在六安市政府任职的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履新之初，倪发科放出了一年完成招商引资15亿元的豪言，而之前六安每年招商金额尚不足2亿元，后来倪发科果真超额完成了招商任务，令人刮目相看。

六安第一批房地产开发企业均为倪发科从上一任职地芜湖引入，一场六安此前历史尚从未有过的拆迁风暴由此展开。六安民众起初对这种运动式拆迁非常抵触，认为拆迁补偿过低。在老城区改造中，还将明清时代遗留下的九拐十八巷等文化旧址拆除殆尽，六安街头曾经一度出现“如今没有共产党，六安来了扒市长”的条幅。

给倪发科招致非议的还包括国企改制。倪主政期间，强势推进淠河化工厂、朝阳制药厂、长江手扶拖拉机厂等六安大型国企均被悉数改制，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上访者甚众，反对者认为其为了替政府甩包袱贱卖了国有资产。其支持者则认为，倪发科改变了六安的城市面貌，让六安从遍地低矮破旧的砖瓦房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建成数个开放式公园。

城建在改变城市的同时，亦带来大量利益。1999年倪发科到六安时，六安生产总值尚是100多亿元，2008年他离开时则达到了534亿

元，其中担任市委书记之后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排名从倒数第一升至全省第七，即便倪发科已经落马，但当地网友聚集的《六安人论坛》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

但无需争议的是，这轮城建浪潮照例为大开腐败便利，2007年前后，六安先后有一名主管土地的副市长、一名规划局局长和两名土地局副局长因贪腐被判刑，当地人为此形容，“一个城市建起来，一批官员倒下去”。

老干部的举报信

倪发科真正在六安大展身手，是在其2002年担任市委书记之后。

曾在地委时期任一把手多年，并成为六安市首任市委书记的洪文虎这年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倪发科顺理成章成为市委书记。六安官场传闻，当时洪文虎本打算再干一届人大主任，省委找倪发科谈话时，倪坚决反对，称洪文虎处处对其掣肘，人大主任必须由自己兼任。

在六安官场，洪、倪矛盾几乎公开化。洪文虎是农业问题专家，多年来一直倡导六安主打农业，行政风格以稳健著称。倪发科来六安之初，洪文虎多次带他逐个同各部门负责人座谈，表示会倾尽全力支持。但后来二人行事风格完全迥异，一个重视农业，求稳低调，一个要经营城市，个性张扬，不久之后即貌合神离。

倪发科在六安官场被认为独断专行，当地一位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2003年倪发科引入华电六安电厂后，建设了两台13.5万千瓦和13.6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后来国家出台规定，要取缔60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项目，倪发科一边向上汇报说已经取缔了，但另一边却告诉厂方要抓紧施工，造成既成事实再说。环保部的调查组前来验收时，倪发科作检讨称这是他自己的意见，与其他班子成员无关，“六安太穷了，这一拆就是上十亿元打了水漂”，这席话令调查组哭笑不得，最终不了了之。

2003年前后，国务院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意在压低虚高的房价，而倪发科却在传达政策的会上放言，六安的房价现在才每平方米1000多元，合理的房价应该3000多元，“不能别人生病，我们吃药”。随着倪发科的城市大开发，六安房价一路上扬，最终达到了他预期的房价，好的地段则要六七千元。

2003年，安徽实行名为“阳光工资”的工资改革，但六安的工资只发到70%，与其他经济相当的城市存在不小差距，以处级干部为例，六安的处级干部工资1800元，蚌埠和马鞍山有3000多元，铜陵与安庆也有

2800元，这让现职干部们对倪发科相当不满。

一位曾与倪发科长期接触的人士称，倪发科在六安期间，在人事方面并未卖官鬻爵，他的秘书余杰曾是金寨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调到六安任办公室副主任之后级别一直没变，直到随倪发科一起到省政府后才从副处升至正处。六安市委机关报《皖西日报》一名女记者曾多次采访倪发科，倪发科对其文笔格外赏识，这位女记者后来给倪发科写信，希望能帮其解决编制问题，倪发科在信上批示“按有关规定处理”转给报社，该报领导为此大发雷霆，女记者从此不再受重用，最后只得离开。

但这位人士亦认为，倪发科家族在六安各大地产项目中渔利，其多位亲属甚至直接在六安开发地产项目。供电公司家属院明都阳光水岸小区和皖西大厦后面的恒泰小区，均为倪氏家族开发。此外，倪发科从芜湖引入六安的一批开发商几乎承揽了所有大型公共场所和重点地段的开发建设。根据六安市土地市场网公布的信息，2002年，芜湖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曾拿到了老地委大院后门2.6万平方米的土地，该公司老总已因卷入倪发科案而被纪委调查。

因地产和城建而起的利益输送，已经是大陆因贪腐落马官员的固定线路。除了芜湖金鼎之外，在老地委大院的开发中拿地最多的是安徽徽商集团，该集团下属的六安市徽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03年6月通过倪发科买到了老地委大院及周边的家属区近300亩土地，家属区大院内住的多是一些离退休的厅级老干部，倪发科曾向老干部承诺，拆迁就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但徽商集团只将临街位置盖楼出售，用拆除的老地委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办公楼兴建其徽商国贸小区，被列入二期工程的家属区改造却迟迟不见动工。被高楼挡在后面的家属区内的老干部们处境尴尬，被售出给徽商集团的房屋大部分是老干部们个人名下私产，且地价余款尚未支付，等待的拆迁亦10年未动。

买地的徽商集团却迟迟不肯拆迁，老干部们的房子多已老旧，普遍存在线路老化问题，加上之前开发商一期工程施工时破坏了大院下水管道，每到下雨家中便被雨水倒灌。

徽商集团内部之后变故连连，其前任董事长蔡文龙因贪污受贿等数罪并罚，于2009年8月被判处死缓，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大全也获刑9年，再也无力顾老地委家属院的拆迁开发。

许多老干部为此多次到北京上访，并动用各自的人脉关系斡旋，也

有人给安徽省和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彻查卖地的资金流向。倪发科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后，老干部群体的举报已基本呈现半公开状态，每年都有倪发科被调查的消息传到六安，而倪发科总是在传言开始引起议论时到六安视察工作，一方面为澄清传闻，另一方面，则是稳定当地官场同盟者的军心。

此次倪案事发后，多家媒体报道倪发科事件的消息来源均出自匿名老干部之口，一些六安网民则到前市委书记洪文虎的博客中留言，称其为反腐英雄。洪文虎离休后一直在六安居住，平时深居简出，偶尔会以六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公开露面，本刊记者曾试图通过网络与他联系，但一直未获回应。

楚歌四面

倪发科案发后，除了监察部短短几十字的通报，安徽官方未作任何具体涉案情节的披露，大多观察者均认为，这场官场地震的导火索由大昌矿业引燃。

安徽大昌矿业集团是第一家进入归属六安管辖的霍邱县的铁矿开采企业，有知情人士称，该集团老板与倪发科私交深厚，在酒桌上直接拍着倪的肩膀喊“老弟”。正是通过倪发科，大昌矿业获得了拥有2.3亿吨储量的霍邱吴集铁矿南段的开采权，而霍邱县财政收入则因为矿产开发，从之前不到2亿元上涨到现在的11亿元。

2009年7月，霍邱县决定通过人大投票的方式奖励给大昌矿业6亿元，当年该县的财政收入只有6亿元，此事经媒体报道引发舆论哗然，人大只得再次通过投票取消了这次奖励，外界普遍认为，奖励大昌矿业的决定就出自倪发科的亲自谋划。

有大陆媒体援引霍邱官场人士的说法，倪发科在大昌矿业持有暗股，且是其大股东，但倪发科到底以何种形式和名目持股，持股数量多少，如何分红，则目前尚无详细资料。一位六安知情人称，倪发科这次轰然坠马，除了有老干部长期举报的因素，更大的动力来自首钢。首钢总公司在2010年3月与大昌矿业合作成立总投资100亿元的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但双方合作并不顺利，首钢方面的人事和财政方面几无发言权，由此责权纠纷一直不断。

倪发科被调查后，曾担任霍邱县县长、县委书记多年的六安市副市长权俊良于今年3月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的还包括霍邱县政府办副主任、安监局党组书记张永，张永在监察部公布调查倪发科消息5天后，6月9日早上坠楼身亡，警方已排除他杀可能，但民间却流传不同说

法。

实际上，卷入倪发科案的不止上述房产开发商和大昌矿业。一知情人声称，今年1月29日安徽省纪委对外通报的马鞍山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赵建明被立案调查也可能与倪发科有关，2006年，在倪发科的主导下，六安市政府和马钢集团签署《六安市政府与马钢公司洽谈霍邱铁矿开发》协议，通过政府为其量身制定的条件，将霍邱县张庄铁矿开发权运作配置给马钢。

该人士还介绍，2012年12月，时任金寨县某县委主要领导被突然免职，也与倪发科案有关。倪发科插手了该县的矿产开发，并从中牟利，这一说法目前尚无从证实。但倪发科升任副省长后，仍分管国土资源等领域，的确强势插手霍邱和金寨等矿产大县的矿权利益分配，并由此四处树敌。一位熟悉安徽省官场的人士称，政商两届的多股力量一直对倪的作为不满已久，倪落马后，还会有更多的利益清算。

四、风起云涌的各地官场

晋吏再洗牌

记者 / 吴如加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在一天之内连续通报山西两名省部级干部被调查，包括山西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两人涉嫌严重违纪。其中，白云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落马的女性省部级官员。

两名省部级高官同日落马，这在山西已是近3个月来的第三次。

6个月，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早在2013年，山西便发生一连串官场地震。据山西纪委、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山西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

2014年，山西省的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以2月27日山西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接受组织调查为起点， 4月12日，不到60天，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2010年调任中央之前，申维辰一直在山西任职，曾官至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外界猜测，申维辰落马或因其在太原任职期间涉嫌贪腐。

68天后，中纪委官网在两分钟内连续播报：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65天之后，依旧是山西，又有两名省部级官员同日落马，分别是山西原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和山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

算上申维辰，在短短半年之内，山西共有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涉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8人中，除北京人金道铭外，其余7人均是山西籍官员。山西已然成为十八大之后，被查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

而众多落马高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如在山西经营23年的申维辰离开该省之后，陈川平便接任了其太原市委书记一职。籍贯平陆的陈川平与此前落马的令政策有同乡之谊。聂春玉和杜善学曾先后担任吕梁市委书记。白云则是继聂春玉之后，担任省委统

战部部长。

在聂春玉、杜善学、白云都曾任职的吕梁一地，前后已有多名市领导被免职或接受调查。其中包括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明珠。吕梁的腐败内幕，由此可窥。

近半年来的山西反腐，创下了多项纪录。由于落马高官数量众多，山西省委常委名单频繁变动，目前山西省仅剩9名省委常委。13名原省委常委之中，已有5名在任成员被调查，超过总数三分之一。其中，金道铭落马之后，由原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楼阳生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另外4名落马官员的岗位目前仍处于空缺状态。

除了落马官员之外，常委名单中的另一变动是原省委书记袁纯清。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官员职务调整的决定。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改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政治局常委坐镇任免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宣布省级官员任免的领导干部大会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出席，而此次会议，则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自坐镇。

一般情况下，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的任职决定，由中组部副部长出席当地领导干部大会并宣布。中组部部长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已属罕见，通常发生在重要地区的重大人事变动之后。如2007年陈良宇落马之后，习近平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便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宣布。薄熙来落马之后，时任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也曾亲赴重庆，宣布对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的任命。

政治局常委出席省“一把手”的任免，虽然特殊，但四年前也曾有先例。2010年4月，张春贤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时，除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也出席了会议。

张春贤入疆，也成为在袁纯清之前，省、自治区“一把手”提前卸任的先例。2009年“7·5事件”发生后，新疆安全局势迅速升级，在这一背景之下，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受命奔赴乌鲁木齐，接替治疆长达15年的王乐泉。

袁纯清任期未满而提前离任，留给了外界许多猜想。《求是》杂志9月1日还刊出了袁纯清的文章，对山西反腐进行表态：主要领导不抓反腐倡廉，党风政风就会松弛，不抓反腐败斗争就是严重失职。

由于《求是》杂志为半月刊，据此推断，此文至少在15天前已经撰写。彼时，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4名省部级大员尚在“马背”上。袁纯清是否预料到了在短短一周之内4名高官的接连落马，不得而知。

同在9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文章《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措辞严厉：“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如果各级党委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没有把管党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当作自己的主责，就是领导不力。”

山西治吏之交

农家子弟袁纯清1977年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者成为同门师兄弟。在校期间，袁纯清便开始崭露头角，担任学生会主席。毕业之后，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了17年，官拜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30年后，45岁的袁纯清离开共青团体系，进入中央纪委，担任中纪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务。同时，他还兼任中纪委新闻发言人，许多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的情况通报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包括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广东湛江特大走私案等。

2001年3月，袁纯清离开中纪委，“空降”陕西，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从此开始了其疆吏生涯。

携带着这样一份履历，袁纯清于2010年走马山西出任省委书记。在面对媒体时，袁纯清直言要“再造一个新山西”，彼时媒体曾称之为“袁纯清与新山西的‘五年之约’”。

长期以来，山西的吏治之败坏，不仅在十八大后的反腐中展现无遗。历任山西的主政者对此都颇有微词。如山西原省长于幼军就曾严厉批评山西地方官员：诚信缺乏、大局淡化、服务冷漠、效率低下。他的继任者孟学农也直言山西官员缺乏市场意识和锐气。

主政山西之后，袁纯清曾推出整风行动，由省纪委组织突击检查茶楼、洗浴、按摩等场所，力图揪出寻欢的官员。据山西省纪委公布的数据，此次“整风”共查处了421名违纪的“享乐官员”。

2011年初，袁纯清还曾代表山西省委常委作出八项承诺，包括不干预或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交易活动。

2011年底，袁纯清再次对山西官员作风进行整顿，前后两次“整风”中，至少有1300多名官员被处理。

今年2月，袁纯清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发言称，有个别领导干部不知足甚至贪得无厌，事业心太弱，物质欲太强。话音刚落不几日，便传来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到了9月1日的领导干部大会上，袁纯清承认，对于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生的严重问题，他作为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

新任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此前一直在吉林工作，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在吉林的45年之中，他从乡到县、从县到市，再到主政整个吉林省，王儒林的履历堪称完美。

王儒林此前受到舆论关注是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因为总结发言时念稿子被王岐山打断发言，并批评“形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中央巡视组走过的11个省市区中，唯有吉林没有副省级以上的高官落马。

山西公安系统地震背后

记者／张蕾

4月10日，山西省司法厅办公楼五楼，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苏浩办公室门前的红色方形地毯一如往常一样鲜艳。但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人大约自3月开始，再也没有出现。

山西省司法厅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称已久不见苏浩。苏浩在司法厅副厅长中排名第三，现在他的简介已从官网撤下。

知情人士透露，苏浩没有出现在办公室，可能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有关。2月27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1年，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打人事件，也波及时任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苏浩：当时大陆媒体报道称，李天一的同伴苏楠曾自称是苏浩之子，苏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苏楠编造了亲属关系。2个月后，苏浩被调至山西司法厅任副厅长。

多个独立信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李亚力亦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此事尚未得到中纪委确认此事。李亚力在2011年接替苏浩任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不到一年后，其子李正源涉嫌醉驾并且殴打交警，最终李亚力的处理结果是“撤销职务，留党查看一年”。

随后亦有山西省公安厅以及太原市公安局多位高层警员也被带走调查，公安系统震动。“大家都在猜测下一个被调查的是谁。”太原市公安局不愿具名的警员称。4月24日，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樊红伟因涉嫌拥有多个虚假身份证被免职。樊红伟曾因此事多次遭到举报，但未获查处。近日媒体报道后，经山西省公安厅、长治市调查组核实，樊红伟授意相关人员编造虚假身份信息申请办理身份证，相关问题正在进一步立案调查。

地方公安系统腐败现象的密集出现，值得关注。山西公安系统的弊案连续发作，亦有其“地方特色”。

争夺太原公安局长

山西公安系统中最早且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跟山西原省委副书记、

太原市市委书记侯伍杰，以及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有关。

侯伍杰是建国后山西省第一个落马的部级高官。最终法院认定侯伍杰贪腐88万元的数额，一直被坊间争议。侯伍杰是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人，他从岚县革委会组织干事起步，2000年已官至太原市市委书记。但是从1995年开始，关于侯伍杰的传闻和举报就接连不断。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些举报对侯伍杰产生不利影响——山西省宣传部长通常是省委常委，但侯伍杰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长两年后的1997年，才被选为山西省委常委。侯伍杰任太原市市委书记一年后，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一职空缺。

一位山西公省安厅退休警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中国的官员序列中，公安局长有特殊地位。公安局承担诸如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户政管理等各重要行政职能，同时还掌握侦查权，刑事侦查权和刑罚执行权等多项刑事司法职能，局长享有把控全局的权力。因此，竞争者们深谙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太原公安局局长职位，被看做是晋升公安厅副厅长乃至厅长的必由之路。

2001年之前，山西公安系统保持了四十多年的低调——从1948年建立到1990年改革开放之初——太原公安给上级的印象是，“不请不到，不吵不叫，给了才要”。一位山西省公安内部人士解释，当时诸多省的公安系统到上级跑设备，诸如汽车、枪支弹药等。但山西“一直保持革命的优良传统”，从未主动跑过。“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变了，人们思想活跃，有些人既不能按照传统敬畏权力，又经不起外面的诱惑。”

围绕太原公安局长的激烈竞争令这位退休警员记忆深刻，太原公安局原副局长邵建伟、临汾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都曾身在这一职务的竞争人选序列。申公元彼时在临汾任公安局长，因搞制度改革被树为全省的楷模，而他本人也获得“全国优秀公安局长”，被业界称为“打黑英雄”。一位当地警员回忆，当时申公元还找到了当地媒体，以太原市公安局长的身份接受了专访，准备就任后即刻发表。

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则联络时任太原市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他分三次送给侯伍杰10万美元和价值港币万余元的百达菲利手表一块，以上款物后经法院查实折合人民币共计88万余元。作为回报，侯许诺为邵建伟谋得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一职。山西省公安厅某高层警员回忆，当时省委关于太原市公安局长人选的讨论久无下文，最后在省委的干预下，临汾、大同、太原三地的公安局局长采取了大轮班的方式，邵建伟从太原公安局副局长调至临汾任局长，申公元从临汾公安局调至大同任局长。

正是邵建伟调任临汾公安局长之后，太原黑社会老大李满林失去庇护被抓获，供出了邵建伟，进而连带出侯伍杰。 2006年,法院判处侯伍杰受贿罪成立，刑期11年。

大同贪腐案

据《凤凰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今13年间，山西公安系统至少有25名公安局局长或者副局长落马或被问责，其中大多涉及煤矿。

2001年，全球金融危机刚过，中国煤炭业开始复苏。2002年冬天，煤价强力反弹，从一吨90多元直冲到300元之上，煤炭需求量极大。以前被看作是烫手山芋的煤矿转让价格也不断攀升，一座2000年还只值几百万元的煤矿，此时已经上亿元。

“公安人员能为煤矿提供很多便利，甚至参与煤矿之间的竞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公安厅的警察称，一般公安局治安支队主管民爆，经侦支队负责查处偷税漏税，矿山稽查大队管越层、越界及非法开采。煤老板们为了发展壮大，绞尽脑汁的跟掌握煤矿生死的公安系统搞好关系。

2001年来到大同的申公元就遇到了温州商人李克伟，据媒体报道，李克伟之所以在短短不到十年内就拥有十几座煤矿，关键是申公元领导下的公安帮助其抢矿，然后让李克伟代理。依靠强硬的政治资源，李克伟短短几年内成了大同南郊区最大的煤矿“代理人”，最高峰时拥有十几座煤矿。

而大同公安系统内部人士曾向大陆媒体讲述：申公元刚来大同市，在一家粗粮馆吃饭，当时申抽的是一元一盒的凤凰烟，400多元的饭局吃罢，申公元还要求把饭菜全部打包带走。2003年后，“申已经开始吃鲍鱼，鱼翅也是一人一份，抽的是中华，讲话声音也变了，衣服倍儿直”。

申公元牟利于煤矿的同时，也开始卖官。据大陆媒体报道，2003年夏，申公元到任大同半年，彼时，大同有干警3700人，科级以上干部200多人。据此间大陆媒体报道，一位当时希望得到提拔的官员对申说，自己在公交分局干了20年了，想换换地方，申说：“那个地方好，不要动。”后来，这个官员从一个处长口中才获知——“那个位置送50万元都调整不了”。

2004年12月，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红窑沟煤矿发生矿

难，矿主正是李克伟。而此次矿难并未按照正常程序“扣账户，控制矿主”，而是被隐瞒了下来。5年后，中纪委在大同展开调查，李克伟自首后供出申公元。经法院审理表明，2001年至2007年，申公元任大同市公安局局长时， 帮助及保护李克伟承包煤矿的生产经营，收受煤矿主李克伟贿赂2900万元人民币，丰田越野车一辆。并且公安部B级通缉令抓捕李克伟等人时，申公元仍将李克伟隐藏于其子处所。为此，申公元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件带出大同市分管煤炭及安全的原副市长王雁峰、经侦支队长高建勋、南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志勇、煤监局长张和平等，诸人一起落马。

后续案例表明，权力寻租并非局限于公安局长级别。2011年，山西省吕梁市公安局前民爆支队长王香柱将收缴回来的9万多枚雷管未按规定上缴国库或销毁，而将其私自卖给了两个煤矿老板。两位煤老板也投桃报李——借给民爆支队领导两部车供其长期使用，还为民爆支队及附属办案单位解决办案经费。

随后，包括运城原公安局长段波、山西霍州原公安局长庞星明、山西灵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双生、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公安局长韩春喜、山西省大同市原公安局经侦支队长高建勋等，均和矿主勾结，为矿主提供保护，收受巨额回报受审获刑。

公安局长之子酒驾事件

苏浩1995年从朔州市工商局副局长调至当地公安局任副局长。从2003年起，任山西公安厅副厅长，2008年开始兼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2011年9月，大陆媒体《新快报》刊文称，苏浩的同僚回忆，苏任职山西省公安厅办公期间，曾有女子带着一个小男孩找苏浩。之后苏浩是否有私生子一事引发热议。2011年苏浩被调任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之后，李亚力继任，他被视为该职位激烈争夺中出现的黑马。一位公安内部人士称，只有较大城市的公安局长才有资格竞争太原市公安局长职位，李亚力所在的晋城人口不足百万，但他击败了诸多有力竞争者。

2012年10月，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交警一事在网络曝光，2013年1月，新华网发文称，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议、山西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其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该文还称，李亚力在处理其子违章驾车并妨碍交警执行公务过程中，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其行为已构成渎职错误。同时还发现其有违反廉洁自律错误和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错误。此事件中涉及的其他违纪人员，按干部

管理权限由太原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

此事件“可以看出李亚力滥用公安权力”，一位对山西公安系统观察多年的媒体人认为。让这位媒体人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5月，山西煤老板罗明福在太原小店区星河湾酒店吸毒嫖娼，其间，一名“小姐”因吸毒过量意外猝死。罗通过全国政协委员郝建秀请托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负责人、太原某医院负责人，公安部门和医院出具虚假死亡证明和病例，制造“小姐”自行吸毒死亡，在没有通知家属前提下当即火化。随后，有人向山西省纪委等部门举报称，公安部门未履行尸检等法定程序，并涉嫌受贿私放吸毒煤老板。目前，包括郝建秀、山西巨能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罗明福等多人被判刑。郝建秀最终获刑四年。上述媒体人称，李亚力被带走调查正是由于郝建秀在狱中举报。

在李亚力被撤职前的2013年的1月，原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太平的司机郑斌杀人案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最终郑斌获刑13年。山西公安厅曾解释，郑斌为临时工，且是下班时间行为，跟李太平无关。但1月7日，时任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太平被调离山西公安系统，平调至其他部门任职。

官场腐败难题待解

李亚力之子酒驾事件中，李本人删除执法录像，收缴交警执法的电子记录仪，修改伪造6.0酒精含量。“他这一系列行为严格说是构成帮助犯罪分子毁灭犯罪证据罪”，太原市检察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检察官表示。这位检察官认为，山西省委当时实际上以党纪政纪的处分代替了法纪的处分，“党纪应该在执法机关审判以后再做。”“有些问题要经过司法程序，经过侦查手段才能搞清楚，纪检委、党纪部门代替不了侦查程序”，上述检察官说。

一位山西公安人员以李亚力一案分析，“公安内部有督察系统，但是督察系统是在公安局长的领导下，谁敢监督自己的领导？”他说，“督察条例只是这样一个条例，但缺乏监督时应该如何？‘一把手’的权力谁来监督？”

上述公安厅退休警员认为，本次山西公安系统地震背后，公安系统的权力腐败和权力寻租问题明显，权力运行难以有效收缩于法律之笼。公安权力异化和膨胀，以及官场腐败问题，仍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政府直面解决。

河北反腐：廊坊初现官场地震

记者／郭天力

从9月份开始，京畿大省河北连续两个月每月有一名厅级官员落马，力度为该省罕见。一人为邢台市委书记王爱民，一人为河北省民政厅女副厅长刘万青，细查两人履历，可以看出两人曾在廊坊共事4年之久。

此前一年，原廊坊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肖双胜，曾长期担任廊坊副市长的承德常务副市长李刚，廊坊发展公司董事长鲍涌波，建设局局长李东等人已相继落马。

“包房企不赔”书记落马

8月底，河北省新闻联播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批准，陈超英担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和省纪委书记。担任这一职位8年之久的臧胜业届龄退休。在省级纪委书记中，陈超英是为数不多有资深理工科背景的。陈超英今年56岁，河北省蠡县人，曾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工作长达17年，是舰船惯性导航技术专家。外界对身为舰船专家的陈超英如何掌舵河北纪委充满期待。

陈超英履新不足一周，曾数月仅有一名厅级官员落马的河北，出现反腐发力的迹象。9月初，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河北省邢台市市委书记王爱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后河北省第一个落马的地市市委书记。

对王爱民，公众并不陌生，他曾数次卷入舆论漩涡，备受争议。王爱民是邢台南和人。2003年从河北省科技厅厅长位置上转任廊坊，担任市长长达8年。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爱民透过媒体公开他的招商口号：“开发商来廊坊投资，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政府的。”此言一出，即招致公众批评。

2011年，王爱民到邢台当市委书记，开始抓农村环境整治。对这项工作，外界评价出现两极。大陆媒体《新京报》曾刊发报道，指责邢台在抓这项工作时，方式方法不对头，导致部分乡镇出现巨额债务。而支持的一方则坚称王爱民此举是为群众着想，脏乱差的乡村环境的确到了非大力整顿不可的程度，即便方式方法有待改进，但不能否定工作方向的正确。王爱民也曾自辩称，他出身邢台农村，了解农村实情，环境不佳，影响发展，必须要还邢台绿水青山。河北省更高层面支持邢台做法，甚至曾组织全省相关人员到邢台现场观摩“邢台经验”。可以说，这

项工作让王爱民在全省露了脸。

与上层的肯定不同，当地官场对王爱民的负面评价则暗潮汹涌。在邢台某县担任多年县长的王刚（化名）向《凤凰周刊》声称，王爱民上任后，先后提拔或者安排了数十名正处级干部，其中，有2/3是南和籍。“邢台各县县长、县委书记任期届满前，都很想调到邢台市，到哪怕是一些中不溜的局担任局长，都非常困难，这在邢台官场是明摆着的。每到一些局有空缺，下边的县长、县委书记们争得头破血流。可是连正处级都难以争到的位置，在王爱民的治下，却让副处级的副县长扶摇直上，把正处级的官员们晾在一边。”

有接近王爱民案办案人员的知情人士向《凤凰周刊》透露，实际上，王爱民所涉案情，邢台并不占主要地位，主要还是8年廊坊任上的事情，“据称，光其亲口承认的涉案金额就逾亿元。”在王爱民被带走时，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提拔的正处级官员名单。

女厅官曾脱产5年“提升学历”

王爱民的落马，让人想起他在廊坊时的老同事：肖双胜。肖是十八大后河北正式对外通报的首个落马厅官。

肖双胜，天津宁河人，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随后进入河北日报社校对科工作。4年后，肖升任正科级，此后，其职位一路高升，8年后，成为河北日报社副社长，官至副厅。2003年，肖双胜从省直事业单位转战地方，出任廊坊宣传部长，完成从媒体人向政府官员的转身。对这位年轻同事的快速升迁，河北老报人储瑞耕曾在其博客中用一句话点评：“如此升迁，中国官场把戏之一。”有消息称，肖的升迁，与其曾任高级官员的某亲属直接相关。

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向外界透露，以市场化媒体的标准看，肖双胜的业务能力并不突出，不过，这无碍他的步步升迁。

出任市委宣传部长3年后，肖双胜转任分管城建的副市长。从2008年到2011年的3年，正是河北城市建设狂飙突进的“三年大变样”时期。作为京津走廊的廊坊，在京津产业和人口的溢出效应作用下，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金灿灿的土地开发之间，也蕴蓄了拆迁矛盾和土地违法案件。

肖双胜案尚未有眉目，又一位曾与王爱民和肖双胜共事5年的女常委刘万青被调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月10日发布消息称，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刘万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

调查。刘万青落马距离王爱民被查仅一个月。

刘的履历显示其1981年毕业于涿州师范，当时的一所中专，后在保定担任涞源县教师、机关干部。由此到1992年的11年间，刘的经历非常特殊：刘万青曾获得两次脱产学习机会，时间长达5年，如此情形，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可谓罕见。这两次学习，一次是河北广播电大保定分校的大专班，一次是省委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班。毕业后，刘万青从县级部门直接进入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

此后她又参加了多个培训班学习，直至2010年拿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粗略统计，自参加工作的33年时间里，刘万青先后5次、共超过10年的时间进入各种教育机构拿文凭。而在1992年进入省级部门工作后，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普通科员到副厅级的大跨越，平均不到两年就提拔一级。这一速度超过她有高官亲属背景的同侪肖双胜。

在肖双胜落马的大半年时间里，刘万青表面上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她依旧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发表讲话。今年8月底，身为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的刘万青还出席了有民政部领导出席的政务活动。活动现场，这个短发干练的女厅级官员笑意盈盈。

一个半月后，刘万青再次出现在媒体视线中，只是，她成了落马女厅官。

牋3名前常委，再加上曾长期担任廊坊副市长的李刚在承德副市长任上落马，廊坊官场大有地震之势。

整肃城建国土系统

与肖双胜几乎同时被查的，还有廊坊发展公司董事长鲍涌波和廊坊市建设局局长李东。据大陆媒体报道，后两人分别于11月18日或19日被有关部门“双规”。此外，廊坊国土系统也有多名官员接受调查。廊坊的土地和城建系统被整肃。?近年来，仅有400多万人口的廊坊，房地产开发热度居高不下，大牌房企悉数到场。以2009年数据为例，房地产施工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固安、香河、三河等地的房地产开发近乎疯狂。由于土地供给有限，从农民手中低价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成为廊坊地产开发的秘笈。这一明显违规的行为在2011年5月被大陆媒体曝光，涉及五矿、万科、万通等品牌房企。媒体曝光之后，开发商、购房业主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相持不下，最终廊坊分管领导并未受到处理。香河原县委书记杨文华仅以做检讨作结，廊坊网民对此表示“寒心”。两三年后，廊坊地产开发积聚的后遗症逐渐发作。

廊坊被调查官员中，四人均涉及违纪违法问题。距离率先曝光的肖双胜案，时间已近一年，但违的何种纪、违的什么法，官方尚未主动披露。《凤凰周刊》记者致电河北省纪检委，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工作人员答复称：“这些案件正在查处过程中，没有处理结果是不能对外公布的。河北省纪委的官方网站即将开通，程序走完，相关案情将公布在网站上。”

内蒙古官场反腐升级

记者／杨桐

这个秋天，对于内蒙古官场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落马的影响余波未消，内蒙古自治区原政法委副书记杨汉中被判死缓，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武志忠贪腐案又接连开庭，内蒙古自治区供销总社原党组书记、曾任呼和浩特市常务副市长的薄连根也在被查办中。

王素毅之前，内蒙古高官贪腐窝案已频频发生，譬如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原兴安盟副盟长赵云翔和前赤峰市长徐国元等一大批落马高官，让外界对这个民族地区的官场生态格外关注。 牋

闪电落马

9月19日，全国政协通过会议免去了王素毅的政协委员身份，这是他最后被免的一个职务。之前的9月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王素毅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9月11日，最高检也确认了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

王素毅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反贪大潮中落马的第6位副部级高官，在他之前被查处的分别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四川省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和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52岁的王素毅是首位落马的“60后”高官，也是中共建政以来内蒙古落马最高级别的官员。

在内蒙古官场，王素毅的仕途一度被看好，认为其少数民族的出身和“60后”的年龄优势加之长期的地方主政经验，有很大的晋升空间。6月26日，王素毅还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的身份，列席了自治区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常委会，次日又与自治区主席巴特尔一起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一行。

但在3天后，6月30日，监察部网站就公布了“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并经新华网报道后引起外界关注，一时传言纷纷。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王素毅是因为情妇的联名举报落马，但这一传言因无证据支撑又被诸多媒体所辟谣。

目前为止，有关王素毅的涉案情节只有监察部网站寥寥数语的通报：“王素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

受巨额财物，收受礼金礼品。”除此之外，外界再无法从官方渠道获悉更进一步的情节。

王素毅被宣布接受调查后，他的手机已经处于关闭状态，而其妻王志宏的手机则通着，接听电话者是其一位男性亲属，说王素毅的妻子也于同期被带走调查，但不愿谈及更多。有内部人士称，王素毅的妻子王志宏在一家大型矿企任职，王素毅到巴彦淖尔后，为该矿企批了大量的采矿权，巴市官场有不少人通过其妻向王素毅行贿。

被带走未归的还包括内蒙古统战部的干部处处长高翔，高翔是王素毅任职巴彦淖尔时的秘书，职务是市委办公厅副主任，2010年王素毅升任统战部长后，将高翔也调了过来。当地人士和媒体的一致分析是，王素毅刚在统战部长任上3年，这一职务涉贪的可能不大，其出事应该是巴彦淖尔主政期间，或与土地财政有关，很可能是两年前巴彦淖尔市官场地震的延续。

王素毅落马之时，适逢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内蒙古不足一月，外界解读为这是今年由中央巡视组揪出的第一个部级“老虎”。

6月3日，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位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宾馆，在次日召开的动员会上，担任组长的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指出，此次巡视工作的重点是检查监督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方面违纪违法问题。

中央第四巡视组巡查内蒙古截至8月6日。这一期间，通过当地媒体公布了巡视组的驻地地址和联系方式，新城宾馆外反映问题的民众排起长龙，当地每天派出大量警察维持现场秩序。

呼和浩特市的一些高端消费场所则开始生意清淡，一位出租车司机注意到，呼市五星级的香格里拉酒店停车场的豪车少了许多，他跟一位门童聊天时也了解到，原来爆满的高档套房现在出现了大量空房。

巴市窝案

王素毅1961年出生于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沟子板村，其在兄弟5人中排行老大，其三弟是现任的土左旗副书记。

土左旗是中共建政后首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出生地，除乌兰夫的儿子布赫担任了自治区第二任的主席外，2000年因车祸去世的自治区主席云布龙也来自土左旗，这个内蒙古著名的政治大旗高官辈出，王素毅在此后的从政生涯中积累了很多同乡人脉。

王素毅的父亲出身转业军人，上世纪70年代曾在锡林郭勒盟担任过砖瓦厂和机械厂厂长，王素毅在锡林郭勒读完了小学。他当年的一位小学班主任称其品学兼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经常考取满分成绩，1977年升入高中，高二那年便考入山西矿业学院，时年17岁。

1982年，王素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交通能源处，其后十年间从普通干事一直干到副处长、处长和正厅级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并在2001年至2003年间出任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后又返回计委当了9个月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素毅留给接触者的印象是出言谨慎，话虽不多，但拍板的事情一定要执行下去。原内蒙古自治区计委主任乌日图曾向《新京报》回忆说，王素毅工作起初颇为直率，敢说敢干，经常在开会时指出领导的错误，弄得领导无法下台，后来在不断去北京跑项目的过程中变得说话更讲究方式，不再贸然顶撞领导了。

2003年底，巴彦淖尔盟计划撤盟改市，王素毅出任当时的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盟长，并于次年成为巴彦淖尔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此一期间，他参加了长江商学院第二期EMBA研究生班，因高达46万元的学费被民众质疑成为一时热点。做市长时，王素毅还要了前单位计委发展小区一套200平方米以上的领导住房。

在巴彦淖尔市主政期间，王素毅尤其热衷楼堂馆所建设、土地开发和市容改造，位于内蒙古西部的巴彦淖尔是个地级市，在蒙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湖泊”，但老城区房屋多建于80年代，显得破旧不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提及王素毅当年的一段话：“招商引资靠什么？首先是脸面。一个地级市，连个星级宾馆都没有，政府办公的地方破破烂烂。引资的目的是想让人家垫资，这个样子，谁还敢来？”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巴彦淖尔市城镇建设投资预期目标为60亿元，截至2008年年初已累计投入资金164亿元，项目和基础建设融资约有420亿元，而该市2007年的财政收入仅为45亿元。在2008年2月王素毅升任市委书记后，巴彦淖尔市进入新一轮造城运动，新城区围绕政府所在的临河区周边展开，以行政办公楼和高层住宅为主。

?010年5月，王素毅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以49岁的年龄官至副部级，一定程度上，王素毅的快速晋升与其在巴彦淖尔的政绩密切相关，但其担任统战部长后，多名旧部陆续出事。

“在城建会上，我曾强调要坚决防止‘建起一座城市，倒下一批干

部’的现象发生。”。这是2008年5月14日，刚升任市委书记的王素毅在巴彦淖尔市纪委工作会议上说的一句话。这个被他多次强调的表述不幸一语成谶。

2011年5月，王素毅离开巴彦淖尔刚好一年关口，该市国泰集团董事长李国民被中纪委带走调查，3个月后，时任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区长的薛维林主动投案自首，随后被牵出的是副市长李石贵，主管城建的李石贵曾是王素毅的得力干将，这一期间包括市政府副秘书长李茂龙、国土局土地收储中心主任张汉在内的多名官员和开发商被调查。

成立于1997年的国泰集团，在王素毅主政期间迅速壮大，拥有房地产、百货市场、购物中心和五星级酒店等9家子公司，该集团几乎承揽了临河区一半的开发工程，成为王素毅主政时造城运动中的最大受益者。

去年，原临河区区长薛维林因收受国泰集团董事长李国民等人贿赂、房产29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而副市长李石贵则因在置换土地、城市建设开发、解决农业贷款等受贿1536万元被判死缓，判决书显示，李国民分16次送给李石贵106万元现金和1000克黄金后，又因其子结婚随礼100万元，为其母80大寿送了80万元贺礼。而引发此次窝案的李国民则被判刑5年6个月，罪名是赌博罪和组织卖淫罪，并不涉及行贿事项。

随着诸多官员被判刑，很多人以为这场官场地震已经结束，王素毅也完成了安全着陆，但2013年6月底王素毅落马的消息传出，当地官场中人又开始人心惶惶。

当地流传的一则坊间传言称，2011年时王素毅即遭一位原市领导举报过，而后中纪委根据线索控制了李国民。但另一版本的传言则是，江苏一家建设公司与国泰集团有经济纠纷，辗转向中纪委举报，李国民被查牵涉到了王素毅。

共性问题

王素毅落马的同时，包头市中级法院开庭的另外两个高官的贪腐案也格外引人关注。

于今年9月30日被判处死缓的杨汉中是其中之一，他是去年6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任上被立案调查的，此前曾任满洲里市委书记和兴安盟盟委书记。该案9月3日在包头市中级法院的公开审理中，杨汉中被指控收受和索要贿赂4037万元，其中2007年任兴安盟委书记

时，因对承建兴安盟党政办公大楼的鑫泰公司提供帮助，一次就收受人民币1000万元。而其案发前伙同亲属、情妇收受和索要的房产多达21处。总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分布在内蒙古、北京、山东、广东、海南5个省份，变现款总额达2289.2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56.7%。

9月16日，包头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武志忠一案，他和妻子于惠珑被指控的五项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隐瞒境外存款。

武志忠曾担任过包头中级法院副院长、内蒙古高级法院常务副院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2011年7月退休，去年4月被采取监视居住。起诉书显示，其涉嫌贪污1066万余元；受贿545万余元；挪用公款3420万元；另有人民币2817万余元、1.9757万元港币、115万美元等，不能说明来源合法；以及隐瞒177余万加元、51万美元的境外存款。

而在8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白志明案的二审在赤峰市中级法院开庭，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他在2011年底一审被判死缓，罪名包括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检方指控，2001年8月至2008年11月，其在担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和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期间的违纪总金额折合人民币3954万元，主动上交个人其他所得658万余元。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的通报显示，今年1月至3月，该院查办了53起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其中曾经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供销总社原党组书记的薄连根等9人为特大玩忽职守、受贿案件，薄连根曾任乌海市委常务副书记和呼和浩特市常务副市长，该案目前正在查办中，尚无消息透出。

检索资料不难发现，2006年之后内蒙古贪腐案件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2004年之前因贪腐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是内蒙古自治区国税局原局长肖占武，1995年至2002年伙同其女儿受贿453.1万元、美元3.45万元，另有人民币319万余元、美元8.3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一纪录在2006年被原赤峰市长徐国元所刷新，他因受贿一套价值380多万元别墅而进入检方视线，被查出在担任市长的六年中敛财3200万元，曾把200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放在云南省一座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佛像耳朵里。

徐国元是内蒙古第一个落马的正厅级官员，在他被判处死缓之后的

2009年12月8日，担任锡林郭勒盟盟委副书记的蔚小平因受贿被逮捕，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5月至2009年1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蔚小平为请托人在工程建设、矿业开发、土地利用、铁路和公路建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17个单位多人财物人民币680万元、7万美元、2万欧元、10万港币、价值人民币33.3万元的越野车1辆、价值人民币85万元的鸡血石3块。

接下来落马的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则打破纪录，将正厅级上升至副部级。刘卓志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盟长、内蒙古自治区锡盟盟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在2011年7月被中纪委立案查处，2012年7月2日，因受贿817.036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刘卓志的86项受贿记录中，卖官收入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此外涉及的主要是采矿权审批和企业经营方面。

而在今年3月27日，原兴安盟副盟长赵云翔也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被判处无期徒刑，赵云翔曾担任阿尔山市市长、扎赉特旗旗委书记和乌兰浩特市市委书记等职，他被控在提拔和使用干部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公路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他人财物1137.3万元、29万美元，另一项罪名是在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新建工程项目中，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让无资质许可证的承建方违规施工，使国家遭受471.1736万元的经济损失。

?月26日上午，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薛延忠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矿产资源配置、工程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在年节、婚庆中有送收红包、礼金问题。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方面，一些干部执行规定搞变通，变相公款吃喝；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执行制度不严格，一些地方和单位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违规设立非领导职务。

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其实也是内蒙古官场存在的共性问题，内蒙古官场窝案频发的一个原因是，资源丰富的内蒙古经济快速崛起，GDP增速曾连续八年全国第一，官员城市建设和矿产开发等方面利益寻租空间过大。

新疆“打虎拍蝇”提速

记者 / 张弛

新疆的反腐“拍苍蝇”比“打老虎”更重要。基层官员的腐败损害了

党和政府与群众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三股势力”的帮凶。

如何做到反腐、反恐两手都要硬，是新疆需审慎应对的难题。

继“首虎”栗智落马后，新疆反腐地图一再扩大。截至8月初，今年已有逾10名厅局级官员被调查。8月新近一名被调查的官员，是自治区扶贫开发办主任赵国明。

新疆纪委通报称，赵国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赵国明于1976年参加工作，满族。在2002年底调任扶贫办主任之前，他一直在北疆工作，历任钻井队队长、县水电局局长、县委书记、行署副专员等职。

自去年11月以来，中共新疆纪委接连发布反腐消息，“打虎”同时不忘“拍蝇”。共查处乡村干部损害群众利益案件800余件，处理848人，其中移送司法82人。

“首虎”落马原因说法不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正式退休两年的新疆自治区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栗智被调查，不仅打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新疆打虎的“零记录”，亦打破中共“逢盛会不打虎”的惯例。值得注意的是，栗智还是首位因“隐瞒真实年龄”被开除党籍的副部级高官。

栗智的仕途在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戛然而止。栗智真正为外界所知，是因为一张站在警车上向周围民众喊话的照片。7月7日，上万民众在人民广场集会，高喊“报仇”等口号，时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人民广场进行劝解。在乘坐的警车被市民团团围住后，他一边躲避从人群中扔来的矿泉水瓶和鞋子，一边带着大家喊口号。

“七五”事件后两个月，栗智黯然离开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的岗位，只保留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对于栗智退休两年后依旧被查，目前新疆官场说法不一。但对于媒体报道所称，栗智自述做决定时犹豫甚至柔弱、因而被外界诟病为“错失良机”的说法，乌鲁木齐诸多官场人士表示并不认可。

他们给出的理由，像“七五”这样罕有的严重暴力事件，在中共行政体制中，其决策乃至实施绝非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所能左右。一个坊间传闻是，“七五”事发之后，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曾强烈要求使用强硬手段进行处置，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朱海仑甚至因此愤而提出辞职。

而中纪委的通报，也证实了这一点。通报称，栗智“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根据中纪委通报，栗智还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凤凰周刊》记者获取的其中一条线索，就指向新疆一家在中亚国家有矿产资源开发业务的公司。信源指，其公司人员行为不但造成恶劣国际影响，还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栗智在新疆官场的舆评，和其在媒体面前树立的形象相距甚远，也绝非媒体所称“绝不树敌”。一位乌鲁木齐官场人士称，尽管从2006年11月就开始担任首府市委书记，但直至他被免职，依然未能如愿当选自治区党委常委，成为当时仅有的一个未兼常委的省会城市书记。至于原因，就是意见分歧大，选票总是不到达标线。

虽然栗智是十八大后新疆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但在他之前，已有一位在新疆任职达40年之久的官员出现在中纪委的“打虎清单”中。据知情人士透露，栗智被查也可能与此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杨刚，栗智曾经的上级和前任。在栗智落马之前，同样作为乌鲁木齐的“老书记”，后任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杨刚，已在2013年12月被调查，并于次年7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在1999年至2006年期间，杨刚担任了7年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在他落马之前，新疆地产界早已风声鹤唳。2013年以来，近10位地产商相继被调查。亦有多方消息称，杨刚的亲属利用其权势影响，染指新疆的旅游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

10名厅局级官员中枪

伴随“首虎”落马，新疆“打虎”速度加快，多名厅局级官员中枪倒地。

今年以来上榜的厅局级官员，除了前面提到的新疆扶贫开发办主任赵国明，还有原新疆人民政府秘书长阿力木江·买买提明，原新疆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尉，原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莫涓，原新疆公安厅副厅长谢晖，原新疆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高烈卿，原新疆兵团副秘书长焦明启，原新疆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局)副巡视员艾尼瓦尔·吐尔地，原新疆民政厅副巡视员、新疆福彩中心主任尹明奎，原新疆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李斌，一共10人。

这些落马官员，不仅有政府机关、强力维稳部门、宣传系统的，也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高校的，其中有少数民族官员。有的落马官员还是搭档，比如莫涓和尹明奎，同属新疆民政厅。阿力木江·买买提明虽在新疆人民政府秘书长职位上被查，但知情人士称，其可能因受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赵新尉案所牵连。阿力木江·买买提明曾在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间担任新疆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社长、副总编辑，与2011年1月起出任新疆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副社长的赵新尉长期共事。

今年56岁的阿力木江·买买提明是新疆且末人，维吾尔族。虽然其仕途经历从未离开过新疆,但鲜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落马前，关于他的公开报道多为职务

变动。

除了“打虎拍蝇”，今年1月新疆还就宗教事务管理领域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展开调查，并查处一起朝觐事务违纪违法案件，32名党员干部被处理，包括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艾尼瓦尔·吐尔地在内的6人被双开。

宗教事务管理领域的贪腐行为，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引发过诸多基层矛盾。根据官方通报，这32人中，有的在朝觐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违规安排不符合条件的人参加朝觐，索要、收受贿赂；有的对朝觐事务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安排部署和监督检查，严重失职。

通报称，这不仅是一起性质严重的腐败案件，更是一起带有重大负面影响的违反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件。这32人无视政治纪律，没有真正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落实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说一套做一套，对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抵住错误思想侵蚀，把手中权力当作换取金钱、捞取好处的筹码，把政治纪律、工作纪律视为儿戏，贪赃枉法，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违纪违法情节恶劣，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反恐与反腐如何平衡

此一轮新疆反腐的力度与广度，已经引发外界关注。有本港媒体评论称，过去因为反恐问题，新疆有反腐例外论的说法，对当地官员的腐败往往放宽一线，今次“清规戒律”全部打破，反恐反腐两手抓、两手硬，将成为新疆官场新常态。

新疆在反恐与反腐两个战场全面开火，赢得舆论广泛支持。事实上，新疆官场腐败与内地不遑多让。仅从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不仅涉及新疆的土地、矿产，还涉嫌批发官帽。但据《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即便如此，在新疆，反腐始终是一个很慎重的话题。

一位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反分裂斗争的特殊性，新疆整个党政军体系相对封闭，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其他官员违法问题相对不容易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反腐行动势必与当地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稍有不慎，就会对新疆的反分裂斗争造成致命冲击。

这是政府在新疆反腐问题上一直比内地慎重得多的重要原因：新疆不反腐，腐败会加大社会矛盾，增加反恐斗争难度；但新疆反腐，同样可能加大社会矛盾，增加反恐斗争难度，甚至产生更大危害。“反腐和反恐都是关系到中共正当性和核心利益的命脉。倘若新疆在反腐的同时，无法保证应对、处理反恐的政治资本，那就麻烦了”。一位新疆官场人士称。

但新疆反腐的形势显然复杂严峻，这从大量的网络评论可见一斑。一位来自新疆的网友认为，“腐败分子就是政治上的‘恐怖分子’，新疆只有重拳反腐方能有效反恐”。他的理由，腐败伤害的是新疆的整个政治生态、政治肌体甚至是新疆官民双方、汉维两族团结，事实上，只要新疆的政治肌体健康、民族问题和谐，就会降低恐怖袭击的可能，减少恐怖分子的出现。

新疆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维吾尔族学者吐尔文江，在从南疆调研归来后得出的结论是，新疆的反腐“拍苍蝇”比“打老虎”更重要。他认为，基层官员的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与群众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三股势力”的帮凶，新疆基层的反腐与反恐维稳有直接的关系。

他去的地方，是去年莎车“7·28”事发地艾力西湖镇。当地政府的后续处理措施，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开展农村土地清理，尤其是乡、村对外承包的集体土地清理。市场经济下，承包土地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原因，主要是在承包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甚至是腐败行为。在与莎车相

邻的伽师县政府网站，土地清查更被提升至“巩固基层政权”的高度。

他举例，艾力西湖镇对外承包的土地签订的合同中承包费大多在30—50元，而现在市面上的包地价格是平均300元左右，而且这些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期限都在10—30年，这就给基层的一些官员以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这次艾力西湖镇的土地清理中，对干部承包土地明确要求，“要么当干部，要么辞职种地”。

2015年3月27日，中共新疆纪委曾对12起乡村干部损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通报。其中有4起案件与土地承包费有关，包括“将国有土地承包款据为己有”、“收受土地承包户好处费”、“私用集体土地承包费”、“将村集体收取的部分土地承包费占为己有”等，涉及4个地州的4个县。

五、海外“猎狐”艰难破局

开篇语：程慕阳沉浮录



2015年1月18日，程慕阳（右）在温哥华自由党筹款活动时，与自由党参议院候选人Andrew-Leslie握手。网上图片

大陆天网、猎狐等海外贪官追逃行动持续升级，压力骤增，逼迫诸多潜藏海外多年的贪官及其家属不断现形，显现了坚定的反腐决心，也令“程慕阳”这个名字时隔15年再度成为新闻热词。

15年前的2000年9月，贵为省委书记“公子”的程慕阳，在其父程维高的前秘书李真腐败案发后出逃北美，由此被列入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名单，涉嫌贪污、窝藏转移赃物。

程慕阳出逃三年后的2003年底，李真迎来人生结局——曾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他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被执行死刑。李真被大陆媒体称为“河北第一秘”，其贪腐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秘书职务期间。受李真案等影响，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也于2003年底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黯然结束仕途生涯，携妻带女回到老家江苏，并于2010年底病逝于常州。

15年倏忽而逝。2015年4月，中国大陆启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天网”行动，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也集中公布了100名涉

嫌犯罪的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程慕阳位列百人名单。红色通缉令公布后不久，来自加拿大温尼伯地方法院的信息确认，温哥华一个名为“Michael·Ching”的房地产开发商就是程慕阳。

从呼风唤雨的公子哥，到负案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再到地位荣耀的地产富商，现年46岁的程慕阳的经历让人惊奇之余，也多了些思量。

截至目前，程慕阳案尚在加拿大司法程序中，程慕阳能否以及何时遣返中国大陆尚无定论，但其经历足以证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古语也正是大陆官方将此次国际追逃命名为“天网”行动的含意所在。“天网”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分别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其中公安部牵头开展的专项行动又名“猎狐2015”。

无论外逃分子多么狡猾，无论潜逃时间如何久远，只要相关部门努力尽职以及国际合作的不断加强，就没有人能逍遥法外。过去所谓的“避罪天堂”，在中共前所未有的“天网”之下也必将无所遁形。

程慕阳河北往事：权力庇护下掘金

记者 / 郭天力

凭借“省委书记之子”的光环，程慕阳大学毕业后仅用9年时间，在河北、北京、香港、包头等地开办了至少32家各种业务的公司，获得数以亿计的财富。每一个公司背后，都有一段权力与资本互相围猎的剧情。

春夏之交的江南，鸟语花香，气象平和。

2015年5月10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的江南豪华花园小区，程西霞在位于小区西北角的一栋别墅里准备晾晒洗好的褥单，别墅大门牌匾上题有“愚园”两个大字。

“愚园”是原河北省省委书记、河北省人大主任程维高退休后在常州的居所。12年前，程维高因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黯然离开河北，携妻带女回到常州——常州是程维高的政坛起点，也是他的归宿。

12年间，“愚园”这个位于常州市中心的幽静院落曾经人员往来不断，但自2010年程维高去世后，访客稀疏。如今偌大的别墅里，只剩程维高的二女儿程西霞与追随程家几十年的保姆二人居住。

现年40岁的程西霞眉头紧锁，满脸愁容。一个多月来，关于其二哥程慕阳位列中国大陆海外追逃百人名单以及程慕阳加拿大地产商身份曝光等消息，已经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

在12年前那场震动河北官场的风暴中，程西霞是程家唯一未涉案的成员。其余家人，父亲程维高被通报违纪，母亲张佩斐被立案调查，大姐程悠兰因偷税漏税被判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而更早的15年前，二哥程慕阳已仓皇外逃。一家人最终各自飘零，如今天各一方。

回首往事，程西霞告诉《凤凰周刊》，如果早知道家人会是今天的局面，她一定会设法阻止他们经商。

蒙借父荫初入商海

1969年，程慕阳出生于江苏常州。是时任常州拖拉机厂厂长程维高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程维高后来总计三个子女中的唯一男孩。在程西霞的回忆里，程慕阳长得好看，又聪明，家人非常宠爱他。36岁得子的程维高更是对程慕阳寄予很大希望。程维高昔日的河北同僚大都熟悉他说

过的这样一句话："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他事业有成，我也老有所养，我也得益。"

文革结束后，程维高于1977年从国企进入官场，出任常州市计委副主任，此后历任常州市建委主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1984年，程维高离开常州赴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三年后又赴河南任省长；1990年转任河北省省长，1993年5月升任河北省委书记，贵为一方封疆大吏。

程维高晚年曾反思子女教育问题。他曾告诉常州一个文化人士蔡小飞（化名），早年他对爱子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包括不让程慕阳对外泄露自己的身份。"程维高到河南当省长后，程慕阳也来到郑州，入读郑州大学。程慕阳在学校填家庭成员表时，父母一栏从来只写母亲张佩斐，不填父亲名字，所以师生们都以为他只是个普通学生。直到大三，才有老师从外面得到消息，知道程慕阳原来是省长公子。"蔡小飞说，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年的程慕阳还是很低调的。

从小成长于商业氛围浓厚的苏南，程慕阳对经商兴趣浓厚。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时代背景下，程维高也愿意让儿子在商界闯出名堂。尽管早在1989年8月，中共中央即已发布通知，禁止高官子女、配偶经商。

199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程慕阳利用父亲程维高曾担任过南京市委书记的关系，入职熊猫电视机厂驻京办事处。这一年，程慕阳还办理了香港居民身份，作为"港商"的他在商海更加游刃有余。一年后，他进入了父亲程维高推荐的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担任副经理。

北方国际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是港商韩凤瑞。韩凤瑞原系北京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人事科长，1987年定居香港后，任恒亮集团董事长。据新华社的《半月谈·内部版》于2003年11月的报道，韩凤瑞通过时任程维高秘书的吴庆五结识程维高，想利用程维高的权势让河北省邮电局购买其代理的加拿大产电信程控设备。该报道介绍，同样的设备，该产品在外省销售价格较低，但给河北的价格偏高，河北邮电局自然不愿意，但程维高坚持让其购买，河北邮电局无奈，只得花高价买了该款设备。

多年以后，在阳泉看守所失去自由的吴庆五向办案人员讲述了这段政商交易的尾声：为表达对程维高的谢意，韩凤瑞让程慕阳到其名下的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并给其45万元股份和一辆价值70万元的奔驰轿车。

进入广告行业后，程慕阳与当时知名媒体人石坚认识了。石坚时任

《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主持该刊的高端访谈栏目，以此为平台，遍访政界名流，采写了大量时政报道，享誉一时。此外，还担任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总经理。

“我对河北情况熟悉，曾多次到河北采访。程慕阳认识我的时候，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伙子，说话一着急就结巴。”石坚回忆，一开始，他感觉程慕阳比较朴实，不是他印象中心高气傲的官二代形象。“起初的交往还比较频繁，我也乐于把程慕阳介绍给其他媒体和政商界人士，还让其接触到了影视剧领域。”石坚说。

《过把瘾》后初恋夭折

1992年，根据王朔小说投拍的电视剧《过把瘾》正在为资金发愁，程慕阳从河北多家国企拉来50万元赞助，挂了个“制片人”的名——至今，这部老片子的片头仍有程慕阳的名字。而将其引入广告行业的韩凤瑞，同时任该剧监制。这是有据可查的两人第二次合作。

“在角色安排上，程慕阳有一定话语权。当时他喜欢上了一位北京戏曲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支持其扮演其中较为重要的角色。”石坚回忆，程慕阳身材较为高大，长相帅气，也讨这位女生欢心，“两人出双入对，爱得死去活来，当时剧组成员无人不知。”石坚相信，当时两人是真心相爱，女方爱的并非对方权势和财富，程慕阳也并非仅爱其美貌。

程慕阳将恋情告诉了程维高，想迎娶这位女演员。没想到，程维高并不同意程慕阳与女演员交往。蔡小飞告诉《凤凰周刊》，曾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的程维高，对工人阶级感情深厚，以致于他对未来的儿媳定下这样一个“硬杠杠”：出身于工人家庭。而程慕阳喜欢的女演员，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女演员也是个倔脾气，‘你（家）嫌弃我，我还嫌弃你呢’。她对程慕阳省长公子的身份不以为然。可以说，是女演员甩了程慕阳。”石坚回忆。

此后，这位大陆知名女演员一直活跃在影视及话剧舞台上，作品获奖颇丰。

程慕阳情场失意，但作为封疆大吏的公子，他在商场上却迎来爆发式的“成功”。据石坚回忆称，怀揣巨资的程慕阳开始在北京买房置业，并频繁出入高档娱乐会所，“那时如果找不到程慕阳，八成他就在北京90年代初期最高档的夜总会里。”

根据石坚的说法，“程慕阳经常坐飞机去深圳、澳门等地赌博。在飞机上，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石坚说，与女演员分手时间不长，有一天程慕阳带着一个长相普通的年轻女子来见他，介绍说这是女友小宋。《凤凰周刊》记者综合常州和河北两地的消息源得知，程慕阳妻子名叫宋香祺，内蒙古包头市人，认识程慕阳时还是内蒙古某工学院学生，其父原系包钢工人，后在包头市经委工作。

1995年，程慕阳的婚礼在北京市金朗大酒店举行。“婚礼前，程慕阳让我请些领导参加婚礼。我通过个人关系给其请来多位政界高官和知名学者出席，让程慕阳感觉脸上有光。”石坚回忆说。

网络有传闻称，攀上省委书记这门亲，宋家在包头变得高调。2010年年底，程维高去世后，亲家宋某前来吊唁。“我见了程慕阳岳父，他穿着普通，待人接物较为谦和，看上去与网络传闻并不一致。”蔡小飞告诉本刊记者，同一天，他还第一次见到程慕阳的妻子宋香祺，“她确实长相一般。”

因为程慕阳曾带着妻子与石坚一起见面聊天，石坚对其有一定了解。“小宋喜欢打扮，每次见面都是浓妆艳抹。她还特别喜欢奢侈品，经常买名贵的包和首饰。”这是石坚对程妻最大的印象。

姐弟联手广告生意

1993年，石坚准备和香港合作方在香港成立《中国发展》杂志，程慕阳得知后，想投资80万元“弄个副社长当当”。石坚说，因为两人平时来往较多，有交情，虽然知道程慕阳根本不是写文章的料，但也不好当面拒绝，便口头答应了。

“没想到，没过多久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有个600万元的广告为什么没刊播。”石坚说，这个电话让他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赶紧让对方过来面谈。一看对方出示的合同，石坚顿时肺都气炸了。“这个合同上写的联系人地址和电话，都是我们公司的，但是收款账号，居然是程慕阳个人的。而他从来没和我说过拉过这样一个广告。此后，类似事件又发生两起，涉及款项均在千万上下。”石坚还进一步说：“程拉的广告费不是在我们杂志做广告，主要是通过我们公司拥有的媒体资源和广告代理权在北京某电视台做广告。”

石坚为此多次让程慕阳赶紧将款项退还给相关单位。“三个广告合同，2000多万广告款，程慕阳竟完全不当回事，说他自己会摆平。当时程维高马上要当省委书记，可能担心影响父亲官帽，程慕阳这才不情愿地将钱退回。”石坚告诉《凤凰周刊》，这也让他最终决定不让程慕阳担

任副社长，并把先期收到的80万元原封不动退回，“这人太不靠谱，胆子太大”。

事实上，程慕阳还在熊猫电视机厂驻京办工作时，便在广告行业捞到第一桶金。据《半月谈·内部版》的报道，1992年初，张家口卷烟厂给了程慕阳15.6万元广告费。时任厂长李国庭和该厂总会计师冯季玲因此得到了程维高的赏识，前者直到70岁还任厂长，后涉贪被抓，并因多起罪名最终被判无期徒刑，案件审理期间曾供述其与程家的金钱往来。后者则在程维高的前秘书李真案发前，卷款数千万元潜逃美国，至今未归。不过，在本次大陆公布的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中，冯季玲并未上榜。

接近程慕阳案的河北人士透露，当年河北省纳税上亿的四家企业中，张家口卷烟厂和石家庄某知名药企是程家的广告大户，类似程家提款机，另外两家大企业因为有央企背景，程家介入较少。程维高长女程悠兰再婚后，程维高曾给该药企老总打电话，称女儿刚结婚，在北京没房子，希望对方以广告费的形式支持。相关司法材料显示，这家药企给了程家30万元，程家仅用5万元做广告交差，另外的钱都进了自己腰包。

前述人士还告诉《凤凰周刊》，程慕阳向张家口卷烟厂要广告业务，动辄上百万，实际上这些广告业务，即便拿到河北的媒体刊播，媒体往往也不敢向程慕阳要钱。“所谓广告费，本质上就是靠老子的关系直接要钱，如果企业不给钱就会被穿小鞋，没有企业敢违抗。”

程慕阳的“发家史”上，有着众多的合作伙伴，这些伙伴有的形影不离，有的又分道扬镳。而追随其左右的大姐程悠兰和号称“河北第一秘”李真等人，牢牢捆绑在程慕阳的生意链上。

程悠兰出生于1957年，比程慕阳大12岁。常州当地人士透露，程悠兰性格外向，高中毕业后到常州一家医院当了两年护士。此后，程维高帮助其转入常州歌舞团。半路出家的程悠兰自然不是专业演员的料，以后又当了公务员。1993年，已在生意场上初绽锋芒的程慕阳，带着离婚的大姐进了北京城，并将大姐女儿送到加拿大读书。

此时，姐弟二人另一重要伙伴李真也出现了。1962年出生于张家口的李真，师范出身，与程维高原秘书吴庆五熟识。吴庆五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商前，将李真介绍给程维高接任秘书一职。据2004年《民主与法制》报道称，李真为了稳固与程维高的关系，竭力帮助程氏姐弟的广告生意。他第一次帮程悠兰揽广告，合同额便高达300多万，帮助

程悠兰打开局面。

贷款与地产再发家

1994年，经人介绍，程慕阳与石家庄先导集团法定代表人刘建忠相识。程慕阳找到李真，让其帮助刘建忠的牙膏厂项目获得贷款。

官方文件显示，李真通过时任石家庄市长张二辰协助刘建忠申请贷款。此外，程慕阳让其父多次到刘建忠的企业视察。省、市两级官员的“关照”，银行方面不得不相信该企业的背景和前景。中国工商银行河北分行和石家庄市商业银行，先后7次给刘建忠发放贷款6050万元，但此后，该企业破产，至今仍有4000多万贷款未归还。

一位与刘建忠关系紧密的女士透露，刘建忠拿到巨额贷款后，给程慕阳一人的回扣和暗股，将近一千万元。当时，该牙膏厂工人曾有戏言：“堂堂省委书记公子，连小小的牙膏都不放过。”

帮助他人贷款敛财之余，程慕阳的地产生意也渐有起色。

郭光允，石家庄市建委中层干部，曾因实名举报程维高以及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而遭到打击报复，被劳教两年多。程维高倒台后，郭光允获得平反。日前他向《凤凰周刊》介绍，程慕阳了解到房地产业市场空间很大后，也组建了三家房地产公司在石家庄开发地产项目。“其中一家叫石家庄鑫麟房地产公司，是程慕阳与保定民营企业保定八达集团

董事长王宝银，和石家庄新华区有关部门在1995年成立的。这家公司需要5000万投资款，程慕阳通过其父的关系，让河北省财政厅和保定市财政局拿出3000万借款给了保定八达集团，这家公司又把这笔钱中的2650万给了程慕阳。程慕阳将钱用于项目具体运作。一年之后，3000万借款到期，但是程慕阳和王宝银拒不归还。”郭光允说，程慕阳没花自己一分钱，做成了房地产项目。

对于郭光允的上述说法，《凤凰周刊》试图联系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宝银求证，但无法联系到王宝银本人对3000万财政款去向置评。有知情人士称，2000年李真案发生后，王宝银曾一度逃往加拿大，现已回国从事养殖业。这一传闻，《凤凰周刊》记者也未能获得证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石家庄的批发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仅新华集贸市场一地，便集中了数万商家。这里的商业地产开发，由此吸引了各路资本前来竞逐。而位于该市火车站广场北部、公里街西侧的新华商业广场项目，更是政商博弈的焦点。

1995年，石家庄、深圳和香港三家公司发起成立石家庄华恒房地产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即为港商韩凤瑞——3年前他已在河北初尝了权力带来的商业盛宴。这次，韩凤瑞名下的香港恒亮集团，委任程慕阳为石家庄华恒公司董事会成员，进入公司最高决策层。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程慕阳在该公司发挥了何种具体作用，但公开资料显示，石家庄华恒公司从各大公司脱颖而出，成功从石家庄市政府手中拿到了新华商业广场的开发权。

在该公司一份董事会文件中，《凤凰周刊》记者见到了程慕阳的香港身份证和签名。程慕阳笔迹较为流畅，“阳”字写为繁体。

新华商业广场一经建成，便成为该区域的地标性建筑，吸引了大量商家进驻。2000年之后的公司档案里，再也不见程慕阳的名字。被程慕阳赞为“很有良心”的韩凤瑞，也在数年之后从石家庄华恒公司隐退。《凤凰周刊》未能联系到韩对他与程慕阳的商业合作置评。

而今的新华商业广场，与周遭的玻璃幕墙大厦相比，显得破旧寒酸。但因地段优势，仍然驻扎了不少商户。程慕阳从这些地标项目的开发中得到历练，了解了商业地产的开发过程。这让他能在加拿大重操旧业，开拓出另一片地产江湖。

夜访官家讨要工程

知情人士透露，程慕阳的房地产项目多与南京某建筑公司有关，河

北省和石家庄市对此怨言颇大。大陆诸多媒体对此都曾有过相关报道。为此，河北省建委曾将相关反映材料递交程维高，程维高在该份文件上连批三个“放屁”，并以“住房超标”为由将省建委主任靳庆和免职。实际上，靳庆和刚从外地调到石家庄，180多平方米的房子尚未建成，即便住房超标，也非既成事实。

原廊坊市委书记、河北省审计厅长张成起向《凤凰周刊》回忆，1996年的一个夏夜，他家来了几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领头的正是程慕阳。“程慕阳先自我介绍一番，并介绍他身边的人是南京的朋友。”张成起说，听到这家南京公司的名字，他立马敏感起来。“石家庄的大工程基本上被南京某公司垄断了，难道他们也看上了廊坊的工程？”一番客套之后，程慕阳直奔主题：这次来廊坊，是想承揽廊坊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的内外装修工程。

面对省委书记之子的要求，张成起表态说：“廊坊欢迎外地建筑企业过来，但是要通过正规的市场程序，我一人不能拍板。”张说，廊坊会展中心是廊坊地标工程，内外装修工程造价超过两个亿，容不得半点马虎。程慕阳本人没有任何建筑业从业经验，他将来拿到工程，必然将工程层层转包，导致施工质量隐患。



未答应程慕阳的要求，次年，张成起即被程维高戴上“不讲政治”之类的黑帽子，张成起为此拍案而起，发表了一封致省委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程维高。市委书记公开叫板省委书记，在河北历史上仅此一例。下不来台的程维高只得将戴给张成起的帽子收回。

2006年，张成起的纪实散文《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一文刊发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张成起向《凤凰周刊》透露，程维高在常州读到这篇文章之后，通过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其发了一份律师函，函中称，该文干扰了其退休生活，并且说其子程慕阳从未见过张成起，文中所谓深夜讨要两个亿工程一节属诽谤，要将其告上法庭云云。

“我看了这份律师函后同样很气愤。程慕阳来我家的事情，还有别的见证者健在，他哪里来的底气敢否认？我毫不客气地给对方回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观点。结果对方再也没动静。再次听到程维高就是他去世的消息了。”张成起说，这样的父子档，让人无话可说。

在父亲显赫的官威庇护之下，程慕阳的商业运作几乎无往不胜，没有人敢不给程慕阳面子，不给程慕阳面子，就是不给程维高面子。折戟廊坊会展中心，或是程慕阳少有的碰壁经历。

时隔多年，追怀往事，张成起说：“我侥幸逃离了那个肮脏龌龊的漩涡。”

石坚则告诉《凤凰周刊》，程慕阳通过广告、地产等形式获得收益后，胆子越来越大。“河北一些市县的地方领导以及国企负责人，为了谋求升迁，找到程慕阳这条线，来到北京从程慕阳处跑官。我记得保定某酒企负责人曾过来找他，他当着我的面，毫不避讳地说这个职位多少钱，那个职位多少钱。我惊得目瞪口呆。这哪里还是大学刚毕业时那个朴实的程慕阳，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他已经失去了自我。”

石坚透露，仅他自己所知，程慕阳曾在北京市亚运村等优质地段购买了最少三套房产，“都是200平方米上下的大户型。”

多年以后，已入籍加拿大的程慕阳之女程颂莲对媒体表示，父亲培养了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在熟悉程家的人看来，程慕阳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无非是钱权交易。

精心策划后的出逃

2000年2月23日，中纪委和最高检成立“2·23专案组”，决定对已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展开调查。调查组成员来自中央和地方多个部门，以李真为突破口，涉及河北众多高官的贪腐大案就此撕开了口子。该案查处材料中，多次闪现程慕阳的身影。不过，办案材料中并未明确提及其是程维高之子，仅称为“港商程慕阳”。

2000年3月，曾权倾一时的“河北第一秘”李真被双规，盘踞河北多

年的贪腐集团大厦将倾。

李真案发，程家头上阴云笼罩。据熟悉程家的人士介绍，当时即有人劝程悠兰“出国躲一躲”，但由于程悠兰对法律和财税知识淡薄，不晓得自己在多年的广告经营中诸多做法早已涉嫌偷税漏税，她自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坚持不走。

李真“落马”后立刻向办案方检举了程慕阳贪污和权钱交易。李真等人的供述，向世人展示了那个年代“官二代”的政商道。有消息称，《半月谈·内部版》有关程慕阳案部分素材，即由当时的“2·23专案组”成员根据提审记录和相关调查所写。

而中国法院网披露的王福友案庭审纪实显示，1994年，河北省计划在北京建设河北大厦项目，由时任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负责寻找地块等事宜。程慕阳听说该项目后，让其同学苏国本找到王福友，推荐北京市安德路一地产项目，并称其名下公司已拿到该项目转让权。当时，该地产项目原价格为1.06亿元，但在程慕阳、苏国本和王福友的运作下，河北省财政厅却出了1.22亿元的高价，这多出的1000多万元，程慕阳与苏国本分得500多万元。不过，花费巨资之后，安德路的河北大厦项目最终却没有建成。

熟悉河北政情的人士介绍，出身于张家口的王福友，曾在深夜给程维高所住房间亲手掏被堵住的下水道，由此得到程维高赏识，得以快速升迁。王福友对程维高感恩戴德，甘为驱驰。位于北京市地安门附近的河北驻京办，同时也是程慕阳与大姐程悠兰开设的多家公司的注册地址。这处古色古香的院落里，承载过三人疯狂的发财梦。

失去自由的李真还供述，为了逃避调查，李真曾将巨额款项交给程慕阳。官方最终也认定程慕阳帮助李真转移到境外的资产约1600万元。“李真费尽心机捞的部分钱财，可以说给程慕阳打了工。”一位熟悉李真案的人士如是说。

郭光允写《我告程维高》这本书时，曾提到一份吴庆五的供述。这份材料中介绍：2000年5月上旬，吴庆五给程维高打过一次电话；电话中，程维高说：“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还在国内？赶紧走！我已经叫阳阳（程慕阳）去加拿大，暂时不要回来。”

郭光允告诉《凤凰周刊》，程慕阳公开的出逃时间是2000年9月4日，但从吴庆五的讲述可以看出，正式出逃前四个月，担心受李真案波及的程慕阳，已经在策划跑路。“之所以四个月后才走，或许是程慕阳依然在观望李真案走向。同时，程名下几十家各种名目的公司，可能也需

要一定的时间处理后续问题。”郭光允说。

程慕阳临走前到底在忙什么？据2003年8月《财经》杂志以及2010年6月财新网的公开报道，程慕阳曾帮助河北商业龙头企业保龙仓运作拿地、贷款等事宜，并以其名下公司名义持有保龙仓股份。程慕阳出逃前，从保龙仓拿走近500万元。报道也指，与程慕阳合作的保龙仓，曾拖欠南京某建筑公司巨额垫资款。现在的保龙仓，化身勒泰地产在香港上市。对程慕阳具体何时从保龙仓拿走500万元的传闻，勒泰地产员工以老总杨龙飞在境外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程慕阳生意合作伙伴刘建忠的一位友人向《凤凰周刊》透露，2000年8月，程慕阳卖给他们一套房子，那套房子160多平方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罗马花园。“我们觉得价格合适，就将房款给了程慕阳。哪里晓得，过户手续还没办，就再也找不到程慕阳了。”多年以后，这位女士仍然难忍气愤，因为没过户，房本上还是程慕阳的名字，官方后来在调查程慕阳案时，这套房子被充了公，“我们花了钱，却没买到房，这个天杀的程慕阳！”

这一细节，或许是程慕阳出逃前疯狂洗钱的旁证。

郭光允介绍，程慕阳出逃时是经香港逃往加拿大。实际上，程慕阳此前已多次去加拿大，并于1996年办理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程慕阳或许早已料到自己的政商生意会随着父亲的失势坍塌，所以他很早开始谋划退路。”郭光允推测。

河北省检察院一位刘姓官员曾在2003年《时代潮》杂志撰文称，曾被程维高催促离境的吴庆五，逃到了美国躲事。2000年9月14日，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反腐动态的吴庆五以为国内暂时风平浪静，便冒险回国看望情人给他刚生的儿子，结果一下飞机就被警方控制。

此时，程慕阳刚到加拿大10天，惊魂未定的他，听到吴庆五被抓的消息，彻底放弃了“暂时躲避”的念头。他利用在河北聚敛的惊人财富，开始了在加拿大15年的苦心经营。

自以为无事的程悠兰，则过了两年太平日子。中纪委正式发布关于程维高违纪处理决定前半年，2003年2月，程悠兰涉嫌偷税罪被河北警方刑拘，后被判刑3年，缓期5年，并处罚金708.99万元。据当时的报道称，“在庄严的法庭上，程悠兰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并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与程慕阳数度合作的石坚，后来因为拒绝程担任杂志社副社长，首

次开罪于程慕阳。在1996年2月的一次酒会上，石坚曾借着酒劲断言，程慕阳打着老子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程维高迟早会栽在这个贪财儿子的手里。这话传到了程维高耳中。一个普通的酒席，一段酒后的醉话，最终让石坚付出了8年的牢狱之灾。程维高被撤职一个月后，石坚即出狱。

远在加拿大的程慕阳，并没有忘记当年的“大哥”。石坚告诉《凤凰周刊》：“我出狱后，程慕阳曾托香港的朋友给我带话，说我坐牢跟他没关系。”但石坚不屑地说：“谁会信？”

隐匿海外终露马脚

程慕阳逃往加拿大的次年，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以涉嫌转移、窝藏赃物等犯罪签发对程慕阳的逮捕令。2001年9月6日，公安部首次发出A级通缉令，在全国悬赏5万元通缉程慕阳。随后，国际刑警组织向全世界发布了红色通缉令。程慕阳被认定曾帮助李真转移赃款、并勾结他人贪污国家财产。

2003年8月9日，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的处分。

当时，程维高已入住常州的别墅“愚园”。这栋别墅的装饰风格几经修改，现在是典雅的江南风格。据蔡小飞回忆，晚年的程维高一想到郭光允等人就生气，曾想在常州起诉郭光允，就算打不赢官司也至少让郭来常州应诉，让他疲于奔命。但在友人接连劝说下，程维高最终放弃了。

2002年，当昔日秘书李真被判死刑的消息汇报给程维高时，他悲痛难忍，几近面瘫。不过，回到常州享受退休生活几年后，程维高对李真等人的看法也大变，“程维高多次说，李真死了，活该。”蔡小飞向《凤凰周刊》回忆称。

外逃加拿大的程慕阳其实一直与家人保持联系。据蔡小飞透露，程维高退休后学会了上网，“经常使用的软件是UC，他用这个与儿子视频聊天。每到这时候，他一贯严肃的脸上就会出现笑容。”程维高偶尔也会感慨，是自己的放纵，害了儿女，但他没有向友人表达过“劝子归案”的想法。在十年前的形势下，程维高或许认为红色通缉令对境外的儿子来说无关痛痒。但十八大后的海外追逃力度，应是九泉之下的程维高未能料及的。

坊间关于程慕阳捞钱的传闻，时常见诸报端。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内部版》上，曾讲述了多起程慕阳捞钱案例。蔡小飞说，他与友人曾经有意无意问过程维高，这些报道是否属实，“遇到这个问题，他会很快把话题岔过去，不愿意回应。”不只程维高，避居海外的程慕阳也对大陆的指控缄默以对。截止发稿时，《凤凰周刊》未能联系到程慕阳本人及其律师对诸多案例逐一回应。

2010年底，程维高临终前，让家人将河北省官方派给他使用的石家庄牌照奥迪车送回河北。但对于十年未曾亲见的儿子，程维高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蔡小飞回忆称，程维高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领导，有老百姓，还有从加拿大赶来的儿媳宋香祺和三个孙女孙子，但没有他最疼的儿子程慕阳。

程西霞也向《凤凰周刊》证实，其父健在时，程慕阳的三个子女经常回国；其父去世后，尤其是最近两年多，三个孩子已经很少回来。“我们联系主要靠电话，互相问个好就挂。对他那边的生活和生意，我完全不了解。”程西霞语调缓缓地说，“大姐因为这起案子，也被判了刑。目前住在北京，我们联系也很少，就是打打电话。”

《凤凰周刊》获悉，程悠兰从常州到北京后，经人介绍与某中直机关干部刘某结婚。虽然程悠兰曾因偷税被判刑，但并未影响丈夫仕途，目前刘某已升任某央企纪检组长。

今年4月，“天网”行动公布外逃被通缉人员名单后，程慕阳登上媒体热榜，甚至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提了程慕阳的名字，程西霞对此表示：“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决定吧。”

《凤凰周刊》记者另获悉，程维高之妻张佩斐年逾八旬，身体不佳。去年年底，张佩斐去温哥华与儿子见面，至今未归。

5月10日晚间，《凤凰周刊》记者再次造访“愚园”。院中，程维高早年添置的水景，已经关闭，听不见淙淙的流水声。三层的豪华别墅，一片静寂，程西霞和保姆二人，为回避舆论，已另住他处。

几乎与此同时，程慕阳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豪华别墅，也大门紧闭，人员不知去向。当地媒体称，程慕阳或携家人离开了这个给他多年庇护的城市。他通过律师向外发声：他“没有逃亡，也从未逃匿，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逃犯”；对红色通缉令中有关他“贪污国有资产”等一系列指控，他一股脑否认。

根据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贪污针对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程慕阳否认有罪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并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与程慕阳有关的几十家公司，与国企的区别和联系究竟为何，也尚待厘清。

采访中，有熟悉这段往事的人士向《凤凰周刊》表示，“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在快速交替，社会面临大转型，权力资本四处寻找制度漏洞。程慕阳的商业帝国，是通过其父在河北省内的至高权力，粗暴碾压市场获得的。这样的敛财方式与中国大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整肃。”

程慕阳出逃加拿大15年，给大陆留下了一个跨世纪的“传奇”：一个年仅22岁大学生，仅用了9年的时间，就在河北、北京、香港、包头等地办了至少32家各种业务的公司，获得数以亿计的财富。每一个公司背后，都有一段权力与资本互相围猎的剧情。目前，有的公司还在悄悄运转，更多的则是“过期未年检或注销”。根据部分媒体报道，“32家”系“不完全统计”。程慕阳当年究竟直接或间接开办了多少公司、收入几何，或许只有他自己才了然。

程慕阳曾是疯狂的资本猎手，在燕赵大地上罕逢敌手；而今，他是中共海外“猎狐行动”的猎物。他将如何最后周旋，如何主演这场被围猎大戏，世人充满关注。

董 事 会 决 议

经石家庄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董事会会议决议：

原副总经理项志新同志离任，现任命黄品勇同志任该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决议

石家庄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会

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

1995年，程慕阳在石家庄华恒房地产公司的一份董事会文件上签名

程慕阳流亡记：地产富豪的末路

记者 / 李克难



新华国际独家获得的迈克尔·程的住宅图片

从2000年出逃到加拿大后，程慕阳就一直在寻求获得加拿大合法身份的保护，但其公民身份申请被拒绝，居民身份被取消，难民身份被驳回，未来等待他的只是被遣返回国——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不会太短。

碧水蓝天，享受着太平洋东岸温带海洋气候滋润的加拿大西海岸第三大城市温哥华，多年来在全球生活质量指数排名中都名列前茅，更是北美地区的冠军城市。

然而今年4月初加拿大国内一次“城市幸福指数”排名，却把温哥华排在了全国33个城市的最末。在加拿大《国家邮报》专栏作家特里·格拉文看来，幸福感的缺失，根源在于温哥华房价的畸高与地产业对整个城市的绑架，温哥华的住房收入比已达到仅次于香港的水平。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日期的邻近，加拿大政府希望发挥一下自己“独特的优势”而向担忧回归后前景的香港中产大量发放加拿大护照。到2011年，已有30万香港居民手持“枫叶卡”。

进入本世纪的头十年，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大陆官员和新贵逐渐增加，巨量资产从地下渠道被转移出大陆，其中不少也流向了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

1991年就办理了香港居民身份的程慕阳，于1996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前一年，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但他仍然保持着香港居民身份。

2000年初，程慕阳在大陆做生意的重要支持者、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腐败案发，李真曾担任过程慕阳之父、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号称“河北第一秘”。程慕阳经过几个月策划后，于当年9月携带巨资出逃加拿大。

但流亡加拿大的程慕阳并不甘心隐姓埋名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富家翁，加拿大的相关司法文件显示，他早在正式出逃前两个月的2000年7月，即已在加拿大开设自己的公司“Mo Yeung International”（慕阳国际），这个公司到现在还在运行。

15年后，当程慕阳的名字被列入中国政府发布的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100人名单中，尤其是照片被曝光后，加拿大媒体吃惊地发现，这位在当地被称为Michael Ching，或Ching Mo Yeung的著名温哥华地产开发商，便是涉嫌经济犯罪出逃的程慕阳本人。而他的公司已在温哥华接下数个高端地产项目，价值不菲。

Cheng与Ching 就是一个人

通往温哥华机场的高速公路边，能清楚地看到称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商业地产项目的巨型广告，这个距机场2分钟车程的项目宣称将成为温哥华南列治文市新地标，其开发商之一正是慕阳国际。

据悉，程慕阳的公司还开发有温哥华市区内的“精品四十五”(Collection 45)社区。该楼盘一共45户，每套房面积从5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售价33万加币到68万加币不等。楼盘于2013年年底完工，目前已售罄。在该楼盘网站上介绍，“从2000年开始，慕阳国际已为加拿大、美国与亚洲的1100万平方英尺的地产项目提供高质量的建设，专业化的设计与精细的室内装修。”

慕阳国际另一个开发项目是“河畔高档社区”，该楼盘承建17层，219户，计划2016年夏竣工。此外，慕阳国际还拥有内设水疗馆、瑜伽馆、按摩房、健身房以及游泳馆设施的高档会所“身活馆”，考伊琴湾的一座“海滨度假酒店”等。

程慕阳系外逃人员身份曝光后，加拿大诸多媒体云集慕阳国际办公所在地，但发现该公司已紧闭大门，人去楼空；该公司网站现也处于维护状态。

程慕阳的代理律师大卫·伦尼曾一度否认其委托人即是被中国政府与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程慕阳；后来又否认任何来自中国对其委托人的指控，宣称其委托人光明正大地来到加拿大，并非逃犯，“被媒体广泛炒作的中国政府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只是产生于中国政权领导人的更替”。

不过，加拿大移民部门确认，慕阳国际的总裁即是程慕阳本人。2014年10月31日，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委员会驳回了程慕阳的难民身份申请。裁判官戈登·麦克雷在判决中说，申请人在加拿大境外犯有“严重的非政治性犯罪”。在加拿大，与移民有关的诉讼需由独立的移民与难民委员会进行裁判。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则是移民事务的行政机构。

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日前就程慕阳案件情况回复《凤凰周刊》，由于案件正在进行中，公民与移民部不便就案件具体问题进行评论。但邮件中留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加拿大人是慷慨而好客的人民，但他们不会容忍罪犯与骗子滥用我们的慷慨。一旦一个人用尽一切法律渠道，我们希望他尊重加拿大移民法律离开加拿大，或者将被驱逐。”

加拿大温尼伯地方法院向《凤凰周刊》提供的诉讼文件显示，程慕阳在难民身份的申请中一直在声称其被中国官方通缉是受到“政治打压”，因为其父亲是已过世的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

但熟悉中国国情的观察人士则指出，恰恰相反，正因为程慕阳父亲身份特殊，程慕阳外逃后才能多年安然无事。

寻求加拿大合法身份的算盘落空

程慕阳从2000年到达加拿大后，并不满足于“永久居民”这样一个只具有居留权的身份，他一直在寻求获得加拿大正式公民身份的保护。

据加拿大媒体曝光，程慕阳曾在2001与2004年两次申请加拿大国籍，但两次被拒。2006年6月，程的律师向加拿大联邦法院上诉其国籍申请，此后又提请法院强制行政部门执行审理其入籍申请的义务。即使如此，程慕阳希望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意图仍告失败。

温哥华移民律师钱路告诉《凤凰周刊》，一个加拿大永久居民如果在加拿大境外“犯事”，他的永久居民身份将被取消，并被加拿大政府遣返；而一旦成为加拿大公民，则不存在被遣返的问题。当然，理论上如果一个人是在成为加拿大公民之前就“犯事”，可以先取消其加拿大公民资格，再取消永久居民资格进行遣返，但实践上这样的例子很少。因而，加拿大公民身份是一个有效的保护伞。

诉讼文书显示，程慕阳早就发现中国的国际刑警在2001年发出针对他的通缉令，但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他的指控没有根据，他还提供了所谓“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受到酷刑的两个证人”的证词。程慕阳在申诉中还称，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公安部曾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北京联络处进行过多次联系，中国警方还曾于2004年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书面请求，阻止程慕阳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据钱路介绍，根据加拿大现行的法律，如果一个申请人在加拿大有犯罪行为，并被加拿大法院宣布为犯罪，是不能加入加拿大国籍获得公民身份的；但如果一个加拿大永久居民在加拿大境外“犯事”，并不妨碍加入加拿大国籍，如果加拿大政府拒绝给予入籍，申请人可以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现行的法律。程慕阳正是基于这样的条款提出的申请。

目前加拿大新的国籍法将修改这一条规定，让在国外“犯事”的人无法加入加拿大国籍，但新的国籍法现在还没有实施。因此，钱路律师认为，程慕阳未能获得加拿大国籍，与中国政府是否向加拿大政府提供信息在法律上没有直接逻辑关系。

事实上，加拿大政府多年来一直在着手将程慕阳驱逐出加拿大。据加拿大媒体报道，2009年，联邦政府已经第一次向移民与难民委员会申请取消程慕阳的永久居民资格，但裁判官采纳了程慕阳方面的证词，尤其是来自“受到酷刑的两个证人”的证词。但2011年，在上诉法庭中，法官推翻了一审法官的裁定，认为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程慕阳在境外“犯事”，因而需取消其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该裁定只是一度以程方面质疑裁判官中立性而推迟执行。

从2012年到2013年，程慕阳聘请多伦多知名律师罗科·加拉提代理其上诉和司法复核案，结果均告失败。

之所以用“犯事”这个并不严谨的法律概念，钱路解释称，根据加拿大法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发生在国外，虽然没有被定罪，但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有确切的理由，合理的相信”这个人在国外的行为放在加拿大国内仍然可以构成比较严重的罪行，即所谓的“犯事”，那么，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便可以拒绝这个人的永久居民申请或者吊销这个人的永久居民资格。因此，取消程慕阳的永久居民身份，不需要他被定罪，而只需要满足“确切的理由，合理的相信”的门槛即可。

失去加拿大身份的程慕阳不得已才开始向移民与难民委员会申请难民身份以获保护。为此，他又聘请了已年届71岁的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为其辩护。大卫·麦塔斯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多年的中国

政府批评者。他也曾是赖昌星的代理律师。但难民身份是针对政治犯的，而程慕阳被通缉的涉嫌犯罪行为是“贪污和转移犯罪资产”，这显然属于经济犯罪，并不是政治犯罪。

加拿大法院向《凤凰周刊》提供的驳回难民申请裁决书显示，程慕阳在申请难民身份时，回应了中国政府对他在河北大厦建设项目中涉嫌贪污的指控。该回应中，程慕阳并未否认他与原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以及北京宏德利公司经理苏国本一起从建设中牟利的事实，但他否认中国官方说法，称苏国本不是他同学，而是在他大学毕业一两年后才在北京相识。

程慕阳表示，在河北大厦项目的运作中，他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他发挥的作用仅是将王与苏凑到一起，对具体交易的细节并不熟悉。程慕阳还承认，他获得了该起交易获利535万中的280万，剩下的归苏国本。这一数据与中国官方之前公布的一致。

对于中国官方指控其帮助李真转移赃款，程慕阳的难民申请书则没有回应。

最终，加拿大移民部门也否决了程慕阳的难民身份申请。

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针对程慕阳难民身份申请的驳回裁决中，法官戈登·麦克雷写道：“程慕阳犯罪的细节令我认为，这种行为在加拿大被称为‘白领犯罪’——由接受良好教育，有良好人际关系，并有良好职业前景的人所作，一个身负信任职位的人所作。”

在裁决书中，法官戈登·麦克雷列举了加拿大移民当局提交的、由中国方面提供的关于程慕阳的大量证据，其中包括10名证人和各项交易的9份书面证据。法官认为如此庞杂的证据他不可能一一检验。但加拿大移民法庭不需要判定申请人是否有罪，只要判断证据是否提供了一个严肃的理由需要考虑申请人是否构成非政治性犯罪。判断的标准低于民事案件中的概然性权衡（balance of probability）而高于仅仅是揣测和推测。从证据上看，对程慕阳的指控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程慕阳及其律师辩称，其因为是前河北省委书记的儿子而受到其父亲的政敌的构陷。但法官认为，假设申请人的说法成立，背后的主使处心积虑，罗织如此大量复杂的证据指向申请人，还不如把这些精力放在直接指向其父亲头上更合适，因而认为程慕阳一方的说法不合逻辑。

不过，根据加拿大的司法程序，程慕阳还可以再一次提起上诉。目前关于其难民身份的上诉已被安排在了今年6月23日审理。

钱路认为，程慕阳现在的处境已经与当年的赖昌星非常相似了。相同的地方是都没有了移民身份，并且难民身份都没有批准，不同的只是，赖昌星当年是把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后回国，而程慕阳则还不知道他的法律程序进展如何，至少今年6月还有一个上诉。如果程慕阳没有找到更有利的理由证明其难民身份，他也将走向和赖昌星同样的结局。

对于程慕阳何时会走完剩下的法律程序，钱路认为自己无法精确估计时间，但如果他能够找出一些新的证据或合理的依据，案件可能会走到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而如果进入最高法院，没有七到十年的时间要结案是很难的。

另一方面，加拿大最高法院曾在一个判例中说过，如果一个人被递解回原籍后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那么加拿大的司法部门就要格外谨慎。可能受到的惩罚越是严重，加拿大对其程序上的保护就越要完善，要让其穷尽加拿大法律上可能的所有程序。这样这个人离开加拿大的时候，不会觉得加拿大是一个没有法治、没有秩序的国家。

钱路认为，与赖昌星案相同，程慕阳也提出，他是因为中国政权领导人交替而受到政治上的波及，但这一点从赖昌星案来看，不太可能构成难民身份的理由。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曾在一个判例中说过，加拿大不希望成为外国犯罪分子的天堂。如果有比较可信的证据证明申请人犯有非政治性质的犯罪，就不会容留此人在加拿大。

程慕阳案再起波折

记者 / 李克难

随着中国海外追逃的深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就越显得迫切,

首先要从改进判决书的书写、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开始。

7月17日，大陆“天网行动”重要目标，前中共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在加拿大的难民申请上诉案揭晓。

加拿大联邦法院推翻了2014年温尼伯难民保护庭拒绝程慕阳难民申请的一审判决，认为该决定缺乏证据支持，仅仅依靠中国方面法院判决的做法违背司法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程慕阳上诉成功，他将可以重新向难民裁判所提出难民身份的申请。尽管这并不代表程慕阳被追逃的命运有巨大转机，重新申请仍然可能被驳回，但至少程慕阳多争取到了一些滞留加拿大的时间。

无论如何，加拿大联邦法院此次的判决令大陆司法的操作细节受到了国际上的考验。某种意义上，这一判决对大陆司法实践的警示意义比案例本身更重要。

焦点在河北大厦一案

从2000年便长期居留加拿大的程慕阳，在2011年失去了加拿大永居权。为继续留在加拿大，他开始向加拿大难民保护法庭申请难民身份。根据加拿大程序法的规定，一个人能不能获得难民身份，需要经过移民与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庭正式开庭审理才能决定，并非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可以单独作出决定。

根据加拿大法律和《联合国难民公约》，如果一个人能证明其返回原居地将受到政治、宗教、种族等原因的迫害，那么他可以申请获得难民身份以留在加拿大。但那些“有重大理由足以认为”，“曾在避难国外犯过严重的、非政治性的罪行”的人则不在难民保护之列。因此，程慕阳的难民申请第一道关即是要让法官认为其并非是犯过严重非政治犯罪的人，从而避免被排除在难民身份的考虑之外。

事实上，从难民保护庭到联邦法院，争议集中在程慕阳是否被认为“有重大理由足以认为”，“曾在避难国外犯过严重的、非政治性的罪行”的范围内。至于他声称的可能的“政治原因”则还没有被法官考虑。在

难民保护庭的难民申请裁定中，对程慕阳可能犯有非政治性罪行的问题都集中在河北大厦一案上。

1994年河北省计划筹建河北大厦。作为河北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王福友负责大厦选址。1996年，经程慕阳介绍，北京宏德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苏国本找到了王福友，将位于北京市安德路9号的香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拟建的北京福临科技大厦的地址推荐给王福友，并称自己的公司已经取得了该项目的转让权，但事实上苏国本的宏德利公司并没有该项目的转让权，只是一个中介公司。

中国法院网的报道称，王福友在明知港方的转让价格是每平方米2600元的前提下，却欣然地接受了苏国本的每平方米2850元的报价，两个价格的总差价是1071万元。王福友与苏国本达成协议，中间的1071万元的差价将付给宏德利公司，作为中介费。但此后河北方面并未向苏国本支付1071万元的中介费，苏国本于是将河北省政府告上法庭。后来双方以仲裁形式解决，河北省政府向宏德利公司支付535万元中介费。报道称这个诉讼是通过合法外衣将国家的500多万元装入个人腰包，其中程慕阳分得280万元。

2002年，王福友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还在服刑。苏国本也被法院以与王福友构成共同贪污犯罪为由，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11年提前出狱。而程慕阳被中国司法机关以挪用公款、窝藏并转移非法财物起诉，但因其外逃未接受审判。

在加拿大的诉讼中，程慕阳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为王福友和苏国本牵线搭桥，自己并没有犯罪。在去年的加拿大难民裁判庭一审中，法官麦克雷认为，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程慕阳很有可能已经犯下了“非政治性罪行”，因而裁决程慕阳申请难民身份失败。程慕阳遂向联邦法院上诉。

大陆判决文书在加受考验

在难民裁判庭的判决中，裁判官麦克雷声称自己收到了大量的证据和文件，又说这样大量的证据和文件让自己不可能一一检验。但此番联邦法院的上诉判决中，罗伊法官指出，一审裁判官事实上并没有获得中国方面的证据，他所依靠的“证据”只是石家庄中院和河北省高院的两份针对王福友和苏国本的判决。而且判决书只是针对王福友和苏国本的，并非直接针对程慕阳。程慕阳在案件中的责任和角色，法律上并没有结论。法官进一步认为，中国法院的判决中存在诸多不清楚之处，因而无法进行判断。

罗伊法官认为，所谓的挪用公款的情节本身就非常的模糊。苏国本尽管开始声称自己拥有地产所有权，但最后签下的合同仍然是河北方面与真正拥有所有权的港澳公司间的。并且在协议中宏德利公司的身份本身是清楚的。整个交易中看不出有什么欺诈存在。

即使王福友与苏国本的犯罪成立，但程慕阳在其中除了把王福友和苏国本两人介绍到一起以外，他与挪用公款有什么关系呢? 罗伊法官认为，在中国法院的两份判决中一再提到程慕阳从535万元中分得了280万元，但都只有笼统的一句“根据相关证据”，但判决本身并未显示判定依据的是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指向的又是程慕阳什么样的欺诈行为。判决中称苏国本的宏德利公司实际上是受程慕阳控制的，但未列出明确证据。纵观两份判决，程慕阳的名字尽管被不断提及，但他除了将王与苏带到一起，未见其他进一步参与的描述。

罗伊法官指出，难民裁判所并没有中国法院的证据，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庭审只持续不到一天，只有一个不重要的证人接受法官质证。而除了这个证人以外，其他证据都只是书面证言和文件证据。这些证据也没有受到质询检验。“公诉方只是在庭上发言，然后就直接被接受了。”

罗伊法官认为，加拿大方面要建立对外国法院裁定的“合理确信”，外国法院的决定至少应当满足“合理、透明和可理解”的要求。但在程慕阳的案件中，他不认为中国方面的判决达到这个要求。加拿大方面要建立自己的“合理确信”也不能只依靠外国法院的裁决，必须自己从证据中去做判断。

上诉判决裁定程慕阳胜诉，可以再寻一所难民裁判庭申请难民身份。

或可成为大陆改进司法契机

上诉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程慕阳申请难民身份的成功。因为即使程慕阳被认为并非犯过严重非政治犯罪，程慕阳要获得难民身份还要证明其如果回国，则会遭到政治迫害。加拿大华人律师钱路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加拿大，多年来很多中国贪官都寄希望于通过申请难民身份而免于回国，他们往往都以其是中共党内斗争牺牲品，如果回国将受到政治迫害为由争取难民身份，但至今还没有见到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这一方面是因为“非政治犯罪”的关很多人是过不了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政治迫害很难举证，而且西方社会也不太理解所谓的“派系斗争”，因而贪官申请难民身份，至今鲜见。

与赖昌星案相比，钱路认为，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方面当时向

加拿大方面提供了大量关于赖昌星走私的证据，材料非常完备。因而赖昌星是否犯有非政治性犯罪在加拿大法院里并不是问题。但和赖昌星案相比，中国有关部门对将程慕阳送回国似乎显得过于乐观。中国在从国外遣返外逃贪官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当地的程序法。这不仅适用于加拿大，也适用于同为大量贪官外逃地，也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尽管程慕阳上诉成功，钱路并不认为这是“天网行动”的一次重大挫折。联邦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认为程慕阳是清白的，也没有因此给他难民身份。联邦法院只是认为，难民保护庭的裁判官所作的对事实认定在程序上是错的，因为他没有看任何证据，只是简单地照抄了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因而，这个决定得要推翻，要由难民保护庭的另外一位裁判官来重新认定，并且一定要有证据。这也为大陆方面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方向。

在程慕阳案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波折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大陆司法操作严谨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其实也指明了大陆司法改革可以借鉴的一个方向。

钱路律师曾在中国大陆执业多年。对比两地的司法制度，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决，大陆法院的判决文书往往过于简单，尤其是更早几年，判决中并不具体写清楚根据哪几件证据得出什么结论，仅笼统表述为“根据相关证据”。这种表述方式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不被接受的。

钱路认为，程慕阳案本身是一个个案，中国可以为此准备更完善的证据。随着中国海外追逃的深入，今后类似考验还会不断遇到。改革大陆司法体制，首先要从改进判决书的书写、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开始。

解密国际通缉令里的中国贪官：数量超过50，十八大后大增

记者 / 孙杨

目前，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红色通缉令里，中国籍人员至少有160人。其中逾50人的涉嫌罪名明确涉及职务犯罪和贪腐问题，比例约占被通缉中国籍人员总数的三成。中共十八大之后两年间，新列入的被通缉者数量大增，其中不乏已逃往海外十多年者。

被称为“第一女巨贪”，出逃海外11年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终于有望被引渡回大陆。新华社官方客户端9月28日发布消息称，杨秀珠的引渡遣返已启动，正通过协作国依法办理相关程序。

其时，大陆官方“猎狐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背景下，杨秀珠将被引渡的消息引得大陆舆论喝彩不断。有评论称，这说明“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绝非流于口号。而将外逃贪官列入国际刑警组织（ICPO）“红色通缉令”予以全球通缉，成为大陆官方“国际追贪”的重要手段。

以杨秀珠为例，早在2004年就被全球通缉，当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2005年5月，荷兰警方将其抓获，其依据就是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位列红色通缉令中的中国籍人员至少160人，其中相当数量为涉贪、涉经济犯罪人员，何时能将他们缉捕归案令人关注。

《凤凰周刊》记者特别将“榜上有名”的中国籍被通缉人员的身份、罪名等逐一进行核实和梳理，更将其中涉贪人员背景进行归纳和分析，力求还原大陆外逃贪官遭通缉的现状、规律，以及海外追逃之紧迫性。

由于国际刑警组织公布姓名均为英文（汉语拼音），并非汉字，本文梳理仅能通过与之同音汉字名称、籍贯、照片、年龄等信息，推测相关性最强的已知大陆外逃贪官。诸多姓名同音字过多、大陆媒体披露较少的被通缉者，能够确认其为涉及贪腐且外逃的大陆籍人员，但确切身份难以获知。

杨秀珠弟弟疑似现身“红色通缉令”

《凤凰周刊》记者登录国际刑警组织（ICPO）官方网站，在其公开的红色通缉令中，杨秀珠的名字已经无法搜寻。不过，记者意外地发现，红色通缉令中，有一名字显示为“Yang Jinjun”的男子，高度疑似女巨贪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通缉令所列信息显示，其现年56岁，出生地为温州，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

据2005年央视“法治在线”栏目播出的《杨秀珠系列案第一案宣判》报道，1996年，杨进军经商亏本，急需一千余万元换银行贷款，杨秀珠曾计划挪用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配套费帮助弟弟。

根据媒体报道，杨秀珠的多位家人均牵涉该起特大贪污受贿案中，其中，杨秀珠的另一个弟弟，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已在2004年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而杨进军则至今没有下落。

杨秀珠案被大陆定为特大贪污受贿案，加之其女性高官身份，一直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可称是迄今为止大陆最知名的女贪官。

杨秀珠曾历任温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温州市市长助理以及温州市副市长。出逃前，官升至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兼浙江省城市化办公室主任，主管城市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伴随着温州经济高速发展，一路贪污受贿至本世纪初。

2003年3月，时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的杨秀珠的弟弟杨光荣受贿案发。同时，检察机关发现杨秀珠涉嫌贪污行为。同年4月20日，杨秀珠以母亲生病需要照顾为由告假，悄然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从上海经由新加坡出逃美国。

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出逃后的杨秀珠被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通缉，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国，最终于2005年5月31日，在荷兰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被逮捕。

近年来，杨秀珠案的涉案人员已经陆续以各种方式归案，现在，随着核心人物杨秀珠本人的引渡程序启动，这场牵动大陆民心多年的贪官外逃案也将画上句号。

杨秀珠的外逃经历仅仅是一个缩影，提前将家人和巨额财产转移至海外，为自己准备假证件以便案发后出逃，已成为越来越多贪腐官员“逍遥法外”的主要路径和方式之一。也成为大陆反腐的掣肘。

十八大以来，中共高调向外逃贪官宣战。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配合下，已陆续将数百位涉贪、涉经济犯罪人员缉捕回国。特别是今年7月以来，由中纪委牵头，掀起的新一轮海外追逃行动，收获颇丰。

与杨秀珠的缉捕过程类似，《凤凰周刊》挖掘追逃背后的故事发现，很多行动成功都离不开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特别是该组织鼎鼎大名又异常神秘的“红色通缉令”，由于频繁被媒体提及，更引发公众强烈兴趣。

逾50名大陆涉贪人员遭全球通缉

打开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首页，即可看到右上角显眼位置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小标识，位列第一的，配有红色国际刑警警徽的“WANTED PERSONS”标识，即该组织最为著名的国际通报——红色通缉令。

作为规模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目前共有190个成员国，重要职能之一是协助成员国跨境侦查犯罪。经由该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它的通缉对象均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

每一张红色通缉令都包含有被通缉者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所涉罪名等基本身份信息描述。绝大部分还配有至少一张照片，并标注了头发、眼睛颜色等外貌特征。红色通缉令每五年重新发布一次，但是只要涉案人员一天没有归案，通缉令将长期有效。

《凤凰周刊》记者发现，在ICPO官网红色通缉令搜索页面的国籍一栏中输入“china”，可以查询到的中国籍被通缉人士160人(该网站按国家搜索的显示条目数上限。更换搜索方法，仍可发现少量其他被通缉者)。这一数量远多于可以查到的欧美发达国家的被通缉者数量。

将被通缉人员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核实后可见，160人大名单中，有超过50人的罪行明确涉及职务犯罪和贪污腐败，比例占被通缉中国籍人员总人数的三成。

他们涉嫌的具体罪行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国家财产、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等。

经核实，这些被通缉人员外逃前的身份，大多是政府公职人员、国企管理层，不少疑似是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的知名贪官。如疑似以生病为由，在国外滞留不归的前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疑似与著名银行监守

自盗案“开平案”关系密切的原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前行长赖敏；疑似卷款数亿元外逃的中移动高管李向东；疑似山东兰陵集团前总经理、党委书记崔学文等。

从通缉令发出时间可见，不少贪官已经成功躲藏海外十多年。大部分贪官的出逃看似突然，实则经过长期准备。

2008年9月19日，时任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曾主持温州旧城改造项目的53岁的杨湘洪率团赴欧洲进行经贸考察。9月29日，当代表团结束考察按计划回国时，杨湘洪以自己腰伤严重不能长途乘坐飞机为由，滞留在法国，至今未归。

由于杨湘洪的女儿事后被媒体查证早已在法国定居，而女婿是位温州籍法国商人，有理由相信，杨湘洪的出逃计划并不突然，背后经历了长期的精心计划。

而中移动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的外逃计划，更是至少提前5年开始布局。

据大陆媒体《时代周报》报道，早在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时任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红便突然辞职，前往加拿大。而李向东则继续留在国内，以自己控制的子公司，利用中国移动“音乐基地”的平台，进行寻租敛财。

2010年，李向东原本正处于即将被提拔重用的关键时期，但3月25日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当天下午约请李向东谈话，谈话结束后，李向东便连夜出逃。

贪官配偶和亲属亦难逃通缉

红色通缉令名单还披露了贪官外逃明显的家族化特征。

很多贪腐人员为避免东窗事发之后殃及妻儿，更早早给家人筹划后路，有的先将子女送到海外求学或令家人移居海外，成为“裸官”；有的则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和家人获取双重国籍、绿卡或假护照、假身份证等，一旦发现风吹草动便立刻举家逃跑。因此，《凤凰周刊》记者在整理名单时，也发现不少著名贪官的配偶、子女和亲属。

如疑似已落马的前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之妻黄玉荣；疑似“女巨贪”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疑似已伏法的广西桂林巨贪李和平之妻黄艳兰；疑似“鄱阳大案”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之妻许爱红等。

2005年，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法院受审，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同一时间，与他同流合污的妻子、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副董事长兼副书记黄玉荣，则早已和儿子身处美国境内，至今仍未归案。红色通缉令中可见名为“Huang YuRong”，出生于山东省的女性嫌疑人与其高度相符，其罪名是“受贿”。

此外，红色通缉令中，也有个别问题官员亲属，如已故的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也疑似赫然在列。在通缉令中被描述为“Cheng Muyang，44岁，出生于江苏常州，罪名为贪污、骗取国家资产”。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程慕阳被认定曾帮助程维高秘书李真（已执行死刑）转移赃款、并勾结他人贪污国家财产。这与红色通缉令中对他提出的“利用职务之便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污，隐藏、转移、收购或以代理人身份出卖赃物”等指控相符合。

十八大后 被通缉贪官数量骤增

国际刑警组织当前资料显示，程慕阳的被通缉时间为2013年。实际上，程慕阳是在2000年9月4日经由香港逃至加拿大的，至今或已安然藏身海外14年，也就是说，程慕阳很可能在海外悠然藏匿了13年之后，才变成了国际通缉犯。

如果国际刑警组织资料显示准确，这显然意味着中共十八大之后，大陆贪官海外追逃力度骤然加强——一些原本“安全”了多年的外逃贪官，从此不再安全了。

不再安全的不止程慕阳一人。中共十八大之后，大陆公安部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数量大为增加，在《凤凰周刊》梳理的50余位贪官名单中，近20人的被通缉时间显示是2013年至2014年之间，比例超过总数的1/3。其中，2013年，9人；2014年，10人。

2014年7月开始的“猎狐行动”也同样借助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力量，据“猎狐行动”组透露，仅7月至9月的两个月内，公安部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28张红色通缉令，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包括外逃斐济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在内的多位外逃人员得以成功抓获。

今年是大陆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30周年。有媒体统计，自1984年以来，中国一共通过该组织发出过逾400份红色通缉令。其中绝大多数涉及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不少在大陆臭名昭著的贪官均是经由国际刑警的配合被缉捕和遣返回国的。

目前可查的最早的合作记录来自1988年，经国际刑警组织协调，大陆首次成功押解潜逃多哥的犯罪嫌疑人——福建省外贸总公司驻多哥公司经理胡正光、副经理杨苑琛回国受审。

2001年，被称为中共建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广东开平支行案”案发，一周后大陆公安部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外逃三位涉案人员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发出红色通缉令，并冻结其三人海外财产。最终，许超凡、许国俊在美国分别被处25年、22年有期徒刑，余振东则被遣返中国，并于2006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红色通缉令对贪官们的震慑作用不容忽视，据四川媒体《华西都市报》引述大陆警方说法，位列红色通缉令的人员，被捕率高达70%。

“红色通缉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压力。”有海外中国问题评论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事实证明，在大陆与多数国家尚未建立引渡条约，存在法律条文、政治标准等矛盾的情况下，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一纸红色通缉令及其提供的协助，可以简化抓捕程序，大大提高追逃和反腐的效率。

（实习生王珮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贪官外逃“封锁”指南

记者 / 林子敬

其实封堵贪官逃跑不难，只要组织部把护照管好，公安部门把第二第三身份的问题给解决，那么贪官的外逃之路基本能堵上。如果纪检部门能够给予更好的配合，效率将会更高。

“其实封堵贪官外逃还是重视与否的问题，这项系统工程自1996年起就实施了，但是落实程度不够。特别是组织部门没有做好收缴护照的工作，直到最近两三个月才开始动真格。”华南某省A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科长刘志成对《凤凰周刊》表示。

近期大陆官方加大宣传“猎狐2014”行动取得成果，告诫贪腐官员“海外并非法外之地”。但是在海外密布网络的同时，加强国内封锁贪官外逃的防线也不容忽视。“最重要的工作还应该放在防止贪腐官员从国内逃出，从成本上看也是如此。”A县纪检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王斌表示。

2012 年6月，在大连召开的国际反贪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曾经提及，追缉一名外逃到东南亚的嫌疑犯，所需经费要10万美元以上；追缉一名逃到南美国家的嫌疑犯，所需经费在20 万美元以上；追缉一名外逃到美国、加拿大的嫌疑犯，至少在50 万美元以上。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对《凤凰周刊》表示，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央和纪委方面对外逃官员方面缺乏有效预防和追逃协调机制。以至于外逃问题出现后，一些地方不对外公开，甚至欺瞒，这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据其称，这些情况在2007年后开始好转，因为中央建立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官员外逃本质上还是资金和人身的出境，防止外逃的协调机制自然得在“钱”和“人”上下工夫。

“封堵资金属于下下策”

今年8月，央行反洗钱局通报了今年以来洗钱威胁、风险和类型趋势，表示在跨境洗钱方面，目前主要还是将非法所得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或者通过亲属洗钱，丈夫受贿，妻子甚至其他在海外的亲戚帮忙洗钱。后者虽然常见，但是由于隐蔽难以规制。

此外，通过成熟的中介公司也很难被及时发觉。目前参与跨国贪腐行动的中介机构组织构成已十分复杂。银行、空壳公司、基金会甚至医疗与教育等公益机构，都可以进行洗钱。

防个人资金外逃主要涉及中国人民银行下属专门的反洗钱中心和公安部。反洗钱工作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调查，比如接到举报。在此基础上能通过电脑形成嫌疑人可能洗钱的交易主体，然后进一步调查这些主体资金流动的状况。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反洗钱局，今年刚好是成立十周年。根据中国反洗钱局的年度报告，2013年反洗钱的破案数量为225件，2012年为352件，2011年为292起。年报中并未公布查破案件涉及的资金额。

美国监督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的官网公布了《2013全球非法金融流动报告》，在非法金融流动的国家排名里，中国赫然排在了第一位，从2001年到2011年期间，非法金融流出额为1.08万亿美元，是唯一以“万亿”作为单位的国家。

非法金融流动的内容之一即为腐败官员利用匿名公司将资金汇到其他国家的户头。在资金流动管理上，外汇局主要监管对象是非金融企业法人和金融机构。因此，如果涉及官员利用企业转移资金，那么就会与外汇管理局挂钩。

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人士王子舒告诉《凤凰周刊》：“虽然现在技术手段发达，宏观监控比过去要容易，但是在资金流动的海洋中挑出违法的流动比过去更难了。”中国未来在资金出入境方面的趋势是自由宽松化，这是全球化的趋势，门槛会越来越低。外汇管理局也是简政放权做得最好的单位。

据其称，外汇管理局把一般的合规检查都交给银行来做，银行的所有结售汇数据都汇总到外汇局的系统上，管检司和各分局会分析这些企业法人的资金流动数据，遇到与企业经营情况不符的异常情况，外汇局才会介入。因此，外汇局遵循的是实时监管和事后监管。

不过在日常的企业法人监管中，外汇局遵循的是无罪假定，把企业法人分成A B C等几类。只要此前都遵纪守法，资质也都合格，那外汇局就认为该企业是最安全的A类。

在外汇局和所有银行实时联网的系统里一旦发现企业法人资金流动有异常，并且查实法人有违规行为之后，就会被降级，视情况变为B、

C类甚至取消结购汇资格。如果被处罚和降级，那再结购汇需要提交的材料和走的手续就严格了，甚至要地方局逐笔审核，这时候企业法人的跨境交易就会受限制。

“不过成立企业毕竟很容易，如果官员权力足够大，能够疏通所在地的工商和银行领导关系，那么作为A资质的企业要购汇结汇并不那么困难。这些方面单靠外管局难以防范。”王子舒说。

此外，很多非法资金的流动未必通过国内正规的金融机构，虽然外管局限制个人每年最多换汇5万美元，但是贪官总是有办法转移大额资金。资金转移的方式，根据央行反洗钱局的统计，至少存在8种途径：现金走私、替代性汇款体系、经常项目下交易、境外投资、信用卡工具、借道离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道境外特定关系人。

中国目前重点监视的资金汇出国，包括泰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香港、澳门等主要中转地区，还有重点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百慕大等等。特别是涉及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汇出，金融机构和外汇局在审查时都比较谨慎。

目前，很多银行在做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当于资金不用购汇，人民币就能直接汇出境外，不涉及在境内结购汇就不是外汇局的业务范畴。“人民币监管主要是人行管辖下的，现在跨境人民币刚兴起，相关监管措施到了哪一步，以及公安部门是不是把没有犯罪嫌疑的官员账户也监控了，就很难说了。”王子舒表示。

对于资金外逃方面，李永忠表示：“不能指望我们堵住贪官转移非法所得，官员一旦贪腐到钱，就已经被动了。封堵官员资金流出已经是下下策，根本上还是应该堵住官员腐败的渠道，而且封堵官员本人出境也会比封堵资金更为有效。”

纪委初核阶段难以封堵

在国内防止官员外逃的封锁线中，最主要涉事部门是纪委、组织部以及公安部门，三个部门都有各自的重要使命以及重大责任。

“纪委的工作最能触动官员外逃的神经，很多情况下贪官都是闻到纪委追查的气息而下定决心外逃。贪官外逃当然有纪委的责任，但是有些事情纪委也无可奈何。”王斌表示。

据了解，地方纪委的主要工作是查案，首先要有群众举报，然后纪

委进行初步分析。认为举报案情有一定道理或者证据，接下来就是前期的初核。纪委在初核阶段会悄悄调查，掌握一定的证据链条，才会正式立案。

王斌表示，在纪委的工作中，初核阶段是导致官员外逃的最致命环节。初核阶段基本上只有纪委一个部门在行动，组织部门和公安机关的防逃机制都还没有启动。究其原因，纪委在初核阶段要接触很多人，根据举报的案情悄悄询问涉案人员机构，再简单的案情也得问过5人，整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然而这个过程中难以防止“漏风”。

王斌苦笑道，“按理来说，初核阶段被查人员应该不知情，但是实际上太难。走漏风声后也很难追责。”据其透露，省级纪委要初核的官员很多，数量上千并不奇怪，没有人手和精力对每个人都加以防范。

此外，初核阶段并不能判断官员是否有问题，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官员确实没问题。如果初核阶段就按照“涉嫌犯罪”进行立案，则会影响官员信誉以及正常工作。但初核阶段如果纪委觉得被查官员有外逃迹象，那么纪委和监察局有权限提前采取措施，通过临时报告公安局限制官员出境。

对此，王斌解释，是否有外逃迹象主要得看案情，如果举报涉及金额只几十万元，那么纪委一般不会通报组织部和公安部门。如果举报时就有过硬的证据，或者涉案金额高达千万上亿，那么肯定会引起重视，不能有所疏漏。“如果官员外逃产生重大损失，那么上级将会从严追责。”

严防“裸官”外逃

大陆社科院曾在2012　年《法治蓝皮书》中指出，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而且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但在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后，短短两年中，“裸官”已经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贬义词。

在防止贪腐官员外逃方面，目前地方纪委最有可能做到的还是盯紧“裸官”。当前，《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每年对领导官员上报的要求越来越多，官员需要申报包括海外资产在内的所有财产以及家人的状况。

对此，李永忠表示，现在全国“裸官”的状况基本上被摸底了。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中，如果官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包括取得外国国籍、永久居留权甚至长期居留许可，还需要提交另一份境外配偶、子女情况的报告表。

表格内容包括所持证件及证件号码、移居原因及方式、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在国外的住址、在国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这张表格被称作“裸官报告表”，由官员本人填写、签名、密封后直接交相应的组织部，送往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中央2014年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凡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裸官”的晋升因之受到硬性制约。此外，在一些地方出台的文件中进一步规定，“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不过落实下来还有很大的难度。”王斌表示，“主要还是核查的难度大，毕竟信息量太大，不可能每个人上报的信息都进行过滤。现在虽然有抽查制度，但是比例还是很低。此外，目前核查主要还是局限于档案，经济情况需要专业领域的知识，一般纪委工作人员难以承担。”

目前财产申报的内容包括不动产和投资类财产，银行存款一般不需要申报。只要官员以自己的名字买房和投资，就能查到，但是，如果以其他人的名字投资，那么就难以核查了。“在核查的精细化层面，纪委层面还有很多理论上应该做到，但是现实中难以实现的问题。” 王斌叹道。

此外，李永忠表示，仅仅是“裸官”不予提拔升迁的规定仍然不够。这一规定对那些从未打算外逃并且指望在仕途有所发展的“裸官”才有效；对那些确实准备“先裸后逃”的贪官而言，反而没有约束力。完成贪腐或者已经在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官员，已经放弃仕途，这时候再“裸”也无需顾及日后的升官问题了。

因此，“裸官不得提拔”充其量只是警醒“裸官”的一种方式，具体到防范“裸官”外逃，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李永忠建言，监督“裸官”应该是更加全面的监督，比如将“裸官”的信息对全社会公开，提前将“裸官”名单在公安部备案，官员财产公示也可以从“裸官”做起。

真正落实护照收缴

“这次中央加大防范官员外逃的力度，新的要求主要针对各个单位的组织部门。”A县的组织部部长叶红告诉《凤凰周刊》。

组织部门其实最直接关系到官员出入境，因为掌控了所有官员的护照。组织部门和公安机关以“备案制”监控官员的护照情况。备案制根据官员的层级和职务进行分级管理，级别越高，办理护照时需要的审批和

手续就越复杂。现在国家严密监控处级以上官员以及涉及金融和秘密的部门人员，对他们的护照审批最繁杂。

A县国税局的一位前职员向《凤凰周刊》透露，此前她办理港澳通行证时到省公安局递交材料，被告知她属于二级备案，不仅需要所在单位的审批，而且需要省级单位的许可。不过后来澄清是公安局登记失误，因为她属于正科级别，只需进行一级备案，出具本人单位盖章即可。

实际上，组织部收缴官员所有的护照（包括因私护照）的规定早已有之，但是一直没有严格执行。官员因私护照随时可以办理旅游签证出国。叶红认为，这使得围堵贪官外逃缺失了重要一环。“现在反腐力度大了，强调倒查责任，组织部没有管好护照导致官员外逃，会被追究主要责任。两个月前我们才紧急统一催缴了官员的所有护照。”

组织部管理好护照是防止官员外逃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一步。管理好后，官员需要办理出境签证时需要经过组织部的审批，在这个环节组织部会询问纪委的意见，判断申请人是否有出逃海外的意图，以及查看有没有不良记录，包括是否有家人在国外，以前是否有涉贪污腐败的被举报记录，但是并不会调查申请人的财产状况。

官员拿到因私护照后，办签证其实也相比普通人的“门槛”更高，只不过这个门槛的设立不是源于中国政府，而是外国政府。此前虽然因私护照没有管理好，但是在申请外国签证时也会遇到麻烦。

“其实发达国家政府最不能接受的是申请人不诚实，并不欢迎中国贪官携带巨款投靠。”北京某旅行社从事办理签证业务多年的张女士如此评价。据介绍，外国大使馆授权旅行社办理签证是相信其对申请人事实状况的把握，一旦出现贪官携款潜逃，外国大使馆也会惩罚相关旅行社。

“如果在旅行旺季被惩罚，那么手上同时进行的几千名旅客签证的申请将全部被拒签，旅行社将损失惨重。”张女士表示，她曾经在处理一批前往澳洲签证的材料时发觉可疑人员。为此大使馆要求其重新调查，旅行社则专程派员跑到此人户籍所在地河北。调查后证实其为当地某国企老总，最后退回了他的签证申请。

有些官员用真实护照让旅行社代办签证，以旅游目的出境再飞往第三目的地。但递交材料时会作假，包括掩饰其公务身份等，但任何不实一旦被查出来都会遭到拒签。“虽然漏网之鱼无法避免，但是久而久之，我的工作感觉都带有公安部门的色彩了。”张女士笑道。

“现在才要求组织部门严管有点晚，过去的工作疏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麻烦的是很多官员已经拥有了第二国籍、外国护照。这样的官员在一些小国家花点钱就能买到国籍，外国才不管你是不是官员，只要符合政策就能入籍。”刘志成科长抱怨。

如果官员取得第二国籍，即便组织部管住官员所有护照也没有用了。刘志成表示，第二国籍在中国使用很麻烦，涉及用什么身份入境。如果仍用中国护照入境，那么出境时想用外国护照就很难，因为中国不允许没有入境记录的人出境。所以很多官员会想办法去香港，因为去香港的难度要小于直接出境，到了香港后再出国时，出境的管理就和大陆不一样了。

“虽然麻烦，但是有些官员就喜欢这么干。”刘志成说，“不过现在技术进步后，这个漏洞能够堵上了。”

对多重身份的技术性封堵

“在封堵贪官外逃时，虽然公安部门处于被动地位，但是这些年来对于贪官外逃的遏制，进步最大的还是公安。”刘志成告诉《凤凰周刊》。

公安领域也有贪官外逃的直接漏洞，最典型的就是官员利用多重身份办理护照出境。办理护照需要提交户籍和身份证等材料，办理身份证又得基于真实的户籍资料。有些人花钱新增一个户口，或者采取一些补漏的形式登记入户籍。

由于此前户籍等基础数据没有联网，不用说省与省之间，同一个省的县市之间的户籍都没有联网，资料更新也慢。因此，一旦拿到有效的户籍，那么拿到身份证以及护照就水到渠成了。

贪腐官员拥有了“合法”的第二身份后，出入境管理局就没有办法了。即便纪委立案并通知口岸，官员也能悠然地用第二身份的护照通关。不过刘志成表示，现在基础数据全部联网，都上传到了公安部的数据库，对多重身份的问题起到了有效遏制。

据其解释，现在办理户籍、身份证和护照时，都会将提交的材料和目前的人口数据库进行比对，面部相似度识别等技术能够查到此人是否有其他户籍或者身份证。新一代的身份证已经需要录入指纹，等指纹数据库充实后，指纹比对会更有效地遏制多重身份的情况。

刘志成告诉《凤凰周刊》，虽然并非针对官员，但是公安部门正在

整治多重身份，该县已经通过比对等手段查出一大批多重身份的居民。该地区原属开发区，当时政策“一刀切”，不允许外来人员再入户，但是很多人用各种手段拿到该县户籍以享受政策红利。“发现后，有关部门会惩罚涉案人，如果查到其办理第二身份的护照，会根据《护照法》的规定予以追究。”

据透露，一般来说居民出现双重身份的问题不太会追责，但是如果是贪腐官员外逃，由于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倒查时肯定会从严追责。“此前陕西‘房姐’问题造成社会重大不良影响，后来立案处理了好几个人，官员外逃时的追责也是如此。”刘志成说。

至于官员用自身的影响力串通公安局办证的问题，刘志成表示基本不可能。首先办证得通过户政和出入境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对提交的资料多次核查，因此只串通一两个人做不到，“漏风”的可能性极大。

“其次，如果有官员有这种动机，就说明他有问题，关系再好的公安局领导也不敢替他办事。毕竟事后倒查下来工作丢掉算小事，很可能还有牢狱之灾。对于领导，我们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弄虚作假可不敢有。”刘志成笑道。

去年新的《出入境管理法》实施后，拥有双重国籍的中国人也在打击的范围。“以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很多有双重国籍的中国人都是有钱人，很多财富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刘志成表示。

现在一旦查到此人持有外国护照，将不给其任何护照签发签证。由于他过去肯定办过中国的出入境证件，已经录入数据，现在当他用第二身份时，也要通过这个系统，出入境管理部门就能够通过比对等手段查出来。

“其实贪官逃跑不难堵，只要组织部把护照管好，公安部门把第二第三身份的问题给解决，那么贪官的外逃之路基本能堵上。如果纪检部门能够给予更好的配合，效率将会更高。”刘志成对封堵贪官的前景表示乐观。

（应受访者要求，刘志成、王斌、叶红、王子舒均为化名。）

外逃贪官为何钟爱加拿大？

记者 / 孙杨

由于中加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两国司法体系差异较大，加拿大政府又无权干涉司法独立，如何处理从中国外逃到加拿大的贪官，加拿大官方一直面临两难处境。

虽然加拿大一直是大陆民众熟知的涉贪人士最青睐外逃地之一，但当“天网”行动公布的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显示，加拿大位居中国海外“避罪天堂”第二位——百人中26人可能藏匿于此，大家还是颇感震惊。

追逃名单在加拿大国内也引发了高度关注。一时间，各大媒体都在核实这26人的背景，追问他们为什么会上榜；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中国贪官给加拿大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质疑加国是否对犯罪人士太过宽容。

近年来，包括涉嫌犯罪人士在内的大批中国富豪来到加拿大，在各地大肆购置物业、生活奢侈，已经引起了很多本地民众的反感。狂热的中国富豪在温哥华购地置业，令房价不断被推高。

特别是被认为财富来历不明的中国“问题人士”在加房地产领域的疯狂投资，引起本地购房群体的反感。随着越来越多贪官的背景遭曝光，在加的富裕华人群体形象大跌，在一些加拿大人眼中，一提起中国富人，就会与“贪腐人士”的形象挂钩。

中国富人的“异常崛起”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族裔对立，令当地政府颇感头疼。2010年以来，仅位于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就出现了多起由本地人发起的抗议活动，指责该市中文广告招牌过多过大，令加拿大本国人反而被排挤为少数族裔。

民怨已经成为加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待在加外国人甚至成为很多地区政治人物参加选举时无法回避的话题。虽然不断有政府官员公开表态不欢迎“中国贪官”；但是由于中加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两国司法体系差异较大，而政府无权干涉司法独立，所以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人士”方面，加拿大一直面临两难处境。

此前的赖昌星、高山等著名贪腐人士，均耗时数年甚至十数年才被有条件的遣返回国。 因此，百人名单公开后，中加两国均有观察人士提出担忧，认为大部分“问题人士”可能将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归案。

外逃加拿大的贪官多为精心准备

十八大以来，中共针对外逃贪官的反腐行动已经历多次升级。2015年3月，由中纪委牵头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高调启动“天网”行动。根据部署，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

名单显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仍然是外逃人员的首选地。其中，加拿大以26人的比例，仅次于美国，成为贪官最热衷的“法外之地”。

由于司法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加两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甚至长期以来，加拿大罕与大陆展开司法警务合作。这令犯罪嫌疑人的遣返和诉讼程序相比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漫长、繁琐。

被称为中共建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的“开平案”，上世纪90年代末案发后，涉案人员分别逃往美国和加拿大，2005年和2006年，通过多方斡旋，中美两国联合执法，将潜逃至美的余振东遣返回中国，但逃亡在加拿大的另一涉案人员，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办公室主任黄伟亮则仍然逍遥法外，位列此次百人名单之中。

目前虽然已有耗时13年最终归国获刑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核心人物赖昌星，以及同样历经波折，但最终难逃制裁的高山、李东哲等案例，体现了大陆追逃决心，但也充分展现了两国司法对接之难。

多年追逃信息显示，与东南亚、非洲等外逃人员也较多的地区不同，逃亡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财力雄厚、落马前官职地位较高，出逃准备也更为全面、细致。

在逃亡加拿大的26人中，超过20人在出逃前拥有较高官职或地位。如已故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四川移动公司数据部总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处处长白静；前山东兰陵企业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临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崔学文等。

很多涉贪人士早已预见会有落马的一天，所以提前数年甚至数十年就已开始在加拿大部署晚年生活。在逃往加拿大的人士中，多人早已提前获得加国合法身份，有的举家出逃，有的配偶、子女早已在当地求学工作，落地生根。

以四川移动公司数据部总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为例。早在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时任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红便突然辞职，前往加拿大。而李向东则继续留在国内，以自己控制的子公司，利用中国移动“音乐基地”的平台，进行寻租敛财长达6年。

2010年，李向东原本正处即将被提拔重用的关键时期，但是3月25日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当天下午约请李向东谈话，谈话结束后的李向东，当天晚上便连夜出逃，从此销声匿迹。

在加拿大生活富足并努力融入当地社交圈

中国贪官逃亡海外后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一直是大陆民众关切的话题之一。

虽然不时有报道称一些外逃犯罪嫌疑人在海外穷困潦倒、东躲西藏，甚至在厨房打杂、背尸为生，但加拿大《先枫报》创办人、《环球华报》前总编辑黄运荣指出，这些仅是个例。外逃至加拿大的大部分涉贪人士，特别是落马前官职级别较高、财力比较雄厚的，逃亡计划往往经过长期悉心部署，所以在加生活质量即使不能和在国内权倾一时相比，也是较为富足和舒适的。

气候适宜、环境宜居、华裔移民较多的大温哥华地区、大多伦多地区等均是中国贪官们最喜欢的落脚点。以大温哥华地区为例，温哥华市区面积不大，约相当于北京市的一个区，不过周边还有十几个卫星城，它们共同组成了大温哥华地区。

“外逃人士虽然住的比较分散，但主要还是位于大温哥华地区的西温哥华市、北温哥华市、列治文市和高贵林市等卫星城内。”黄运荣告诉《凤凰周刊》。这些地区大部分距温哥华市区十几分钟的车程，交通便利，但又不是城市中心地带，环境较好、豪宅众多，华人比例高，位置又比较隐蔽，很少有外人进入社区，恰好满足了贪官们“不被干扰、低调享受生活”的需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土豪”们正在迅速改变着上述地区的族群生态。例如西温哥华市，历史上原本是传统英国贵族居住区，曾不允许华人居住，但是现在，很多动辄上千万加币的豪宅已被华人买下。“西温哥华市正在变成只有华人才住得起的地区。”有加拿大当地媒体谑称。

曾有国内媒体报道称，贪官们在异国他乡无法融入当地社交圈，长期被孤独折磨。对此，黄运荣说，很多豪宅的主人与邻里并不经常交

流，甚至相邻的两户人家，多年从未敲过对方的门。“但是大部分贪官出逃前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所以一到加拿大就适应了这样的隐居生活。”

一些“问题人士”在加拿大也会有相熟的故交，为保持联系，通常他们会驱车到温哥华市里相约见面，而在日常生活中则很少接触。

贪官们在为自己设定安享后半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家人，特别是后代可以融入当地社会做了最佳安排——出钱供子女就读当地最好的学校，毕业后鼓励他们经商或从政。

“‘问题人士’们虽然自己不便出面做生意，但是鼓励他们的子女经商，还特别注重维护与当地政府、官员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贪二代’们已经与当地人无异。”黄运荣告诉《凤凰周刊》，在加拿大，即使是关系较好的同学之间，也不会过多关注对方的家庭，很多贪官后代，在读书时就已彻底洗白，社交圈完全本地化。

房价高企引发当地民众反对

“买房购地是外逃贪官们最盛行的财产投资方式。”黄运荣说，一方面，购置物业可以以最快的方式将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巨额财富融入当地经济循环中，达到藏匿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投资，也可以让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生活无经济担忧。

由于近年来大陆多个城市房价高企，很多中国人来到加拿大，发现这里的房价更为实惠，以往在国内仅够买一个卫生间面积的价格在这里可以买到一栋公寓，一些地区的豪宅也不过四五百万，热情立刻被点燃。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很多在加中国人名下都有多个物业，大部分并不用来居住，此举造成了温哥华等地房屋空置率过高的情况。

“买房就像买菜一样寻常”是很多中国富人留给加拿大民众的印象。加拿大媒体曾经报道，有中国富豪仅仅是乘坐房地产公司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圈之后，就用手指划定一个区域，出钱买下。

一位温哥华市民告诉《凤凰周刊》：现在在温哥华，如果一个好的房源被放出来，本地人是绝对抢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像中国“土豪”一样千金一掷。在本地人眼中，中国人疯狂的圈地简直匪夷所思。

狂热的中国富豪，将温哥华的房价不断推高，令族群间的对抗情绪陡增。随着不断出现的中国富豪巨额财富来历不明的新闻，更加剧人们

的不满。

黄运荣告诉《凤凰周刊》，近年来，温哥华本地人的抗议声音不断增大，今年年初的最新一次抗议活动，发起者竟是移民加拿大已几代的华裔。抗议者表示，现在，如果没有一百万加币，是不可能在温哥华买房的，很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得不迁居至远郊区生活，这在中国富豪们到来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抗议人士担忧长此以往，加拿大人反而将沦为边缘族群。

族群间的对立，在一些地区还表现为文化上的抵触。例如，在华人人口比例超过40%的列治文市，因为越来越多的店铺中文招牌做得越来越大，甚至不再配有英文招牌，令在此生活的白人群体感到生活不便，已经出现了多次抗议行动。

感觉被孤立，甚至被侮辱的白人要求当地政府立法保护英文文化，甚至提出将华人隔离。为此，列治文市府不得不举办社区对话等活动为矛盾降温，还邀请公众探讨当地广告招牌语言使用的影响和建议，寻找解决方案。

中国富豪“攻城略地”甚至已经是加拿大部分地区政治人物参与选举时不得不面对的议题。2014年9月，温哥华市长罗品信 (Gregor Robertson)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就提出，将对在温哥华购买房屋后空置的外国购房者收税。此举被指主要针对热衷购房的中国“土豪”。

加国政府面临两难选择

2011年7月23日，“丑名远播”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终于被押解回国，其长达12年的逃亡之旅宣告落幕。2012年，中国银行“高山案”的主犯高山以及李东哲，在出逃7年之后，相继被遣返回国，大陆媒体纷纷发文称此举提振了民众对海外追逃的信心，但是另一方面，也不禁有人感慨海外追逃，特别是缉捕逃亡加拿大者的艰辛。

此次百人名单公布后，一些观察人士立即提出担忧，若要身在加拿大的26人全部归案，可能仍然难以避免漫长曲折的过程。也令一些大陆民众认为，加拿大是热衷容留和保护外国贪官的国家。

实际上，加拿大的“消极”态度，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自于其司法制度。由于加拿大的《引渡法》《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程序复杂，且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加之两国在司法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仍存在分歧等原因，令加拿大成为引渡中国贪官时，耗时最长、程序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

“其实这些年来，面对大陆提出的追逃追赃合作要求，加拿大政府一直表现得比较积极，但是政府无权干涉司法独立，令很多具体合作措施无法形成。”黄运荣说。

资料显示，早在远华案之前，中加双方就开始警务合作的谈判。1994年时任加拿大总督纳蒂辛访华后，两国签署了《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达成了一些司法协助的条款，包括涉及赃款赃物和归还被害人财物的措施等。不过，此后的很多年来，该条约并未发挥过多实际作用。

十八大以来，大陆高调启动海外追逃行动，中加两国的多项合作谈判也开始提速。在2014年11月举办的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哈珀会面，哈珀表示加拿大无意收留逃犯，愿意在遣返方面同中方开展合作。

今年5月，面对本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关于程慕阳被通缉案件的查询请求，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回复了一份书面声明称：加拿大人慷慨友好，但“绝不容许罪犯和骗子滥用我们的慷慨”。

中加两国政府与民间对贪官的共同声讨，也令加拿大司法体系承受了一些压力，相关机构已经开始尝试与中方合作。

2014年12月，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向媒体确认，两国已准备好签署一项涉及追赃的协议，包括将逃往加拿大的、尤其是涉嫌贪腐人员的非法所得返还中方。这是中国就追缴犯罪所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

而面对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引渡困境，大陆反腐机构也从未放弃尝试绕过加拿大司法体系提高追逃效率。如派出驻加大使馆警务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开展警务合作等。

劝返无疑是其间成功率最高的方式之一。长期以来，大陆警方、检方等相关机构都曾派出过负责人到世界各地与锁定目标的犯罪嫌疑人谈判，劝说其回国自首。

在赖昌星案、高山案等成功案例中，“攻心术”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陆专案组曾先后多次派人到加拿大与他们展开谈判，为了更好地劝说赖昌星投案自首，甚至带着赖昌星的哥哥亲自登门游说。

“赖昌星和高山之所以最终投案自首，一方面是因为在加拿大实在耗不下去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劝返者的谈判能力。”黄运荣说。

据黄运荣透露，近年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甚至已经在

加拿大长期设点，派专人在当地游说、劝返犯罪嫌疑人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另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今年3月4日报道，中国警方代表一直在加拿大秘密活动，目的是调查中国贪腐官员的洗钱行为和隐匿房产，同时寻求让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回国受审。报道称，这是中国政府打击经济类海外在逃嫌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

大陆海外追赃难题

记者／张蕾

2014年1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和去年年底中组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两个文件，被海外舆论解读为中国开启“海外反腐”机制。

前者要求“公民申报海外资产”，后者要求官员报告“子女移居国外、从业、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情况。

要求公民申报海外资产、负债情况，是近年来各国惯例。不过大陆此项举措的背景是日益复杂的贪腐形势：不仅贪官携巨额赃款潜逃海外，而且国内查处的官员拥有海外资产的也日益增多。如近期查办的原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都在海外拥有巨额财产。

相对于海外追逃，海外追赃的难度更大，而且中国“出海”资金中官员资产的数额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据。与之相关的最新官方数据，还是4年前，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2010年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新闻通气会上透露的：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每人平均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

中纪委综合监察室监察员何平告诉《凤凰周刊》，一般贪官比较青睐的是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因为那里生活舒适，并且个人自由度较高。关键是，中国与这些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抓捕他们及追缴他们的赃款，困难重重。

引渡是专门针对外逃犯罪人员的法律制度，目的是不让在逃罪犯逍遥法外，将逃犯送到对其进行刑事追诉的国家接受审判或刑罚的执行。

据国务院2010年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介绍，当时中国已与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加入含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28项多边公约。

其中规定，在被请求引渡国家的法律许可范围内，应当扣押在其境内发现的犯罪所得、犯罪工具以及可以作为证据的财物，而且一旦同意引渡，就算被引渡人失踪或者死亡，上述财物仍可以予以移交。

中国和泰国的引渡条约甚至将可移交的财物范围从“犯罪所得的财

物”扩展到“在逮捕被请求引渡人时或在此之后发现由该人占有的财物”。

这种引渡条约的签订，会让中国在海外的追赃变得便利。在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经理陈满雄夫妇挪用公款7亿元人民币潜逃泰国一案中，中国依照引渡条约将陈满雄夫妇引渡回中国，同时也扣押了其价值88万元的财物。

尽管与有些国家未签署引渡条例，但大陆的海外追赃从未停止。在中国被媒体广泛报道中，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受审、原任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回国自首、中行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回国获刑等案件，都被赋予了更多“反腐胜利”的意义。

“要学会妥协”

但是，这些胜利都来之不易，以赖昌星为例，从1999年出逃到2011年7月23日以“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国，历经11年。

为了让赖昌星尽早被遣返回国，以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牵头，司法部、公安部等多个部门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所携带赃款的追缴，至今也没有官方的任何消息。有媒体称，加拿大罚没了该财产，亦有媒体称，中国正在向加拿大方面追缴。

原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杨诚综合赖昌星的各种已知的财产信息推测，赖昌星在加拿大的资产，经他挥霍之后，只有200万加币。据其透露，加拿大曾经和中国商谈赃款分割协议，但是中国很难接受。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不能接受“赃款分享制度”，从而失去了一些追赃的机会。

在打击腐败类犯罪时，许多国家都坚持国家财产豁免原则，而使当事的两国间通常因为相关财产的所有权而对立，导致赃款追回难以实现。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开始流行“赃款分享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

但此前中国拒绝这样的分享机制，中国与外国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例往往规定,双方应“免费”提供司法协助。中国甚至在与有些国家的约定中明确表示,“不得要求偿还因提供司法协助所支出的费用”。这挫伤了一些国家协助中国追缴赃款的积极性。

2013年7月，中国与加拿大缔结首个境外追赃专门协定。这是中国就追缴犯罪所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协定包含返还和分享。

返还是指如缔约一方的法院认定某项被非法侵占的财物为缔约另一方或其境内的企业、个人合法所有，该方将根据协定和本国法律将该财产返还合法所有人。据此，被贪污、挪用的国有资产，被挪用、诈骗的企业和个人财产，如能证明合法所有人，将会被返还。

分享，是对于没有或无法认定合法所有人的犯罪所得资产，如走私、贩毒获得的赃款，缔约一方将在没收后，与另一缔约方按一定比例分享有关资产。

这或许会增加一些国家帮助中国追赃的积极性。监察部特约监察员、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认可这种做法，“要适应外国人的游戏规则，学会和外国人妥协。”

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学研究所所长黄风看来，类似于赖昌星案的“移民法遣返”，在没有跟大多西方国家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达到的效果也完全相同，因此值得尝试。

所谓“移民法遣返”是指一国通过遣返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等方式将外国人遣送至对其进行刑事追诉的国家，无论作出遣返或驱逐决定的国家具有怎样的意愿，这在客观上造成与引渡相同的结果，因而也可被称为“事实引渡”。

民事诉讼取证难

另外一个颇受瞩目的案件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余振东和另外两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三人挪用资金4.82亿美元。中国银行发现资金被挪用之后，三人已经潜逃至美国。最终，余振东被遣返归国后获刑12年，许超凡和许国俊也在美国被判刑。

美国之所以将余振东控制，是因为美国发现了余振东在美国洗钱以及伪造护照的犯罪证据。随后通过诉辩交易，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法院判处余振东144个月（即12年）监禁。

美国向中国试探性的询问，能否接受遣返余振东回国只判刑12年的条件。让美国意外的是，中国方面同意了。随后余振东回国受审服刑。美国司法部门将其在美国银行账户上的355万美元冻结，并将赃款归还给了中国。

美国大使馆驻华法律顾问Latimer告诉《凤凰周刊》，“这次合作对于中美两国腐败犯罪的治理意义重大，因为这有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跨国录像取证，第一次有证人到美国参加庭审”。

成功遣返余振东，源于中国和美国2000年6月签订的《中美司法协助协定》。在该协定里，双方承诺，双方在各种犯罪方面加强合作。

“我们愿意把他们（贪官）送回中国，也正在寻找将他们送回中国的方式。”Latimer说。

这反映出美国和中国合作时的积极态度。但是Latimer承认，他们只有在掌握违反美国法律的确切证据时，才能对这些贪腐者采取行动。

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和美国签订引渡条约。Latimer称，“尽管中国的司法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谈起美国为何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时，Latimer说，“我们还没准备好。”

赖昌星案和中行开平支行案件这样的追逃追赃方式，也几乎成为中国目前追赃以及追逃的经典样本。很显然，中国希望依靠这种方式能够打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时的海外追赃困境。

除此之外，国际上追缴赃款也可提起民事诉讼。在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化学贪污案中，北京市纪委、市检察院和城乡建设集团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赴澳大利亚以城乡建设集团名义提起诉讼，主张其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别墅等资产为国有资产，要求收回。最终5套价值887万余元的高档住宅等被追回。

这是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缔约国可通过境外民事诉讼，主张其对腐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以直接取得赃款赃物，或通过获得补偿、损害赔偿等方式直接追回。

但是举证方面往往陷入困境。民事诉讼追赃时，请求方不仅要证明腐败官员通过犯罪获取相当数额的资产，而且还应证明犯罪所得资产转移存在连续和不间断的证据链条。但是如果贪官从银行取出大量现金，转存另外的银行，这种资金流动的断裂，会让举证陷入困境。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侦审指导处副处长余怿在一篇讨论公安境外追赃的论文中提到，目前为止，中国警方已与50个国家的内政警务部门签署了双边警务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其中规定了包括赃物追回等方面的合作内容。如2001年《中越政府关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合作协定》明确了在“移交赃物、证据”方面开展合作，又如与乌克兰、意大利、白俄罗斯、老挝等国签订类似的合作协议，以服务于境外腐败资产追回。相比民事或刑事诉讼等方式，警方之间这种相互沟通的途径相对更便捷。

在黄风看来，中国海外追赃的难度还在于，中国“没收财产”判决不被外国承认，也阻碍追赃。这源于没有区分罪犯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为此，黄风建议，将作为附加刑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彻底从中国刑罚体系中废除，建立一个独立的对违法所得和犯罪工具的等值没收和追缴制度。

黄风认为，改革没收财产刑有两种方案。一是对“没收财产”加以必要的法律限制，废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做法，将没收与违法所得的数额挂钩。二是将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彻底从我国刑罚体系中废除，经济处罚功能完全由罚金刑承担。

（实习生王晨、林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陆反腐赃款赃物处置谜题

记者／谌彦辉

5月10日，温州拍卖行当天的一场拍卖会突然延期，这场拍卖会因温州市纪委将党员干部主动上缴组织的收受物品公开拍卖而广受瞩目。

此前，温州市纪委便向媒体披露，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将于5月10日在温州拍卖行公开拍卖处置收缴的一批物品，共80余件，起拍总价约6万元。这些拍卖的物品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名酒、金银首饰、冬虫夏草等滋补品，还有一些贵金属收藏品，邮票、手机、BURBERRY围巾、GUCCI皮夹等杂项，被媒体戏称为“送礼参考大全”。

被延期的“特别拍卖会”

据温州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介绍，45项标的物起拍价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起拍价最高的是一块Cartier(卡地亚)手表，要价1.5万元，最低的为一件D＆G衬衫仅40元。而其他名酒、首饰、纪念币的起拍价相对较高，一箱贵州茅台6000元，周大福50克金条10500元。

拍卖会很快引来不少市民追捧，尽管5月10日当天未能如期举行，但温州拍卖行在其网站宣称，“本场拍卖会已延期，具体时间另行公告。”

像这种收缴物品的拍卖会，温州拍卖行以前也曾举办数次，但并无固定周期。最火爆的一次是2009年8月拍卖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受贿案的涉案物品，据称在其“专场拍卖会”上，59件标的物半个多小时就被一抢而光，成交总额达110万元左右，远超起拍价52万元。其中一幅范增字画，起拍价才60元，后来飙升到了5万元，一些赝品字画也拍出了高价。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拍卖的物品大多是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主动上缴组织的收受物品，来自市财政(地税)局、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等50多个单位和个人。此外，也有部分系涉案收缴物品。

据温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温州已实行收缴物品拍卖制度多年，收缴物品达到一定数量就会公开拍卖处置，拍卖所得资金将纳入市“581”廉政账户。该账户于2001年推行，旨在让党政干部通过上缴其收受的无法退回的财物，确保廉洁自律。据统计，2013年度温州近400人次主动上缴礼金262万元。截至今年4月30日，温州“581”廉政账户余额约为1473万元。

温州市纪委近日透露，廉政账户内的资金一律上缴国库，并非外界猜测的用于廉政宣传。而其他诸如现金、有价卡券和支付凭证也直接存入廉政账户，古玩字画则直接转交市博物馆收藏，其他实物则按规定进行公开拍卖处置。

近年温州反腐公开赃款赃物处理的举措也赢得国内反腐专家的喝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称，长久以来，历年反腐追缴赃款赃物的去向及用途很少公之于众，也鲜有媒体披露，一直缺乏透明度。

反腐追回多少赃款

近年内地反腐力度不断加强，一批批贪官纷纷落马，每年查处、没收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数额也越来越大，贪腐财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赃款和赃物，尤其是很多贪官还收取房产商铺，总价不可估量。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近日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称，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

近5年来，涉案过亿巨贪还有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余元，贪污5300万余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超过1.3亿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0857亿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收受他人钱款近2亿元。

5月14日上午，最高检反贪局局长徐进辉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14年前三个月，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超8000件，立案人数超万人。其中，贪污贿赂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占立案总件数八成以上。

然而，年年反腐败，全国到底追回多少赃款？国内反腐专家也一头雾水。

2014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提到，2013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而曹在2013年3月10日的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检察工作时说，五年来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

“目前公布的数据可能小于实际的损失。”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

任建明说，这些年到底有多少赃款赃物被追缴回来，作为反腐专家他也很难掌握这部分数据，也无从研究。“你不知道他们收缴了多少赃款，又收缴了哪些赃物。”任建明认为，近年反腐追缴的赃款赃物现在很难统计。

另一方面，赃款赃物的追缴难度也很大，部分贪官被抓捕后他已是一个“裸官”。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而对于追缴回来的赃款赃物如何处理及使用，外界无从知晓。根据大陆《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即由最后结案的单位统一上缴国家财政，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然而在贪污犯罪中，由于有受害的单位，当然要退还给这些单位。但贪官落马之后这些赃款、赃物大部分都是来自受贿所得。大部分的受贿所得，由于行贿人是出于违法的给付而已丧失了对财物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他们没有权利收回这些赃款和赃物。

对于这部分的赃款赃物，官方通常以追缴和没收的方式上缴国库之后，统一由国家财政进行重新分配。

赃款都去哪儿了

当赃款上缴国库后，内地反腐工作通常告一段落，至于怎么重新分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介绍，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事实上，大陆关于赃款赃物的法律规定并不少，据不完全统计，1965年至1998年间，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办法、通知、批复等近20个，但这些规定大多数出自财政部门。在陈光中看来，司法机关之间移送赃款赃物应该在诉讼法规中进行规定，不应体现在财政法规中，而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却只字未提。

现实中，内地在处理贪官赃款赃物一贯采取的原则和处理办法也按照国家现有的财经制度进行运作。

早在1965年12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公安部、财政部

联合下发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赃款赃物“应随案移交，由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处理”。

但1986年12月31日财政部《关于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则规定“由查处机关依法上缴国库”，据此规定，一些侦查、起诉机关不再将赃物按法定程序移送，而直接上缴国库。

因为财政部1982年《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规定，可以给承办单位20%-30%退库提成。虽然赃款赃物不等同于罚没款，但赃款赃物上缴提成的做法也成为反腐败工作中的潜规则，有的甚至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筹码要求多拨办案经费。尽管1986年3月财政部又发紧急通知“不提成、不退库”，但赃款返成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近年随着反腐败深入，赃款赃物数额越来越大，部分司法机关为各自的部门利益不依法移送赃款赃物，办案机关在反腐侦查过程中扣押、没收赃款赃物，少数执法人员还挪用赃款赃物，甚至自己打领条冒领赃款赃物，据为己有。

近日据媒体报道，辽宁铁岭检察院在办理中国人民寿险辽宁分公司高管卢涛贪污受贿案件中，办案人员个人账户收取近2000万元“暂扣款”，并未随案件移交到法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曾撰文指出，办案机关在反腐侦查过程中通过扣押、没收违法所得和财政返成，或者以多种名义向办案对象收取各种费用，成了反腐败领域中的一大特色，一些人将此称为“腐败的转移现象”。

这种办案机关通过反腐败而产生新腐败的现象，让不少法学专家深感担忧。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情树说，反腐败过程中的这种利益激励机制不仅有损司法公正，同时也会滋生新的腐败。他呼吁官方严令禁止办案部门获得赃款返成的做法。

反腐成果如何分配

“如果反腐成果被新的利益集团窃取，或只是少数人重新分赃而已，人民怎能感受到反腐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吴情树说，如果能够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有关贪官赃款赃物的使用制度，将有利于推进反腐败建设，也有利于保障人民对贪官赃款赃物使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然而，大陆应该怎样处理赃款和赃物的问题以及通过怎么样的制度设计来运作？目前法学专家也没有提出好的设计方案。

在澳门讲学期间，吴情树对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案件——欧文龙贪污贿赂案件极为关注。据称，欧文龙在职期间贪污受贿的金额高达好几个亿，创下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案件的纪录。但这些赃款由特区司法机关没收后，统一纳入特区政府财政，然后由特区政府统一再分配给澳门居民。

按照当地的说法，只要是澳门居民，又在澳门定居满5年，每人可以领到5000元；不满5年，每人可以领到3000元。因为欧文龙这些钱是通过违法买卖土地等方式得来的，他们损害了澳门居民的利益，这些钱就应该返还给澳门人。

吴情树认为，澳门特区政府这种通过统一分配的方式，将赃款和赃物统一平均分配给澳门居民，不仅可以让老百姓看到反腐败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还能提高他们检举、揭发贪官污吏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对官员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力量。

吴深受启发，他构想出一种方案：凡是追缴和没收贪官的赃款赃物，按照贪官所在的地域，由当地政府将这些赃款赃物统一进行管理，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将这些赃款以及赃物拍卖所得的价款的一部分钱，按照贪官所属地域，给当地的每个人进行派送；另一方面，按照贪官所属的部门，设立相应的慈善基金。例如，在教育系统查处的贪官，那就设立一个教育基金会，如果是在法院系统查处的贪官，那就用这些钱设立一个被害人赔偿基金会。如果某个案件查处的数额太少，那么，可以先由政府统一管理，在累计到一定数额后，再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重新分配。

“这样一来，当地人民检举、揭发当地贪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而老百姓也能从中获得实在的好处，同时也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对这些赃款赃物使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欧洲引渡艰难破局

记者／孙杨

此次成功从意大利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只是个例，还有众多贪官滞留欧洲，令警方无可奈何。若要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引渡机制，仍有诸多障碍亟待突破。

在中共反腐大局之下，自十八大以来提速的国际警务合作又实现了一次突破。来自大陆公安部的消息，2014年2月3日，公安部赴境外工作组将外逃意大利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张某依法引渡回国，这是欧洲国家首次批准向大陆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

多年来，包括贪官在内的大陆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形势之严峻、转移赃款规模之庞大众所周知。虽然近两年来，中共掀起了一系列强度前所未有的海外追逃追赃行动，也获得了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在外逃者最青睐的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司法体系、外交原则等存在较大差异，追逃追赃行动仍比较困难，成效有限。

对于此次引渡成功，各界评价略有差异。一些大陆官方媒体态度积极乐观，认为这一成功案例意义非凡。《人民日报》海外版评价称：贪官的“避罪天堂”正在坍塌，今后将“无处遁形”。

不过也有时局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大陆海外追逃方式仍以劝返、遣返、异地追诉和被判刑人移管等为主，且成功案例大部分发生在亚洲国家，相比之下，引渡是最为正式也是程序最为严格、繁琐的方式，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此次成功引渡只是个例，还有众多贪官滞留在欧洲，令警方无可奈何。若要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引渡机制，仍有诸多障碍亟待突破。

示范其他西方国家

2月3日13时左右，一架从意大利起飞的国航普通航班降落北京首都机场，待其他乘客走下飞机后，一位黑衣黑帽、面部被白色大口罩遮住的女性乘客，在几位身着便装的公安部赴外工作组成员陪同下，走出舱门，旋即被早已等候在此的警察开车带走。

这名女乘客正是逃亡意大利10年之久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张某。2000年至2005年的5年间，身为河北某证券公司工作人员的张某，利用职务之便，共盗取客户证券账户资金140余万元。2005年10月，张某潜逃至意大利。

案发后，河北石家庄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张某批准逮捕，并启动境外缉捕工作。2014年7月公安部部署的海外追逃专项行动“猎狐2014”开始后，石家庄市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加大了缉捕力度。

通常情况下，逃亡时间越久，信息缺失越严重。外逃意大利的张某早已更换了身份融入当地生活，工作组反复侦查核实，掌握了张某新身份信息、住址及工作地点等信息。2014年10月，意大利博洛尼亚警方出动将张某抓获并通报中方。由于中意两国已签署双边引渡条约，大陆警方正式向意大利提出引渡申请。2015年1月16日，意方正式批准将张某引渡回中国。2月3日，最终将其成功引渡回国，前后历时近4个月。

据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引述公安部国际合作局欧洲工作处处长王钢的表态：“此次引渡的意义超过案件本身”，大陆与西方国家法律规范、政治制度等有差异，此次引渡对其他西方国家将起到示范作用。

王钢还表示：中国警方将进一步深化与各国执法部门的密切合作，积极通过移民遣返、引渡、劝返等多种渠道，尽最大努力将外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不断实现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新突破。

据了解，大陆警方近期还将陆续从有关国家依法引渡回一批外逃犯罪嫌疑人。

引渡耗时长、成功率低

“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成功引渡犯罪嫌疑人早有先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告诉《凤凰周刊》，很多媒体报道中所称的大陆第一次成功从欧洲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的说法并不准确。

黄风表示，严格来说，此次引渡应该是大陆与欧盟国家在签署了双边引渡条约后，第一次通过正规法律合作程序完成的引渡。“此次引渡象征中国与欧盟国家建立起了正常、稳定、规范的合作关系。”

与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等相比，引渡无疑是最正式的追捕外逃犯罪嫌疑人的方式。然而也是涉及外交、司法、国情以及其他因素最多的方式，所以批准过程繁琐、消耗时间较长，成功率难以预测。

大陆最为知名的走私贩赖昌星利用加拿大与中国两国间政治、外交、司法体系的特点和差异，以各种方式拖延滞留时间，以至于大陆的

引渡申请长达12年未获批准。最终于2011年7月，才被加拿大警方以遣返的形式送回中国大陆。

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多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大陆经济嫌犯，特别是贪腐高官、企业高层最为青睐的外逃地，同时也是与大陆开展警务合作最少的地区之一。

目前，美国和加拿大都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澳大利亚虽然已经签署，但在其国内尚未获得议会通过。

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仅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等前独联体及东欧国家签有引渡条约。2009年10月15日，曾经从阿尔巴尼亚成功引渡回一名特大金融诈骗案的主要嫌犯。

与欧盟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引渡合作是最近10年才逐渐有所突破的。自2005年11月，与西班牙签署引渡条约至今，又陆续与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签订引渡条约。

2014年11月26日，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在外交部举行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截至当时，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不过，大部分是亚洲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法律屏障、需求差异

虽然近年来，大陆一直努力与更多欧盟国家签署引渡条约，开展警务、司法合作，但与亚洲等其他地区相比，从欧洲引渡嫌犯回国，仍然比较困难。

徐宏曾表示，一些国家对于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态度消极，一些外国法官由于缺乏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的了解，作出不予引渡或者遣返的判决。

其中一个客观存在的明显差异是，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使用的是普通法系（判例法），而中国大陆采用大陆法系，法系之间在举证、诉讼、判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司法程序，无法良好对接，就会令引渡成功率大大降低。

外逃欧洲的贪腐人士和经济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屏障，滞留在当地。黄风告诉《凤凰周刊》，著名女巨贪杨秀珠之所以一直在荷兰，无法带回国内接受审判，即是因为荷兰法律规定，只有两

国之间存在引渡条约的前提下，才可启动引渡申请程序。

另外，对于已经普遍废除死刑制度的欧洲国家，大陆死刑制度的存在，也令引渡申请面临重重困难。“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签署双边引渡条约解决。”黄风说，现在，中国与欧盟国家在制定引渡条约时，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承诺和让步。

需求差异也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达成引渡条约的原因之一。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希望从欧美各国引渡回来的嫌疑人以经济犯罪居多；而欧美各国希望中国引渡回去的嫌疑人则以暴力犯罪居多。双方关注的侧重不同，对某种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同，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当然，各国政府还会考虑抓捕、诉讼、举证、遣返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以及查获的赃款如何分配等实际问题。所以即使达成了引渡条约，也不代表两国之间形成了畅通的引渡通道。

在一些政界人士眼中，引渡并不只是司法问题，还是外交、政治问题。一些欧美国家经常因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拒绝大陆的引渡申请，有的时候，国与国之间引渡合作的达成，还要附加外交、政治，甚至进出口贸易、争端领土等方面的条件。

在最近的海外反腐行动中，大陆已尝试动用外交手段。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常驻北京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表示，他们都曾被要求对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给予协助。

近年来，中国大陆也开始不断地尝试以其他途径追捕逃往欧洲的犯罪嫌疑人。目前，公安部已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初步构建了海外执法安全合作网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与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比利时等国开展司法机关合作，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助抓捕海外逃犯；以及通过外交斡旋等方式，协助追逃行动。

在本次张某被引渡回国之前，意大利警方也协助大陆警方以其他方式遣返、劝返了一些犯罪嫌疑人。2014年12月10日，浙江公安机关通缉的涉嫌贪污罪潜逃22年的叶某，即被成功从意大利缉捕回国。

司法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司长郭建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立既符合国际条约、通则，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体制和机制，是当务之急。

分析人士则认为，若要减少与发达国家间警务合作的障碍，中共方面还应该考虑做出必要妥协，尊重国际条约，尝试改变思路，例如允许合作国“分享”一定比例的赃款。

追缉外逃贪官倒逼权力结构改革

文／李永忠（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 采访整理／林子敬

解决贪官外逃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通过深化改革，先在一个或几个县、市，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语），防止权色和权权交易，如果能做到，那么权钱交易很容易解决。否则，权钱交易将堵不胜堵，防不胜防。

中国新一届政府在树立威信时，选择了反腐作为突破口。十八大以后，首先以“八项规定”徙木立信，然后“老虎”“苍蝇”一起打，层层传导，高压态势很快就形成了。在反腐的过程中党中央和中央纪委也发现，网拉紧时出现“大鱼飞小鱼跳”的局面，贪官都想往国外跑。

为此，今年以来中央开始加强追缉外逃贪官的力度，并且拉紧国内的外逃封锁线。在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表示：“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 年、10 年、20 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一年中，高压反腐态势顺利从国内转向国外，今年“猎狐行动”取得丰硕的成果，进一步警示官员“海外并非法外之地”。不过，追缉国外贪官毕竟仍属于亡羊补牢，成本高昂，属于下下策。因此，如果无法“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那么贪官自然会越来越多，外逃也会越来越多。

无法外逃有人选择自杀

新一届政府在防止贪官外逃上主要是针对“人”铺设封锁线。钱要跑出去很容易，封堵很困难，而封堵人相对容易。在这方面，中央从“裸官”入手，摸清“裸官”的情况，不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让组织部加强了因私护照的管理。

地方的各层级组织部近期加强对因私护照进行了统一收缴，虽然过去中央也有过类似的政策，不过当时“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可以统一规定，怎么执行地方及部门可以各取所需。

现在贪官外逃已经没有那么容易，最重要的技术原因还在于海关技术水平的提升。前一段时间，失联60多天后，原河南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被抓住。此前各方猜测过，他可能已经外逃，然而最后他在湖南长沙的一间出租房被抓。

嗅到危险的贪腐官员第一时间都想跑，但是郭宜品跑不出去。他可

能私下听过若干外逃没有成功的案例，知道海关和边警已经有了很好的设备，能够通过比对，发现持假护照、假身份证的人。

那些试用过假身份证，甚至委托人买国际机票到海关被发现的失败案例；那些试图越境，但由于不认识当地人、不会说当地话，结果被举报的案例，迫使他权衡再三后，选择了藏起来。若不是防止外逃的封锁线拉得紧，他最后不会住在那种破陋的地方。

早前海关等部门不具备先进的脸谱识别比对技术手段，贪官用真护照、假名字可能就出去了。现在如果不整容，想凭借自己的脸出去很难。海关对一些重要岗位的官员也进行了重点监控，一比对就出来了。那些试图外逃的贪官很容易被抓住。有的被抓住时，可能纪委连线索都没有掌握，外逃本身反而成为了很好的线索。

现实中，已经有一些想跑的官员在海关被抓住。正因为逃出去很难，所以一些贪官选择了另一种方法——自杀。过去贪官外逃严重的时候，几乎没有自杀。现在外逃贪官成功几率减少的情况下，贪官自杀的比率却提高了。

贪官选择自杀，是自杀能够终止案件的调查，保住贪官已经取得的成果，毕竟“人死为大”，纪委和公安机关都会终止调查，这是国际上通用的惯例。因此，一些自杀官员很可能是生前有问题的官员，自杀后他的家人和财产可能不会受到波及，可能会保护他的上下级。当然，如果能外逃成功，就不会选择自杀。

追逃倒逼改革

不过，也不能认为贪官就跑不出去了。最聪明的贪官会在无人知觉的情况下外逃。他们是贪官中的战略家，善于研判大势，是贪官中的先知先觉，不过人数极少；半知半觉就外逃的官员也是高手，他们懂得分析形势，分析本省本市以及周边官场的情况，预感到事情不妙就逃。国内的封锁线基本上很难“网”住这两类人。

贪官中大多数人还是后知后觉，贪官总是贪心大，像股民一样，炒股不炒到最高点不放手，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急剧下跌。他们外逃的契机一般是东窗事发，比如，得知自己被纪委初核、情妇被控制，甚至因为家里遭小偷。组织部管护照以及海关、边警主要能管住这部分人。

此外，追外逃贪官成本高，不但公安部门在国外行动需要巨额支出，而且按照现在的思路方向，协助追逃后，国外政府能够从赃款中分成。对追回的贪官是否执行死刑的问题，中国的处理方式放弃了过去的

强硬态度，目的也是为了将贪官缉拿归案。

不用说追逃，即便在国内查处一个贪官，组织受到的伤害远大于其个人付出的代价。但是为了保持高压态势，党中央和中纪委还是决定必须强力反腐。中纪委成立国际合作局，在赃款和执法上的“退一步”，目的在于切实有效追回贪官，让国内贪官“官不聊生”，外逃贪官“永无宁日”。

现在的做法最重要的意义是能够倒逼改革，追逃时必然会反思，为什么官员能携巨额贪腐资金外逃了？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权力岗位上捞取如此巨额的贪腐资金？为什么身边的监督竟然都熟视无睹等等。在付出代价、痛定思痛后，能够倒逼改革。因此，追讨贪官不仅是倒逼“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过程，也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过程。

不过，凡是采用倒逼的方式，通常比正逼的方式要危险！为什么不能未雨绸缪，而一定要亡羊补牢？与其追逃贪官于国外，不如封锁贪官于国内；与其封锁贪官于国内，不如加强对贪官行权的监督；与其加强对贪官行权的监督，不如改革制度、分解过分集中的权力。正因为之前科学的权力结构没有形成，导致监督严重失衡，才需要倒逼。

其实，这么多年的反腐败，大多是细微末节的推进，总以为战术胜利就能取代战略胜利。追缉外逃贪官只是战术行为，即使全部追回来，如果不设立权力结构改革的试验区，我们内部还会继续成长大批的“老虎”和“苍蝇”，当大批的“老虎”和“苍蝇”存在的客观条件下，肯定有人会千方百计跑出去。即便海关和边警的技术提升了，大批贪官存在的数量，必然决定贪官外逃成功的质量。

权“色”和权权交易仍难解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只打死了一个妖精——“自学成才”的白骨精被打死了。凡是有连带关系，比如某某佛的徒儿、童子、坐骑等都打不死。其实追缉贪官也很难，“自学成才”的腐败分子还能追回来，有根基的腐败分子则难以对付。追缉海外贪官通常是最低层次的权钱交易，在国外这种行为也属违法犯罪，容易形成共识，进行合作。

如果不对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权力结构进行改革，腐败会由最初的权钱交易上升到权色交易，这里的“色”，不单单是美色，泛指所有非物质化贿赂。如果腐败到这一步，大大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在权色交易中，证据很难获取。

例如在刘志军案中，检方指控丁书苗给刘志军的贿赂是4900万，分两笔构成。但这两笔钱没有一分钱经过刘志军的手和账户，按理说不能认在刘志军头上。司法讲究证据，没进账未过手，加大了对贿赂的认定难度。非物质化贿赂很难处理。

权色交易已很可怕，最可怕的是权权交易，比如某人是甲省的省委书记，另一个人是乙省的省委书记，他俩既不用送烟，也不用送酒，更不用送钱，两人只需要将对方的子女，弄到自己管辖的副省级城市担任要职，让他们顺利接班，甚至超过他俩。这样的腐败怎么处理？

最高明的腐败不是贪了钱外逃，他们不用走，几千亩土地和矿山等财富会合理合法地归他们所有。此外，国内机会那么多，他们为什么走？走的贪官都是手段太明显的权钱交易，而且没有根基，没有保护伞。不要认为外逃贪官在贪污团队中占有很大比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当然，贪官追逃也重要，说明即便是冰山一角，我们也注意了，也在亡羊补牢了。

真正有根基的腐败分子不用逃出去，比如南方某市有很多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天天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人，如果查看一下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的子女就能理解了，他们不需要外逃。包括这次追回来的贪官，大多是在国内没有根基的官员。当然，有根基的官员也会留着外逃这一手，他们早就在海外配置了资源、资产甚至国籍，防止改革和反腐的进一步深化挤压他们在国内生存的空间。

中国反腐抓了那么多的大贪官，但是真正发大财的是哪些人？是权权交易和权色交易的人，权钱交易发财不大，他们属于刀尖上舔肉，风险很大。权色交易很难查，权权交易现在法律、党纪和政策几乎没有办法。纪委查案也是如此，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我们30多年反腐大都停留在最低层次的权钱交易上。

这些年，外逃贪腐官员携带出去的资金以亿万计，但是被贪腐并留在国内的资金远不止这个数字。因此，要解决贪官外逃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习近平语），深化改革，先在一个或几个县、市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防止权色和权权交易，如果能做到，那么权钱交易就很容易解决，否则，权钱交易将堵不胜堵，防不胜防。

对此，四中全会给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要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法治包括治党和治军。这不仅是立法上会更完善，更重要在于是一个制度改革的信号。因为不进行制度改革、不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治党治军

无从谈起。反腐方面亦是如此。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两个首先”，预示着中国将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猎狐行动”提速中外警务合作

记者 / 孙杨

对海外追逃的内地警方来说，首要问题是没有执法权，因此，必须要与国际组织或当地警方合作。国际警务合作开展是否顺畅，直接关系着追逃成果。

7月22日以来，一场由内地公安机关部署，代号“猎狐2014”的海外追逃行动正高调铺开。据11月16日公安部“猎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会议披露，近4个月以来，已先后从5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十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1名。

近年来的各类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数量至少以万计，携卷至境外的涉案资金更是万亿级别的天文数字，其中大量“逍遥法外”的贪腐官员，令中共承受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巨大压力。

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内地已经有相关部门开始对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展开专项缉捕行动，但跨境追逃碍于国与国之间法律、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具体执行时存在诸多障碍，加之经济成本较高，参与部门缺乏统一协调等因素，追逃效果一直不甚理想。

由于此番追逃行动系由十八大以来高调反腐的中纪委牵头，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央行等部门共同参与完成，故也被外界解读为国家行动。

其中，公安部门负责行动具体落实。在境外缉捕过程中所牵涉的国际警务合作问题引发诸多关注。特别是对很多专业人士来说，“猎狐行动”不仅仅应关注缉捕多少犯罪分子，若能在内地与海外警务合作、刑事司法协作方面拓宽渠道，将对内地建立长期有效的追逃追赃制度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既神秘又高调的“猎狐行动”

“猎狐2014”是内地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行动期限为2014年7月22日起至年底。

虽然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家内地官方媒体有机会与猎狐行动组近距离接触，但在他们的报道中，几乎全部使用了“神秘”这一形容词。

这个内地公安部下属的经济犯罪缉捕专项行动组，将办公地点应景地选在云集了各大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公司总部以及银监会、证监

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北京金融街。

由内地官媒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将行动组的日常运作描述得颇像电影画面："办公室墙面悬挂的大幅国际地图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红点，每个都代表着嫌疑人可能隐藏的地点。蓝色背景的排行榜紧挨一旁，各省市自治区已经缉捕的嫌疑人人数和全国排名清楚醒目、实时更新。十余名身着制服的警务人员正忙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厚厚的几摞文件。"

而在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猎狐2014"行动办公室负责人刘冬看来，这是一支代表了中国经济犯罪侦查顶级水准的精锐部队。成员几乎全部是名校毕业的硕士和博士，专业背景涵盖侦查学、法学、金融学、经济学、计算机学等多个方面，平均年龄30岁。

行动组成员们的任务，是根据各方面汇集而来的情报，逐一定位追逃名单上的犯罪嫌疑人，部署行动，然后亲自赴海外实施抓捕，并最终将其带回国内接受司法裁决。

在缉捕过程中，行动组成员的足迹遍布几大洲，有的要与嫌疑人展开攻心战，有的遭遇会武功的嫌疑人反抗，有的深入非法赌场套线索，有的甚至需要出入埃博拉疫区。

虽然行动组每一次执行具体任务时，因为需要保密的缘故而显得十分神秘，但"猎狐行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推进，却一直保持高调。

除了在行动开始前，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等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劝导在逃人员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外；在追逃开始后，行动组更是不断更新缉捕人数，密集公布追逃成果，公开部分已取得成功的缉捕过程，甚至请组员在媒体上现身说法。以至于有媒体评价此次行动"开创了境外追逃的先例"，"获得巨大成功"。

其实，如果真正追溯起来，自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就已经开始出现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现象。

1998年，公安部成立经济犯罪侦查局，正式将追逃列为其任务之一。不过由于权力不够集中，与其他部门缺乏协调，所以追逃成绩并不理想。

近年来，随着贪官和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人数不断增长，资金流失增加，追逃不断加力。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

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

至于“猎狐行动”，眼下实际已是第二次开展了。

在中纪委高调反腐的背景下，2013年，公安部曾对东南亚地区部署了一次集中的“猎狐行动”。经过40多天的前期工作，行动组仅用10天时间，即将10名犯罪嫌疑人带回国。

今年1月，中纪委召开十八届第三次全会强调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3月，又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还在5月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正是上述一系列动作，最终促成了这一次声势更为浩大的“升级版”追逃行动。

与西方国家警务合作提速

行动组成员王谨（化名）曾向《中国青年报》讲述其赴柬埔寨缉捕逃犯的经历：准备实施抓捕的当天早上，王谨和柬埔寨警察隔着一条马路守候，“心情激动得要往下摁”。不久，两个男人出现在店铺门口。照片掏出来一比对，其中一人与嫌犯非常相似。当时，柬埔寨警察也兴奋起来，没等王谨发出指令，七八个警察已经冲过马路，扑向那人。待到围住了人，一核对身份，才知被抓的是与嫌犯极为相像的他的胞弟。而真正的嫌犯已经趁着人多混乱，开车逃跑了。

所谓犯罪无国界，执法有疆域。对海外追逃的内地警方来说，首要问题是没有执法权，因此，必须要与国际组织或当地警方合作。国际警务合作开展是否顺畅，直接关系着追逃成果。

“执行海外缉捕前往往会先通过国际刑警组织（ICPO）发布红色追缉令，然后再请求与嫌疑人所在国的警方合作。”一位有过经侦工作经历的警察告诉记者。

作为除联合国外，规模第二大的国际组织，保证和促进各成员国刑事警察部门在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合作是国际刑警组织主要任务之一。自1984年起，内地就是其成员。1988年，就首次通过与国际刑警的合作，成功押解一名犯罪嫌疑人回国。

目前，ICPO官网显示被通缉的中国籍人员至少160人，涉及罪名包括腐败、贪污、诈骗等。而根据内地媒体《参考消息》报道数据，自2008年以来，公安部通过ICPO发布红色通缉令379份。

根据规定，接到红色通缉令后，成员国应布置本国警力协助请求国家缉拿犯罪嫌疑人。到今年9月，“猎狐行动”已由公安部协调国际刑警

组织发布28份红色通缉令。

今年8月，警方赴斐济缉捕美女高管陈怡成功归案，即有国际刑警组织的部分功劳。2013年8月，涉嫌经济犯罪的陈怡在案发前已潜逃境外。公安部接到情况上报后，首先通过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缉令，并向有关国家和地区提出协助查找犯罪嫌疑人请求，最终查明陈怡已逃往斐济，立即派出行动组，成功抓获陈怡。

不过更多时候，追逃行动还是根据不同个案的情况，直接进行国与国的合作对接。

向驻外使馆派遣警务联络官是保证与当地警方合作顺畅的方式之一。虽然警务联络制度的相关档案自2005年后才开始出现在公安部对外公开文件中，但是早在1998年，内地就已派出第一名警务联络官，赴驻美使馆工作。到2012年为止，公安部已向美国、俄罗斯、德国、沙特阿拉伯、泰国、韩国、南非、阿根廷等23个国家的24个驻外使馆派驻了38名警务联络官。

按照内地行政级别划分，警务联络官大多拥有处级以上级别，他们具体职能包括与所在国司法部门保持联系，研究对方执法政策体系，协助两国警务合作对接，为海外追逃收集信息以及参与缉捕犯罪嫌疑人等。

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开的信息，驻韩使馆警务联络官王大鹏2年协助缉捕了13名外逃犯罪嫌疑人回国；中泰两国每周至少有一次执法合作，重大案件侦破有警务联络官全程参加；驻美警务联络官每年与美国各执法部门的会见、交涉、交流在150次至200次之间。

在很多驻在国，中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数量远多于对方提出的数量，警务联络官们需要多方争取资源，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快捷的处理方式。

公安部透露，2008年以来，警务联络官协助侦办各类案件1881起，协助缉捕、遣返犯罪嫌疑人298名。

除了警务联络制度，内地还通过定期会晤机制、建立联络热线、签署合作文件等方式与各国警方保持合作。

公安部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9月，内地公安机关已与8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与44个国家的内政警察部门设立了65条联络热线，与31个国家的内政警察部门建立了定期工作会晤机

制，同59个国家的内政警察部门签署各类合作文件237份，牵头或参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及相关会议机制81个。

此外，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已与51个国家签订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与10个国家签署了移管囚犯的双边条约。虽然内地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渠道在不断拓宽，但与追逃任务相比，仍然显得不足。特别是与贪官“钟情”的西方发达国家，签署的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均不多，合作机制仍欠畅通。

近年来，内地推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警务合作进一步提速。

2013年3月28日，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澳大利亚移民部联合主办中澳追逃研讨会，讨论各自国内缉捕、遣返外国在逃人员和返还赃款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程序、证据标准，就重点个案的下一步合作进行了探讨规划。

而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则每年轮流在两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知识产权刑事执法、追逃、遣返非法移民、打击偷渡等领域的执法合作问题。

在今年8月结束的APEC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上，中美两国着重讨论了反腐败议题，并且都表达了建立合作网络的意愿。该反腐合作网将旨在加强以追逃追赃为重点的个案合作、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内的亚太国家签署了《北京反腐败宣言》，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ACT-NET）也已正式运行。

海外追逃应学会妥协

对海外追逃行动人员来说，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仅仅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带回国内，接受审判。

虽然目前，内地已颁布施行了《引渡法》《反洗钱法》，为开展国际追逃提供了国内法律依据。还签署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公约》《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参与了联合国关于《引渡示范条约》《刑事互助示范条约》《刑事诉讼转移示范条约》《关于移交外籍囚犯的模式协定》等重要文件的讨论和制定。但是其中一些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存在冲突，与国际通行法律准则无法对接，加之多个国家尚未对内地司法体系完全认可，所以追逃人员在如何把嫌疑人带回国的问题上，频遇障碍。

引渡是方法之一，但是目前仅有30余个国家与内地签署了引渡条约，而其审查过程又漫长而复杂，所以，追逃人员很多时候不得不尝试劝返、非法移民遣返以及异地追诉等手段。

牛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教授拉纳·米特表示，任何让外逃贪官回国的努力都会遇到困难，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与国际惯例不符。

对此，司法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司长郭建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立既符合国际条约、通则，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体制和机制，是当务之急。"

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则表示，追逃追赃下一步工作重点包括加强国际合作，将追逃追赃工作提升至构建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战略高度，加强追逃追赃配套法规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工作等。

不过，要实现上述目标，就不得不直面人权和主权孰轻孰重的争议。

北京方面一直以来的立场是：打击跨国经济犯罪，应当在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框架下进行。各国应相互尊重并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采取积极有效、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间的执法合作与交流。

不过目前来看，这一观点仍未被部分国家接受。最具代表性的分歧即"死刑犯是否引渡"。在追赃方面的警务合作一样存在上述难题，由于内地法律对罪犯财产哪些属于合法、哪些属于非法不做区分，所以"没收财产"判决不被外国承认，海外追赃频遇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若要海外追逃追赃顺利进行，内地必须要做出必要妥协，尊重国际条约，尝试改变思路。

眼下可以看到，为减少司法障碍，内地正尝试动用外交手段。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常驻北京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表示，他们都被要求对此项行动（指"猎狐2014"）给予协助。

而对很多国家来说，美国的态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8月11日，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证实，美国已经成为内地经济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头号目的地，有逾150名经济犯罪嫌疑人目前仍在逃美

国，其中许多牵涉腐败犯罪。

2004年4月16日，美方将被内地称为开埠第一巨贪案“开平案”的主犯之一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此案例的涟漪影响延续至今。

曾经在华盛顿从事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工作，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的KYLE D. LATIMER告诉《凤凰周刊》：“我们愿意把他们（贪官）送回中国，也正在寻找将他们送回中国的方式。”

另据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透露，美国司法部官员将于12月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在北京会晤中国司法部门官员。今后将定期与中国商讨执法问题，包括处理在两国的在逃犯问题。

国际反洗钱组织：中共海外反腐“外援”？

记者 / 孙杨



新年伊始，中共一系列针对官员的海外反腐新举措引人关注。

1月1日起，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的新《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规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

内地官方媒体对这一措施评价称：“（该规定）将加强对本国公民个人在海外金融资产的了解，是抑制税款收入流失、防止跨国洗钱和贪腐人员外流外逃、打击经济金融犯罪的有效手段”。亦有部分海外媒体认为，此举系中共近来高调的反腐运动即将向贪官的海外资产“开刀”的信号。

而在2013年12月29日，中组部最新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显示，今年起将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子女移居国外、从业、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自从2008年，台湾地区在国际反洗钱组织艾格蒙联盟协助下查实陈水扁家族海外洗钱的新闻曝光以来，国际反洗钱组织在调查贪官海外资

产方面的作用开始引发内地公众强烈兴趣，被看做是海外反腐的利器之一。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借助外部力量反腐呼声渐起。

实际上，内地构建反洗钱体系，谋求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合作的努力已逾十年。只不过，在清查和追讨贪官海外资产方面发挥的作用，未如民众想象般容易和乐观。

内地贪官海外洗钱形势严峻

2013年9月，中央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发布《中国反洗钱报告（2012）》，这是中国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9次发表反洗钱报告。

报告称：在反洗钱国际合作方面，司法部依约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和追诉工作，协助中央政府有关执法机关处理一系列追缴境外腐败资产案件。但是报告并没有透露此类案件的具体数量和调查细节。

随着近年来媒体对“裸官”、贪官外逃等案件的曝光越来越多，内地官员通过海外购房、信用卡套现、地下钱庄等跨境洗钱方式，将贪污受贿资产转移至海外的现实逐渐为大众所知晓。

国内外各种机构也发布多种口径的调查报告，不过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组数字获得中共官方公认。

最近一组由政府机构披露的数据是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为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共8000亿元人民币。

而同一时间，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资料则估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名官员境外在逃。中纪委称，近30年来，外逃贪官携走资金达50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虽然上述数字已经令不少人感到触目惊心，但是2013年以来曝光的一系列腐败官员海外资产个案更为令人震惊。

在薄熙来案的审理过程中，其拥有的一座位于法国戛纳的价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豪华别墅被曝光，最终证实是受贿所得，予以没收。

前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落马时，被发现持有一个使用假名的澳大利亚护照，并在25个银行账户里拥有总计1900万的澳币，超过9公

斤的金条和25只罕见的钻石。

前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唐旭曾表示，“贪污贿赂犯罪资金藏匿和转移的性质，决定了腐败和洗钱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洗钱行为是腐败行为的继续和延伸。”

国内反洗钱体系局限性凸显

“跨境转移资产与贪官外逃问题愈发严重，令中共反腐败、反洗钱领域倍感压力。”有外媒如此总结内地近年来着力推动反洗钱体系建设的动力。

虽然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晚，但是内地的反洗钱体系构建时间也已经超过10年。200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将原来设置的保卫局增加反洗钱职能，改为反洗钱局。职能是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研究和拟订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则和政策；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并协助司法部门调查涉嫌洗钱犯罪案件等工作。

2004年7月，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作为央行直属单位，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职能。

同一年，《反洗钱法》的起草工作也全面启动，最终于2006年10月31日获得通过，并在2007年1月1日起执行。

2004年，内地还建立了由央行牵头，有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23个部委参加的国务院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制度。试图令多部门联合开展反洗钱工作，在国内拉起一个反洗钱网。

据2013年央行公开的一份“中国反洗钱十周年”的总结表示：“十年来中国反洗钱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成绩令人瞩目”。具体成果包括洗钱犯罪刑罚化、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数据库建设等。

然而，当面对追捕外逃贪官、追缴海外腐败资产的问题时，一个立足于国内的反洗钱体系的局限性立刻显现出来。

在跨国支付手段非常发达的今天，反洗钱工作需要依靠一个覆盖全球的情报网络，对跨境资产转移的清查需要与相关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合作展开，缺少国际认可和协助，不仅会令情报获取的过程充满了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障碍，更难以执行跨国追赃。因此，与包括国际反洗钱组

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协作，显得愈发重要。

2008年，陈水扁海外洗钱案真相大白，可以说是国际反洗钱组织作用的典型体现之一。

尽管从2004年起，时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陈水扁便被质疑贪污受贿，但因为证据不足，案情一直拖延不进。

2006年底，国际反洗钱组织艾格蒙联盟（FIUs）查获了陈水扁家族在英属泽西岛的账户，涉案金额达1500万美元。随后，根据瑞士、美国等金融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艾格蒙联盟在其当时108个成员之间联网清查，陈水扁的海外资产信息最终完全被掌握。

该事件令艾格蒙联盟成功走进内地公众视线，亦令内地要求政府早日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的民间呼声日渐强烈。

内地谋求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合作之路

中国内地至今仍不是艾格蒙联盟的成员。随着近年来，内地贪官海外巨额资产不断被曝光，网络上不断出现“中国为何不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的猜测和质疑。

有了解情况的相关人士表示：在是否设立专门的反洗钱情报机构并参与国际反洗钱情报交流，已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反洗钱工作力度的重要标志的今天，之所以出现如此认识，一方面是因为陈水扁案令艾格蒙联盟名声大震，以至于内地一些民众将艾格蒙联盟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内地在反洗钱国际合作方面甚少公开信息，没有发布过合作反腐的数字和案例，以至于民间并不了解国际合作的推进情况。

自2004年以来，中国内地一直谋求加入多个重要的国际反洗钱组织，并且到目前为止，已经与多个组织建立联系或成为正式成员。而国际反洗钱组织也十分关注“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反洗钱工作。

2004年10月，内地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欧亚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小组（EAG）。这是一个欧亚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反洗钱组织，成员国还包括俄罗斯、中亚和东欧多国。2009年7月，内地恢复在另一个区域性反洗钱组织——亚太反洗钱组织（APG）的成员活动。

而当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反洗钱组织，则是1989年由西方七国（G7）发起成立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这个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府层面展开合作的组织，在全球反洗钱领域起着指导

性的作用。其制定的《反洗钱40项建议》和《反恐融资9项特别建议》（简称FATF“40＋9”）等，已经被众多国家作为制定本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基础。截至2013年6月已经拥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正式成员，和20多个观察员国家。

2007年8月，中国内地经过评估，正式成为FATF成员，与此同时，FATF一份评估内地反洗钱状况报告也同时被公开。在全部49条标准中，内地有一半达标或基本达标，与FATF大部分成员国情况相近。

据《南方周末》报道，负责起草该报告的FATF工作人员对中国的成绩“表示满意”。但是报告也指出了内地在反洗钱方面的缺陷，例如由于体制限制，中国执法机关和金融专家不能自由为外国同行提供帮助；中国的珠宝销售商、房地产中介等几乎从不确认客户身份和保存交易记录等。

“尽管中国反洗钱工作还有待提高，但毕竟不能将一个拥有13亿人口、影响力迅速增长的大国排除在反洗钱组织之外。”FATF总裁斯韦德拉乌对媒体发表的观点，基本可以代表国际反洗钱组织对内地的态度。

至于内地网民熟知的艾格蒙联盟，是一个国际间的反洗钱情报互助组织，由各国金融机构、反洗钱情报组织组成，成员来自130余个国家和地区，台湾地区和本港均位列其中。据内地《财经》杂志2009年报道，内地正在积极申请加入该组织。

根据2013年央行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截至目前，内地签署并批准了所有与反洗钱及反恐融资有关的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反洗钱组织的活动，成为首个完成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互评估的发展中国家，与2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反洗钱信息交换合作备忘录，在国际反洗钱领域的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

相对应的，国际反洗钱组织也越来越认可中国的加入和作用，其中，EAG、APG均多次在内地举办全会和年会，2012年7月，内地接任APG2012-2014年度联合主席一职。2012年2月，FATF则正式结束对内地互评估的后续程序，令内地成为首个达到FATF建议基本要求的发展中国家。

国际反洗钱组织能力仍需观察

《中国反洗钱报告（2012）》显示，2012年内地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其中，决定逮捕涉嫌贪污受贿案件12705件共14331人，提起公诉25049件共34354人。不过，其中多少案件涉及

海外贪腐，多少案件通过国际组织协助完成，则没有统计。以至于内地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合作成效到底如何引发猜测。

其实，包括FATF、EAG、APG等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其成立初衷和主要关注领域很长一段时间都集中在反国家洗钱、反恐融资、反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毒品和其他经济犯罪等领域，打击职务犯罪和反贪腐方面并非传统上的重点关注对象。

不过随着反洗钱形势的变化，2012年2月，FATF推出了新《反洗钱40项建议》，将腐败和税收犯罪等新领域提升到优先应对问题的行列，提出强化对金融机构识别政治公众人物的要求，不仅要求实施强化尽职调查措施，还要求将关注范围从外国政治公众人物扩展至国内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公众人物，以及其家庭成员和关系密切的人。

即便如此，清查贪官的海外资产以及追赃，仍然是一个公认的难题。一方面，腐败官员通过境外购房、大额消费、境外存款甚至赌场、地下钱庄等各种手段转移出去的赃款早已洗白，并且融入到当地的经济循环中，难以剥离。加上各国的金融、司法体制不同，令确认资金来源和数额面临巨大的困难。

事实上，国际反洗钱组织最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管道，协助建立起一个资源共享的情报网络，目的是简化跨国追查的手续和成本，并让各国监督机构加强对所属国家反洗钱活动工作的支援。由于金融机构不具执法权，因此国际反洗钱组织大多数时候只提供信息资料，而不负责调查。

因此，即便是获得了来自国际反洗钱组织的信息，之后的调查和追讨仍然障碍重重。由于内地对罪犯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不做区分，通常采取全部没收的刑事判决，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机关拒绝合作调查。而作为贪官资产外流主要目的地，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赃款追回也不愿提供“免费服务”，大多数要求分成。

澳洲联邦律政部去年曾证实，自2002年以来，澳洲共向中国移交了753万澳元的赃款。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中国贪官向澳洲转移的腐败资产数目。

而同样受不同司法体制以及引渡条款的限制，在追捕外逃贪官时，更面临众多外交、法律障碍。内地提出的司法协助经常被拒绝，导致进展缓慢、成本大增。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国际反洗钱组织还拥有对不合作

国家的制裁权等，所以并非所有成员国加入的目的都是为了反洗钱，有的国家希望借此吸引外资，在国际结算时得到支持，避免制裁；有的国家则把反洗钱作为一种金融壁垒措施。因此，也令反洗钱工作效率降低。

正如有反洗钱领域专业人士表示：国际反洗钱组织在中共海外反腐行动中，能起多大作用还需时日观察。目前对于内地来说，加强司法独立，建立更加透明的金融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国际合作的效力。

中澳联手追捕贪官内幕

特约撰稿员 / 蔡源　记者 / 孙杨

在澳大利亚的法律框架下，追缴财物比引渡贪官要容易些。追缴非法所得的钱和财物，检方要提供的证据达到“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即可，而刑事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将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同一天，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发布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具体运作方式等内容，标志着执法合作网络正式运行。据了解，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腐败工作组，组织结构包括主席、联络人和秘书处。

作为《北京反腐败宣言》签署国之一的澳大利亚，此前已于10月同中国联手展开针对在澳大陆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追赃行动。

10月20日，澳洲主流媒体——新闻集团旗下的《澳大利亚人报》和法尔法科斯（fairfax）旗下的《悉尼先锋晨报》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高调报道中澳两国正在联手追缴在澳逃亡的大陆贪官的不义之财。随后，澳洲国家广播公司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部主管布鲁斯·希尔对媒体宣称，澳中两国将在近期联合行动，追缉第一批贪官及其资产。而在这份获得两国警方确认的优先追缉名单中，包括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和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

与此同时，澳洲联邦警察局发出正式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将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澳洲联邦警察和中国公安部将通过高层会晤进行洗钱、汇款和经济犯罪方面的合作。”

随后，澳洲各大媒体包括国家电视台ABC、各大纸媒都以大篇幅报道了澳中两国的合作，并指出澳大利亚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之外，最受中国贪官欢迎的外逃地。有媒体评论指出，澳大利亚不应该成为中国贪

官外逃的天堂，也有不少读者对澳洲政府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的政策提出批评，担心它们成为罪犯洗钱的工具。

追缴名单或由大陆公安部提供

“贪官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拿着钱（从中国）跑路的。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计划的。”希尔说，普遍的情况是先让子女和配偶到澳洲，再通过他们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这就是中国大陆俗称的“裸官”。“经过一段时间的转移，他们把钱转为合法资产，比如房产、股票和银行账户。”希尔说。

据悉，虽然是中澳联手追逃，但是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是澳洲警方。对此，澳洲司法部官员解释称，这是由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澳中两国不太可能一起在澳洲本土采取联合行动。

而这次行动也并非如部分媒体宣称的，是中澳两国首次联合追逃。早在五年前，澳大利亚联邦检察官就控告了逃亡在澳的前广东南海市置业公司的经理李继祥。

李继祥的罪名包括两项非法所得罪和七项洗钱罪。澳洲联邦检察官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97到2003年间，李继祥伙同同伙以建造廉租房的名义骗取金融机构8200万元人民币贷款，并将其中3000万元人民币以各种形式汇到香港，后来，他又将280万澳元分成七次汇到澳大利亚。

罪行败露后，李继祥于2003年逃亡澳大利亚。最终在2007年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根据澳大利亚刑法和非法所得法，李在2011年9月14日被判处14年监禁，并在9年内不能保释。

Martin Daubney法官称，宣判时李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一丝悔改的意思。“他欺骗了公众机构，非法转移现金。你把钱带入澳洲的行为，不论是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反社会行为。”

在2011年这次追缴行动中，澳大利亚政府按照非法所得法的公平分摊条款（equitable sharing provision），给中国政府退还了416万澳元，价值3000余万人民币。

哪些贪官位列在优先追缉名单之上，是两国媒体都急切想获悉的。不过眼下正值行动期间，两国警方都非常敏感，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近期大陆坊间热传的包括原国家电网总经理、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和前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童言白在内的潜逃

澳洲的贪官名单，其实是源自大陆《财经》杂志2013年一篇名为《中国裸官报告》的报道，该报道梳理了59名落马“裸官”的材料。公开资料显示，蓝甫、高严和童言白分别于1999年、2002年和2004年逃往澳大利亚。

来自澳洲警方另一消息来源则称，希尔警官提到的优先追缴名单，是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从一份少于100人的名单中筛选出来的。

澳重启重大投资签证审查

虽然澳洲警方不能透露行动细节，但是澳大利亚联邦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卢布告诉《凤凰周刊》，政府正在重新审查因大陆外逃贪官新闻而被推到风口浪尖的“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和“1500万澳元高端签证”的审批过程。

据统计，澳洲政府自2012年11月24日推出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以来，94%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其中大陆占91%。中国大陆的申请人也是获得澳洲永久身份最多的，占到88%。早已有众多媒体和民间组织机构质疑澳洲政府的投资签证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中国贪官跑路的绿色通道。

卢布部长表示：为了让贪官浮出水面，澳中合作不会只局限于警方。澳大利亚移民部也会和中国执法机构合作，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进行强制的品格和安全审查。“一旦发现有申请人的资产是来历不明的，我们会把申请资料交给当地的执法机构。”

对此，曾应邀赴中纪委参观的悉尼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Kerry Brown告诉《凤凰周刊》，澳中两国的合作是值得肯定的。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成为中国贪官逃跑的天堂，大家应该合力阻止他们。

近年来，一些大陆媒体在报道海外追逃受阻时，宣称部分国家拒绝与中国合作的原因之一，是乐于见到中国贪官带着大量热钱投入该国市场。

实际上，至少在澳大利亚，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并没有人愿意让澳洲成为中国贪官的逃亡天堂。特别是很多受近年来高房价困扰的民众，更是不希望中国贪腐官员的“黑钱”进入澳洲，澳洲舆论经常对大量来自中国的“热钱”流入当地房产市场表示反感。

澳大利亚前移民部长Amanda Vanstone告诉《凤凰周刊》，反腐是

关于所有人的利益，如果中国政府在澳洲的法律框架之内寻求澳洲的帮助，澳洲政府应该尽可能地给予援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澳洲高级外交官说，他曾经警告过澳洲政府，如果大量中国贪官跑到澳洲，将会给两国关系埋下隐患。“一旦中国政府开始向堪培拉追缴赃款或者要求引渡贪官，会给澳洲政府造成很大困扰。因为澳洲政府将要平衡外交利益和保护自己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权利。”他说。他举了赖昌星例子，说他的引渡案困扰了中加关系长达十年。

在澳贪官的隐蔽生活圈

抛开追逃行动，外逃贪官和他们的家人生计如何，一直是大陆公众的兴趣点之一。

至今未有任何机构统计和公布在澳逃亡的贪官或者“裸官”规模，所以人们无法获知这个群体的准确人数，以及分布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澳洲官方数据，澳洲2300万人口中有近100万华人，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消失在澳洲各地庞大的华人社区中。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一些贪官热衷藏匿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贪官一条街或腐败子女村，难免让人误解他们自由高调地群居在豪华社区，生活奢靡。实际上，至少在澳大利亚，“裸官”或者贪官的配偶和子女们，都是非常低调的。

《澳洲金融观察》最近披露了前铁道部落马高官苏顺虎之子苏冠林在澳洲生活的细节，掀开了贪官子女在海外逃匿神秘面纱的一角。

据媒体和法庭资料显示，苏冠林今年31岁，他的太太29岁。夫妻二人的身份一个是外贸公司的职员，另外一个是会计。

不过，他们有着与年龄和收入不相称的豪华住宅。2013年4月，两人在悉尼著名富人区Killara以135万澳元的价格买下一栋房子。虽然这栋房子看起来比较普通，但是两人已经申请当地政府推倒重建一栋二层五个睡房的豪宅。当新宅建成，房子的市值最少价值200万澳元。

这栋百万新房并不是二人唯一财产。2010年，苏冠林当时25岁的太太曾在悉尼另一价格不菲的地段Breakfast Point买下一处价值220万澳元的房产。7个月后，苏冠林又在悉尼的Wolli　Creek买下一所40万澳元的公寓。根据中国法庭的资料显示，二人购买房产期间，就是苏顺虎接受200万澳元贿赂的时间。二人在Breakfast　Point买房前3个月，苏冠林

收到16笔汇款，共计120万。

当澳洲媒体问苏冠林夫妇担不担心在他们名下的财产被没收，苏冠林的太太说房产都是在他们的名下，和苏顺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不担心。

苏顺虎如何把不义之财转到澳洲是一个典型的“裸官”模式。送子女去海外留学，然后以不同名义把钱从各种渠道寄去海外。钱到海外之后，再被转换为房产或者其他资产。

很多澳洲华人律师、移民中介、会计师对这样的事情心照不宣，也不会过多地过问钱的来源。

据澳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透露，中国“裸官”的配偶和子女在澳洲活动非常隐秘。他们一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不愿意和圈子外面的人接触。圈子里的人及配偶在大陆时的级别和官位差不多。

“他们（裸官和家属）有很多的钱要转移，也想尽快拿到澳洲的身份，”这位老板说。他们在咨询移民政策和财产转移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愿透露太多关于中国国内的信息。如果多问几个问题，就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在这位华人老板眼中，“裸官”的配偶、子女和商人的家属非常不同。移民的商人和家属毫不避讳地谈论他们在国内的生意、以及他们要向官员行贿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澳洲四大银行的一位华人客户经理则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据说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客户，曾用私人飞机把大量现金带入澳大利亚。而2013年澳大利亚维州法院的文件也显示，有中国商人用私人飞机一次性把80万澳元带入澳洲，并存在中国某银行在墨尔本的分行。

至于外界盛传位于此次中澳联合追逃优先名单上的高严，根据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资料，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于悉尼注册了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Jutan Development和Yutan Property，开发在悉尼黄金地段Neutral Bay的一片价值180万澳元的土地。当高严在2002年接受调查的时候，高新元把该地块以300万的价格卖给了华人商人Lucy Gong。

追缴贪官非法财产易，追缴已转移他人的财产难

实际上，中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展开海外追贪的瓶

颈，首先仍是法律上的差异。比如如何引渡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潜逃官员；如何让外国法院认可中国法庭的审判决定；以及怎么让国外执法机构和中纪委这样的非司法机构合作等。

澳洲著名刑法和反洗钱专家Hugh McDernmot告诉《凤凰周刊》，相比之下，追缴财物比引渡贪官要容易些。追缴非法所得的财产是根据民事法则，而引渡贪腐官员则是依据刑法。在澳大利亚的法律框架下，民事诉讼标准要比刑事的低不少。比如说，要追缴非法所得的钱和财物，检方要提供的证据达到“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即可，而刑事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如果中国警方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澳洲联邦警察也认为他们有合理的怀疑认为钱或者财产来源不明，这对澳洲民事法庭来说，是一件比较简单的案子。” McDermott对《凤凰周刊》说。

但是，如果贪腐官员把资产转到子女、配偶、情人或者公司、信托的名下，追缴的困难就会大大提高。因为澳洲警察要证明非法所得的资产和贪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跨国之间的资产追踪，可能将面临不少法律的障碍，比如银行对客户资料的保密责任。

另外，根据澳洲法律，追缴来的不义之财如何和中国分账也是一个问题。由于跨国调查通常费时又费力，所以根据澳洲《非法所得法》“公平分享”条约，澳洲法院有权对赃款如何分配作出裁决。

以李继祥案为例，皇家检查官Tim Carmody SC，也是现任昆士兰最高法院大法官曾透露，由于洗钱案件比较难发现，同时也不容易被起诉，李案的调查人员曾到三个国家和地区调查取证，起诉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政府“分赃”在部分大陆民众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却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协定。McDermott称，政府之间协议如何分配不义之财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即使是在澳洲国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也有相关的协议规定如何分配，因为澳洲政府最少也要弥补自己警力和法院的开销。

如果追赃之外，大陆政府还想把贪腐官员带回国内接受审判，那么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尤其是当这位贪腐官员已经加入外籍的时候。

在澳洲律师和法律专家看来，联邦政府通常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其他国家引渡的要求，中国方面需要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一定要通过澳洲的司法程序，最少要花几年的时间。

中国的死刑制度也是一个绊脚石。在中国，重大经济犯罪有可能面临死刑。然而已经废除死刑制度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法院非常不愿意把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引渡回中国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

如果中国的死刑制度是个大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怀疑则是另一个鸿沟。刚刚获邀从中纪委参观回来的Kerry Brown对《凤凰周刊》表示，如果澳洲政府和中纪委合作的话，这样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奇怪的。因为中纪委是一个政党的机构，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执法机构。

（本文特约撰稿员系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旗下商情观察中国编辑，前《时代报》和《悉尼先锋晨报》亚太事务记者。见习记者赵菁对此文亦有帮助。）

澳方热情降温？中澳联合追逃面临考验

记者／孙杨　特约记者／蔡源

中澳联合追逃经历今年3月涉嫌经济犯罪的澳籍华人谢仁良在上海被捕一案“实战”后，正在由“蜜月期”转入“微妙期”。细细梳理，颇多值得总结、借鉴之处。

自从2014年，中共借“猎狐行动”掀起一轮声势浩大的海外追逃行动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表现得较为积极配合的发达国家之一。

不仅是澳洲政府高层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和公开场合中表态将配合中国追捕在澳贪官，而且似乎已经开始了不少具体行动的落实，如被澳洲媒体报道的中澳正在根据一份逃澳贪官优先追缉名单对在澳逃亡的贪官展开调查，并追缴不义之财；将追捕最著名逃澳贪官，前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提上日程等。

不过，在经历了半年多的联合行动，特别是今年3月涉嫌经济犯罪的澳籍华人谢仁良在上海被捕一案的“实战”后，争议和反对声音开始变大，中澳联合追逃正在由“蜜月期”转入到一个微妙的阶段。

特别是“天网行动”百人名单公布，大陆明确其中至少10名逃亡者身在澳洲，希望澳大利亚配合追捕，更令澳洲方面变得愈加慎重——因为在这10人中，有些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或已成为永久居住公民，有些背景复杂，牵涉商业、外交等问题。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当来自中国的追逃追赃呼声与澳洲本地法律和其他现实问题相遇，要如何在其国内民众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双重考验之下做出正确决策。

谢仁良被捕案在澳引争议

今年3月2日，一份来自边检部门的通报引起了上海警方的注意，通报称：一位澳大利亚籍华裔于近期入境大陆，入住浙江杭州某酒店，虽然该人士的姓名显示为“张健平”，但是经人脸识别技术分析，此人的面部特征和其他相关信息均与1997年上海警方公布的在逃通缉犯谢仁良高度吻合，希望警方调查此人。

根据上海警方当年案件侦查资料显示，1996年前后，时任宁波某公司董事长的谢仁良，因公司经营严重亏损，私刻宁波市一家证券营业部公章，对外开具伪造的国债券代保管凭证，通过签订债券交易协议书、

国库券融借协议等合同，骗取上海市财政局下属某证券公司和宁波的证券公司资金和国债券共计逾1亿元人民币，用来炒期货和股票。

1997年3月，期望靠期货和股票翻身的谢仁良，投资失败，卷余款出国，最终化名张健平，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上海警方是通过追逃数据库和面部识别技术锁定谢仁良，再通过与其儿子的DNA比对检测，确认其真实身份的，虽然在此之前，他一直强调自己叫张健平，而警方抓错了人。

就在国内媒体欢呼有一个外逃犯落网的时候，这一消息在澳大利亚国内却引起了不同的争论。

据多家澳洲媒体报道，张健平是中国大张旗鼓开始“猎狐行动”以来首位被中国官方逮捕的澳籍华人。有澳洲人士担忧张健平可能会获得中国司法不公正的审判，而根据澳大利亚对本国公民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澳洲政府有权通过外交渠道就这次逮捕进行交涉。

也有澳洲人士提出，根据中方提供的信息，张健平（即谢仁良）是在2002年，通过与澳籍人士结婚的方法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在获得身份后，又与该澳籍人士离婚，并与前妻复婚。 根据澳洲公民法规定，如果是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获得澳洲国籍的，政府有权剥夺其公民权。

目前，据《新闻晨报》、《东方早报》等多家沪上媒体报道，张健平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内，至今为止坚称自己不是谢仁良，并声称失忆。如何处理这位澳籍人士，成为澳洲政府一个“烫手山芋”，因为一旦处理不好，不仅影响两国邦交、国内舆论，甚至可以左右政治选举结果。

前车之鉴是力拓高管胡士泰案。2009年7月，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力拓集团在上海的公司中，有四名员工被上海司法机构以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拘留，其中包括力拓高管、澳籍华人胡士泰。

2010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数罪并罚判处胡士泰有期徒刑10年”。

该案件在中澳两国均引起了舆论上的轩然大波，澳洲官方对澳籍公民是否应该在中国接受审判和服刑异常关切。

据悉，力拓曾经花重金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的说客。而据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6月消息，澳大利亚国会和政府考虑通过一份囚犯交换条约，使胡士泰离开中国，在澳大利亚服完他的10年刑

期。

胡士泰的案子，不仅一度令两国外交关系变得紧张和尴尬，更在中澳贸易合作中引发了双方的不信任，特别是矿业方面，甚至一度出现合作停滞的势头。

有澳籍人士分析，虽然谢仁良案影响范围不及胡士泰案，但是由于主角均为澳籍公民，所以难免会有人将两者加以比较，如何平复各方情绪，颇为考验当前澳洲执政府智慧。

中澳联合追逃“蜜月期”结束？

由于经贸摩擦、不同执政党轮替等原因，中澳关系近年来经历了多次起伏，但最近2年间，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快速升温期。

2014年11月，在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双方宣布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完成，被认为中澳在经贸合作方面将登上新台阶。

而在同月早些时候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与会国一致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作为签署国之一，澳大利亚表示，已于当年10月起，同中国联手展开针对在澳大陆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追赃行动。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主管甚至对媒体宣称，澳中两国将根据双方确认的第一批名单，开展联合行动，追缉贪官及其资产。而在这份获得两国警方确认的优先追缉名单中，包括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和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

上述表态，在当时两国国内均获得主流舆论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陆续有联合行动被曝光或被表态已提上日程。

其中，澳洲联邦警察局发出正式公告称 “澳洲联邦警察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将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澳洲联邦警察和中国公安部将通过高层会晤进行反洗钱、打击非法资金往来、追踪经济犯罪等方面的合作。”

而澳洲各大媒体包括国家电视台ABC、SBS，还有各大纸媒都以大篇幅报道了澳中两国的合作。有媒体评论指出，澳大利亚不应该成为中国贪官外逃的天堂，也有不少读者对澳洲政府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的政策提出批评，担心它们成为罪犯洗钱的工具。

2014年年底，《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还刊文援引多位消息人士的

话证实，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过去几周曾多次前往高新元的公司注册地、皮尔蒙特港湾调查——高新元是可能逃亡澳大利亚的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之子。

不过现在联合追逃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了。今年3月，谢仁良案的发生，令部分澳洲人士认为，不管追逃的意愿多么正义，一旦开始具体执行，仍然绕不开两国司法制度的差异以及人权方面的担忧。

5月，澳洲媒体在调查获悉中纪委公布的“百人名单”中的10位可能藏匿于澳大利亚的通缉犯中，至少5人在澳大利亚有物业、资产，其中包括已获得澳大利亚国籍的公民和获得永久居住权人士后，舆论走向进一步变得谨慎。

以位列通缉名单上的胡玉兴为例，《凤凰周刊》查阅澳洲选举委员会资料证实了澳洲媒体此前的报道，即胡玉兴是一名登记在册有选举权的澳大利亚公民。与此同时，他不仅在珀斯有物业，还同时与当地4家公司有往来，持有至少2家公司的股份。

调查和抓捕胡玉兴，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应该适用哪一国的司法体系。由于中澳之间还没有签订引渡条约，若要遣返胡玉兴，最大的可能性是从调查其澳籍身份是否合法取得方面入手。

根据澳大利亚公民法，只有在极少数几种非常特定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取消公民权。这意味着，将胡玉兴遣返回中国，将非常困难。

联合执法绕不过司法难题

“很多被中国政府指控贪腐罪并逃往澳大利亚的通缉犯都像胡玉兴一样，早已获得外籍身份，抓捕这样的贪官，可能将耗费两国政府长期大量的人力物力，是否值得这样做，也是两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一位澳大利亚知名媒体的评论人士称。

确实，在这半年多来，即使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或媒体曝光大陆贪腐官员在澳洲逃匿，澳洲政府的公开表态却仍然变得越来越谨慎。

虽然澳洲联邦司法部不久前仍然对媒体表态称：澳大利亚和中方有富有成效的执法合作关系，包括在刑事犯罪和警方间的合作，澳洲政府还是保持公开的积极态度。但是比起早期所说的联合行动追缴贪官的资产的话来，堪培拉显得不是像原来那样的积极。

比如在张健平被中国警方逮捕的事件上，澳洲外交部就拒绝对这件事情进行评价，而且澳洲联邦警察也特意澄清，在这一案件上，没有和

中国警方有任何的联合行动。

一位澳洲政坛观察人士表示，虽然早期已经有声音对中澳联合追逃在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难题提出过担忧，不过却被当时澳大利亚政府高调的表态盖过，现在看来，中澳两国还绕不过各种法律、制度和文化的障碍。

以中澳两国之间迟迟不能通过的引渡条约为例。多年来，澳大利亚对于是否应该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态度一直没能明确。

澳洲外长毕晓普在去年11月时曾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向堪培拉提出要签订引渡条约。“我们欢迎习近平主席反腐的决定，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改革决定”，毕晓普说，但是她同时表示，澳洲现有的反洗钱法足够应对贪官外逃澳洲的问题。这意味着，澳方认为引渡条约对本国追逃作用不大。

但是后来，毕晓普的态度也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澳洲本地媒体的报道，毕晓普也曾经说过，政府会考虑引渡贪腐官员回中国。

澳洲政府摇摆不定的立场，也说明在澳洲国内，对如何处理中国贪腐官员存在不小的争议和担忧。

位于墨尔本的斯威本大学客座教授、曾经在克林顿时代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的前美国高级外交官Kenneth Chern告诉《凤凰周刊》，大陆贪官把自己的子女和非法所得送去海外，已经引发了中国网民和改革派人士的强烈关注和不齿。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怎样对待嫌疑犯持不同意见。

“一方面，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要尊重和配合中国的追捕行动，但另一方面，也一定要谨慎地遵守严格的证据标准。” Kenneth Chern说。

一名澳洲曾经派驻中国的资深前外交官则对《凤凰周刊》表示，他曾经警告过澳洲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配合中国反腐行动，但又不令澳大利亚为难。

上述人士的担忧，在澳大利亚国内颇具代表性，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和司法体系的差异，仍然令澳大利亚对中国追逃存在不信任。

在澳洲律师和法律专家看来，联邦政府通常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其他国家引渡的要求，中国方面需要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一定要通过澳洲的司法程序，最少要花几年的时间。

另外，在中国，重大经济犯罪有可能面临死刑。然而已经废除死刑制度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法院很难会同意把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引渡回中国，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

澳民间“驱逐中国贪官”情绪升级

如果说以往澳大利亚在面对是否应协助中国追捕贪官时，只需要参考司法部门的意见，那么现在，澳洲政府还不得不面临越来越高涨的民间情绪的压力——饱受高房价折磨的澳洲民众，已经迁怒于包括贪官在内的、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今年早些时候，澳洲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在澳大利亚最知名的报刊之一《悉尼先驱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反洗钱法就是解决澳洲高房价的灵丹妙药。文章将令澳大利亚房价高企的罪魁祸首指向来自中国的大批贪腐官员，称目前在澳洲房地产市场上，来自中国买家的资金里，至少有一半是黑钱，也就是140亿澳元，折合670亿人民币。

虽然仅仅是一篇评论，数据也未并非来自任何官方机构，但该文章还是在澳洲的各类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载，引起的读者反应巨大。

在其中一个社交网站上转载的文章下面，有上百条留言，其中绝大部分澳洲读者表示认同和支持。

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个人奔赴海外购房置地，经济发达、环境舒适宜居、政策较为宽松的澳大利亚成为买家的青睐地之一。特别是最近几年，赴澳买房出现井喷。

澳洲外资审查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至2013年间，中国人总共在澳洲房地产投资近60亿澳元（约合近300亿人民币），已经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成为澳洲房地产界的第一大海外投资群体。

在澳洲人民印象中，每到周末，悉尼各大房产交易市场里就挤满了中国买家，他们高调且出手大方，几乎买走了所有最好的房源。

虽然至少从2005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就陆续出台限制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的政策，但实际上，很多政策只停留在表态层面。

2014年，悉尼市内的房产均价涨幅超过15%，部分郊区涨幅甚至高达27%。加之近来，澳洲各大媒体不停爆出与中国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富豪买下价值数亿人民币的豪宅的新闻，促成房价高企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自然被认定为中国投资者，进一步加剧了澳洲民众的反感。悉尼甚至已经出现了抗议中国投资者的集会。

今年5月10日，一位名叫Nick Folkes的澳大利亚人在Facebook上建立起了一个反对中国房产投资“入侵”的公共页面，公共页面内的主图上，澳大利亚标志性建筑物悉尼歌剧院被五星红旗覆盖，被指隐喻越来越多的中国买家正在“入侵”澳大利亚。

Nick Folkes号召澳大利亚人围堵中国驻悉尼领事馆，甚至还上传了一个焚烧中国国旗的视频，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虽然是极端行为，但也应该看到，澳大利亚民众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上述澳洲媒体人士称，特别是澳洲民间对于驱逐中国贪官的呼声，已经给联邦和各地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这可能会对澳大利亚下决心协助中国追逃产生帮助。

中国警方赴澳劝返遭拒？

如同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遇到的追逃障碍一样，在缺乏引渡条约和其他有效的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劝返仍是目前中国海外追逃效率最高、成功率最大的方式。很多时候，来自中国的劝返人士会不断地给逃亡者做思想工作，甚至带着家人上门劝说。中国警方的这种秘密行动在很多国家已经变得很常见。

以加拿大为例，温哥华《先枫报》创办人、《环球华报》前总编辑黄运荣告诉《凤凰周刊》，近年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已经在加拿大长期设点，派专人在当地游说、劝返犯罪嫌疑人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另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今年3月4日报道，中国警方代表一直在加拿大秘密活动，目的是调查中国贪腐官员的洗钱行为和隐匿房产，同时寻求让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回国受审。

但一旦踏上他国领土，即使是做思想工作，也往往意味着要绕过对方国家的法律法规，难免要打些擦边球。不久前，中国警方在澳大利亚的劝返行动，就遭遇诸多质疑。

根据《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的报道，2014年12月，山东日照警方曾经派遣两名警察进入澳大利亚，到墨尔本劝说据信已经加入澳大利亚籍的49岁华人男子董锋（Dong Feng音译）回国投案。

澳洲媒体在报道这次劝返行动时，使用了“潜入”一词，称中国警方没有提前通知澳洲警方和外交部，而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悄悄前往墨尔本与董锋直接谈判的。

来自大陆的新闻报道则显示，董锋曾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日照某企业采购部长、销售部副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妻子杨某收受山西一煤化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等人贿赂，后逃亡澳洲，于2009年5月被日照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上网追逃。

而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董锋并没有承认中国警方的指控，并宣称他是被一个上司陷害的。

日照警方来澳洲“私自”办案的消息，经媒体曝光后甚至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外交风波。澳洲政府称，对中国警察的到来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认为他们在澳洲的行动是不恰当的。

悉尼大学国际法教授Vivienne Bath则对此评论说：“即使并不违法，这样做也是不礼貌的。你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在中国那样做吗？”

随后，澳洲政府照会了在堪培拉和北京的高级外交官，据悉，他们向中国官方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据《悉尼先驱晨报》等澳洲媒体报道，澳洲政府的一位发言人称，中国政府向澳洲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而据澳洲媒体报道，中国驻澳外交官也同样非常尴尬，因为日照警方的行动也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大陆的行为，还引起了澳大利亚媒体的困惑。“澳大利亚的媒体不知道应该怎么将做思想工作这一行为翻译成英文。”一位在澳洲工作的华人记者说，所以也不知道这一行为应该如何用澳洲法律解读。

实际上，大陆警方并非只有这一次赴澳直接接触当事人。据悉，黑龙江的警方也曾经试图在去年9月到布里斯班去劝说一位被指控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黄姓商人。但是最后因为经费不足等问题而没有成行。之前黑龙江警方曾多次联络澳洲联邦警察在北京大使馆的联络官，试图得到澳洲警方的支持。

实际上，中国政府也清楚把逃犯引渡回中国要面对的法律和政治压力。有澳洲媒体分析认为，中纪委公开100名在逃嫌疑犯的名单，更像是发动了一场心理战，迫使他们自愿回国接受审判。

中共反腐或终结海外“逃亡天堂”——逃澳贪官十人录

记者／孙杨　特约记者／蔡源

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中，胡玉兴、姚耿、郭廖武等10人可能逃亡或藏匿在澳大利亚，令澳洲成为中国贪官最青睐逃亡地的第四位。先大肆贪腐，再出逃发达之地过“天堂”般的生活，这一现象民间舆论早有不满。逃亡澳洲亦是典型代表。此番“天网行动”，令延续了数十年的“逃亡天堂”现象或将不复往日的平静和安逸。

澳大利亚西部珀斯市南郊的Atwell小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区，现年60岁的胡玉兴经常在傍晚与妻子和孙子一起散步。2002年来到澳大利亚的他，一直是这样平静地安享晚年。现在，他的梦想可能要落空了。以至于当有记者突然出现在面前时，胡玉兴和他的太太立即情绪失控，甚至试图殴打记者。

作为重点缉捕对象，胡玉兴位列大陆“天网行动”外逃贪官通缉名单第9位。

今年4月22日，中纪委监察部高调发布消息，以“天网行动”为名，启动新一轮海外追逃，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的红色通缉令。

与一年前的“猎狐行动”大部分目标藏匿在东南亚、非洲等地不同，“天网行动”追逃目标直指藏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逃亡者。在这份百人名单中，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分别以40人、26人、11人列前三名。另外，还有10人可能逃亡或藏匿在澳大利亚，令澳洲成为中国贪官最青睐逃亡地的第四位。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都是“重量级”贪腐人士最青睐的避罪天堂，也是追逃困难最大的地区。澳大利亚因为其壮美的自然和优越的居住环境，成为外逃贪官们悠闲、体面的“逃亡天堂”，也是最令大陆民间耿耿于怀之地。此番“天网行动”对海外“逃亡天堂”首次正面打击，或终结其数十年安全、平静的历史。显现出中共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减，亦令大陆民间为此振奋，迅速成为舆论期待的热点。

依照最新的百人通缉名单，《凤凰周刊》特别通过正规渠道，独家查询到了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登记信息，南澳洲、西澳洲和维多

利亚州土地交易记录，以及澳大利亚联邦选民花名册等。综合各种信息，基本核实10名被通缉者在澳实况、逃亡路径等信息。

据《凤凰周刊》掌握的情况，名单上的10人逃至澳大利亚，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事先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成为合法公民，并在澳大利亚当地成立公司、开办业务，出逃后高调体面地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二是先将家人送出国，读书、工作、生活，并转移资产，甚至让家人先获得澳大利亚国籍，案发后出逃，以在澳人士家属身份，低调地生活；三是作为国内企业的中澳合作项目负责人，多次借工作机会赴澳踩点，然后以工作的名义滞澳不归，最终与国内失联。

隐居普通社区的“宅男”

珀斯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地中海式气候令这里温度宜人，风景优美，拥有很多迷人的海滩，是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

与东海岸的悉尼和墨尔本相比，珀斯生活水平稍低一些，也不是传统的华人密集地区。最近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到澳大利亚购置房产，珀斯的华人也开始多起来。一些中高档社区逐渐成为华人聚居地。

Atwell小区目前的平均房价为六十余万澳元/套，虽然比当地整体房屋均价略微高出一点。不过，由于这一带大部分是占地500平方米左右的新房子，所以颇受新华人移民欢迎。四间睡房两个车库，这是华人眼中标准的“澳洲梦”配置。

2002年7月出逃的胡玉兴，就住在这个小区里。在邻居的眼中，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居家式男人。和很多年长后才移居澳洲的华人一样，胡玉兴每天的生活就是帮着子女带孩子。邻居们经常在傍晚看到胡玉兴与妻子带着孙子在小区散步，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直到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一纸通缉令公布，澳洲媒体拿着照片找上门。

出生于1955年的胡玉兴，47岁选择出逃时，已担任山西省太原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长达10年，同时兼任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

《凤凰周刊》从多种渠道查阅到的当年报道与资料显示，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胡玉兴就已经是太原市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得力干将。

他曾于1992年主编了《山西省省城房改指南》；山西省纪委主办的《正气》期刊，则于1999年发表了名为《加大房改工作力度　推动全市

经济发展——就当前房改热点问题访太原市房改办主任胡玉兴》的文章。

逆转出现在2002年，5月太原市启动政府机构改革，计划将房改办并入房地局，于是启动了对二级机构的清产核资审计工作。然而，3个月之后的审计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经查明，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违反国家规定，违规发放售房资金3.19亿元，违规办理公积金贷款手续，形成不良贷款约3.53亿元，违规长期投资5900万元。

审计发现，胡玉兴的违规行为包括，越权出让建筑用地；在发展中心将三幢高层楼楼座出售给中包公司（中国包装总公司）并办理相关手续期间，绕过发展中心，以房改办名义申请变更规划，并擅自改变结构直接报建；以资金管理中心的资金作抵押，让房改办下属的担保公司超范围经营，为其弟投资的公司贷款做信用担保等等。调查还显示，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银行开设的存款账户多达89个，涉及11家金融机构。

审计结束，太原市检察院接到移送文本，准备立案调查时，却发现关键人物胡玉兴已经出逃了。

胡玉兴是在2002年7月28日，使用私下办理的护照离开中国的。几年前，他就已经将一双儿女送到澳大利亚读书，2001年，他的妻子也以照顾儿女为由，前往澳洲。通过精心的准备，胡玉兴成功地“消失”了。

2002年12月，太原市公安局以涉嫌滥用职权对胡玉兴下达逮捕令，纪检、公安、审计等部门联合对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进行立案调查。2003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胡玉兴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2003年12月，《太原日报》公开了太原市纪委、监委对胡玉兴案件的处理决定，称其任职期间违规放贷和投资上亿元，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私自办理护照出国一年之久至今未归，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行政公职的处分。

接下来，就是十余年的“杳无音讯”。

现在，随着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的公布，这段陈年旧案再度被翻出。胡玉兴的行踪，也浮出水面。

首先找上门来的是澳洲媒体。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当他们的记者在珀斯的社区里见到胡玉兴的时候，他正从白色奔驰车上取纸箱，听到记者询问通缉令的问题，胡玉兴“变得疯狂”，不仅将记者的嘴唇和脖颈打伤，还把相机抢走摔到地上。报道形容：“胡玉兴站在住

所车道上，胸口起伏，气得浑身颤抖。”

一旁胡玉兴的妻子也情绪激动，她冲着记者尖叫：“是中国政府的错，我们是澳洲公民，我们没有做错误的事情。”要求记者马上离开。

本刊记者曾经联系被袭击的澳洲同行，但是他拒接对该事件进行评论。不过他在自己的推特（社交媒体）上说，胡的案件是他经历过最不可思议和有意思的故事。

《凤凰周刊》通过查询澳洲资产登记信息发现，胡玉兴不但拥有Atwell的房产，同时还拥有4家澳洲公司的股份，其中两家公司的登记地址，正是他现在居住的地址。

西澳洲资深的移民中介许耀汉说，“看他住的那个地方，不是什么富人区，就是非常一般的地区，不是钱花得差不多了，就是想低调。”

矿企高管“滞澳不归”背后

在逃往澳大利亚的10位被通缉人士中，有两人是曾任职中国大型矿产企业、现正值壮年的管理者。一名是原云南省五矿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一把手”，现年53岁的姚耿；另一名是原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年49岁的郭廖武。这与澳洲作为大陆重要矿业贸易伙伴或有关联。

国内关于姚耿的公开资料非常少，仅知道其身份证隶属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但是1998年，出逃时的姚耿刚刚36岁，却已是云南省五矿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经理，说明他曾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人才。

因为被指控挪用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公款，姚耿被云南省检察院立案，并于2000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涉嫌罪名是“贪污”。选择出逃的他经泰国转道至澳大利亚，从此音信全无长达17年。也是由于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他才重回人们视野。

《凤凰周刊》通过查阅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记录发现，姚耿在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间，担任了一家在澳洲新南威尔士注册的公司的董事。

这家公司叫Café Bondi （Australia）Group，即邦迪咖啡（澳大利亚）集团，包括姚耿在内共三个合伙人。在公司递交的材料上显示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姓名都和红色通缉令上的姚耿相同。作为公司董事，姚耿拥有30%的股份。其他两位合伙人是出生在南京的中国人，姓

名拼音分别为Rui Gu和Sheng Gu。

董事资料显示，姚耿的住址位于悉尼首屈一指的超级富人区——玫瑰湾（Rose Bay）是全澳洲最贵的住宅区之一。居住在玫瑰湾，坐在家中即可欣赏到世界闻名的悉尼情人港、歌剧院以及悉尼大桥美景。而这个区，最不起眼的房子也要至少260万澳元（约合1200万元人民币）一套，是澳洲平均房价的5倍。

姚耿在担任公司董事短短8个月以后，就将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另外一个同样出生在南京的中国人。另外，记者在澳洲选民的花名册上，没有发现姚耿的名字，说明他可能没有加入澳洲籍。

另一个在名单上出现的矿企高管是原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武钢澳大利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廖武。《凤凰周刊》掌握的来自武钢和澳洲的资料共同证实，2009年至2010年期间，郭曾经主导过武钢与澳大利亚矿产公司WPG合资开发南澳中部矿产项目的推进工作。还曾在与澳洲上市公司Centrex Metals合作开发的另一个南澳铁矿项目中担任过武钢的代表和董事。

2009年，武钢成功收购Centrex公司15%的股份。然而根据Centrex给澳洲证券交易所的通知，郭廖武在2010年11月12日，辞去了Centrex董事的职务。

郭廖武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澳大利亚。“滞澳不归”的郭廖武随即被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起诉。并于今年4月14日，通过国际刑警发布了红色通缉令。

郭廖武称得上是外逃贪官中“高学历人才”的代表，拥有博士学位的他，曾经是一名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曾在其研究的专业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并获得过科技奖项。

例如，郭廖武曾在2002年7月，于行业内报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上发表《武钢矿山生产中的几个岩石力学问题》的学术文章。2009年5月，在武钢集团网站上发表《郭廖武：对矿业公司提高技术经济指标的思考》文章，其中包含诸多研究数据和图表。

郭廖武还是一个“经常深入基层的”的干部，可能是由于在担任武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之前，曾任程潮铁矿矿长，所以对基层很有感情，就在其滞澳不归前4个月，还曾经赶赴武钢下属基层单位开展安全督查，武钢官网上至今留有郭廖武2010年4月8日，在乌龙泉矿深入55米排土场检查的照片。

在与澳洲合作的两个项目资料中显示，郭廖武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多次亲自赴澳推动项目进展。不排除他借此机会，对日后滞澳不归做出提前安排。而据大陆《楚天时报》报道，郭廖武在外逃前，已经将妻女安置在澳大利亚。

对于郭廖武的指控，目前在澳洲矿产圈内有另一种猜测。一位接近武钢的人士透露，郭廖武逗留在澳洲可能另有隐情。该人士称：郭廖武留在澳洲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武钢外派人员工资太低。像郭这样的矿业人才，在澳洲的年薪通常高达几十万澳元，因为一名普通的澳洲矿车司机，一年也有十几万澳元。

“你可以想象，和郭一个级别的澳洲高管，拿着数倍或者十几倍于他的工资，在谈判及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心里能平衡吗？”该消息人士说，据他了解，武钢外派工作人员薪资与国内看齐，虽然有给驻澳高管发放津贴，但一年不会超过两万澳币，这与澳洲当地人的失业救济金差不多。所以，在薪水普遍非常高的澳洲矿业圈内，不少中国高管是军心不稳的。

上述人士认为，澳大利亚是中国最重要的矿产项目合作国，大量矿产能源企业在澳洲派驻高管，但是由于矿业公司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管理和待遇存在问题，很可能给包括贪腐人士在内的中方高管制造外逃的借口，且留下可钻的空子。

中基层女性出逃者沉浮各异

在逃亡至澳大利亚的10人中，有3名是女性。从出逃前身份看，她们均不是单位高层，出逃后，也走向了迥异的人生道路。

现年56岁的福州籍人士唐东玫，2008年出逃前，曾是福建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会计，因为涉嫌贪污，被福建三明市检察院立案。来自澳洲媒体核实的信息显示，唐东玫目前在澳生活富裕，其名下拥有墨尔本市Kew社区的物业，这是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富人区。不过，她目前应该还没有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澳大利亚联邦选民花名册中未发现其名字。

现年64岁的大连籍人士周世勤同样居住在自己墨尔本的物业中。周世勤出逃前，是沈阳铁路局大连铁路房产生活段财务主任。房产生活段是铁路系统内部一个集供暖、供水、生活、物业、铁建施工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单位。据通缉信息显示，2002年，周世勤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将800万元工程款占为己有。2007年10月出逃澳大利亚，11月，被铁路系统内部司法机构沈铁公安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

分院立案展开侦查。

今年5月，大陆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发表名为《检察长亲自挂帅督促对大连铁路房产生活段财务室主任周世勤追逃行动》报道称，辽宁省检察院要求相关单位将该案件作为开展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工作的重中之重，检察长要作为案件第一责任人，亲自挂帅，督促落实。

另一名出现在百人名单中的原广州市交警支队民警郭洁芳，虽然通缉令显示其目前可能藏匿在澳大利亚，但在澳方的各类财产、物业信息中，均查不到其任何资料。“可能是以化名在澳洲生活，也可能是落魄到没有任何物业财产。”澳洲媒体人士分析称。

15年前出逃的郭洁芳时年47岁，曾经是广州市交警支队队长张林生的妻子。警队内，两人一起工作，警队外，两人合作“发财”。

1994年，张林生通过郭洁芳与广东派力公司签订协议，使其成为广州市机动车教考场唯一认可的模拟驾驶培训及经营管理机构，通过占有该公司40%的股份参与“分红”，获得两套当时价值142万元的房产，港币、人民币合计200余万元。

1995年，郭洁芳联合广州交警支队另两位同事合伙成立广州市三星咨询服务中心，专门代办广州郊区摩托车车牌业务，事后三名股东各分得266万元收益。

2000年，案发后的郭洁芳抛下丈夫和儿子，逃往澳大利亚。留在国内的两起案件中的涉案人员均获得审判。郭洁芳的丈夫张林生，因受贿489万元，于2003年被广州中院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死缓，目前已坐监11年，经过两次减刑，还剩9年刑期。姐姐和儿子，会不时来探望他。

“风云人物”惨淡收场

在逃澳名单上的另外4人，赖明敏、张大伟、胡奉宪、吉东升，都曾经是各自工作领域内的风云人物。据信，他们均逃往澳大利亚，具体信息尚未被准确核实。

随着逃亡美国的开平案主犯之一余振东2004年被遣返回国服刑，另两名涉案嫌犯许超凡、许国俊相继在美被判刑，案发于2001年，曾被称为新中国开埠以来第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的“开平案”，一度被认为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然而在这一次百人名单中出现的两个人，再度掀起开平案余波。一

个是逃亡加拿大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办公室主任黄伟亮；一个是逃亡澳大利亚的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原行长赖明敏。

根据过往报道显示，1993年至2001年期间，原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3人，挪用银行公款合计4.83亿美元。现在看来，并非案情的全部。

一份2003年江门中级法院刑经初字第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开平支行的上级单位中国银行江门分行行长赖敏（赖明敏在国内的曾用名）曾要求建立分行小钱柜用于发放奖金；同年，为填补江门分行盗用联行“917”科目资金的缺口，赖敏又指使分行财会部经理余鸿斌等三人到开平支行找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商讨如何填补资金缺口。经协商，开平支行同意用美元支付540万美元填补该资金缺口。

开平市法院2004年发布的一份违法发放贷款罪案资料还显示，赖敏在任职期间，因亏空“917”科目巨额款项，为逃避稽查和通过离任审计，通过许国俊从开平支行中挪用1605万美元用来填补亏空的资金缺口。

也就是说，作为开平支行的上一级分行领导，赖敏是开平案中重要的涉案嫌疑人，涉嫌罪名包括挪用公款和贪污。

与开平案同伙在银行系统内的臭名昭著类似，逃往澳洲的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大伟则成为了电力系统开展反复宣传时的反面典型。

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是2002年由云南电网公司与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IT公司。曾获得云南省科技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主要承接的业务是云南电网公司信息化项目建设。

至少从2004年起，张大伟就已经成为该公司“一把手”，他曾获得过“2004年度全国企业信息工作优秀领导人”殊荣，在业务上，他绝对可称是高精尖人才。

而据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云南电网公司官网曾在2005年的网页上介绍称，张大伟领导的云电同方“内强素质、外树品牌”：成立3年就获得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通过了ISO9000质量认证。开发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先后被昆明煤气总公司、云南电网、海南电网等省内外企业选用，获得系统内外的一致好评，2004年圆满完成了董事会的经营目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张大伟的出逃时间是2013年9月。相比其他人，他的逃亡路线比较曲折，通缉令显示，他可能到过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地区。

虽然检察机关至今没有公开过张大伟的涉案细节，不过，今年3月起，电力系统组织下属所有企业的员工观看了一部名为《肃纪正风好扬帆——2014年反腐倡廉纪实》的教育片，该片长达一小时，是南方电网以包括张大伟在内的电力系统2014年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为题材拍摄的。

根据教育片显示，张大伟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在2007年至2013年上半年期间，以管理层发放绩效为名，擅自从账外发放现金1115.5万元；自2011年3月起至2013年5月止，向同方公司总经理配偶发放工资每月8500元，其余6名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每月5100元等。

据悉，电力系统对这次学习非常重视，不仅由纪检部门发文要求下属企业观看，还通过党支部组织集体学习研讨、对照检查、撰写心得体会等。

原四川韵律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胡奉宪，也曾经是四川商界风云人物。作为2003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百事“电话门”事件主角，胡奉宪曾因认为百事（中国）合作中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了自己的私人电话记录，侵犯了其公司的商业机密，将对方告上法庭。一度引发商界对于国际知名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潜规则的反思。

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当胡奉宪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却由中国本土企业家沦为外逃贪污嫌疑犯。

胡奉宪是在2009年11月出逃的，因涉嫌贪污犯罪，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2010年7月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据信他可能逃亡美国、澳大利亚。

现年51岁的河南籍人士吉东升的出逃，也充满波折。2001年，原河南中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代理总经理胡燕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鹤壁市中级法院被提起公诉，时任河南省中原证券郑州纬五路第一营业部经理的吉东升作为证人，在庭审中对胡燕进行了指证。

据河南媒体披露的案情细节显示，检察机关指控胡燕曾指使他人编造虚假装修工程合同，加大工程造价等，以掩盖挪用公款一事，而吉东升便是胡燕曾指使的人之一。

2002年7月，胡燕被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同年12月，牵涉案情中的吉东升出逃澳大利亚。

逃澳生活：大笔资金来路不明，钟情地产投资

外逃贪官的逃亡生活到底风光几何，一直是大陆民众关注的焦点。虽然不时有报道显示一些逃犯在国外生活落魄、东躲西藏，但是《凤凰周刊》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知情人士的采访后得知，至少在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外逃贪官，都过着相对富裕和平静的生活。

一位澳大利亚长期关注中国海外追逃的传媒界人士，首先否认了一些报道中提及的澳大利亚有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的内容。

“虽然至今还没有机构统计和公布过在澳逃亡的贪官或者裸官规模及分布情况，但是澳洲有近100万华人，所以，贪官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消失在澳洲各地庞大的华人社区中。”该人士说。

与逃亡加拿大的贪官大多生活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华人聚集区类似，在澳大利亚，华人最多的悉尼、墨尔本和珀斯，也是贪官最喜欢选择生活的城市。

藏匿在发达国家的贪官们，还有着很多共同点。

由于大部分逃亡至此的贪官，往往曾经有着较高的官职，贪腐金额较多，出逃前的准备工作也做得长期且细致。

先将子女、伴侣送到国外，同时低调地转移赃款，然后通过申请入籍或者办理假护照等方式金蝉脱壳。

举家逃亡澳大利亚的贪官，往往子女已在澳读书或工作多年，早已融入当地社交圈，所以等其来到澳洲，如果愿意抛头露面，便可以通过家人迅速融入社会；若想要低调生活，也可以很快适应国外生活。

再加上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且注重隐私保护，即使是邻居，可能也很少来往，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相邻居住十几年的两户人家，也不了解相互的身份和背景。

如何低调快速地获得身份并成功转移财产，是贪官们来到海外最关注的问题。据澳洲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在澳洲，有很多专门为华人提供帮助的律师、移民中介、会计师，甚至地下钱庄，他们对这样的事情心照不宣，也不会过多地过问钱的来源。

澳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透露："他们（贪官和家属）有很多的钱要转移，也想尽快拿到澳洲的身份。"在咨询移民政策和财产转移的时候，他们通常非常小心，不愿透露太多关于国内的信息。如果多问几个问题，就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购买物业也是贪官们最喜欢的财产转移和投资方式之一。《凤凰周刊》曾经在2014年的报道中披露了原铁道部落马高官苏顺虎之子苏冠林在澳洲生活的细节，掀开了贪官子女在海外逃匿神秘面纱的一个角。

澳洲外资审查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至2013年间，中国人总共在澳洲房地产投资近60亿澳元（约合近300亿人民币），已经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成为澳洲房地产界的第一大海外投资群体。而据瑞士信贷的研究人员估计，在未来的7年间，中国人在澳洲房地产业投资可能将达440亿澳元（约合2100亿人民币）。

随着去年，澳洲政府表态愿意与中国联合追捕逃澳贪官起，不断有贪腐人士在澳购置豪宅和多处物业的报道出现，以至于在一些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在澳中国富人的钱都是来历不明的印象。

面临相同情况的邻国新西兰官方已经有所表态。为了阻止更多来自中国的贪官移民，新西兰收紧了移民申请审查，有的品行调查甚至要耗时长达一年。曾经持排华立场的新西兰原外交部长温斯顿·皮特尔斯也表示："要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和控制，防止中国的贪腐人员都跑到新西兰来。"

高严外逃“罗生门”——百人名单之外的著名逃澳贪官

记者 / 孙杨　特约记者 / 蔡源

高严出逃至今已13年，因其子在澳洲，故一直被猜测藏身于澳洲。坊间关于这位中共外逃级别最高的贪官，有多个外逃版本，至今仍难觅真相。《凤凰周刊》查找了澳洲每一个州选民花名册、公司登记和一些房产交易的记录，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今年4月，中纪委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百人名单中，有10人被认为可能藏身澳大利亚，令澳洲成为大陆新一轮海外追逃的重点国家之一。不过，亦有一些人对名单略感意外，因为包括中共前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河南交通厅“三朝元老”童言白等在内的多位大陆坊间街知巷闻的著名逃澳贪官，均未上榜。

特别是高严，作为迄今为止中共外逃级别最高的官员，他的下落十几年来一直是个谜。除了网络流传的各种亦真亦假的往事，中澳两国官方从未有过任何追逃进展公开，也没有媒体捕捉到他出逃后的一点点蛛丝马迹。

一位中国海外反腐的长期观察人士、澳洲知名媒体华裔记者称，只要一提到中国海外追逃，澳大利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高严。不仅仅是中国民众对追缉高严高度关注，全澳洲的媒体也都很感兴趣，大家都希望能首先找到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贪官。

“但是流传的版本太多，越调查，越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无解的罗生门事件之中。”这位媒体人说。若高严还健在，现在已经73岁，留给追逃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高新元是唯一线索

最近一次高严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始于2014年10月。这时，距他出逃已经过去了12年。

2014年10月20日，澳洲多家媒体以头条新闻方式，报道了中澳两国政府将联合展开对大陆外逃贪官的追逃追赃行动。澳大利亚方面同意将在几周之内展开没收贪污官员财产的首次行动。

据澳洲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提供了一份不到

100人的外逃犯罪嫌疑人名单，作为首次行动的优先对象，高严被媒体认为非常有可能位列其中，不过澳洲警方没有对此予以确认。

但几乎同时，《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在此前的几周时间内，澳洲联邦警察曾多次前往高严之子高新元在澳洲的公司注册地——皮尔蒙特公寓大楼调查。

由于高新元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确定在中澳两国掌控之内的，与高严有联系的关键人物，所以警方此举似乎证明了媒体的猜测，不过之后，便再无最新进展被公布。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新元，曾于1996年前后首次来到澳大利亚，根据《凤凰周刊》查找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文件及当地报道，来到澳洲后的高新元在1997年和1999年，陆续开设了两家公司，分别名为Jutan Development和yutan development。同一时期，高新元同时还在国内与其父掌管的电力王国建立起了一系列有不正当利益输送的商业联系。

2002年，再度来到澳大利亚的高新元和他的生意伙伴卖掉了他们在澳洲的一块地，共计300万澳元。同年9月，其父在被调查期间逃亡海外（因儿子的原因，被猜测藏匿在澳大利亚）。

一个月之后，高新元返回大陆。据大陆媒体报道，中纪委怀疑其可能协助安排高严出逃，对其实行“双规”。高新元接受中纪委审查后，交待了很多自己的经济问题，并牵涉出众多地方电力系统官员。

2003年4月25日，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正式对高新元进行刑事拘留。2004年，武汉中级法院以行贿罪一审判处高新元有期徒刑五年。据大陆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有期徒刑，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按此推算，高新元应该在2008年4月底刑满释放。此后，高新元再未出现在公众视野。根据《澳洲金融评论》的报道，高新元在澳洲公司的生意伙伴和员工说，他们也一直未能与高新元取得联系。

《凤凰周刊》查找了澳洲每一个州选民花名册、公司登记和一些房产交易的记录，也同样没有关于这对父子的线索。

对于高严，大陆官方一直以来的唯一口径就是一个字：追！

今年3月7日大陆全国两会期间，有记者就抓捕高严问题向现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询问，李纪恒表示：高严是个腐败分子，国家正在全力以赴追捕他。当记者说“还没追到”时，他表示“那继续追！”

4月22日，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公布后，对高严追捕情况的关切之声再起。澳洲媒体报道称，中方一名官员表示，北京和澳大利亚正在寻求合作，将高严从堪培拉遣返。

特别是在百人通缉名单中，包含一位逃至美国或新西兰的原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铭，他被认为与高严关系十分密切，是其“铁杆”下属，从吉林电力公司到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均由高严一手提拔而起。

《凤凰周刊》对比两人履历发现，比高严小3岁的陈兴铭也同是吉林籍人士，他和高严曾经同在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任职，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且还同在北京相关电力部门工作过。

根据通缉令信息，2001年前后，陈兴铭利用职务之便，将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公款2700余万元，借给港商郭春生用于营利活动，后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北京市检察院立案，2002年6月，先于高严3个月出逃，目前可能藏匿在美国或新西兰。

自高严外逃后，有关他的腐败案件调查就陷入停滞，据此有媒体分析，如果可以将陈兴铭遣返回国，可能将揭开高严外逃案的一角。

身染重病，难以逍遥

实际上，13年来，中澳两国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高严，因为他的贪腐行为和外逃，给大陆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也因他而改变。

作为曾经的吉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以及后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高严既做过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曾是掌控着一个国家从发电、输电、配电到供电的所有电力资源的央企航母掌舵人。没有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逃亡海外。

所以当2002年9月高严出逃的消息在境外首先传播开之后，给电力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报道称：仅仅在股市上，外逃消息出现的一周之内，在香港上市的北京大唐发电和华能国际的股票下跌了11%，而山东国际电源下跌了 6.7%。

由于高严被推测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多国均有落脚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人知道高严具体逃到了哪里。

2002年，《悉尼先驱晨报》曾经报道称，高严可能人在澳洲。随后，《纽约时报》也据此进行了报道。不过，当时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大

使馆方面曾表示，并没有获得消息证实高严已经进入澳洲境内。

从2008年10年30日，杭州市公安局在其官网上发布的悬赏金为20万元的高严通缉令可以看到，这位“狡猾”的贪官在外逃之前，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工作。仅根据警方掌握的情报就显示，他至少拥有高庆林、张传伟等三个假名字和假身份证以及4个护照和1个港澳通行证。

“身在国外的高严可能早已更换了新的身份过起自由的生活，甚至可能整了容。”上述澳洲记者称，这会令追逃难度大大增加。“据咨询澳洲官方多部门人士得到的信息综合判断，各方面均不掌握确切信息。如果高严确实在澳洲，可能澳洲情报部门知其下落，但不对外公布。”

也有人猜测，高严在海外的生活可能并不逍遥自在。因为根据通缉令显示，这位贪官在其60岁出逃之时，即已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发病时坐、起、躺均有困难。腰椎病是一种较难治愈的疾病，现年73岁的高严，即使健在，可能也难以自由地活动了。

名单内外的外逃者

没有被列入百人名单的著名逃澳贪官中的“大老虎”代表，还有河南交通厅“三朝元老”童言白。现年58岁的童言白，在2004年出逃前，曾历任河南省高速公路局局长、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并在2001年获得“全国交通劳模”称号。

2003年，许昌至漯河高速公路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有关部门对许漯高速公路的质量问题立案调查。曾任该高速的常务副指挥长的童言白也被同时调查。

2004年1月，在被调查期间的童言白，使用非法渠道获得的护照，悄悄携赃款从深圳黄岗口岸出关，经香港、菲律宾等地，辗转逃至澳大利亚。其时，他的妻子与儿子，早已在澳大利亚落脚安定下来。童言白至今仍逍遥法外。

作为大陆坊间熟知的贪官外逃最青睐目的地之一，澳大利亚藏匿的涉贪人士不止名单中的10人，除高严和童言白之外，还有一些贪官及家属现身处澳大利亚的土地上。

一些知名外逃者为何在百人名单之外，有分析认为，可能性有多种。一则此次名单仅列百人，或只是阶段性的公布；二则名单或以震慑性为主，一些逃亡者虽未见信息披露，但实际追逃或劝返的步骤已在进行之中，暂无需列入名单。从大陆官方历次表态来看，百人名单显然远

非追逃目标的全部。

随着包括中澳联合追逃在内的大陆系列追逃行动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外逃贪官隐匿多年的信息不断被挖掘。即使像高严、童言白这样策划多年、行动缜密、多国转移的“高端”外逃贪官，落入法网亦可期待。

五、反腐风暴冲击业界

解密大陆航运业贪腐“黑洞”

记者 / 张弛

2013年11月7日，航运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发布公告，称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坐实了此前媒体关于徐因涉嫌贪腐而被双规的报道。

徐敏杰被双规带出了中远系多名公司高管落马。11月25日，坊间又传言中国第二大航运企业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团）旗下又有多名公司高管被带走接受调查。涉案人员包括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和中海油轮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运）前任总经理茅士家、中海油运生产运营部副总刘厚平，以及曾在中海集团和大新华物流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大新华物流）担任过高管的贾鸿祥。

12月初，大陆媒体报道称，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运）上海公司副总经理陈复江也被带走调查。尽管公司方面称陈只是协助调查，并没有被公安机关批捕，但外界仍猜测其涉及经济问题。

中海集团旗下公司这一连串人事变故前，中海集团董事长李绍德因年龄原因申请辞职。无独有偶，执掌中远集团长达15年的老船长魏家福，也于去年7月因年龄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

短短一个月内，中国两大航运企业巨变迭起。联想到2011年以来，中远旗下青岛、大连、广州等五大分公司均曝出腐败丑闻，在连年巨亏阴影下靠甩卖资产勉强维持的国有航运业，极有可能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集体沦陷。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对内地航运业因高管问题而引发的持续震荡，航运界一位资深人士表示并不意外。他说，虽然航运业整体巨亏，但并不表示个人就无利可图。

据这位资深人士透露，航运业涉及运价制定、船舶购买与租赁、码头收购等诸多业务，本身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而特大型央企运行相对封闭，其领导人的职务与官职挂钩，一些高管调动与支配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外界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随着涉腐调查的深入，内地航运业各业务环节的贪腐“黑洞”，或将大白于天下。

甩卖资产弥补连年巨亏

以2008年为界，中国航运业堪称大起大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全球航运业长达10年的繁荣，遭此重创，中国航运业至今未能恢复景气，整体仍处低谷运行。

身处其中的航业巨头也难以自拔。然而让人费解的是，目前很多国外同业已经出现转机，重回盈利轨道，中国的航运巨头们却还在叫苦连天，为弥补亏损而疯狂甩卖资产。一边是连年的巨额亏损，一边是持续发酵的贪腐丑闻，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令外界猜测纷纷。

“仅仅两年就搞出200亿的巨额亏损，如果都归咎于外部环境与经营不善，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国内一家航运公司的管理人员认为，航运企业亏损虽然与行业景气周期有直接关系，但航运界腐败案件频发，必然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

两年巨亏200亿元，创造这一惊人“业绩”的就是被媒体称为“A股亏损王”的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远洋）。这还不算在2007年上市，其股价从巅峰时期的68.4元一路狂跌至现在不足4元、几年时间内蒸发的数以千亿元计的市值。

根据中国远洋2011、2012年报数据，2011年中国远洋净利润亏损104.5亿元；2012年又亏损95.59亿元，成为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ST”股票；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远洋实现营业收入46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0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额达58亿元；全年能否扭亏为盈，仍有待审计确认。

这个成绩还是中国远洋变卖了100亿元优质资产换来的结果。2013年3月，中国远洋向大股东中远集团出售中远物流100%股权，获得了67亿元；5月，中国远洋子公司中远太平洋向中远集团子公司中远(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了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及相关股东贷款，获得税前收入29亿元。

过去三年，中国远洋A股股价的跌幅分别为49.73%、5.77%、31.52%，2013年底前如果不能扭亏，将被暂停上市，继而有可能成为第一家退市的大型央企上市公司。而同期中远的国际、国内同行，主营业务均没有亏得这么惨烈。

为避免退市，中国远洋唯有继续变卖资产。2013年8月31日，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出售青岛远洋的子公司青岛远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81%的股权和中远集运子公司上海天宏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81%的股权。这两笔资产的出售于11月底完成，中国远洋从本次交易中获利36.78亿元，将计入2013年年度报表。

2013年3月以来，中国远洋对中远物流、中远太平洋股权的出售，均由母公司中远集团埋单。为避免上市公司被摘牌，中海集团同样对旗下公司进行资产腾挪。2013年11月初，中海集运旗下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将其持有的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55%的股权，作价7.5625亿元转让给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和PSA（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公司）。此外，根据2013年6月中海集运发布的股权转让公告，中海集运还计划向中海集团转让中海码头100%股权，此举预计可为中海集运带来约8.7亿元人民币的税前利润。

但对于母公司而言，这一出一进绝非从左口袋倒腾到右口袋那样简单。“为扮靓业绩进行资本运营，尽管没有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在客观上会助长新一轮圈地式的投资冲动，留下新一轮战略布局失误的伏笔。”一位国企监管层人士称，交易中的战略随意性使得被倒腾的资产是否盈利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层面无暇问责。

祸起高租金合约

在中国远洋旷日持久的亏损中，干散货船（用以装载无包装的大宗货物的船舶，专用于运送煤炭、矿砂、谷物、化肥、水泥、钢铁等散装物资）的高额租金是重要原因。年报显示，在中国远洋2011年104.5亿元的巨额亏损中，近半损失来自2007年和2008年签订的高额租金船合同。

当时正值航运业的巅峰时期，干散货船的日租金一度高达8万美元，2008年6月，好望角型船（干散货船的一种，也叫海岬型船）更攀至20万美元的极端高点，而中国远洋正是在这个时候，签订了200多条干散货船的长期租约。没想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干散货船日租金一路狂跌至1万美元，无货可运和高额租金的双重压力立刻袭来。

中国远洋当时签下天量高租金合约，是否出于对形势的误判？有航运公司高管认为，事情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当时中国远洋有很强的投机心理，希望低价租船再高价转租给其他公司，在中间赚取差价。”他表示，这完全是小船队的做法，“这么大的企业，不好好经营主业却去炒船，不赔才怪。”

“用经营小企业的思路管理央企，是会出问题的。”据交通运输部主管水运业务的一位官员回忆，当时不少业界专家、同业人士曾就此向中远集团高层建言，提醒高额长期租约可能产生的风险。遗憾的是，他们均未能说服公司当时的决策管理层。

一位匿名航运业界人士证实，当时中国远洋船舶数量的增加与其运力并不匹配，公司一度希望通过中远集团旗下中远散货运输（集团）公司和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将租入的船再转租出去，以获得租金差价。但这种投机冲动很快随着国际航运市场的逆转而落空，不但高额利差化成泡影，还给中国远洋留下了一支臃肿的船队。

事实上，早在2009年录得75亿元亏损时，外界就指出，中国远洋是吞下了自己疯狂扩张的苦果。2009年前，航运形势一直不错，中国远洋赚得盆满钵满，2008年一年就赚了108亿元，因而船队规模扩张也比较快。当年4月，金融危机已经露出苗头，中国远洋还宣布耗资23亿美元订造25艘新船，为集团增加10.68万标准箱运力和211.3万载重吨运力。“现在看来，当初仅仅是投机冲动还是另有隐情，值得关注。”

盲目扩张让中国远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除了巨额的折旧费用，这支庞大船队的维护保养，亦成为中国远洋的额外负累。据业内人士透露，无论新船、旧船，每年都有一次常规的维护性保养，3年还需大修一次，仅“船舶大型设备的检验、更换、加固，一次就要几百万”。

相比之下，其他航运公司没有像中国远洋这般损失惨重。比如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航运（总部设在丹麦哥本哈根），作为世界航运界的老大，体量较中远更为庞大，但该公司早在2007年底2008年初就着手压缩管理层级，对集团的组织架构、远洋航线、运输价格和产品进行调整，甚至推出了“天天马士基”（承诺在亚欧航线上每天定时截关/截港，运输时间延期可获赔偿）这种极具颠覆概念的服务理念，得以减小景气周期带来的冲击。2013年，马士基航运扭亏为盈，重回盈利轨道。

2011年，国际航运形势持续低迷，全年平均BDI指数（波罗的海航运指数，反映全球航运业景气情况）跌至1459点，此时中国远洋手中持有的订单仅能满足船队的一半运力，而同期燃油价格却大幅攀升。中国远洋终于不堪高额租金负累，企图采取拖欠船租的极端方式，将船东重新拉回到谈判桌。这不但激怒了许多同行，也令中远集团在业界信誉扫地。当年7月开始，中国远洋陆续有3艘货船被扣押在港口。

虽然扣船风波最终以和解告终，但带给中远集团的影响却没有就此消失。“其实正是因为高租金船问题，才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继而

开始调查。”一位航运业业内人士称，高租金船问题揭开了中远集团内控管理混乱的冰山一角，先后有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宋军、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大连远洋）原总经理孟庆林等人涉案被查，及至2013年11月中远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落马。

最早败露的是宋军。他于2011年被控涉嫌贪污、受贿等多项罪名，涉及37套房产及700多万美元的非法所得。据内地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10月-2008年6月间，宋军与某航运公司老板“共同投资合作买卖、租赁”了3艘船舶，获投资款、租金差、卖船利润以及保证金、佣金共计1180多万美元，私自存放在其提供的银行账户中。2007年4月-9月间，宋军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转移，将该账户中的606.5万美元兑换成4620.24万元人民币，转入其指定账户。

租船中介“潜规则”

2013年7月12日，大连远洋原总经理孟庆林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大连远洋是中远集团下属二级公司，专营石油运输，是中远唯一以液体散货运输为主的专业化运输公司。大连远洋虽然不在中远集团的上市公司资产中，但也处于亏损状态。

颇具戏剧性的是，孟庆林一开始并不是直接调查对象，他最终浮出水面，系受其女婿牵连所致。有关部门最初调查的，是中远旗下一家名为大连远昌船务有限公司的三级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高福生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违规签下数艘高租金散货船合同，开展相关业务非法获利，经人举报被带走调查。而在调查过程中，有关部门发现这家公司与孟庆林女婿名下的公司有违规交易。

孟庆林是中远的资深员工，在集团内部属于中层管理人员，2013年1月在大连远洋调整领导班子时正式卸任，并且获得了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总经理马泽华等高层领导对其任内业绩的肯定。然而据大陆财经媒体报道，他在退休前就已经注册了自己的私营公司，依靠在大连远洋的关系获取业务，收益不菲。与其进行违规交易的大连远昌公司负责人高福生，此前并不是中远的员工，而是孟庆林的铁哥们儿，凭借孟庆林的斡旋才当上了远昌公司的总经理。

牵出孟庆林涉嫌违规交易的公司，就是依托大型国有航运公司的垄断地位，通过船舶租赁来获利的私人中介。这类中介公司一般可以赚取两部分利润：租金差价和中介费用。

船舶租金按日报价，随时波动。以常见的干散货船为例，日租金可以在1万美元至10万美元之间波动，在航运市场景气的时候，用船公司

对于这种波动并不敏感，即便中介公司报价高于市场价几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也不会影响交易的达成。

据一位航运界人士透露，远洋运输国际化程度很高，运价的市场化程度也很高。如果不想搞利益，对方会根据市场价格跟你谈，如果想搞利益，对方就会配合你，一般是通过第三方公司，但你要给对方利益分享。

该人士举例说，比如一个五年期的期租合同，本来日租金是2万美元，如果想做成2.5万美元，当事人不会直接跟船公司签约，而是先找第三方租船公司，香港、新加坡或者伦敦，随便找一家租船公司，先跟租船公司签约2.5万美元，租船公司再与船公司签约，这样每天5000美元的差价就出来了。

“本来是双方交易，现在搞出个第三方，肯定就会有价格的让渡在里边。”他说，“航运企业这方面业务的负责人，加上业务员，往往一两个人就能决定租价。如果租期比较长，比如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差价带来的利益很惊人。”

至于中介费用，业内也有定例，一般可占到租船合约总额的1.25%。如果承租人和出租人双方各有一家中介公司，则每家各拿1.25%，这样一份合同签下来，中介公司获利少则几十万美元，多则上千万美元。在这样的“潜规则”下，很多航运公司的业务员，都会在交易时有意多安排一家中介公司。“除非是傻子才不想赚这笔钱。”一位航运界人士称。

这类租船腐败案操作起来很简单，一般都是在看似合理的业务中掺杂私人利益，是行业众所周知的“黑洞”。而大型航运企业的在职人员在外开设私营公司，或者退休后进入民营航运企业，很多都会存在类似的“关联交易”。

这种交易，外部操作一般不会有问题，唯一的障碍就是企业内部的控制管理。如果航运企业内控严格，操作空间就要小一些，比如对主管部门负责人有一定的授权限制，但有的航运公司内控较差，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的，就很容易操作。

由于租赁价格与股票一样，时刻都在变动，而业务员每天都要确认大量的天价合同，虽然合同上可能有些需要企业法人代表签字，但大部分都会授权给公司航运部门的负责人。如果业务部门领导与业务员串通造假，便能很容易蒙混过关。

前述航运业界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大型航运公司内部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经济利益，已经形成团体化运作的腐败窝案，因为其“牵涉不同环节，独立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但截至目前，此轮反腐尚不确定会涉及航运界哪些人士。

关联交易成行业“黑洞”

“不仅仅是租船，凡牵涉成本控制的企业都会有这个问题。船的理赔保险、修船、定备件、加油、雇佣船员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寻租空间。”据前述航运界人士观察，这些“寄生”于大型航运企业的私营公司，几乎遍布与航运公司业务有关的各个领域。比如大型航运企业航运部控制业务的人，即可以注册一家从事同样业务的公司，通过“转移业务”完成利益输送。

再比如货运价格，国内运价一船在200万美元左右，国际运价一船可能高达900万美元，暗箱操作空间巨大，又没有严密的监管系统，有些甚至不进行招投标，全凭个人说了算。多位业内人士猜测，曾在中海集团任职的大新华物流前董事长贾鸿祥东窗事发，可能与此有关。

2013年9月，大新华物流的母公司海航集团在处理与江苏沙钢集团旗下航运公司沙钢船务的债务纠纷时曾表示，2008年大新华物流与沙钢船务签署的租金价格高达每日5.25万美元，高于市场日租金7000-8000美元。当时航运风险已经引起业内的广泛注意，贾鸿祥还签下长达7年的高价租船合同，很是反常。

贾鸿祥船长出身，在航运业有近40年的从业经验，1997年起历任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等职务。2007年开始担任大新华物流副董事长兼总裁，后又担任董事长。

贾鸿祥执掌大新华物流后，从中海系统挖走一批员工，以至于大新华物流被业内戏称为“小中海”。贾在任内接连收购天津海运、烟台海运和山东海丰，一时间风光无限。大新华物流终因扩张过快而自酿苦果，时至今日，不得不向香港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2011年年底，因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并产生大量法律纠纷，海航集团曾对贾鸿祥等21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做出行政处罚，贾鸿祥受到了记大过及降级的处分，从此淡出大新华物流。

与贾鸿祥同时落马的茅士家，曾历任中海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海发展）

总经理和中海油轮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中海油运）总经理，2011年退休。去年11月接受调查时，其身份是大连瑞海石油化工品船舶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开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茅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营范围是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化学品船运输等领域，这与其此前在中海集团管理的业务领域基本相同。

中海油运是中海发展的子公司，管理着中海集团旗下70多艘油轮。据大陆媒体报道，茅士家曾主管油运业务，他的儿子、儿媳在外注册了一家公司，利用中海油运的关系倒油，捞取巨额暴利。但茅士家究竟因何被调查，目前尚没有明确说法。

茅士家出生在上海崇明县，自小对大海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1978年，茅士家作为中国第一批外派海员登陆台湾，曾轰动两岸。据茅士家回忆，他专门去南京路定做了一套花呢厚西服，为自己能够代表“中国人的形象”而深感自豪。据大陆财经媒体报道，茅士家在业务能力上口碑不错，在来到中海之前，他曾在招商集团旗下的招商油轮任职，招商油轮拥有中国最大的油轮船队。

刘厚平涉案也与茅士家事发有关。他在茅士家主管中海油运时任航运部的负责人，主要职责是调度、租船和揽货等业务。

在中海旗下以上诸人被带走后，很快便曝出“中海集运上海公司副总经理陈复江因经济问题被批捕”的传闻，有业内人士推测，陈很可能是被内部员工举报。尽管该传闻很快遭辟谣澄清，但有接近中海高层的人士向媒体证实，陈“短时间内无法继续原来的工作”。

中海集运的经营范围涉及集装箱运输、船舶租赁、揽货订舱、运输报关、仓储、集装箱制造、销售等领域。陈复江此前是中海集运上海公司排名第二的副总经理，具体分管欧洲及亚太地区航线业务，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其工作暂由其他领导负责。

码头布局或涉内幕交易

与以上因关联交易而落马的诸位高管不同，中远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接受调查，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具体经营业务中的腐败行业，但涉及更多的，可能还是码头收购与布局等大宗投资中的内幕交易。

内地有媒体报道称，徐敏杰涉及货运代理和高租金船案件，或与魏家福女儿有关。但中远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虽然一些情况他不宜透露，但可以肯定“目前媒体的报道均属猜测，与事实相距甚远”。

徐敏杰是迄今中远系涉案高管中职位最高的，被大陆媒体视为魏家福贴身“智囊”。徐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青岛远洋船员学院船舶驾驶专业，1980年进入中远集团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一度是中远集团半军事化管理体制下内部提拔的典型。

在中远集团早年一份内部刊物上，曾刊发文章，称赞徐敏杰“有一种求知若渴、永不满足的劲头”。文中还提到，徐极力推崇的一句话是“或许我们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我们必须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灵”。

截至被带走接受调查，徐敏杰已在中远工作了33年。在业界看来，徐早年曾有过远洋船的经历，“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是一个极稳妥的人，经验丰富、管理能力突出。在下属眼里，徐客气能干；中远集团官网则称其“拥有30多年航运业经验和丰富的国际货运、码头、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这个评价并不夸张。本世纪初期，徐敏杰执掌中远集团旗下上海中远国际货运，期间获评为中远集团劳动模范；主政中远太平洋以后，他也一度被认为在码头业务上十分进取。但是，中国远洋的连年亏损，让徐早年的辉煌沦为过眼烟云，并促使其经济问题浮出水面。

“从2011年开始徐就受到举报，前后大概有三次之多。”据中远集团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中国远洋2010年亏损104.49亿元，当年徐敏杰的年薪高达490.06万元，2009年和2008年的薪酬更是高达519.42万元和513.37万元。

大陆财经媒体报道称，徐是出差途中在南方某机场被有关部门带走的。关联交易腐败多集中在运输业务上，徐在集团总部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主要负责安全生产工作，没有涉及具体经营业务。前述内部人士猜测，“他出事可能是在中远太平洋任职期间。”

在中远集团旗下，中远太平洋主要负责集装箱码头的管理和经营，以及集装箱制造、管理、经营和租赁等业务，在香港业务做得很大，相比中远系其他公司更加灵活，而且早在1994年，公司就已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从2007年1月起，徐敏杰开始担任中远太平洋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一职，而2007-2011年，恰好是该公司大举布局码头建设、开展集装箱租赁业务的时期。在此期间，徐敏杰主导了大量的码头投资收购、集装箱租赁管理工作，包括对希腊比雷埃夫斯基港的收购。

收购并接管比雷埃夫斯基港，使得中远集团在地中海有了一个支撑点。这对于当时正谋求国际化扩张的中远集团是一项重要举措，被视为中远海外并购的经典案例，魏家福亦曾因此获得希腊政府颁发的勋章。

比雷埃夫斯基港给中远太平洋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可观。2010年，中远太平洋的净利润同比大增109.42%，在诸多业务当中，码头业务增幅最大，达到63.5%。这其中，比雷埃夫斯基码头的营业收入从上一年的2316万美元激增到8330万美元，占公司当年所有码头业务收入的42.6%。

徐敏杰执掌中远太平洋的4年间，也是中远太平洋在码头业务上扩张最快的4年。仅2010年，徐敏杰就在国内连续布局了海南、福州、江都三个码头项目，投入总计48亿—65亿元。财务数据显示，中远太平洋在2007年时固定资产只有14.74亿元，2012年年底已经增长到37.18亿元，5年时间增长了152%。

数据显示，徐敏杰在位期间，中远太平洋经营管理着20个港口和25家码头公司，由于不断收购和新建码头，最终出现码头严重过剩。多位航运界业内人士据此猜测，不排除徐敏杰在码头港口的收购、投资当中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在中远集团内，并购集装箱码头是大宗投资支出，所涉资金数额巨大，很容易成为腐败的土壤。”一位航运界人士称。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运作位于江苏扬州的江都码头项目时，时任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亲自会见徐敏杰，表示希望继续加深港口物流业务的合作。在徐敏杰接受调查前，已经调任南京市市长的季建业，于2013年10月17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在国内港口布局中，各地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使得港口布局有了内幕交易的可能。据中国远洋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早在2012年年底，徐敏杰就曾被带去问话，此次再度被调查，不排除此案还会继续延伸。

当然也不排除徐在集装箱租赁业务上涉腐的可能。有业内人士称，徐在中远太平洋任职期间，租赁的集装箱数量大大增加，而在租入、租出、出售和回购等多个环节，均存在价格操作的空间。

内部管理失控隐忧

徐敏杰事发后，内地有传言称中远“前董事长魏家福已被有关部门限制离境”。该说法虽获中国远洋在其官网正式澄清，但这位已卸任多时的“中国船长”，于2013年11月16日辞去招商银行副董事长一职。

2013年7月1日，魏家福因年龄原因正式卸任中远集团董事长职务，时年63岁。当年11月，与魏同龄的中海集团董事长李绍德也因年龄原因请辞。两人在争议中同时谢幕，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隐退的真正原因只是因为年龄。

中海集团相关人员出事，有一种说法称可能是李绍德离任审计时发现的。“航运业成为此次反腐的重点领域，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势必牵连出更多的人和事。”一位知情人士分析称，这两个特大型航运央企系列贪腐案件的影响，也许不亚于中石油腐败窝案。

作为航运业首屈一指的大型央企，中远和中海似乎从未担心过资金方面的问题。与一些外资或民营企业相比，他们能轻易得到国家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比如为收购船队，可以通过定向增发股票轻松募集巨额资金。

但在国际航运市场上，没有中国政府的庇护，央企的光环完全失效，中国远洋很难与同业比肩竞争，亦不具航运“话语权”。航运业界人士认为，中远、中海之所以陷入目前困境难以自拔，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如果真的想抓，航运领域的寻租现象不能说完全杜绝，但起码80%-90%是可以控制的。”

内控混乱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在中国远洋的一些租船条约中，根本没有“随行就市”的避险条款。与中远多次打交道的希腊著名船东乔治·伊科诺莫(George Economou)认为，未能在合同中对冲租金变化风险，说明中国远洋缺乏处理长期国际租船合同的经验。

2008年，中国远洋和其旗下公司Dryships签署船舶租赁合同时，根本没有对冲风险的条款。双方签署合同时，最大的好望角型货船5年期合同的租船费率是8万美元/天，而2011年8月，短期现货市场上好望角型货轮租船费率降到每天1.8万美元。市场突变，费率纠纷在所难免，中远要么违约，要么巨亏。

中国远洋连续三年巨亏，迄今无人对此负责，也说明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基本失效。安邦咨询的分析师认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通病之一是，企业管理层专注于搞政治，一心只想把业务做大，往往忽视企业运营中的风险。“如果要追责，中远的管理层固然难辞其咎，中国国企的经营管理体制也应反思与改革。”

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在1998年执掌中远以后，曾开创中远集团长达10年的黄金发展期，10年间创造利润超过1000亿元。有人将中远这一成就归功于魏家福的“国际化视野、清晰的发展战略”。2013年4月，

魏在中远连年巨亏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向利益受损的中远股民道歉；但他同时表示，政府认可中远集团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中远，我就足够了。”

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海集团以前，李绍德一直在上海海运局工作。2006年接任中海集团董事长后，与魏家福高调张扬的风格不同，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甚至一度缺席中海集运与中海发展的股东大会。这种过分低调的风格，曾招致集团内部对其“从不关心公司股价”的批评，也被股民怒斥“董事长玩失踪”。

在经历多年亏损后，国内航运企业联合向交通运输部提交了一系列旨在缓解经营压力的政策建议，包括：适度缩短现有船只的淘汰年限，以解决当前运力过剩问题；通过协商处理货主自有船队运力资源，来解决货主办船队现象；以及取消海洋清污费、降低相关税负等措施。

航运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将船舶报废年限由30年缩短至15年，明摆着是向政府要补贴，掏纳税人腰包；协商解决货主自办船队，是只许“长子”吃肉，不许别人喝粥；取消海洋清污费，实质是要牺牲环境，用国民健康与生命埋单；而降低相关税负，怎么不提管理层降薪、缩减管理经费？

“求救于政府的中远，首先应检讨自己的差距。”前述航运业界人士批评称，希腊经济连续五年衰退，国家财政处于破产边缘，本国进出口货运量微不足道，希腊船队仍能全球买船，保持了运力的逆势增长；相比之下，中国位于世界前列的进出口贸易量给中远提供了稳定的客户源，然而却未能挽救中国远洋持续亏损的颓势。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大陆电商反腐风暴升级

记者 / 曹蓓

把传统零售业搬上互联网的那一刻，电商就不可避免地种下了内部腐败的种子。基于互联网的海量特质和急速扩张趋势，如今，各大电商巨头已不得不下重手反腐“治病”，大陆电商内部反腐的风暴正在从基层向高层延烧。

近日，前腾讯高管、现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春宁因在腾讯任职期间涉嫌群体性腐败，遭腾讯举报，并被警方带走。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向全体员工发送的邮件中曾表示，尽管多年来一直不断强调高压线，“但还是有同事明目张胆触犯，严重的甚至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不仅是腾讯，在高压反腐的社会大环境下，大陆互联网和电商领域巨头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均在严查内部腐败，并有从基层向高管延烧之势。

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大陆各大电商内部腐败竟无一幸免，且其内部腐败的环节、形式与商超零售等传统行业颇为类似，这大大出乎公众意料。

腐败遍及电商巨头

黄飞（化名）没想到，以前跟他同在一个部门做运营的同事，刚刚被警察带走了。虽然对于他和他的同事来讲，这样的场景已经出现过，但是被带走的人曾经就在身边，还是让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的同事被警察带走，原因是涉嫌腐败。在京东，内控合规部不定期会在后台发布“近期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例”，还会组织学习。每到这时候他都会暗自庆幸自己的坦荡，“那些拿了钱还没被发现的人，应该很难坐住吧。”他总这样想。

黄飞在京东的采销部门做第三方运营，负责跟商家联络，选品、数据指导、活动提报等。跟几乎所有的电商一样，客户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运营部门手中，因此是腐败的“高发地”。

比如，一个秒杀的坑位（位置），平时每期成交几百单。但在“6.18大促”时，成交量会多达几万单。类似于这样好的坑位给谁？原则上来讲，取决于商品的性价比和商家活动的力度，但实际上，虽然已经有一系列的量化标准，其中还有人为的操纵空间。所以，运营时常会被商家“公关”，用钱来获取这些平台资源的倾斜。

“诱惑很大，因为只要点点鼠标，就能有几千甚至几万的收入。”黄飞说，“但是要看怎么想，收了钱整天担惊受怕的日子我过不来。”

腐败当然不只在第三方运营、采销这样的一线岗位。跟传统产业一样，在多家互联网、电商龙头企业，内部腐败已经开始蔓延至多个角落，包括高层。

针对运营环节的腐败问题，各大电商尽管早已采取技术手段加以防范，但这并不能杜绝内部腐败的发生。

电商平台会对内部流量进行监测，每次活动，每一个坑位（位置）的转化率、流量、访客数、跳失率、流量（UV）价值，都会有数据，经常参加活动的商家会通过自己店铺的数据监测，结合每次活动的坑位，总结出各个坑位的价值差别。

比如，一个商家不做活动时，每个月卖出30件衣服，但如果上了活动，又争取到好的位置，可能交易量会上万。这种情况下，拿出几万块钱送给运营，或者运营部门主管，后期再定期维护，对于商家来说，完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当然除了自愿行贿以外，有不少商家是被索贿。一位知情人士曾对媒体透露，对于运营而言，能动谁，心中自有一本账。行业内大牌是用来拉动客源或点击率的，他们不敢动，也动不了。小卖家，产品开发、质量跟不上，即便把推广资源给他们，也仅是昙花一现。于是，那些利润高，又有一定影响力的中等规模企业往往成为目标：既能帮采购完成销售指标，又有利可图。

“公司现在把控的比较严，很多制度上的规定，但是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其中包括部门的负责人。”黄飞说。

2013年，京东曝出其称为最轰动的腐败案。与黄飞所在的第三方运营部门不同，涉案的周某是京东自营部分采销部门的经理，这也是被京东监察部负责人江卫华称为“腐败重灾区”的部门。那年，周某29岁，已是负责IT部门的采销经理。彼时他的部门做笔记本电脑的活动，附送散热器。散热器的采购价格是20多元，他跟供应商联合起来虚高价格，最终的进价为57元。据江卫华介绍，周某本是京东重点培养的员工，年轻、有能力，却最终因为贪婪获得了5年5个月的刑期。

身处新兴行业的电商和互联网企业，正在面临着他们业务飙涨后的腐败上升期。

最早闯入公众视野的电商腐败，是2012年的淘宝。彼时，淘宝“小二”利用资源帮店铺参加促销、刷信用的消息频出，加上当年3月曝出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受贿，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的腐败瞬时被拉到聚光灯下，让当时风头正盛的阿里巴巴饱受困扰。

“初创时期，阿里很小，员工很少，只要最初的创业者们有共同的信念，很容易做到内部反腐。但阿里确实发展得非常快，管理者们面对的局面不断变大，变复杂，而且由于阿里创建的电商平台能为大量商家带来利益，也使得谋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阿里巴巴廉正部负责人子周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

虽然经历不尽相同，但同样身处互联网急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大电商和互联网企业在迅速壮大的过程中，其内部到处流动着巨大的商机，这几乎是它们面临的普遍境遇，这是很多传统产业不曾经历过的事情。当然，极具互联网特色的腐败形态中还有一个原因，便是队伍的年轻化。

黄飞今年31岁，但在他的部门，几乎是年纪最大的员工。与他的主管同级别的人，也不乏85后的身影。

来京东之前，监察部负责人江卫华在沃尔玛集团做类似于廉正部的资产保护部工作15年，谈到电商腐败的特点，他首先说出的是员工年龄这个因素。“像我这样的人，在京东已经算年纪很大了。”

在多个因素的催生下，内部腐败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至整个行业。比如近期曝出的“百度三名总监正在接受调查，起因涉腐败事件”，又如前文提到的刘春宁涉嫌的腾讯在线视频员工涉嫌贪贿案件等等。

内部反腐升级

在外人看来互不相让的百度、阿里、腾讯，实际上每年都会有一次从财务到内审还有反腐部门的聚会，三家轮流坐庄，互相交流。

2010年阿里成立了廉正部，专门负责打击腐败等严重违规的部门。期间南上北下，走访了多个传统企业取经。最先到岗的是一位财务人员，第二位是律师，第三位就是阿里的合伙人之一、人力资源与廉正部副总裁蒋芳。

在今年6月18日，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成立仪式上，蒋芳向《凤凰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最初廉正部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四个人，马云当时说，“你们需要12个人。”可当廉正部有10个人的时候，他又对

蒋芳说需要40人。至今蒋芳仍无法理解马云是如何计算出具体的人数。“但后来我想，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两百人甚至更多的团队去时候调查内部的舞弊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证明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去防范各种职务违规。在反腐问题上，人力投入不是最重要的。”

在互联网企业和电商的反腐队伍中，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曾在公安、检察、工商部门工作的人员，以及财务、法务、技术等专业人员组成，数量大概在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从目前来看，获取腐败信息的渠道都是靠举报。

一家大型电商反腐部门的负责人向本刊透露，曾有一个供应商，长期被采购人员索贿，无形当中推高了企业成本。几次后，他决定举报。用匿名信的形式，发送到电商内部的举报邮箱。“破案后，这个供应商找到我，说当时打算举报时特别犹豫，不举报实在无力承担，但举报就意味着此前送的钱打了水漂。”

根据公开材料，百度内部，由百度职业道德建设部负责规范员工行为、强化价值观建设等工作，该部门具有高度独立性，在进行腐败案件调查时，不必经过相关业务部门领导即可直接展开调查，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工作。

阿里的廉正部门则主要承担预防教育和调查的工作，最终以书面的形式向相关主管部门领导呈现，而后续对员工行为的判断和处分，则需要相关的主管部门领导负责。“如果调查和判断、处罚集于一身，一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二来廉正部本身也需要被监督。”蒋芳笑着说。

腾讯内部的反腐部门较为神秘，但从此次曝出的刘春宁案件，腾讯的内部反腐力度可见一斑。在腾讯内部，对“收受贿赂或回扣的行为、从事与公司有商业竞争的行为、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或关联交易的行为、违法乱纪行为”等都有严格要求，形成公司人人皆知的高压线。违者轻则解除劳动关系，重则由公司向司法机关举报。

而在京东，则公开强调对腐败“零容忍”。内控合规部负责内部监察和审计，监察主要是指针对个别问题预防和调查，审计则从业务的角度对局部问题进行全面核查。内控合规部的人员除了来自经侦、警队和传统行业的反贪人员以外，还有内部对此项工作有兴趣的人员进行培养，甚至包括此前做过采销的人员后来学习主要针对采销的反腐。

经过几年的反腐历练，互联网企业和电商在反腐道路上的方向开始发生改变，基本上都从后查转为预防。

在阿里、万科等发起的反舞弊联盟中，包括腾讯与百度在内的多家企业，均表示愿意加入，之所以目前还不是成员，是因为还有内部程序要走。

“阿里是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所以利用大数据来搭建内部反腐体系，把日常工作中的异样，也就是不合规操作抽样出来，变成产品，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我们正在着手搭建的整个运营体系，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只要出现异样操作的痕迹，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把反腐越来越向前线靠拢。”蒋芳说。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阿里的内部腐败主要集中在淘宝“小二”这样的人力密集型部门，依靠大数据建立的技术防腐机制，其效果尚难预料。

能否杜绝腐败？

各大电商和互联网巨头内部反腐升级，让舆论惊呼腐败遍已及业内。但在各大电商和互联网企业自己看来，其内部腐败并没有外界描述的那么恐怖。

“阿里的内部腐败问题并不比其他公司严重，但阿里反腐引发的关注一定比其他公司更多。”阿里巴巴集团廉正合规部负责人子周对《凤凰周刊》表示。按照子周分析，一方面是因为阿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主动披露让反腐暴露在阳光下。因此，并不是阿里的反腐动作越多，引发的关注越多，就意味着阿里腐败问题越严重。

京东的反腐部门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过去，京东集团内部对于反贪腐的态度十分强硬，但是基本不对外宣传，所以公众所知不多；此后加大了对内外的宣传力度，目的仅仅是希望借此提醒、警示广大员工，但并不意味着京东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江卫华称。

但不断加大的反腐力度仍不能避免频繁腐败案，背后的原因却不得不让人深思。

一位业内人士发文指出，不管是阿里、腾讯、百度还是京东，都在各自行业形成不不同程度的垄断，如腾讯与阿里，在游戏与电商上几乎是处于垄断的位置，工作人员权力相当之大，这些拿着工资的人员，手中却有着决定别人产品生死的大权。在产品过剩的现在，不管是游戏还是服装鞋帽等等，都处于饱和状态，几乎谁获得流量，谁就可以生存，而这些权力就掌握在这些企业的某些工作人员中。

江卫华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京东的反腐主要针对采购，而很多细小的违规，如果要全不顾忌到，确实也不现实。这也隐约透露出这类企业在面对腐败暗流时的无奈。

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并不仅仅如此。阿里巴巴集团前首席风险官邵晓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公司和社会是紧密相通的，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也会影响公司的管理”。

吏治风暴冲击景德镇瓷业生态

记者 / 张蕾（发自江西景德镇）

从2013年年底开始，许多标着大师名号的陶瓷艺术品价格大多“腰斩”。

但一些具有艺术水准的作品价格依然不会下跌。

景德镇高端陶瓷艺术品市场萧条正在持续。

根据市场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市场的拍卖成交2500件，成交总额为150亿元，一年之后,拍卖成交量为3500余件，成交总额仅为5亿元。而到2014年，国内各大拍行每一场拍卖的成交额均下降了30%到40%，

拍卖价格的大幅下跌，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市场重新整合的结果——景德镇高端陶瓷艺术品市场经历10年畸形发展后，在反腐契机下，正在回归市场的本来面目。

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和官场的亲密关系已被大陆舆论诟病多时，在曾任江西省省委书记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苏荣和夫人于丽芳被查处后，艺术陶瓷在官场充当 “雅贿”之名已多次经媒体曝光。随着中国政府反腐深入，高端艺术陶瓷的拍卖价格与成交额结束了十多年的陡峭上涨，在2013年呈现断崖式下跌。与之相对应的是，从2012年1月至2015年4月，江西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755件5549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23件4259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32件1290人，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案290人，厅级干部32人。其中，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景德镇陶瓷学院原党委书记冯林华，落马时都拥有艺术陶瓷领域“大师”的称号。

任山（化名）在景德镇收藏行业多年，对景德镇的艺术陶瓷生态有更为直观的观察和认识。在他看来，“大师”称号曾受到无度追捧：“一些香港、台湾以及内地的土豪买家，到店里就问，这是不是大师的作品？”

任山经营的瓷器店往年接待过不少政府的官员——有想要升职向喜欢瓷器的上级示好；也接待过部队的军人——有求于上级来挑选礼品；也有一些政府部门公款采购批量的“大师瓷”，来用于维护关系。任山记得最近的一次接待“送礼”的客人是在去年年底，一位中年客户称，他的侄子参加工作不久，想当科级干部，获知领导喜欢瓷器。但是领导告诉他，“除了‘王张李戴’的作品，别的就不要给我了”。王张李戴是景德镇四

位颇有声望的陶瓷艺术大师的合称，买一个他们的作品，大概需要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这位客人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

这种情况在今年几近绝迹，多位从事高端艺术陶瓷生意的商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以往每个月总能有几单生意，但是现在“一整月都卖不出一件”几乎成为常态。在景德镇莲社大街的艺术品陶瓷聚集地，不断有瓷器店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房租费用歇业转让。

而靠关系获得“大师”头衔的作品更是没有生存之地。在景德镇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年轻女雕塑艺术家，花了上百万买到“省级大师”的称号之后，她的作品无人问津。一些靠关系评选为“大师”的艺术家，如今以画流水线作品低价出售谋生。

华艺拍卖公司总裁蒋卫民告诉《凤凰周刊》，按照他们以往拍卖市场的价格，只要评选上了国家大师，价格可飙升十倍以上。但从2013年年底开始，许多标着大师名号的陶瓷艺术品价格大多“腰斩”。但一些具有艺术水准的作品价格依然不会下跌。

在景德镇老厂有陶瓷艺术品工作室的汪美丽是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以擅长画花鸟享誉业内，在她看来，陶瓷艺术市场价格虚高的泡沫散去之后，给了潜心创作者们更多的市场空间，她的生意就没受到太多影响。

而刘昌亮从2012年才开始从事瓷画创作，主攻藏传佛教的壁画。他经常在位于陶艺街的汉字粉宋的店里向游客们介绍画作。6月一个下午，他以6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一幅作品，对于新人来说，这是不错的成绩。

陶艺家、全国政协委员郑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议案，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彻底清理和取消当前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各种“大师”称号制度，尤其是陶瓷艺术领域的“大师”制度，改为陶瓷文化“传承人”或“专家”称号，以净化市场，鼓励正常的竞争和创作。

在高端生意持续萧条之下，任山正准备将生意的重心放到中低端，这是在目前的市场行情中，他不得不采取的商业策略之一。

（实习生刘辛未、龙浩海、康亦玮亦对本文有所贡献）

内地肃贪波及澳门博彩业

记者 / 张弛

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向澳门施压，矛头直指服务高端赌客的博彩中介业者，以加大对非法资金流转的监控，抑制贪腐和洗钱。

受内地反贪腐力度升级消息影响，澳门博彩股2013年2月6日全线逆市重挫后企稳。其中，永利澳门一度大跌逾8%，银河娱乐、新濠国际、金沙中国、美高梅、澳博控股等跌幅均超过4%。

据英国《泰晤士报》消息，中国政府计划打击博彩中介业者“沓码仔”，以遏制内地贪官及富豪到澳门赌钱、洗钱等行为。中介业者的服务对象是出手大方的所谓“高端”赌客，“沓码仔”专门为其提供贷款并负责收债，从中抽取佣金。

报道称，大陆司法部门的人士说，大规模整治行动将于农历年春节过后展开，届时内地警方亦会配合在澳门的行动，集结六个一线城市的警力全面肃贪。这将是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行动的一部分。一位澳门博彩业人士向记者证实，目前小规模的取缔活动已经开始。

肃贪风暴

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向澳门施压，矛头直指服务高端赌客的博彩中介业者，以加大对非法资金流转的监控，抑制贪腐和洗钱。

自2012年10月下旬以来，中国警方已经拘捕了至少三大澳门博彩中介公司的多名工作人员。知情者称，这些博彩中介业者涉嫌向内地超级赌客提供贷款，然后到大陆收债。其中7名博彩中介业者在美国赌业大亨斯蒂夫·维恩（Steve Wynn）开设的永利澳门酒店被捕。

路透社的报道称，此事或与薄熙来一案有牵连。知情人士说，另有至少4名博彩中介业者在内地被拘，其他被拘者目前也已转移到了内地。

报道引述澳门赌场高阶人士的说法称，赌场运营商亦注意到当局对于内地资金跨境流动的更多限制，并在近期接到特区博彩监察协调局发出的最新内部规定，要求中介企业每月提交客户名单，包括赌博的具体时间和输赢金额。每一笔贷款也必须有详细记录。

同时，澳门也在重审其反洗钱规定，并要求赌场运营商对拟调整的规则给出反馈意见。澳门十六浦度假村酒店行政副总裁马浩文认为，中

国政府试图通过近期的拘捕行动告诉人们要“守规矩”，特别是在秘密转移资金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新体制一系列旨在改善自身形象的努力，以及其后陆续发表的反贪腐言论，使得强势反腐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在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管治奢华消费方面，澳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这里是中国境内唯一可以在赌场内进行合法赌博的地方。过去10年间，得益于“赌权开放”与大陆“自由行”政策，澳门博彩产业迅速壮大，吸引了大批挥金如土的内地游客，将这座城市变成亚洲赌城。据澳门特区政府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澳门的博彩业收益超过380亿美元。这是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6倍。

但这也给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带来挑战。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居民每年带到境外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由于这一限制，一些大笔下注的赌客只能依赖博彩中介获得更多资金。此外内地富豪和贪腐官员利用赌场洗钱，非法转移财富。

2012年12月21日，深圳市人大代表、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综合党委书记陈醒光因涉嫌参与境外赌博被免职。陈醒光因一则网络举报进入纪检部门视野，据称其曾多次到澳门豪赌，为了偿还欠下的7000万元赌资，他在股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2010年把六约社区全体股民投资兴建的深圳圣德堡酒店以5000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他人。

就在今年1月，两名内地商人同时遭澳门威尼斯人赌场追债。一位是内地融众系风云人物谢小青；另一位则是明星女企业家邹蕴玉，曾以15亿身家列胡润女富豪榜第44位，持有高远置业53.99%股权。两人分别被追讨1100万港元及2300万港元赌债连利息。

2012年，邹蕴玉及谢小青亦遭澳门美高梅金殿赌场追债，数额分别为1400万港元及880万港元。这家赌场是“赌王”何鸿燊二女儿何超琼旗下公司。

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统计，过去一年中有2800万游客到访澳门，其中逾六成来自中国内地。前些年中国经济红火时，澳门是让多余资金流出中国的减压阀。但如今经济增长趋缓，公众对腐败的怒火越来越大，有关官员赌博欠债的报道让中国民众感到愤怒。

继2012年4月香港严格其反洗钱规定后，现在澳门也在跟进。虽然大陆之前也曾多次收紧政策，但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些措施显然有所

升级。

博彩业是一个政策依赖性极强的产业。作为澳门的支柱产业，其对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近期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博彩业监管的消息，令人担心澳门的高速增长是否会继续。

澳门一位博彩业界人士认为，“这将给澳门带来切实影响，因为许多赌徒的资金都是非法所得，”他说，“我相信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办者苏国京持不同意见。他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澳门摆脱对博彩业的依赖，发展多样化产业，但“多样化并不意味着盈利会减少”。目前澳门的餐饮、娱乐等其他服务业的盈利只占总产值的5%，而拉斯维加斯的非赌业产值占比高达50%。

美银美林报告称，即使确实打击“沓码仔”，有关极端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天大证券董事施俊威接受访问时亦称，对于中央整顿澳门赌业的行动毫不意外，预期澳门博彩股于短期内将借消息作沽货调整的借口，中长线板块前景仍然看好。

与此同时，越来越意识到博彩对经济重要性的中国政府，一边狠抓反腐，一边将手伸向了这个带刺的“金窝窝”。2013年1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修订的《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此前一直游走于行业边缘的网络销售彩票终于合法化，A股相关概念股鸿博股份、安妮股份等随后三个交易日最大涨幅均超过30%。

洗钱天堂

外界普遍认为，澳门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人对赌博的热情，从大陆市场逃离的大量不安分游资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透过繁华的澳门，可以洞悉中国大陆的官场腐败，也可以体察到大多数中国商人对于大陆政治气候是如何诚惶诚恐。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援引《拉斯韦加斯评论报》的报道称，“2012年澳门博彩业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80亿美元，这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数字超过了2011年全美商业博彩业356.4亿美元的收入。

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博彩业收入猛增的现象似乎让人看不懂，但香港网络新闻杂志《一周中国》给出的解释是：很多中国富人利用赌场洗钱，为自己移民海外准备资金，因此博彩业收入的高低实际上能够说明富人是否对国家有信心。“博彩业收入越高，信心就越低”。

《纽约时报》统计称，2010年共有50.8万中国人离开家乡，前往经

合组织的34个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比2000年增加了45%。而这一趋势仍在持续。在2011年，共有8.7万中国人成为美国永久居民，比前一年的7万人又有增加。

报道认为，这正是澳门博彩业收入增加的原因。《一周中国》写道，如果你认识到澳门为“聪明钱”离开这个国家提供了逃跑路线，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通过中介的一番运作，现金一旦到达赌场就会变成港币。很多钱被赌掉，但仍有巨款流入离岸银行。”

在这个链条中，中介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也由此而成为澳门博彩业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掌控着绝大部分的豪赌客名单，赌场必须与之合作才能获得豪赌客的光顾，这也是澳门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博彩中介直接接触澳门赌场，为VIP客人安排签证，以折扣价购买筹码，能帮玩家避免身份确认。虽然必须注册在案，且名义上受澳门政府监管，但这些促进博彩的机构据说在与有组织的大陆犯罪团伙密切合作。

一位研究有组织犯罪的专家声称，因为澳门赌博业蓬勃发展，大量中国大陆的“黑钱”进入澳门，使得操控赌窝的黑帮组织“三合会”进入二战以来最鼎盛的时期。

2013年1月14日，针对澳门反洗钱及反恐融资现状，澳门金融情报办公室公布了可疑交易报告（STR）统计结果。报告显示：2012年1-6月澳门博彩业可疑交易举报982宗，其中由博彩业举报的约占70.4%。

在2011年，澳门全年收到的STR数量是1563宗，2010年则是1220宗。大量资金从澳门流出国门自然会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度采取了临时措施，以限制向大陆居民发放《港澳通行证》的数量。

知情人士称，出于对中国政府重拳打击博彩中介业务的担心，目前赌场经营者正努力吸引更多单纯为了找乐子而赌博的大众赌客。有些赌场正在减少赌博区的面积，从而规划出更多区域用于商店、戏院和餐厅的建设。此前广州到澳门高铁的开通，也为吸引这部分赌客提供了便利。

有证据显示，博彩中介服务的大赌客们正在缩小其下注规模。2012年第三季度，澳门VIP博彩业务的营收同比下降了1.1%，这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相比之下，老虎机和大众赌桌的营收则增长了27%。对

于赌场而言，这些不通过博彩中介抽取佣金的大众赌客更实惠。

赌场经营者这样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一旦大陆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前往澳门的内地有钱人很可能将面临业务量下滑及房地产投资大幅缩水的困扰，那么，在澳门的200多家赌场中介则可能在向大陆赌客追讨欠款时遇到麻烦。“在大陆，由于赌博行为的非法性，所以因赌博所产生的赌债不受法律的保护。一旦赌客跑掉或者赖账，想要追回也并不容易”。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

神秘的利益链

澳门的赌场内，最热闹的永远是“中场”的赌台，但赌场七成以上的收入却来自那些“闲人不得入内”的神秘贵宾厅。《澳门日报》曾报道，当地赌场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其独特的贵宾厅模式。相比之下，拉斯维加斯的贵宾厅收入只占赌博收入的四成，在新加坡约占四至五成。

据澳门博彩业内部人士透露，贵宾厅客人一般分三个档次，不同档次的客人会享受不同待遇的服务。那些享受最高礼遇的豪赌客，可以免费享受葡京酒店最好的套房、最好的餐厅、豪华轿车接送，甚至可以不用拿现金就能先领取巨额筹码。

各个赌场贵宾厅与赌场老板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承包摊位者与出租场地者的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与其他地区的贵宾厅与赌场是同一公司不同，澳门贵宾厅独立于博彩企业，独设法人公司。由于当地博彩业极度依赖贵宾厅，使得政府对于大额交易的监管实际上流于形式。一个业内公开的秘密是，谁拥有一间豪华的贵宾厅，就意味着每年数千万元的稳定收入。

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办者苏国京撰文称，经由赌场贵宾厅，博彩中介不但可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调拨资金，还可以完成现金的走私。“若中介串同客户进行洗钱活动，或者将非法资金与合法资金融为一体，将会令资金来源及客户的身份识别变得更为困难”。

如果希望绕过外汇管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调拨大额资金，可在博彩中介人的帮助下，先把资金转移到当地赌场贵宾厅，并由该贵宾厅通知位于另一国的地下钱庄汇款人。汇款人随后会安排所需资金付予受益人。反过来也一样，如有人希望在别国的赌场进行博彩，可以通过同一个地下钱庄汇款人安排汇款。

当这些客户到达了贵宾厅后，他们便可立刻获得该金额并进行博彩活动。贵宾厅及地下钱庄汇款人会在之后进行对数，双方基本上不需要

有资金交收。

还有一种是现金走私。赌场中介人收到一个来自国家A的赌客款项，但该赌客想在国家B赌博。中介人于是将款项带到国家A的一家商店，该商店将款项细分为几份，再由多位“职业水客”带到国家B。另一位代理在国家B收集这些细分现金后，通过现金存款、支票存款、银行转账过户及汇款等方法存入当地博彩中介人的银行户口。

当收到全额时，赌场中介人再将款项转换成本票并交予娱乐场贵宾厅。之后贵宾厅便会按本票金额发出一种特殊筹码“泥码”给该位国家A的赌客。当赌客从赌桌赢到现金后，会将现金给予赌场中介人经地下钱庄汇回国家A。

但博彩中介人绝不是能够时刻满足客户需求的天使。在大多数情况下，找他们借贷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隐匿于赌场之外的这些中介交易中，“九出十三归”是行业里的潜规则：借10万的话，对方只借9万，还的时候要还13万。“如果借钱是拿去赌的话，放贷的人还要跟着你，每一局都要抽你佣金。”一位曾在澳门工作的人士介绍。

澳门赌业：站在中共反腐漩涡的边上

记者／吴如加　实习生／钱薪宇

尽管处于博彩业寒冬，澳门民生却未受影响；难得一见的赌业下滑时期，也被认为是实践多元化经济发展思路的好时机。

每隔半小时至一小时，广州火车站便有一班列车发出，以200公里的时速向南奔驰，一个小时后抵达珠海。列车被冠名为“威尼斯人号”——冠名者是澳门威尼斯人赌场，车厢内的头枕巾和桌板上也印满该赌场的宣传广告。

“威尼斯人号”的终点紧邻珠海拱北口岸。走出列车，目力所及之处，莫不是威尼斯人或新葡京赌场的巨大海报。

由拱北口岸步行3分钟便到了澳门半岛最北端的关闸。出关后乘车经嘉乐庇总督大桥，一直往南，就到了路氹城——这里原是澳门的两座离岛氹仔和路环之间的一片海域，填海造陆工程将这里填平。如今，新生的路氹城成了赌场云集的地方。在这里，金沙、银河、威尼斯人等多家新式赌场占地广阔，如城堡般一座座耸立着；刺眼的灯光下，壮丽的外观甚至有些略显浮夸。

不过，那些最慷慨的豪客是不会乘坐列车前来的。为了吸引他们的光顾，赌场中介会提供往返机票、接送豪车和酒店客房，一切简单得就像在茶餐厅里为客人提供一杯免费的柠檬水。

曾经享受过上述服务的豪客中有一些曾是中共的官员，他们在澳门赌场闪烁的灯光里留下慷慨一掷的身影——当然，他们掷出的本就不是自己的钱，赌款要么来自被贪污、挪用的公款，要么是企业的巨额贿赂。大量非法资金的流入，以致澳门被港媒称为“黑钱洗衣店”。

2015年5月9日被遣返回国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潜逃新加坡长达4年之久，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上排名第二位，贪污款项多达9400万元。李华波不仅是澳门赌场的常客，在赌桌上累计投注30亿港元，输掉了3400余万元，还通过澳门地下钱庄，将2953万余元人民币转移至新加坡。

“参与境外赌博的干部100%有问题。”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曾如此断言。

得益于贪官在内的豪客们赌桌上的贡献，以博彩业为主要财政收入

的澳门自1999年回归后经济增长迅猛，每年财政盈余多得无处花。从2008年起，澳门特区政府开始向当地居民派发“红包”，八年来未有间断。去年，每一个澳门居民都领到了大约9000元澳门币的“红包”（注：100澳门元约等于78元人民币）。

越叠越高的筹码之下是一个日渐富裕的中国，以及心照不宣的腐败。在香港高登论坛一则“大陆贪官澳门赌输几多钱”的帖子下，有人留言“我代表全澳市民多谢你，下年又有钱派。”

但腐败经济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中共十八大掀起强劲反腐败风暴一年多之后，澳门博彩业收入终于在2014年6月突然扭头下跌，下跌趋势目前仍未停止。

大陆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而且力度未减。站在反腐漩涡边上的澳门赌业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北京反腐盯上澳门

大陆的政治气候变化从来都会影响到澳门，或多或少，或早或晚。1966年，北京高昂的革命气氛曾激励澳门人拉倒葡人铜像，冲进了总督府；1999年的回归则让澳门彻底告别了街头横行的黑道。因此也没有人怀疑此次内地反腐运动对澳门的冲击，只是对其影响程度的大小，难以作出具体的评估。

作为中共治下唯一可以合法赌博的地区，澳门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一试运气，也成为了内地官员们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

早在澳门回归之前，毗邻“赌城”的珠三角地区便一度赌风盛行。陆媒《新民周刊》在2004年曾报道，一位政府官员在澳门发现，周日的早晨，他手下的中层干部几乎尽数出现在当地的茶楼中，这令他大为不悦。回去后在隔周的工作会议上，他愠怒地说：平时开业务工作会，你们这些人从来都到不齐，周末去澳门赌，你们却一个不落。今后局里的重要会议，干脆放在澳门开算了。

某种意义上，澳门博彩业的迅速膨胀，与内地官员的捧场不无关系。澳门理工学院曾忠禄教授曾搜集了一些见诸于媒体的贵宾厅豪客案例并写成报告。搜集的122个案例中，有99名豪客是来自中国内地，另有18人来自香港，5人来自台湾。来自内地的99名豪客遍布22个省或直辖市，其中59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政府官员33人、国企高管19人、国企出纳7人。另外，还有民营企业主26人。他们大部分为30至49岁的男性。其中政府官员人均输掉的金额为2208万元人民币，国企高管则人

均输掉1567万元，输钱最多的一位官员输掉了1亿元。

澳门某赌场的荷官（即赌场发牌员）阿度对内地赌客的阔绰印象深刻，他对《凤凰周刊》回忆称：“大陆客人比较随意，他们专注于赌台上。香港的客人就比较挑剔——输了会责怪‘你怎么发牌的’。大陆客人这样的不多，输了就输了。”

赌场荷官岗位只对拥有澳门身份的人开放，但由于内地豪客越来越多，“会说普通话”成为竞聘时的优势。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

由于回归之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一国两制”典范的澳门，无意间也成了暴露内地腐败现象的一块疮疤。随着大陆反腐运动的深入，北京的中共高层对这块疮疤愈发难以容忍。在继续加强内地贪腐打击的同时，中共官方还将打贪的触手伸入了澳门。

《经济学人》杂志早在2013年便曾援引一位经常在澳门赌场款待客户的中国商人的话，“在澳门，北京有太多的摄像机盯着我们。”

2014年接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的李刚，同时兼任十七届、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其在十八大之后赴澳门履职之初（当时就任中联办副主任），外界便对其中纪委背景有着诸多猜想。英国广播公司曾经报道，李刚调任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挪用公款或国有资产、在赌场挥霍的内地官员。

201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与澳门金融管理局主席丁连星，就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反洗钱合作与交流进行了沟通，达成了签署反洗钱监管合作备忘录的意向，共同表达将致力打击利用澳门作为中转站，进行海外洗钱、资本外逃等行为。

2015年初有港媒报道称，公安部的官员将与澳门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和银行家进行重要会晤。公安部门将监控澳门所有通过中国银联银行卡支付系统进行的资金往来。大陆官媒新华社下属的《参考消息》于1月19日援引了该消息，当天，六只澳门博彩股在一天之内蒸发了265亿港币市值。

今年全国两会以后，澳门廉政专员张永春等一行多人还专门北上，于3月30日与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会面。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黄树贤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与澳门廉政公署加强追逃追赃务实合作，加强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执行力度，以推动内地与澳门反腐败事业的共同进步。”

次日，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与张永春的会面中亦强调，内地检察机关与澳门廉政公署作为两地反贪腐的重要力量，肩负共同职责使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对此，澳门立法会里唯一的土生葡人议员高天赐公开表示，不排除内地贪官与澳门赌场有密切关系，甚至利用澳门赌场作清洗黑钱场地。他认为，虽然内地进一步加强打贪力度，甚至把打贪范围伸延至澳门，或会再打击已接连下跌的澳门博彩收益，“不过保持澳门廉洁形象，比赌收更加紧要。”

同为立法会议员的关翠杏亦支持澳门配合反腐，“作为一国之内的特别行政区，既有义务对国内打贪给予配合，也有出于自身反贪工作的需要。”尽管内地与澳门之间尚未建立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但在有关范畴内的情报及讯息交换和合作关系一直都存在且有成效”，因此关翠杏认为，双方在反贪一事上会有更多方面可以相互配合。

近日，凤凰周刊曾致函澳门廉政公署及金融管理局进行采访。两个部门均未否认与内地纪检、监管部门存在合作。澳门金管局更表示“长期以来一直就跨境金融监管包括反洗黑钱以及反恐怖主义融资等跨境犯罪，与中国内地的相关部门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并提及2014年11月曾与内地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银联国际等部门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内地与澳门间有效的联动监控机制，以打击“国内银行卡 POS 机跨境犯罪”。

澳门博彩业的冬天

2014年2月，仅仅一个月，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就达到了380亿澳门元的历史高点，同比增长40%。而2014年全年的澳门政府全部财政开支，也不过是657亿澳门元。

但也就在2014年，澳门博彩业收入开始了断崖式狂跌： 6月同比跌3.7%，8月同比跌8.1%，10月同比跌23.2%，12月同比跌30.4%。2015年，下跌的趋势并没有停止。

资本市场的反应也极为激烈，在香港上市的几家博彩公司几乎都遭到了“腰斩”。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在过去12个月中，在澳门收入排名前三的博彩大亨的总市值已经缩水了220亿美元。其中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受影响最大，作为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董事长，一年前他的财富达373亿美元，排名全球第11位，但过去12个月中，他的财富均缩水超过20%，目前列第25。

而银河娱乐集团的中国所有者吕志和财富缩水达40%，从全球第40位下跌至108位。另一位国际博彩巨头——永利娱乐创始人蒂夫·韦恩（Steve Wynn）的财富也缩水超过20%。

2015年3月，澳门博彩业连续第10个月同比下滑。阿度站在熟悉的赌台前环视四周，他告诉《凤凰周刊》，比起一年之前的繁荣光景，赌场冷清了不少。“人少了，尤其赌得大的客人少了，以前大陆当官的来赌，他们可以几百万几百万地下注，现在这些人都不见了。”阿度接待的客人中，95%来自中国大陆。

全世界都在为可怕的跌幅惊呼，媒体和分析师们纷纷将其描述为澳门博彩业的寒冬。

澳门中联办主任李刚承认博彩业的下滑与内地反腐“有关系”，但否认反腐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尽管主流观点普遍将这一轮的下滑归因于反腐。

曾忠禄也不认同这一主流观点，因为大陆反腐自2012年12月之后便声势浩大展开，内地打击官员出境赌博甚至开始得更早，这确实难以解释为何直到2014年6月才出现的负增长，更无法解释2014年2月的史上最高单月收入。事实上，自2007年之后，内地对国家工作人员到澳门旅行就实行严格限制，曾忠禄称，从那时候开始，来澳的政府官员及国企老总就非常少，他们对澳门博彩业的贡献也已停止或非常小。

显然除了反腐之外，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赌场的收成。例如，2014年6月，澳门治安警察局收紧了中国内地护照的过境限制，同时，澳门金管局加强了对银联卡的规管。甚至10月份赌场实施的禁烟令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

曾忠禄认为，从时间点上看， 2014年5月发生的“黄山事件”是最直接的诱因。

中介人黄山是澳门一家贵宾厅的代表，他在这个行业里活跃了四年，手下有100多人为他工作。四年之中，大量内地投资者将大约80亿至100亿港币投入了黄山经营的贵宾厅，黄山则每月给予他们高达2.5%的利息回报。黄山将这些钱贷给贵宾厅的豪客，再从他们输掉的钱里获取分成。

4月中旬，黄山给手下人发了奖金，随后便解散了他的公司，并从此消失。投资者近100亿元的投资化为乌有，和黄山一同消失的，还有投资者对博彩中介的信任。

“投资者对贵宾厅投资，贵宾厅并没有任何财产做抵押，唯一的保证是同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关系。黄山跑路令这种信任关系立刻消失。”曾忠禄写道，他将这场信任危机比作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

此后，投资者纷纷收回对贵宾厅的投资，豪客们也不敢把赢得的钱再寄放在贵宾厅。于是贵宾厅的资金链断裂了，由此导致的经营恶化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恶性循环之下，缺乏实力的贵宾厅开始关闭。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则认为，外部因素是造成赌场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内地经济、环境、政策的影响也是很直接的。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今天的结果。内地的经济增长放缓、内地的政治形势变化、反贪腐的运动，这些肯定都会有影响。很难评估，不可能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但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澳门民生未受影响

对于狂跌的博彩收入以及部分客流的减少，赌场方面显然也不太担心。

阿度告诉《凤凰周刊》，他的薪资刚刚还被上调了5%。“我们在路氹准备开新的赌场，6家持有赌牌的公司都要开。在开之前公司肯定要留住人才。如果你现在不加薪的话，别人加了，员工就会跳槽过去。”

事实上，除了赌场VIP厅中介人和相关的公关、会计、客服、奢侈品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澳门市民和阿度一样，其生计、生活并未受到博彩业下滑的影响。赌收的下降在澳门引起的波澜，并未比澳门之外的世界更大。

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澳门博彩业收入仍然达到了650亿澳门元，这个数字已经与去年整个澳门的全部财政支出持平。博彩业收入大约有40%左右会以直接税收等形式转化财政收入。这意味着，即便下滑趋势不变，博彩业今年对澳门财政的贡献仍然足够澳门政府全部支出，而且还会有较高盈余。

柳智毅称，对于博彩业收入连续10个月下滑，“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担忧，但是目前看不到对澳门居民的生活有任何影响。”对于澳门博彩业收入在今年2月同比跌幅达49%、3月跌幅达39.4%，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数据的游戏”。

他解释道，49%的巨大跌幅是以去年2月份的赌收作为参照的结果。而去年2月份的博彩收入创纪录地高达380亿澳门元。“我们的博彩业一直往上翻翻翻，2014年头几个月的基数都很高，现在的同比跌幅都是拿今年的月份和去年做对比，这样一比，当然差距很大。”

柳智毅预言，2015年后半年的数据会完全不同，“因为2014年7月、8月的基数已经下来了，一比可能就没事。”

这一轮下滑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贵宾厅的厅主以及中间人。

澳门博彩业高度依赖的贵宾厅并非由博彩公司自己经营，二者之间类似于摊位承包者与场地出租者的关系。据香港《明报》报道，在澳门博彩业的黄金时期，拥有一间豪华贵宾厅，意味着厅主每年有数千万元的稳定收入。

“赌场的盈利能力肯定会减少，但经营方面基本上影响不大。现在只听到私人承包的贵宾厅经营不下去会关门走人，而赌场不可能。”柳智毅说，“贵宾厅经营不下去的情况暂时不是很多，就算没有博彩下滑，在市场竞争中也很正常。”

关翠杏对博彩业的下滑也表示并不担忧，“现在受影响的主要是赌厅里的公关人员，部分赌厅不能营业了。还有奢侈品消费行业，也受了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还称不上是危机。”

虽然贵宾厅的部分工作岗位流失了，但澳门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现在澳门的失业率是1.7%，几乎全民就业，如果一些（赌厅、奢侈品商家）结束了，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关翠杏说。

尽管股市市值大幅缩水，但树大根深的六大博彩公司也不会面临即刻的危机，几年来累积的雄厚资金给了它们充裕的缓冲时间，并不会影响未来新赌场的项目进展。在路氹城，巴黎人、永利二、三、四期、新濠影汇、横琴度假村等新的娱乐场项目仍旧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乐观估计，新项目的建成将会提振市场。即便博彩公司真遭遇运营上的危机——这种可能性近乎为零——澳门特区政府亦不会允许赌场关门，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前任特首何厚铧便曾表示：“如有必要，政府将进行接管，我们将不会允许任何赌场倒闭。”

虽然澳门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博彩业，博彩收入下滑不可避免将影响政府财政状况。“税收肯定会少，但不会影响澳门居民的福利。”柳智毅说，“因为过去赚的钱太多了。”

今年3月23日，澳门特首崔世安在向特区立法会全体会议作201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时指出，加上2014年财政年度的预算结余902.96亿元（澳门币，下同），至今年1月底，澳门特区政府财政储备总额已达4324亿元。此外，外汇储备总值达1333亿元。

“西方的政府都是赤字，我们盈余这么多，澳门才60万人口，除以人均的话，是非常丰厚的。所以这个基础非常稳固。”柳智毅分析，“2013年我们整个政府总收入1500多个亿，但整个政府所有的开支，包括澳门大学的开支，才500多个亿。每年有900多个亿用不完，所以，怕什么呢？

高天赐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便（政府）收入是零，过去（存）的钱还够我们用6年。”

巨额的政府财政储备使得特区政府在博彩下滑的情况下，仍提出了增进居民福利的计划。特首崔世安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在今年预算案基础上，将敬老金调升到7500元，普通残疾津贴调升到7500元，特别残疾津贴调升到15000元。

澳门大学商业经济学教授萧志成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亦表示：“如今，“蛋糕”已经很大，大到足以让澳门政府保证澳门的发展。”

曾经的澳门神话

“人家都说，澳门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神话。”关翠杏说，然后随即又补充道，“但神话是不正常的。”

美国富豪谢尔登·阿德尔森与香港商人合作，于2004年5月耗资2.65亿美元在澳门建造金沙娱乐场，开业10小时内，金沙的营业额突破1000万澳门元，7个月后金沙宣布收回了投资。金沙娱乐场的博彩业为阿德尔森带来了3.2亿美元的税前收入，比他2004年从4000个酒店客房和展厅、商店及拉斯维加斯超豪华顶级酒店“威尼斯人”老虎机得到的收入总和还多。这便是澳门人所说的“金沙效应”。

《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欧逸文对这座赌城的快速膨胀感到惊奇，他记下了《澳门商业》杂志的发行人阿齐维多对他说的一段话——“拉斯维加斯花七十五年的成就，我们十五年就达成了。”

截至2014年底，澳门这片弹丸之地上耸立着35家赌场，5750张赌台，23%的人口就职于博彩业，他们的平均月薪是两万澳门元。2002年

赌权开放伊始，澳门的GDP仅为548亿澳门元，2013年则飙升至4135亿，膨胀了7.5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澳门的人均GDP超过9万元，已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四。

在柳智毅看来，博彩业对澳门的巨大贡献非常直观。“2013年的政府收入，每100块里面，有81块都是从博彩税收的。”

毋庸讳言，澳门神话全由赌场撑起。

澳门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就曾指出，2002年的“赌权开放”较之1999年的“政权交接”，对大多数澳门市民的影响更为全面和深入。

“现在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包括养老金、现金分享、医疗开支、对澳门大学的资助，钱从哪里来——博彩的贡献。我们还规定所有博彩税收里面1.6%归到澳门基金会，基金会主要目的就是资助一些社会活动，包括学术文化、慈善，包罗万象。”柳智毅说道，“大家都说我们澳门人有很好的福利，很幸福。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博彩业。没有博彩就没有这些。”

纵观世界，一座赌场的诞生总是源于当地政府的财政紧张，开放赌博无疑是增加财政收入最快的一种方式，澳门也不例外。1842年，香港开埠，澳门的贸易港地位逐渐被取代。为了解决财政上窘迫，澳葡政府在1847年即宣布赌博合法。19世纪后期，博彩业便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1896年，葡萄牙政府宣布在本土禁赌，禁赌令在大部分海外殖民地都得到了执行。但在澳门，博彩业则一直游离于法律的模糊地带。

直到1959年，马济时出任澳门总督。任上，他为了定位澳门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对澳门的地理和资源条件进行了调查。马济时认为，澳门的工业难有太大的发展，亦无可能如香港那样，成为远东的重要贸易港口。因此，澳门的未来只能在博彩旅游上押宝。他将自己的意见汇报给里斯本，得到了葡萄牙政府的认可，并颁布18267号法规，使得在澳门经营博彩业完全合法化。

上个世纪80年代，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博彩业一度成为澳门的四大支柱产业，后来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建筑业纷纷外移，金融业亦因此不景气。于是形成博彩业在澳门一家独大的格局。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认为，“中央政府允许澳门设立赌

场，主要是为澳门的生计考虑。澳门和珠海、深圳、香港、广州相比，在工商服务等行业上，没有什么竞争力。”

议员关翠杏记得回归之初澳门面临着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制造业是不可能了，建筑业也不行，建筑业需要在整个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才能变好、提升。当时澳门具备的唯一条件，就是回归之后，我们成了中国唯一可以合法开赌的地方，所以发展博彩业就是澳门的一条出路。”

内地赌客无疑是支撑澳门博彩业的绝对主力，尤其在收入最高的贵宾厅业务。去年一年，澳门特区政府仅仅从博彩业征收的直接税就达到1367亿澳门元，而这一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也不过是1560亿。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同1842年之前，澳门依赖中国皇帝给予的贸易垄断地位而繁荣，1999年后的澳门神话同样建立在北京给予的垄断基础上——在中国范围内独家经营赌博的特权。

无怪乎“赌王”何鸿燊说：“澳门博彩业突飞猛进和澳门社会繁荣稳定，与祖国的支持息息相关。”

“澳门是非常微型的经济体，它从来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外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是澳门经济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不是澳门内部能够左右的一个事情。从历史来看是这样，从回归到现在也是这样。”柳智毅分析。

漫长的多元化之路

难得一见的赌业下滑时期，被认为是实践多元化经济的发展思路的好时机。

正如中联办主任李刚所说，“博彩业赚钱来得太容易了，你让它去发展多元经济，它没有原动力，因此要适度发展，一旦博彩业走下坡路，其他产业才可以支撑。”

2014年12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问澳门时，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和完善对博彩业的监管，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果。”

实际上，由于对博彩业一家独大的顾虑，澳门政府早已提出了经济多元化的理念。

“发展多元经济跟收入完全没有关系。经济思路多，主要是为了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钱的问题。2006

年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每年都讲，这是我们澳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目标。”柳智毅强调，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但目前澳门接近一半的GDP仍由博彩业占据，大量人力资源被吸引到赌场和相关工作行业。香港资深传媒人区家麟在其文章中写道：“在澳门买楼，找装修师傅很困难，几乎所有工人都建酒店（澳门许多赌场与酒店一体）去了。装修工头手下无兵，所有工序硬着头皮自己做，价钱贵、工期长、质素无保证。”

博彩业天然的道德瑕疵也使一些人质疑其在澳门的发展方式。陶堂（化名）是一名本地社团的骨干成员，“澳门赌业真的有一些道德问题。”陶堂说，“在澳门，博彩根本不是娱乐，不像国外那样拿些小钱试一下运气，赢就好，输了就算了。很多来澳门的人是来赌身家的，靠这一种客源的增长是不健康的。”

在博彩业发展势头良好的过去，尽管经济多元化的思路被反复提出，成为澳门各界的共识，并在一些领域小有所成，但终究缺乏长期动力。“赌场收入增长很厉害，根本不用想其他产业，这个收入每一年在增长，用得着去管它多元化吗，所以就根本没人管。”陶堂解释道。

一个多元化的澳门，同时也是文化层面的需求。“如果澳门仅仅被理解成一个赌城，在世界面前呈现这样一种文化特色，这不是澳门的成功。”在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看来，澳门是中国与西方最早相互窥望的窗口。天主教的传教士从澳门走入内地，中国的朝廷通过澳门了解了西方。“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东西方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文化的多元，符合澳门的历史，也符合澳门的社会生态。”

在博彩业当道160多年的澳门，要发展其他产业并非易事。尽管目前各大赌场运营商均在其经营范围内增加了大量非博彩业务，但这一部分投入并未带来令人兴奋的回报。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拉斯维加斯，博彩业为赌场运营商带来的营收还不到一半。在澳门，这一比例目前在88%到99%之间。何鸿燊的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非博彩业务占总收入的比例仅略高于1%，而业务最为多元化的金沙中国，非博彩业务收入占比为12%。

近年来澳门大力发展的会展业，目前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1%。

“这是一条长期道路。”李刚说，“我个人来看，需要30年时间才能实现多元经济发展。”

“博彩业的体量太大了，占GDP比重也好，产业比重也好，（其他产业）没办法跟它做一个对比。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不可能期待一朝两天就有效果。”柳智毅分析道，“博彩绝对还是一个大头。所以中央给我们的一个方向政策，是经济‘适度’多元，‘适度’两个字没有量化。”

毕竟，无论人们对博彩业有多少诟病，眼下澳门仍然坐在这条船上。